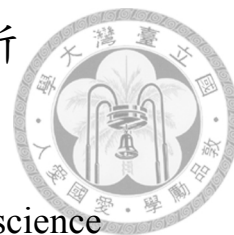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In-depth Reporting

壓不扁的玫瑰

- 中國大陸調查記者的生存困境與突圍策略

The Uncrushable Roses--

Predicaments and Tactics of th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簡永達

Chien, Yung-Ta

學術指導教授：張錦華 博士

Advisor: Chang, Chin-Hwa , Ph.D.

深度報導指導老師：何榮幸 先生

In-depth Reporting Advisor: Jung-Shin Ho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April, 2014

誌謝



午後一場大雨，讓城市也氤氳著草氣，應是舒爽時節，但此刻坐在灰色皮沙發座椅的我，臉上卻擠不出笑。不僅是班機延誤超過兩小時，還有筆記本裡的採訪名單還聯絡不上，以及腦中反覆出現兩天前大綱口試時，榮幸師說的那句：「永達的論文是在尋找心中的典範。」

焦慮與不安，沒有因為抵達廣州而消解。抵達的頭一天，意外得知願意協助採訪的老師臨時出國，每天醒來我只能在微博搜索採訪對象，並寄發私信希望能見面。前兩週的時間就在重複中消逝，採訪沒有進展，而且不知道哪時候才是個起頭。對於採訪的困境，我有更多諒解。畢竟，中國調查記者不過三百人，在超過三十萬的記者群體中，屬於少數群體，更何況他們的報導經常觸碰監管底線，讓他們更敏感於保護自身安全。

坐在電腦前書寫誌謝的下午，我很難一一回想採訪如何突破。不過，從毫無頭緒到論文付梓的過程，我感謝所有人的陪伴。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張錦華老師教會我語言的邏輯，而每次批閱論文密密麻麻的字跡，是我在混沌中安定的力量；何榮幸老師亦師亦友的相處，除了提點我在採訪與寫作上的盲點，更樂意與我分享記者工作的甘苦，為我定錨未來。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胡元輝老師與李雪莉老師，提供我豐富的人脈資源與採訪經驗，讓我的採訪之路走的更順遂。

中國調查記者的研究興趣，源自 2012 年赴北京大學交流的經驗，意外發現這片缺失新聞自由的土地，有群記者更願意集中所有氣力，只為喊出一句真話。為了採訪此選題，我陸續前往香港、廣州、蘇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親身接觸超過 30 位記者與學者，採訪時程將近三個月，逐字稿超過一千頁，近距離觀察中國調查記者的面貌。感謝每位受訪者與我分享經驗與觀察，他們有憤怒、有理想、討厭權威、不願妥協，他們是像草一樣堅韌的力量。

採訪得以順利完成，特別感謝廣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的張志安老師提供我豐厚的人脈，以及為我指認中國媒體環境的特殊性。感謝政大「兩岸學人獎助計畫」執行長陳德昇老師、「中華發展基金」和台大社科院「海外短期研究」

提供研究經費補助，感謝上海社科院提供短期住宿，感謝黃蓉、歐健與李茂老師給予研究之外的諸多照顧。



回憶起榮幸師的提問，如今想說：「怎會不是呢？」。自進入新聞所以來，報紙將死的警世預言迴盪在每節課堂，社會上「弱智媒體」「記者殺人」的批評聲不絕於耳。彼時的我，兼任傳學門召集人，與夥伴育志規劃調查報導的訪調計畫，希望奪回我們的光榮旗幟。因為，當新聞業失去光環，不啻為民主的硬傷。

課堂裡老師最愛提問「誰以後想當記者？」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原本高舉的手只敢怯怯地半舉著。感謝我有一群還想當記者的同學，與你們在剪接室熬夜看天光，或在研究室焦慮寫作業的日子，是臺大生活最美麗的片段。感謝鼓勵我瘋狂的家緯、傳遞溫暖力量的雅筑、忠實的質疑者中傑，以及兩位最盡責的小天使子歆和心怡；感謝昭珍、彩玲、歆婷與思敏，與你們的每頓療癒午晚餐都是單調生活裡不可缺少的調劑。感謝 r99 的每一位，與你們共度的點滴，不管是動員百位的 20 週年所慶，還是首次 Live 直播的小畢典，讓我至今想起仍驕傲不已。

感謝生命中遇到的每個你。感謝 30 雜誌的章瑜姐教會我故事的節奏；感謝中正大學羅世宏與政治大學馮建三為我介紹多位大陸學者；感謝賢亮抽離感情的批判，讓我能調換位置觀看中國；感謝國中以來的老友泰翔耐心修改英文摘要；感謝楷婷在我失落時總是溫柔傾聽；感謝宜璇陪我屢次往返中研院；感謝慧瑜為我介紹具有豐富中國採訪經驗的新聞前輩。

能以一篇自己滿意的論文拿到碩士學位，需要堅實的後盾。感謝父親總是以我為榮，母親願意給我更多自由，以及家人們的支持。最後，感謝辛苦又堅強的自己，這篇深度報導從企劃、文獻、採訪到寫作，每一步都不容易，困難到我每天起床，都要對著鏡子喊話「你很棒！不要放棄！」，才能繼續坐在書桌前敲下每個字符。

蛻變是必要的成長。在無數個為論文難眠的夜裡，我慢跑。慢跑大概是世上最孤獨的運動，四周寂靜，只有心跳聲相陪，當喘息聲大過心跳聲，就要重新調整呼吸，吸吸吐的節奏，讓人能重回平靜。掌握生命的獨特步調後，盡量提醒自己，別忘了尼采說的「永遠不要捨棄心中那個心高氣傲的英雄。」

中文摘要



隨著兩岸交流愈趨密切，我們需要認識更透明的中國，但中國的威權體制習慣隱匿真相，便有賴於調查記者為公眾挖掘真相。隨著兩岸交流愈趨密切，台灣需要對中國有更深入、全面、真實的認知。但在威權體制籠罩下的中國，真相就如奢侈品般稀少而代價高昂，發掘真相還有賴於有勇有謀的調查記者。

在自由之家發佈的《2013 年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中，中國排第 179 名，是全球最大的新聞不自由國家。自 2012 年中共領導層權力交接以來，以習近平為主的領導班子顯著加大了對媒體的管控，不僅平面媒體的限制增多，甚至有記者因觸犯宣傳條規而遭到調職。

其實，中國自胡錦濤於 2004 年提出和諧社會以來，新聞空間就被不斷收緊。相反地，中國的網路產業卻在十年間快速成長，許多調查記者菁英便轉戰網路，順理成章地將新聞專業主義帶往入口網站（中國稱「門戶網站」），在新聞頻道繼續實踐調查報導精神。

本文使用傅柯的「倫理主體」和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建構一理論框架以瞭解中國調查記者如何在政治與資本的雙重結構困境下，援引自身資本並巧設策略，令揭露黑幕的調查報導得以發表。此外，作者也試圖闡述中國調查記者所採用之突圍策略的機會與限制。

此篇深度報導論文合計採訪 33 位記者與學者，從外在壓力、個人主體和政治機會等面向勾勒中國調查記者的突圍經驗。他們嫻熟地使用網路科技，突破政治壓力下的新聞管制；平面媒體的調查記者能使用微博這類線上社交工具，找到關鍵的深喉為他們的報導提供證據；另外，部分記者則看重手機通訊軟體的私密性與其相對寬鬆的審查制度，選擇在微信等公共平台經營自媒體。

中國調查記者從實踐中不斷修正自己對邊界的計算，即使新聞空間持續限縮，他們仍保持信心，伺機而動，準備用調查報導來拓寬中國的言論邊界。

關鍵字：中國調查記者；中國新聞業；微博；突圍策略；媒體管制

ABSTRACT



This in-depth report focuses on the tactics used by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o disclose social tensions and the predicament they are in. In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3,' a report ranking global press freedom and publishing annually by Freedom House, China ranks 179th out of 196 countries. Since November 2012, constraints on print media have become more extensive after the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several journalists were dismissed or demoted for violating press regulations. Under this predicament, to the surprise of most people, there are still many Chinese journalists willing to risk their jobs for the sake of digging out facts

This thesis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set tactics and utilize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to disclose the truth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By interviewing 33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nd scholars in China,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ly, it's the possibilities generated by dilemma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political power. Secondly, the journalists' assets including their own network and efficiently usage of progressing internet technologies. Thirdly, it delivers limit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port show that the journalists proficiently use online micro-blogging tool such as "weibo" to find key person who is able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the coverage, and thus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censorship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s. In addition, "wechat," a popular messaging & social media service in China which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s cost of monitoring, the profits earned and the potential market make it hard to be pinned down.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journalists venture their "wemedia" on "wechat" plat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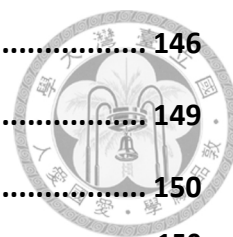
In practice,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re actually still toeing the line, modifying their strategies, trying to keep the faith and waiting for the moment of broadening the boundary of press freedom by their investigative coverage.

KeyWord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Chinese Journalism, Weibo, Tactics, Censorship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v
ABSTRACT.....	v
第一部分 深度報導.....	1
時代的紀錄者.....	2
最堅實的後援.....	12
— 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12
拿料的功夫.....	24
— 記者如何取得關鍵材料？.....	24
用事實說話.....	42
—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42
老將的網路實驗.....	56
— 資深記者如何在網路拓寬言論空間？.....	56
借力微博.....	70
— 記者如何透過微博找人？.....	70
去活在真實中.....	89
— 記者如何避免被民粹綁架？.....	89
新聞業的天氣.....	104
— 記者如何面對自去年的言論緊縮？.....	104
新聞自淨器.....	118
— 記者如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118
在路上，指向前方.....	132
— 網路會是記者突圍的出路嗎？.....	132



採訪後記	146
第二部分 採訪企劃	149
第一章 緒論	150
第一節 報導緣起	150
第二節 報導目的	154
第三節 報導背景	15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63
第一節 中國如何控制媒體	163
一、 中宣部職能	163
二、 媒體集中領導	166
第二節 中國調查報導發展史	178
一、 中國傳媒改革歷程	178
二、 中國記者主體性	191
第三節 中國網路政治	205
一、 中國互聯網發展	206
二、 中國微博政治	220
第三章 採訪規劃	229
第一節 報導架構	229
一、 報導形式	229
二、 報導概念架構	231
三、 報導切入點	234
第二節 訪談對象	236
第三節 寫作架構	242
附件一：深度報導企劃書	247
附件二：採訪名單	271
參考文獻	273



第一部分 深度報導

時代的紀錄者



2013 年，中國面臨言論緊縮的一年。

調查記者被限縮的新聞空間，會如何影響台灣？

北京清晨發佈霧霾，環保署下午跟著亮紅燈；

四年前，山城重慶吸引台商湧入，宏碁、富士康、日月光都搶進大西部；

兩年後，薄熙來無預警下台，西進台商投資泡湯。

當兩岸交往愈趨頻繁，我們需要透明化的中國，

但這個國家素有封鎖消息的習慣，

需要這群甘冒風險的調查記者找出真相。

筆者走訪中國五大城市，

訪問三十多位記者、主編、傳播學者、政治學者，

呈現中國調查記者的樣貌，

他們是，為時代留記錄的人。

「如果你要當調查記者，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知道如何讓自己安全嗎？」雷恩·布盧茲斯（Len Bruzzese）在《調查記者手冊》這麼問。

這個問題，在中國調查記者聽來可能有些諷刺，因為，在剛過去的一年，他們感受到自 1989 年以來最嚴厲的言論管制。

2013 年初，中國最大膽的報紙《南方周末》旗下的記者舉行罷工，抗議宣傳部門將呼籲中國尊重憲法權利的新年獻詞，替換成歌頌共產黨偉大復興的陳詞爛調，上百名記者透過社群網站連署，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度震下台。

8 月，中宣部要求全國新聞工作者，含編輯加記者至少 30 萬人，都要參加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培訓與考核，通過後才能換發記者證。同時，政府部門宣布中國各高校新聞傳播學院將採宣傳部共建模式，由官員出任學院負責人，主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

12 月，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發佈報告說，目前

有 32 名記者被關在監獄中，政府濫用反國家罪名對付尖銳批評的記者，在記者工作最惡劣的國家榜單中，中國排第三。



比起中國記者的命運，我們似乎更關心的是：台灣能否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

今年初，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南京會晤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是兩岸自內戰結束後首次政府部門正式接觸，具有象徵性意義。去年底，兩岸七十多家媒體媒體高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商談兩岸互設媒體辦事處，大談「加強正面客觀報導」、「積極傳播兩岸一家親」。

兩岸交流將在今年加速發展。原因發生在 4000 公里外的海島。

印尼峇里島，亞太經合會上，習近平自信演說：「兩岸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台下，前副總統蕭萬長微笑回應。

與自信的大國交流，台灣瀰漫普遍的焦慮。2008 年大陸爆發毒奶風波，高達 25 萬公噸的問題奶粉銷往台灣，危害國人健康安全；2010 年重慶拉攏台商西進投資，兩年後卻因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而受到波及。

甚至，前陣子的霧霾，每當北京清晨發佈黃色示警，全世界也跟著繃緊神經。據《紐約時報》報導，北京的霧霾已飄揚過海，來到美國中西部上空；日韓也全都發警報，二月份韓國首爾 PM2.5 指數連續一周超過 100，創歷史紀錄；日本則有 10 個縣發佈霾害預警，官方透過 NHK 放送消息，要求民眾減少出門。而台灣受大陸冷氣團影響，懸浮微粒指數（PM2.5）首先超標，醫院裡眼睛紅癢、氣喘過敏病患增加三成，對健康造成重大威脅。

當下的中國，更符合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描述的權貴資本主義，他們用錢和子彈遮蓋事實，而這群以「調查」為名的記者，對權力說真話是存在的唯一目的，他們潛入利益漩渦，探索這個國家最隱秘的秘密，並將之暴露在陽光下。



暴力與和諧

面對不確定的對手，我們必須了解中國調查記者的時代命運。

他們是誰？

按照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張志安的《中國調查記者生態報告》，即便是以最寬鬆的標準來定義，中國調查記者也不過 300 多人；根據另一位中國某南方報刊記者估計，目前仍在第一線跑新聞的調查記者不到 80 位。

對他們來說，2003 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這年，中共領導層更迭，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處理 SARS 疫情時，中國政府明快免職隱瞞疫情的官員，此舉激起民眾對新政府透明治理的期待。

同年，《南方都市報》刊登一篇報導，揭露大學生孫志剛因隨機的身分稽查，被警察毆打並死在收容所的可怕經驗。這篇文章引發全民抗議，當局隨即廢除收容制度，也讓撰寫報導的記者陳峰和王雷，成為中國調查記者的代表。

接下來十年，是興奮與壓抑交纏的日子。

經濟不斷地提速增長，終於，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少西方媒體興奮地喊出：「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但是，在中國這台龐大的經濟列車轟然向前時，也有許多人從列車上跌下，被巨輪碾過。貧富差距是它付出的代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4 年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 0.473，高於聯合國所定的警戒線，更何況這個國家一直有數據造假的問題，若按另一份西南財經大學 2010 年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高達 0.61，可被聯合國定義為「貧富差距懸殊」。

貧富懸殊，看似冰冷的四個字。換個更形象化的資料，中國國家衛生統計委

員會最新發佈的報告，中國肥胖兒童人數高達 1200 萬，佔全球 13 分之 1，但中國農村也有高達 300 萬兒童處於營養不良、遲緩發展。



貧與富，已經不是消費不起奢侈品，而是關乎人的生存與尊嚴等基本問題。

暴力發生的瞬間，往往也是尊嚴被剝奪最厲害的剎那。

大約四年前，上海青年闖進市政府，刺死六名警察；去年，一名殘障男子不滿多年上訪未果，在北京首都機場引爆炸彈；剛過去的 228 連假，中國昆明傳來多名維族青年，蒙面隨機刺殺 29 名路人。

去年被美國《外交雜誌》(Foreign Policy) 評為百大思想家之一的導演賈章柯，在他的新電影〈天注定〉中，以影像的語言描繪暴力化的中國。

整個社會就像個火藥桶，任何火星，都可能點燃這憤怒之火。

中國經濟劇變，社會衝突不停。此時，胡錦濤大談「和諧社會」，以口號鎮壓批評的聲音。

「槍桿子」和「筆桿子」是中共政權治理的兩項法寶，但自 2000 年加入 WTO 後，他們收起槍，改拿鈔票當子彈。

2008 年，溫家寶推 4 兆人民幣救市發揮效果，在西方連環爆歐債危機與金融海嘯後，中國經濟仍維持 9% 的高增長。成功舉辦規模壯觀的奧運會，則充分展示了中國的富強與自信，它可以送宇航員上太空，可以修一條鐵路到西藏，它是下一個超級大國。

經濟部門在前線建功立業，頻頻吸引老大哥的關愛眼神，但「宣傳官員是反向問責，就是你做的有多好，大家不知道，但是一旦出了漏洞，一定有人問責。」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永剛解釋。

官僚的競爭心態，也讓宣傳部從嚴工作作風。



同年的四川地震，超過 80000 人死亡，中國調查記者揭露當地腐敗的政府官員應為劣質的建築負責，最終被集體噤言；2011 年的溫州動車事故後，中宣部下令封鎖消息，除官方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後一年的北京暴雨，中宣部撤下著名調查記者王克勤的「暴雨失蹤者」，並解散他主管的調查報導部門。

收攏的力道延續至今。《紐約時報》去年底揭露中共中央九號文件，文件中提醒各級幹部，特別注意七種反動言論思想，其中尤以西方民主憲政為首。

留給調查記者的空間越來越少，催促著離去的腳步。

以網路突圍管制

兩次人事地震，改寫中國傳媒版圖。2006 年，《新京報》總編輯楊斌被迫辭職；2008 年《南方週末》總編輯江藝平被調任研究單位，中宣部兩次強勢調動，引起編輯部不滿，記者紛紛辭職以明己志。

這給新生的網際網路提供機會，可以壯大入口網站影響力，捧高薪挖角調查記者，南方系的陳峰、王雷、傅劍鋒都轉戰網路。

技術革新突出體制的遲鈍，網路的海量訊息、爆炸性鏈接和去中心化等特質，曾讓前美國總統柯林頓調侃中國控制網路就像「把果凍釘上牆」，無法做到。

因為，中國四大入口網站，包含新浪、騰訊、網易、搜狐，都屬於私有企業，中宣部失去傳統的威攝能力。即使政府實行網路審查，通過屏蔽關鍵詞的方法不讓民眾討論敏感議題，但網民則創造各種方式繞開審查制度，例如「王麗娟」是王立軍的諧音，綽號「護士長」則是「副市長」的雙關語。

微博的病毒式傳播，更暴露監管者的顛預。微博是 twitter 的高度克隆產品，熟人圈的互動反而將網絡拉的更遠，又因新浪的名人策略奏效，有了所謂大 v 用戶，至 2012 年底使用人數突破 5 億人，是 twitter 全球用戶兩倍以上。

借力微博，讓記者更容易採訪。王星曾是南都《網眼版》編輯，與生俱來的網路 DNA，他嫻熟使用各種網路工具，在同行追逐郭美美新聞時，總能捷足先登。網路爆料人周筱贇，用來揭黑的武器，有四個微博、五個博客、兩個論壇，還有他獨創「證據確鑿的爆料模式」，才能在吃人的體制確保自身安全。



微博是中國的縮影，現實社會的民粹暴力也溜進網絡空間裡，他們用暴力的語言煽動情緒，眼中只剩立場、不問事實。監管者樂見輿論分裂，他們利用社會的情緒，雇用大批「五毛黨」在網上發佈各種支持共產黨的言論。

新浪終究是私人企業，它的伺服器放在北京，為了能「安全的營利」，新浪總裁曹國偉接受《富比士》採訪時承認「至少雇用一百人，監控網路上的留言。」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低估的數字。

監管者與網民在網上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靈活又機動的網民，以創造性的方式躲避「真理部」，一種「互聯網沒有言論管制」的樂觀情緒，在 2012 年推至頂點。

年底，《財經》副主編羅昌平的實名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在微博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加上之前打下一票「表哥」、「房姐」的地方官員，中國自由派趁勢呼籲中共官員公布財產。

加上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信息和組織對於那些看似穩固的專制政府產生的破壞力，它讓中國領導層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819 淨網行動

微博主導的網絡化世界中，線上和線下社會變得模糊，任何一個公民的行動都可能像突尼斯小販的自焚那樣不可收拾，催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淨網行動，他在宣傳會議上正色說「意識型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不久後，政府頒佈新規定，網路謠言轉發五百次以上要被論刑。

騰訊《大家》的主編賈葭認為「互聯網對黨構成威脅，所以要用盡力氣打擊，」

他以自創的「氣球理論」形容中國政府為了維持穩定就像吹氣球「要讓氣球永遠處在飽滿狀態，每吹一口氣，都要把力氣使到最大。」



被稱為北京才子的許知遠則認為，習近平對自己的權力非常有自信，他不關心負面批評，「他完全向西方證明自我，他們非常傲慢，認為不需要理會市民公共空間。」他認為鎮壓是來自這種自信，而非恐懼。

權力的施展，由一次次的電視「示眾」呈現。

薛蠻子是一位網路大 V，他的微博有 1200 萬粉絲。在涉嫌嫖娼後，很快在電視上公開懺悔在微博中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這些都與警方宣稱的嫖娼行為無關。電視中表情謙卑、身穿囚衣、手帶手銬，他的這幅形象相當於是對所有大 V 的警告。

恐嚇策略發揮作用。據社交網站資料分析公司知微的報告顯示，打擊網路謠言後一個月，微博平均發文數減少 11%，而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追蹤網路大 V 後更發現發文數驟降 25%，它在揭示清楚不過的訊息：讓異議者噤言，「我微博 8 月初以後就不更新了，好可怕。」賈葭說。

下一個是陳永洲。

「請放人」、「再請放人」。《新快報》連續兩天的頭版戰書，搭配前陣子官方以口袋罪逮捕記者的背景，引發網友及新聞界熱烈關注，24 小時內微博轉發 8 萬多次，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一言以蔽之：「濫用刑拘令人擔憂。」

三天後，理著光頭、穿著囚服的陳永洲出現在央視前，對自己收受賄賂撰寫不實報導的行為供認不諱，甚至說出「我希望整個新聞業能以此為戒。」隔日，作為新聞理想主義者的胡舒立再發感慨：「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

新聞尋租的氾濫，源於中國特殊的「管辦分離」制度。主管單位仍是中宣部，但可開放報業做「適度的」商業化改革，傳媒既要承接黨的宣傳功能，又要實現自負盈虧，被中國記者比喻是「把人捆住四肢，丟進海裡」。



半市場化的媒體，反而受市場波動影響更大。新華社的報業報告中指出，2012年第三季報刊廣告金額比去年下跌 15%，另一份由《富比士》所做的報導也發現，包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在內的五份廣告收入領先的報紙，都在 2012 年同步經營負成長。

主管單位中宣部又掌握人事任免、薪籌調整等權力，以致中國調查記者薪資未接軌市場，據張志安的研究指出，近七成調查記者月收入在五千到一萬人民幣範圍之間，還有一成五記者月薪不滿五千。種種因素，讓新聞記者的職業操守遭遇滑坡，新聞尋租層出不窮。

當央視在鏡頭前審判陳永洲，也將中國新聞業推入「塔西佗陷阱」，行業失去公信力，讀者沒理由相信單一媒體的道德水平會高於平均線，於此同時，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陸媛發表〈IPO 有償沉默〉，首度揭露新聞尋租的灰金鏈條，她說，所有做的努力，只在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三重打擊，構築全面潰敗的中國新聞處境。威權體制，是靠恐懼維繫其統治，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Miklós Haraszti）在《天鵝絨監獄》中寫到審查制度，「不僅是『合法』與『非法』的限制，還是隱秘的心理起源，這種根源支持著國家審查文化的每個細胞。」面對恐懼，每個人都是勤勉的自我審查者。

賈葭和許知遠研究過台灣的歷史。

許知遠追尋司馬文武的身影，這位黨外雜誌前輩年輕時，躲避警總的日子裡，常在截完稿後上陽明山泡溫泉；賈葭在阿才的店訪問解嚴前的政治記者，他們天天喝酒、批評政治，「要讓自己快樂起來，不能被龐大黨國機器嚇到」是他從台灣記者汲取的經驗。

中國的調查記者，是時代的旁觀者與描述者，雖然欣賞抽象的道德和正義，但用鋼筆記錄真實才是職責所在。在無數的黑暗時刻，盡量保持自信，如同陳峰在《網易》辦公室對我說出的那句：「我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



同一套調查原則

哈佛大學的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 1948 年曾這樣寫道，「中國既是記者的天堂，也是統計學家的煉獄。」對此他解釋，「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這裡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著更多人間戲劇，但可辨認的事實真相卻不多。」

《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肯定同意他的說法。他以一篇〈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獲得 2012 年的普立茲獎。報導曝光後，各國調查記者都在問「你怎麼知道的？」他回答：「追蹤錢的線索。」

《南方週末》記者陳中小路通過追蹤錢的線索，揭露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的「高利貸」生意。她調出所有宋基會及相關企業的工商檔案，研究股權變化與資金流向，發現宋基會利用權力炒作房地產生意，回收資金用以放貸並收取高額利息。

調查報導需要耐心和果斷，就像慢慢拼攏拼圖，要找到每個關鍵的碎片，季天琴在〈起底王立軍〉中，做了最好的示範。她換了電話潛入重慶，不住酒店改找朋友家借住，至少半年沒跟熟人見面，如此謹慎小心就為了接近「深喉嚨」，最終，她取得對方信任，在辦公室手抄了三天的材料。

調查記者的名聲，需要勇氣與決心換取的，如同《財經》雜誌記者袁凌發表的〈走出馬三家〉，曝光中國勞教院違反人道的施虐行為，在他之前，馬三家一直是中國記者心理的禁區，不僅批評勞教制度敏感，更因為馬三家是中共改造法輪功的樣板基地。

勇於承擔的主管，一直是調查記者所企求的，這類角色，在中國特別重要。《財經》副主編羅昌平特別景仰程益中、胡舒立等新聞前輩，「他們在扛的時候，可以扛起很大一片，因為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支柱。」他坐在泛利大廈十九樓的辦公室和我說，「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手中，」面對審查他願意妥協，「（稿子）往後延我能接受，不上封面我也能接受，我的目的就是讓稿子能出來就行。」

更為重要的，他們信守所有新聞記者心目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在一個視異議為威脅的國度，絕不做任何傷害深喉嚨的事情。《新世紀》周刊記者王晨做到了，她在一篇〈奢侈動車〉的報導中，揭露中國南車浮濫採購高鐵設備，對方要求王晨出示證據，否則「不排除提告」，面對威脅，她在北京的餐館神色堅定地告訴我：「我要保護他們，我不能說。」



在美國實行調查報導的原則，同樣適用於中國。甚至，在習李政府釋出「進一步市場化」的風向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催生股份制經濟，意味著更加透明的公開資料機制，讓拿過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忍不住羨慕，「他們能夠窺探這個國家最黑暗的祕密。」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對 19 世紀英國的描述，用在今日跌宕起伏的中國新聞業，同樣合適。

技術創新與資本興奮，2013 年成為中國調查記者的創業年。前《新世紀》周刊高級記者趙何娟辭去高薪穩定的工作，創辦結合新聞與社交的網路媒體——《鈦媒體》；前《經濟觀察報》記者劉建鋒透過淘寶店嘗試國外風行的「眾籌新聞」（crowd-funding）模式；前《21 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左志堅看準微信公共號私密性與相對寬鬆的審查制度，成立《拇指閱讀》公共號，上線一個月就粉絲破萬，讓他興奮地辭掉工作，全心投入創業。

這是舊責任的新重複，作為記者，他們始終做著記錄與描述的工作，頗類似於漢學家史景遷的描述「如希臘歌劇中的唱詩班，恐懼而又著迷地注視著舞台中央結局已定的人與神的搏鬥。他們常常表現出驚人的智慧，已經看出這種特殊劇目的潛在方向，明白了這絕不是可以讓置身事外的人平安無事的戲。」

在今日的中國，世界上最快速的資產累積，與威權復辟的歷史時刻，調查記者的角色，再次變得重要。



最堅實的後援

一 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2013 年底，正為霧霾所苦的北京，透出久違的和煦日光。開完不久的中共三中全會，決議廢止施行超過半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

勞教制度是在 1950 年代中共發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逐步建立，運動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除判死刑外，罪狀較輕的，不能判刑的，而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人口，則進行勞動教養，限制其人身自由，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指示發佈後，要求各省自行建立勞動教養場所。

1958 年，批准勞教制度後一年，全中國興建超過百家勞教所，形成省辦勞教、縣辦勞教，很快地，收容人員就超過百萬。

各地搶辦勞教，因為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最便宜行事。它是行政處罰措施，不需經過法院判決，沒有明確期限，還可重複勞教。數年間，各級政府瘋狂立法，從人大常委會到省市級政府，出台相關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把城市盲流、偷竊吸毒、賣淫嫖娼、破壞治安等，悉數納入。

地方政府掌握勞教的懲罰與解釋權，上訪者成為勞教所裡的主要群體。

勞動教養對象擴大，背後是一個矛盾日益激化的中國，經濟進步沒有帶給中國社會普遍的福利，當權貴和資本組成新聯盟，他們坐在經濟列車的頭等艙裡轟然向前時，很多人卻跌落在車輪之下，被輾過。

這些跌下列車的人群，或在擁擠的上訪村裡等待希望，或在街頭含冤舉牌，而行人只是從他們身邊走過，或許，要在殘忍的社會生存，首先要學會漠視人的尊嚴。在犬儒的社會裡，上訪者悲慘的際遇，已經許久不被談論了。

直到去年四月份，《Lens》的〈走出馬三家〉首度曝光勞教院內部情形，再次將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推上公共輿論陣地，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焚化的資料重新呼吸

與袁凌約在他租屋處附近的西餐廳，位置不大好找，狹小的門口被一家洗浴店的招牌擋著。那是很老式的西餐廳，有著白瓷地磚、長吧台、皮沙發座椅，店裡只有兩組客人，兩男一女穿制服的侍者坐在靠門口的座位聊天，年輕男侍者趴在桌上打瞌睡，一聽見人聲就睜大眼睛裝鎮定。我挑了角落的位置坐下，腦中想的是冒險電影主角的畫面，突然，一個微禿的男子坐在我對座，毒辣的太陽把他臉上的肌膚晒的黝黑又粗糙，襯著那件領口有些寬鬆的 Polo 衫，笑起來一口亂牙，他是袁凌，《走出馬三家》的作者。

袁凌談興甚濃，「上面很快禁令就下來，後來我的微博就被關掉了。」還沒等我打招呼，他先吐了一番苦水，像被憋壞了的小孩。會這麼快遭到打擊，不是沒有原因，在中國，勞教所等同高敏詞，更何況馬三家這個地方，是中共改造法輪功的樣板基地，直接連結前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是不能被提起的名字。

「我做的，只是讓被埋沒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袁凌不習慣美化的修辭，也不願描述採訪的危險，連故事的開頭都說的平淡。

2008 年，他在北京一處家庭教會見到王玉萍，她剛從馬三家女子勞教院出來，身上有一股味道，他克服嗅覺，沒有挪開位子，就這樣聽到一個上訪與勞教的故事。自此，與馬三家越走越近。

北京添煤供暖的冬夜，有個被遺忘的角落。他參與公益組織，送熱粥和饅頭去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看到平房裡的大通舖，人體混濁的氣味和遭遇的苦澀融合在一起，濃的化不開。隨著日漸深入，一些隱晦的內情也向他展開。

聽一個殘廢的女人，講著身受「大掛」，用手銬將手腳扣在床架，身體懸在兩張床中間，還有王桂蘭那份，捆在小塑料卷裡，藏匿在陰道帶出來的日記。這些記錄與講述，構築出一個道德全面潰敗的世界，



那些酷刑，超出理解的邊界，對此，似乎只能無言。聽著一次次重述，他只是記錄，「有三年的時間，我沒有心力打開翻看」那些手寫的筆記和被勞教者的材料，累積成一麻袋，堆在租屋處一角。

有幾次，僅是出於良心的歉疚。他在前幾家供職的媒體，提過馬三家的選題，都遭到否決。他可能也鬆一口氣，「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題目，」因為自身也存在著勇氣和心理能力的欠缺。甚至，有一些時候，他覺得它們註定像這片國土上的眾多證物一樣歸於淹沒，他只是乏力的見證者。

悲觀、壓抑的情緒，來自數年期間，勞教制度像一個冰蓋，律師、媒體、人大代表的聯手努力，屢屢歸於失敗。他和她們的交往仍在繼續，曾在北京南郊平房裡，和幾位從馬三家走出的上訪者吃過「團圓飯」，他看見她們努力重新生活，但那段恐懼與不平，已滲入骨血中，他知道生存之外，她們也需要真實。

「我採訪二十位以上的被勞教對象，」採訪這麼多人，因為「一個人講沒意義，大家講的可以互相印證。」採訪的過程盡是殘忍，「那些細節，對她來說是心理負擔，你要一遍遍地追問細節，她會容易失控。」但袁凌克制情緒，平和的語氣反覆追問，像個旁觀他人痛苦的局外人，「受害者往往會誇大自己的痛苦，」當上訪者向他哭訴如何被懸掛在空中時，他一定要問「你腳著不著地？」

有了案例與幾份物證，他還需要更「嚴謹的證據」，而律師有調查取證權，一直是調查記者的親密戰友。「有人把勞教院受到的虐待，請律師提起行政覆議，要求賠償，」袁凌從散落的日記中看到針頭線腦。翻閱案卷查到哪個律師代理，再向上追蹤到他的律所，打電話給他，被拒絕一次就再試三次，「他們會怕嘛，都不會宣揚代理勞教，有些律師也被抓起來了。」說服律師很難，但取得的證據都蓋上當事人指印，是具有法定效力的，心裡也有底氣。

關鍵的談話者

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傳出消息，年內停止勞教制度，這個冰蓋出現裂痕，他向《財經》副主編羅昌平報稿，沒想到即獲得支持，「證據鏈經得起

推敲，我覺得就可以發。」大受鼓舞的袁凌，決定去一趟遼寧，探訪馬三家。



北京時序入春，遼寧仍是冰雪深厚。「這是一座真正的勞教城」，袁凌回憶，佔地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馬三家，周圍荒涼的一塌糊塗，冬夜裡走在大街上，路燈一明一滅，大雪後積水的窪坑、農田裡紮起的稻草。

57 年的歷史，造就它不同尋常的格局，勞教院門口，仍掛著思想學校的牌子，四周皆是高牆鐵絲網，「給我的感覺都是黑色的」，那股肅殺的氣氛，給袁凌太強烈的感受，就像黑洞總是蘊含特別的能量，能遮蔽所有接近它的努力。

官僚習氣同樣叫人無力，面對傳達室的推諉與門衛的喝斥，袁凌無法進到勞教院，只得叫車轉一圈，高牆內還能隱約看到大院有高高矗立的雷鋒像，看著這位「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寒冷」的新一代偶像，「第一次在我心中和勞教院聯繫在一起」袁凌說。勞教制度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教育感化第一」的理論下，實行的卻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

在這座沉鬱的北方城市，經過幾天的奔波輾轉，終於接觸到一些人和線索，尤其是那些敢於講述情況的內部人士，「他們讓我明白，在看似灰漠的一片鐵幕背後，仍然有正義存在。」

在約定碰頭的地方等到來者，每次的見面，他明白自己更接觸到事實核心。他總結三點突破，一個是找到勞教院裡的幹警，他不願多說，袁凌把日記裡的說法擺出來，像是那張固定人手腳，不能完全坐直或彎腰的「老虎凳」，透過幹警的印證，最後確認它是存在的，「他是另個身分的人，沒有動力來誇張」。

採訪到馬三家勞教院原副院長算是第二點突破。「他覺得現存的勞教制度很有問題，」前院長直接批評，馬三家把《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視為虛文，他在任時勞教人員幹活沒給任何報酬，後來才開始給學員一個月 10 元的象徵性補貼。面對關鍵的深喉，袁凌反而不踏實，他小心翼翼地接近，探詢對方的動機，原來「勞動」和「教養」是分開的，眼前分管教育的副院長，看不下去近幾年，勞教產生的龐大利益，衍生成腐敗利益，嚴重擠壓勞教人員的教育時間。

依規定，馬三家勞教院內設有駐所檢查室，平常不派駐人員，只有一個舉報信箱，檢查人員定期開箱。袁凌的第三個突破，找到檢察室科長，一般來說，官場裡最好「睜隻眼，閉隻眼」，為什麼還會願意接受採訪？「她手頭有幾個案子過不去」，這位科長間接證實了，馬三家勞教院曾發生幹警毆打勞教人員導致其成為植物人的案件。三個支撐，得以基本還原高牆內的情況。

等到要寫稿時，卻是「腦子一片空白啊」，袁凌形容那堆龐雜的資料，「幾乎吞掉我」，那麼多的物證、那麼多的採訪，「真是太難了...」，他用一種沒信心的語氣連說三次。

更何況，題材的高敏感，「就像攀岩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要踏在哪塊石頭」，每一步都要更謹慎，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他首先做的，就是切割馬三家與法輪功的關係，「我採訪的所有人都不是法輪功的，」袁凌接著解釋，「我是從稿子能出來為考量。」接著，寫作上他放棄中國常見的特稿寫作手法，唯美而又靈性，這篇稿子「按照真實來寫的。」

發刊的博弈

稿件的刊發，則是另一場博弈過程。「羅昌平是敢往前闖的人」袁凌認為《走出馬三家》能發出來，關鍵還是長官支持。《財經》雜誌在中國是調查報導高地，更被宣傳部注意，「《財經》釋放出的信號完全不一樣。」於是，羅昌平挑了集團底下的流行文化類雜誌《Lens》發刊，但他也不想放棄，為《財經》又跟袁凌要了一篇稿，按著不發，等候機會。

4月號的《Lens》封面，是美國流行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樹林裡手拿著吉他的照片，美國《浮華世界》（Vanity Fair）說她是「美國最少女的少女」，封面故事談的是她的新歌《I Knew You Were Trouble》，以及每場戀愛如何給她靈感。

誰也想不到，揭露殘酷暴行的《走出馬三家》藏在裡頭，書的扉頁僅用14號的字型題示，對比採訪付出的巨大努力，封面的位置有種反常的低調。

這個結果，是經過羅昌平對籠子的精密計算。這篇報導震驚了中國，甚至是那些熟知勞教系統虐待的人們，門戶網站與微博上瘋狂轉載，直到當局查禁這篇報導。據美國《中國數字時代》網站資料，該篇報導週六發刊，中宣部週二要求所有媒體對《走出馬三家》一律不轉不報不評。



遼寧省當局迅速地做出反應，宣布將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十天時間，調查組迅速做出結論，稱《走出馬三家》嚴重失實，文章中提及的「上大掛」、「老虎凳」是無中生有，所謂的「死人床」只是一般的護理床。報告出爐，只有同屬政法委機關報的《法制日報》報導，但同屬黨媒的新華社雖轉載但拒絕署名，而光明網評論員則發文質疑《馬三家打的報導失實，真相是什麼？》。隨即，袁凌也在微博上回應調查報告，公開「要求對質」，批評聲浪延燒，遼寧當局不得已求助國信辦，迅速屏蔽袁凌微博。

倒是宣傳部，意外地沈默，就連「禁令是發給其他媒體，沒有給我。」羅昌平回憶。

恐懼可以窒息人的感受，袁凌相信中紀委派人調查他的背景，手機持續地被監聽中，儘管難以查證，但他確信手機發燙、經常斷訊都是被竊聽的證據。

「我都很擔心忽然就被人帶走了，」他將這份擔心說出來，「羅昌平他提醒過我，有人來找我，要馬上跟雜誌社聯繫，」每天他都做好被拘捕的準備，他接起的每通電話都會錄音，「你威脅我，我就給你發出來。」飽受恐懼的人使盡全力的反抗。

宣傳部的報復不著痕跡，卻又一擊中的。稿件的證據紮實，不能指責報導不實，宣傳部發現《Lens》的刊號是跟黑龍江一家小出版社租用的，轉而對小出版社施壓，讓對方主動終止合同。「他確實跟本來不一樣了，已經非常懂怎麼處理媒體」羅昌平說。典型的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看來沒有規則。

和他的政權一樣，經常叫人迷惑，就像信訪與勞教制度，一面鼓勵民眾向中央反應冤屈，另一面又把異議者關進勞教所。



黑色維穩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式的奇蹟要繼續，無可避免地讓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每年數萬起的群體性抗議事件，脆弱且傲慢的黨國急了，2005年的《信訪條例》規定，各級政府應建立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內的失職行為，予以追究，並且通報。這項通報的規定，逐漸演變為幹部政績考核指標之一，全面維穩的要求下，對地方政府形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在此背景下，勞教所關押人數超額，「駐京辦」紛紛建立，「黑保安」頻頻出現，暴力非法截訪也成慣常手段。

大時代下，個體略顯荒誕的命運，一直是報導的熱點。

幾年前，有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成為北京維穩外包的龍頭，《南方都市報》記者龍志發表的〈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兩萬字長篇報導裡，上訪的主角曾是個女警，被保安公司押進黑監獄，以重拳打的她面目全非，販賣上訪者資料抽傭的是信訪局，而將她交接給黑保安的是警察—她以前的同事，最終，她像犯人一樣被押解回家。

同樣注意到截訪成為好生意的，還有《財經》記者譚翊飛，他在個人博客中寫道，「我曾偽裝維穩幹部打電話給安元鼎的隊長，問他截訪生意可不可靠，對方說：『如果我們沒有背景，敢在北京大街上抓人嗎？』」的確，多篇報導都指認，安元鼎橫行北京，在火車站有專用車輛，穿梭在駐京辦和黑監獄，抓補、關押、遣送訪民。

媒體重複披露，北京當局做出批示，2010年安元鼎被立案偵查。但是，安元鼎沒了，黑保安卻沒有消失，只是更分散了。按照規定，在北京非正常上訪的群眾，最後都會被送到久敬莊，集中分流。但事實上，裡頭的房間一部分租給駐京辦，以前安元鼎的幾個黑保安，繼續幹活。

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王星才揭露一起〈久敬莊強姦案〉，除了黑監獄借屍還魂，還寫出女性在上訪群體中，容易被欺凌的雙重弱勢角色。公權力不作為，暴力在社會頻繁出場，這幾篇照出中國潰瘍的調查報導，都讓他們獲得當年得調

查報導大獎。



只不過，這社會似乎得了集體失憶症，情緒快速高張，而後又迅速拋棄。中國社會像片大池塘，總有一種力量要讓波瀾不驚，但這群記者是在岸邊戲耍的頑童，不斷將手裡的石頭丟入水中，激起漣漪。《走出馬三家》成為廢除勞教制度前的最後一篇報導，歷史為它留下一頁，卻也仰賴許多記者持續報導，才讓麻木、沒有心肝的社會，注意力能在底層多留片刻。

代價與榮耀

將生命比做長河，雖不能完全類比，同樣在不經意處轉彎、匯集、而又分開。

袁凌與羅昌平的緣份比《財經》更早，他們在十年前就認識，當時，前者是後者的上司。那時《新京報》報剛創刊，袁凌是副主編兼首席記者，他成名的調查稿寫的是 SARS 後骨壞死患者，引起社會關注。他追逐新聞的巨大身影，為年輕新聞人跟隨，羅昌平是其中之一。十年過去了，他們仍在追逐新聞，不過角色互換，這次，羅昌平是袁凌的領導。

「我是付出巨大代價的」，袁凌為了留任《新京報》，放棄他在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這個決定，讓他從看似前程似錦的博士，成為徹底的北漂，到現在他的戶口還沒地方落，只能每個月繳錢放在人口市場裡。

回想剛才與袁凌見面的情景。北京五環邊上的天通苑，被當地人戲稱是「布魯克林區」，從地鐵口出，門口促擁著成群的哥，操著關外口音吆喝著「打車嗎？」；車站外的空地，凌亂的攤販，賣著炒土豆角、烤麵筋，即使大街上汽車轟鳴而過，揚起塵土一片，也不影響站在攤前的人們吃完面前的那盤炒麵。

從主街拐進一條林蔭道，與剛才的車流不同，只有零星貨卡經過，再往前走十分鐘才看的到約定的小區，是一堆劣質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房子，粗糙的紅底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我付出婚姻的代價，我爸跟親戚也都不跟我聯絡了，」似乎更能理解，他所謂「在中國當一個記者代價很高」是什麼意思了。

羅昌平也是一名北漂，2000年初，在瘋狂城鎮化的國度，放棄高薪的建築工程工作，隻身到北京，只為當一名記者。到了2006年，他已經是《新京報》深度報導部主編，他可以選擇去薪水更高的互聯網，但最終仍進入《財經》，又成了普通記者，薪水比以前少一半。但是，同樣在那一年，中國發生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貪腐醜聞－上海社保案，羅昌平得以親歷《財經》的調查風格。

這起震驚海內外的醜聞，源自上海社保基金「參建貸款」開發房地產、公路建設，其中，最大一筆貸款金額32億人民幣，流向神祕富豪張榮坤，短短五年間，他拿下滬浙高速公路經營權，成為最有價值國企上海電氣的最大股東。

泡沫終會破滅，社保局長被雙規，上海電氣高管被調查，複雜的錢權交易驚動高層，中紀委派百人調查團常駐上海，動用內規要求黨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涉及問題作出聲明。調查逐漸深入，矛頭漸漸指向上海市長、市委書記，同時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良宇。

要知道中國的報導有幾條紅線，疆獨、藏獨、宗教問題、臺海問題，再來是涉及高級幹部，必須等新華社發通稿。更何況，中共政權是個派系妥協下的結果，刑不上政治局是默認的潛規則。自改革開放後，陳良宇是第二個被中紀委立案調查的中央高層。

上海鮮少有負面新聞，因為它不只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高層派系中還有上海幫之說。但市場化的壓力，似乎加大記者的膽量，「這個案子很大，只是沒想到會那麼大」，時任上海《21世紀經濟報導》特稿部主任左志堅用一種無謂的語氣回應，「每家都搶著在做了，能不做嗎？」

胡舒立，這位被外媒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題目。持續追蹤長達三年、投入十多位記者、作過四期封面，平均每篇封面投入金額是一般的三倍，羅昌平與他同齡人，趙何娟、陳中小路都參與到上海社保案的調查，至今他仍與有榮焉地說「《財經》在那次確實達到最高的新聞標準」，尤其還有胡舒立這個蒸汽鍋爐，帶著他們往前衝。

但《財經》畢竟是北京的媒體，在上海沒有相應的人脈資源。胡舒立聘請當

過法官的楊海鵬擔任資深記者，由他找到關鍵的深喉，對社保基金的情況很清楚，但官僚的慣性讓他急著拒絕，「舒立陪著他在樓下等了一晚，」羅昌平被那份對新聞的堅持感動，「很少新聞人能夠做到。」



「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沒學過新聞的羅昌平，像個勤奮的學生要補回課程。接下來幾年間他揭露過郴州官場腐敗、北京副市長地產尋租、青島市委書記和他的情婦，以及讓藥監局長被雙規，「註定為新聞而生」是《南方週末》前主編江藝平對他的評價。羅昌平也是胡舒立看重的記者之一，讓他擔任法制組召集人、為他的《遞罪》作序，稱他身上有「不少新聞人淡忘的正義感和責任感。」

「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羅昌平以前的同事，《紐約時報》中文網總編輯曹海麗是這樣形容他。三年多前，《財經》主編胡舒立與投資方「聯辦」談判未果，決意帶整個採編團隊另立門戶。羅昌平永遠記得那天，胡舒立說服《財經》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爐灶，包括前台保安，他原本也是其中一人，但在最後關頭，他變掛了。

很多人不解他的決定，時隔多年，他才坦實：分裂的導火線，從《再問央視大火》的稿子埋下，因這組稿件完成後，胡舒立遲遲按住不發。

為什麼央視這麼敏感？揭露這麼多高層貪腐的胡舒立在怕什麼？

央視的特殊地位，在中國傳媒界享有「收支兩條線」的財政特許，每年廣告收入只需上繳一定金額給中央，其餘可以自己留用，十多年來，央視每年廣告標王金額不斷突破，羨煞不少傳媒集團。

但真正敏感的是「央視是宣傳部的錢袋子。」羅昌平一字字說出高敏感的原因，你打上海社保案，除非宣傳部官員跟陳良宇同派系，否則跟他無關，但你要打央視，那有太大關係了。就算胡舒立，也不想冒這風險。

羅昌平問了《財經》老闆王波明，央視的稿子能發表嗎？他答應的爽快，接

著，就該羅昌平苦惱了。反覆考慮後，他決定留守《財經》，因為「這是我確定能發此稿的唯一渠道，」他聽過許多輿論，卻無意辯駁，「只要稿子能發出來，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他不依賴對某個人的忠誠」曹海麗觀察這位老同事後說。羅昌平也承認，這次「分家」讓他思考很多，他把自己定位成獨立的調查記者，而且他指的「獨立」是「雙重獨立」，不僅《財經》能相對獨立於資方、獨立於政府，他自己也要能獨立於《財經》，「我不能被組織的利益綁架」他對我說。

有個他不曾說的祕密，〈再問央視大火〉讓他看見潰爛的社會裡，權力與暴力走的多近。

報導發表後，有人撥了他私人的電話，說：「已經斷了我們的財路，小心你的命。」對此他非常生氣。我問他怕嗎？回答的聲音不大，低沈的嗓音應來自丹田：不怕，「我相信，目前中國的狀況主要是封鎖稿子，還沒有惡劣到要記者生命。」他用一貫樂觀的口吻向我這個常誇大危險的「局外人」解釋。

扛住壓力

留下重建廢墟其實更難。他還記得胡舒立說過的「新聞是易碎品，而好記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讓新聞不碎」，他知道自己必須擔起責任，讓更多新聞在他手中，完整地、合法地出版，因為「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手裡了」。

在他職業生涯中，與警察交鋒的經驗不多。2010年9月20日傍晚，四名警察氣沖沖地闖進《財經》辦公室，要求帶走〈安元鼎保安公司專職截訪〉的記者譚翊飛，不過警察造訪時，譚本人在印度旅行。儘管羅昌平是這組報導的核發者，但畢竟不是自己採訪。

幸好，為了規避風險，《財經》內部早建立獨特的 memo 制度。每次開始新的調查報導前，羅昌平會用 Gmail 給所有參與人發一封信件，主題是類似「央視大火調查」的簡單名字，然後要求每位記者在採訪後，必須把見過的爆料者姓名、談話內容，以及書證、錄音等，全部夾帶檔案寄送給主管編輯、副主編、主編。



「memo 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他先前不清楚每個細節，就用 memo 制度查，當晚凌晨一點，他去見警察做筆錄，交代詳細的報導過程，直到次日十一點，才離開警局。臨走前警察當面噲說，我知道你家住在 XX 家園 XX 樓 X 單元，讓他覺得好氣又好笑。

他扛住了，就像當年《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為記者陳峰、王雷扛住壓力，刊發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一樣，他明白自己更靠近崇拜的新聞前輩一些，「我們顯然低估了像程益中這類人」，尚未制度化的新聞環境，其實得靠這些理想的主編為記者「扛起很大一片」。

幾年間，自他手中發出〈公共裙帶〉、〈中國式收購〉、〈走出馬三家〉等多篇揭黑報導，他是中國新聞業少數的「80 後」高管，是唯一四次獲得《南方週末》年度傳媒致敬的記者，也是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最值得關注的中國媒體人。

「名聲是可以變現的」，袁凌觀察調查記者的轉型後說，但他清楚羅昌平不是這種人。對羅昌平來說，他的目標從來都是「讓更多好稿子發表出來」，只不過他的角色變了，但他很高興有這層轉變，可以做到從前記者身分做不到的事——保護記者，「所有壓力基本上我能扛的，就要扛下來，不能壓在記者身上，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他在〈走出馬三家〉報導出刊後，曾傳短信告訴袁凌，如果有人找上門，不要跟他們走，有事情隨時跟他聯繫。就像他在微博實名舉報前發改委劉鐵男後，《財經》主編法滿在聽不清的電話中和他說的：「其他的我都不關心，我現在唯一關心的是你的安全。」

調查記者的溫柔，是一口濃烈的二鍋頭，咽在喉頭苦澀，吞下後暖胃。



拿料的功夫

一 記者如何取得關鍵材料？

季天琴掛上電話。

來電顯示為尾號「7777」的號碼，是重慶市警局局長王立軍的手機號，長達8秒鐘的沈默後，對方先掛斷電話。2011年5月，季天琴正為截稿的《紅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學》，打電話向王立軍核實關於學歷造假的事。不過，前兩通電話都無人接聽。

想了好一會兒，她才打電話給雜誌社長官，時任《南都周刊》主編的石扉客，他一聽大驚，打算開車接季天琴吃宵夜，也好安撫她。幾杯黃湯下肚，石扉客扯開嗓子咒罵，諸如「人性黑暗、手段下作」之類，甚至希望季天琴連夜搬家。季天琴沒理他，繼續低著頭吃完了一鍋乾鍋牛蛙，石扉客急了，問她「不擔心嗎？」「他們好意思對一個女生動手！」她回說。

很季天琴式的回答。吃完宵夜，石扉客依舊擔心。

「那幾年重慶是腥風血雨啊！」石扉客說的一點也不誇張。

2009年的重慶是熱火朝天，城市裡飄揚的紅旗、紅歌，報紙上宣揚的打黑，還有被炮製的重慶模式，都沸沸揚揚的。

「打黑」是打擊黑社會的簡稱，起點是歹徒周克華槍擊一名哨兵後逃逸，隨後王立軍公開批評黑惡勢力猖狂，強調打黑挑戰執政黨決心。

6月率先抓補了龔剛模等黑惡團伙，不過這群「黑社會」不是在街頭打殺的小混混，他們皆是民企老闆。

7月，原重慶市人大代表、渝強運輸公司老闆黎強被刑拘，五天後，王立軍在一場打黑會議上透露被拘捕的真正原因，在出租車罷運的協調會上，黎竟敢打斷薄書記講話。黎強被抓次日，王立軍高升兼任武警總隊第一書記。



8月，數百名警察包圍機場，在王立軍帶隊下，重慶司法局局長文強被帶上警用防暴車，之後，財產充公、處以死刑。

王立軍的偶像是普京，「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幹掉，兩個一般富的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六個窮人會說：幹的好！」打黑初期，涉案企業家全都家破人亡：龔剛模被判無期徒刑，並處分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重慶首富彭治民為人大代表，身家約八十億，最終也是無期徒刑，沒收全部財產。

重拳嚴打下，王立軍為募款民警留學基金，接見 13 位企業家。當天，老闆們一共認捐留學基金 3000 萬元。

不承認涉黑的，就會被送到「鐵山坪」，這是重慶 24 個打黑基地之一。龔剛模稱自己在鐵山坪，雙手被懸吊在窗戶的護欄，吊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另一個被處死刑的企業家樊奇杭，曾不堪折磨，兩次撞牆自殺，咬下舌頭自殘。

王立軍的打黑專項有個秘密武器，就是「大情報」。自 2009 組建，將全國每個人的資訊，從社保到銀行，全部彙整。情報中心可在 12 分半內將全國人口查找一遍，通過 13 個網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對象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 GPS 定位，監控其行動。在特偵、網監的祕密介入下，至 2011 年，重慶全城被刑拘人數達 5000 多人。

通常在監聽前警方會撥打手機，對目標定位，這正是石扉客最擔心的。

初次見到季天琴，很難不注意她的外表，及肩的長髮與高挑的身材，修整過的眉毛壓著褐色眼珠。一個年輕貌美的女記者，怎麼會把自己置入危險中？故事要從 2009 年的黎強庭審說起。



現場的衝擊

那年，季天琴 27 歲，剛從復旦新聞碩士畢業，是上海《新民週刊》的記者，到重慶旁聽黎強案庭審，沒有想冒險的心情，更多是來自領導的壓力。

半年前，她才因保障名額進了《新民週刊》，但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要當名記者，大學和研究所時期，她分別在東方衛視的《舞林大道》和群邑公關實習。還記得面試那天的情景，主編接連問了「最近看過最有印象的報導？」「《新民週刊》與《三聯生活週刊》的比較？」她都支吾其詞，但又因與復旦建教合作必須要，最後老總婉轉地說「學生氣太重」，「我一個 27 歲的大齡女青年還保留著學生氣質，難道不是更應該珍惜的品質嗎？」季天琴回他。

報社對她寬厚，或是不抱期待，她也表現的越來越不靠譜，就連每週一次的編輯會議都經常遲到或缺席，原因是喜歡賴床。終於，這個懶到發霉的人，向主編提了要求，想去重慶旁聽黎強案開庭。

在庭審辯論現場，她的認知受到衝擊。當年，對比金融海嘯嚴重衝擊沿海城市，重慶的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14.3，外商投資金額成長 140%，高達 40 億美元的外資注入市場，外媒與中媒齊聲呼喊「重慶模式」。

支撐重慶模式的重要支柱是「平安重慶」，負責打黑的王立軍公開宣示，要「重慶很安全」成為城市名片。接著，一些荒誕的數據出現：街頭犯罪率全面下降 40%、搶劫零案發、連續 43 個月未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王立軍是全中國最著名的警察，他上過《央視》談肉搏持槍歹徒、他被評為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甚至有以他為原型改編的電視劇《鐵血警魂》。

當時，沒有人質疑過「重慶模式」與王立軍的「打黑行動」。可以想見，當季天琴在庭審現場看到黎強文質彬彬的樣子，和邏輯清晰的反駁，該有多驚訝。

其實，重慶公安所謂的「黑社會犯罪」就是當地的幾個小青年打架，就被打成黑社會，在公安的起訴書中，「穿一樣的制服、統一時間上班、工作時間禁止

打牌」都被列成黑社會的幫規，季天琴回憶，「在我看來，都是打黑擴大化了。」



黎強的辯護律師趙長青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也是當年新疆克拉馬依大火後，主動為罹難小孩辯護的律師，他認為檢方提供的 1849 件證據中，沒有一項能證明黎強涉黑，也因為趙長青的成功辯護，全案退回公安補充偵查，又拖了一個月。

重慶市警局見勢便組織「五毛」攻擊趙長青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沒想到「這給媒體專訪趙長青的機會」季天琴說，趙長青也樂於在媒體上談論「程序正義」與「無罪推定」。重慶警方才意識到律師能左右輿論，打擊對象便從企業家轉換到律師，拿來「殺雞儆猴」的雞，挑上了龔剛模的辯護律師－李莊。

2009 年 11 月，北京律師李莊第一次在看守所見到龔剛模，龔稱自己被吊了八天八夜，打到大小便失禁，李莊打算採毒果樹理論作為辯護策略，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在訴訟審理過程不能被採納。12 月，龔剛模突然翻盤，檢舉李莊要求他做偽證，李莊隨即被刑拘，並被以妨害作證罪起訴，而龔剛模則因檢舉有功，獲得減刑。

缺位的監督

沒想到，李莊案意外撕開了扭曲的警媒關係，媒體江湖上充斥謠言，「那是媒體不專業的表現，」季天琴不客氣地批評，因為新聞監督缺位，才讓重慶打黑這場荒誕大戲，唱了三年。

重慶毫無疑問是新聞熱點，中國的記者雲集嘉陵江，但警方嚴格管控信息，媒體之間互相競爭，追獨家的壓力讓記者與魔鬼定下契約，用關係交換重慶警局的通稿，取得獨家新聞的記者，往往全文照登、不加查證，成為那三年為江城粉墨上妝的化妝師。

一篇《中國青年報》的「獨家」新聞，指稱李莊及律師群體長期「收黑錢」，以致中國司法腐敗。這篇報導，引爆中國律師群體的怒氣，陳有西律師在網上沈痛寫下〈法治沈淪〉，爾後又發表〈論打黑〉、〈論律師〉、〈論智庫〉一系列文章，

尤其後面三篇，「讓我從法盲變成在飯桌上普及程序正義的憤青。」季天琴說。



人在美國費城的石扉客也看到報導了，一股羞愧的情緒讓他在夜裡無眠，起身坐在電腦敲打「重慶的小文革正在逐漸成形，」那天起，他將視線釘在王立軍身上，沒再移開。

回中國後，他做兩件事：一是說服季天琴加入《南都週刊》，另一是私下郵件詢問打假名人方舟子，有關王立軍學歷造假的事情，並請對方保守秘密。

2010年初春，季天琴加盟《南都周刊》，促成兩人首次合作，不過，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大約在08年底，石扉客關著門採訪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教授，當時他被檢舉是「反革命」，一陣急亂的敲門聲打斷他們談話，門外穿著風衣的女孩還散亂著長髮，開口就說「楊老師，希望就『反革命』事宜採訪您」，這個女孩是季天琴。大喇喇又少根筋的個性，事後果然就有人找上報社，主管寫的檢討說：這個姑娘絕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只是單純地缺乏政治敏感而已。

春的頻率，搭上蹦跳的心。石扉客在新年的行事曆寫下「圍觀重慶」四字，包括四篇稿子：文強案的遺產、紅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學、紅色衛視經濟帳、西陽官員監控風雲。已經加入《南都周刊》的高級記者季天琴與另一名記者，從四川轉搭巴士翻越歌樂山入渝。

「我用的詞是『圍觀』，因為它是個增量，」有點電影《惡魔教室》的味道——一個偏執狂中學教師，在五天內，重塑法西斯集權社會。石扉客在報紙上讀到重慶一日遊廣告：早上在市政府聽「五個重慶」、下午到市公安局參觀打黑、晚上再到人民大會堂聽紅歌。他感覺就像電影裡說的「它還遠沒有走開，你一不小心它就會回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歌聲響徹在廣場上、公園裡。網上也傳來歌聲，「你的目光像刀劍，閃爍著寒光……刺破了腐敗和黑暗」，有人做了這首《薄熙來之歌》，幾天內，傳播極廣。



時代情緒能理解薄熙來，他有種危險的魅力。

2010年，重慶的實驗進入下一階段—全面改造生活，行道樹換成筆直的銀杏樹；扭開電視，重慶衛視取消廣告，只播紅色電視劇與「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類節目；新任官員配合「三進三同」政策，組織十萬官員上山下鄉，進農村同吃、同住、同勞動。

正如哈維爾說的，在生活的全景下，個人只是社會的自動加總，他們學會心甘情願的參與。

重慶法院外掛起橫幅，「文強死、百姓歡、重慶安」，聽聞文強被判死，輕狂的少年聚集法庭外，高喊慷慨激昂的口號，還有一地鞭炮鳴放後的痕跡。他的罪名是包庇黑社會，擔任司法局長前，當過十五年重慶公安局長，當年，他也是被群眾推上神壇的「打黑英雄」，如今，群眾以同等激情迎來王立軍。

紅色再度打擊黑色，挾持激情，不講規則和程序。王立軍是這場行動的代理人，他在一場公安局的內部會議中提出「雙起論」，今後凡是報紙攻擊公安機關和警察，公安機關就起訴報社，警察就起訴記者，王立軍義正嚴詞地說著「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

王立軍如同這政權，既傲慢又脆弱。人前，他自大地談要如何對付媒體；轉過身後，他對警察也絲毫不信任。

雙面王立軍，扭曲性格與成長經歷相關。他只有中專學歷，從警前當過礦場與林場工人，一下子被時代推到高點，自信常伴著不安全感，於是，他做了件沒人嘗試過的事，對警察實施 GPS 監控。

每個警察配備一台 GPS 手機，內建「精細化管理」系統，每天登入系統填寫工作日誌，如果出差，必須註明時間、地點、辦了什麼事。而且，填報內容不限於 8 小時工作時間，連下班、節假日的活動情形，都必須如實填寫。手機 24 小時開機，要隨身攜帶，各警局設有「精細化管理辦公室」，隨時抽查，發現有

人關機，則隨時通報紀委，可能免職或黨紀處分。對了，這些行動背後有個堂而皇之的理由「杜絕警察打牌，讓他們遠離娛樂場所。」



讓人不禁想起《1984》的情景，「除了你腦殼裡裝的哪幾立方公分的東西之外，你身上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那幅無處不在的生活全景中，每個人的臉孔是被抽象、被消解。而石扉客想的，就是向世人還原那幅虛偽的巨大全景。

監控之城

季天琴在重慶的採訪工作並不順利。雖然「紅色衛視」與「監控風雲」的採訪大致完成，但〈文強案的遺產〉放棄了。

她先是找到文強的大姊，剛開始還願意接受採訪，在電話哭訴著「這哪個（怎麼）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啊」，但後來態度轉變，「季小姐，你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

後來又找到文強的兒子，裝快遞員把他騙出來。當時，季只有他的手機號，沒有地址，那天正好下雨，就打電話說「我是送快遞的，雨水把快遞上的地址弄糊了，你再給我報一遍。」可季天琴是個路痴，繞了好久都找不到，索性叫路上的快遞又給他打了一次電話，「你朋友說找不到你，」快遞員出賣了她。

她的小伎倆沒成功，但看了一個女生大老遠跑來，「他見了我，但還是拒絕了我的採訪，」並解釋他目前還被專案組控制著，見記者要向上面匯報，「我一個機靈，把名片從他手裡搶回來。」

那幾年，特務統治和監控監聽在重慶大行其道，季天琴甚至懷疑，她一進入重慶就被監控了。

果然，位在南都總部的石扉客收到指令，要求季曾二人立即撤回。「當時重慶盯的很緊」儘管石扉客不願意，但「遇到這種事，誰都沒有機會」，畢竟，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報，在「黨管媒體」的體制下，所有的報紙都是共產黨的，就算他清楚這套體制不符合新聞自由，「但它在現行體制下，是有合法性的，我認這個，為什麼？這樣我在體制內才有空間嘛。」



更何況石扉客還是學法律的。他 1996 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這所中國法學的最高學府，畢業後他先在湖南的警校教過幾年書，接觸過很多警察，他喜歡專業警察的形象，那種坐在顯微鏡前，隊長跟警察圍在邊上，他瞅著一枚指紋，老半天都不說話，最後吐出：可以抓人了，所有人都能相信他。「我很佩服真正靠技術說話警察」，而王立軍在他眼裡，「就是個騙子嘛。」

為什麼說王立軍是騙子？

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轉業軍人，十餘年間，他成為 29 所中國及海外大學、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碩導、博導、主席等。而且，他被聘的學術專業，不僅於刑事偵查，還包括心理、法醫、法學、美學、哲學、社會學、人力資源、資本運營等。2010 年冬天裡的一天，西南政法大學聘請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到校講座，在渝期間，李也宣布聘請王立軍為「美國李昌鈺法醫研究所」特聘教授。這是一條學術圈獨特的「王立軍定律」。

西南政法大學是搭橋者，那幾年，西政為政治提供紅色資源，組織學生參加重慶衛視的〈天天紅歌會〉，作為「唱讀講傳」的先進集體，西政正在創造「校校有活動、班班有歌聲、人人唱紅歌、個個讀經典」的氛圍。

曾經，這所傍著嘉陵江的西南政法大學，被稱作法學界的「黃埔軍校」，源自西政人對母校的一份獨特情懷。當 1971 年中共中央要裁撤所有的政法學院時，是幾位老校友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才保留下來，也是唯一一所。現在，這所曾承載法學榮耀的高校，卻聘請王立軍擔任刑法學兼職博導，明顯知法犯法，因為按中國教育法規定：擔任博士生指導教師，必須具備博士學歷，以及副教授以上資格。

〈紅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學〉原本想調查王立軍的學歷。季天琴被叫回上海後，繼續撥打電話、發郵件採訪王立軍的學歷虛假問題，直到接起那通不出聲的電話，她才意識到，危險離她有多近。

數天後，石扉客連續收到西政的三份傳真：聘王立軍為教授合法合規，若周

刊報導有誤，將追究法律責任。後來考慮風險，報社高層拿下質疑學歷部分內容。現在看來，這個決定非常明智，因為王立軍即將攀上他個人權力的顛峰。



2011年4月，依傍江河的重慶更加潮溼悶熱，重慶檢察院查出李莊兩項漏罪，指稱他在2008年也曾教唆被告做偽證，再提上訴。這項舉動既不符合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而且再過兩個月，李莊就刑滿出獄，因此檢察院此時起訴，被外界解讀為「延長羈押」，而中國媒體界為區別先前龔剛模的偽證案，將這次漏罪案稱為「李莊案第二季」。

微博上輿論嘩然，有網友寫下不文雅的批評「勃起來痾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端給檢察院，檢察院端給法院，法院叫李莊律師吃，李莊不吃，說誰痾的誰吃，」它的後果給發文者引來兩年勞教，罪名是「散布謠言」；還有名大學生村官寫下感觸「唱紅歌、大躍進、浮誇風、個人崇拜、藐視法律...拿什麼拯救你，苦難的公民」、「專家，一個多好的詞啊，現在都被豬糟蹋得不成樣子了」，最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逮捕他並處以勞動教養兩年。

政權虛無主義的態度，常賦予它更大的力量，能夠毫不在乎媒體批評或網上輿論。這一年，王立軍第三次升職，兼任重慶市副市長，主管政法領域，加上之前的職位，他掌握公、檢、法、司、軍、警系統，是重慶二把手。

此時，石扉客還想模仿唐吉軻德大戰風車的橋段，準備衝上去大幹一場。但現實已不容許他這樣做，重慶公安局盯上他，將他列入監控系統的黑名單，而且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嚴正口吻傳來指令：不准再做重慶選題。

收到指令的同時，重慶也傳來撤銷對李莊漏罪的起訴。石扉客聞後大喜，「不讓我做李莊，那我就做給李莊辯護的律師」，他要做一組劍走偏鋒的題目，出刊日歷在6月11日，李莊出獄當天，聚焦參與李莊案第二季中的辯護律師，打包做成〈大牌律師轉型〉。談的還是中國法治問題，尤其季天琴寫的〈李莊案背後的律師暗戰〉影響最大，斯偉江在前方辯護、陳有西在微博旁隨時轉播並普法，那句「正義雖不在當下，但我們等的到」在微博上到處轉貼。

除了《南都周刊》，媒體在這次庭審報導都缺席了，石扉客罵他這幫哥們很

慫，「他們膽子很小，稿子沒發，後來我們報導不就出來了嘛。」石扉客笑的得意，雖然新聞求快求獨家，但石扉客直到手機那頭確認李莊上了飛機、離開重慶，才將整組報導上網上架。



鮮衣怒馬的騎牆派

中國人喜歡講「站隊」，那套源於市井的生存哲學說的是，要懂得看形勢、選邊站，尤其網上面孔模糊的騎牆派。而石扉客還原重慶所做的一切努力，在網民看來卻是「逢薄必反、挺薄即殺」。

厚重的無力感，迫他在個人部落格寫了一篇〈關於南方系的標籤〉，公開叫板王立軍面對面專訪，提交日期顯示為 2011 年 11 月 12 日。

誰也想不到，一場更大政治風暴正撲向重慶。

只隔一天，重慶政局居然有翻天之變。據新華社報導，11 月 13 日晚間九點，谷開來帶上一瓶棕色的 VC 瓶，裡面裝有安非他命、搖頭丸等毒品，為了偽造尼爾·伍德吸毒、販毒的現場。谷開來與尼爾·伍德一起飲酒，趁他嘔吐要喝水時，谷將事先準備的毒藥用醬油壺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

現在看來，我們知道王立軍肯定是焦頭爛額。但當時的石扉客不知情，網上騎牆派更不會知道，只知道石發帖後重慶陷入了奇怪的沉默。不過，2011 年就到年底了，隔年要召開十八大，很多人都認為，薄熙來會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而王立軍作為他的副手，也會升任公安部長。

原本還在觀望的，都搶著表態了，石扉客能感受到，輿論壓力變本加厲了。2011 年底，他惹了禍，方舟子把他先前詢問王立軍學歷造假的信件，在網上公布出來了，還在微博上聲稱「我從來沒答應過和他的保密約定」，把石扉客氣壞了。網上還有一票腦殘粉，馬上就能看到「石扉客把方舟子當槍使，遭拒即辱罵」、「掩耳盜鈴否定南方系陰謀論」、「不就蒐集黑材料的嘴臉太難看」這些評論，他覺得方的粉絲像綠頭蒼蠅，特別難纏。



季天琴同樣無可避免，她每天打開微博，就是收到一堆咒罵她的私信，網上還有人指證歷歷地說，她和石扉客長期同居，還在雲南保山開房。季天琴沒當回事，「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保山，還特地上網搜索一下保山的風土人情」。

「我是挺好色的」石扉客對謠言更不在乎，他早給自己封做「床運專家」，他在微信有所謂的「扉女郎」，不定期發送美女圖片給朋友，但他也明白表示，「我不跟女同事上床，那是職業倫理問題。」有公安上門跟他太太說過這件事，要她好好管管，她回嗆了一句：有你們管就夠了。

「對我採取任何打擊，我都能接受，」但是，當網上的五毛曝光他女兒的姓名、照片，還有上學的地方。那一刻，他徹底崩潰了，「我不只是個記者，還是個丈夫，是個父親。」他每天都在想著：如果女兒被綁架了，該怎麼辦？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威脅會在哪裡出現。」

這一局，各自攤開手中的牌，石扉客輸了。就像兩年前，他在南方年度傳媒致敬會場上喊出「中國未來十年也不會出現伍沃德那樣的調查記者。」面對黨國，記者始終是乏力的扒糞者。

怕惹禍上身，身邊的朋友紛紛跟他畫清界線，沒人敢再打電話給他；唯一接到的一通，是之前在警校教書的同事，提醒他公安已經找上門查他的資料，就連他僅存的父親，晚年寫作他這代人的荒謬命運，最終只消警察一句「他兒子是我們工作對象，不准出版」便輕易抹去一個老人努力的痕跡。就算你能做到讓自己乾淨，但「他們拿你沒輒，就從身邊人下手」石扉客憤怒手段沒有底線。

那年過年，氣溫比往年更冷，石扉客從上海開車回長沙老家，車外，低矮的瓦房和碩大的高樓交疊在一起，單調的景色是中國的縮影；車內，老婆與女兒熟睡的臉龐，「我擔心他們會製造車禍」，緊盯王立軍三年來，第一次他感到害怕。

跟石扉客聊天，你不會覺得無聊。他同事爽快地形容他：新聞土匪，說他幹的是新聞，氣質卻像土匪，也挺符合他這湖南人的性格：剛烈、直率、大嗓門。在微博上他以敢言聞名，與十年砍柴、楊海鵬、趙楚並稱「四張大嘴」，但這張

大嘴，在輿論反撲後選擇安靜下來，「那個月我沒有發一條微博，」事情發展至今已超乎他控制，況且他在這年失去母親，在這當口，家庭對他更為重要。



至於起底王立軍的事，他曾灰心地把材料全交給美國的友人，並囑咐他「如果我被抓走了，你就把材料公布出來，」個體顯得多麼脆弱，恐懼常不自主地滲入內心。

這種恐懼無處不在，因為它源於制度的模糊性，所謂的風險，可能與你說的話、說到哪個程度、跟哪些人說話都有關，它在每個人的下意識裡起作用。當下的中國，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噴火的龍，借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譬喻，它是吊燈下的巨蟒，一般情況下，它靜靜不動，默默傳遞的訊息是「你自己決定」，但生活在巨蟒陰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對自己行為做出調整。

問他後悔嗎？他長嘆「不可能收手的啊，只能等待機會，」看得出我臉上閃過懷疑，他接著說「假如他真的當上公安部長，(我)還是跑不掉，」指的是「一坨屎」勞教案後，他曾在微博上大罵「這就是文革嘛，惡意攻擊領袖罪」，這串留言脫離他藉口的新聞調查，就像在槍彈下失去掩體，但石扉客比猶太人更有自覺，他知道如果他不說話，未來就沒有人能幫他說話，他說，「我不說話，自己最後也是要搭進去的，」他像蹲伏的蜘蛛「觸角隨時張開，就等著機會來。」

「真的天亮了」

2012年2月2日，南方報業在南昆山上開年會，山上沒有網路，手機訊號也不穩，石扉客和季天琴要到下山才知道，重慶傳來消息：王立軍不再兼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副市長職務從分管政法領域換到分管教科文衛。這則消息，解讀的空間依然很大，飯桌上簡陋的飯菜組擋不住一幫記者的興頭，大家都在分析王立軍是要被冷藏還是重用？隔天，《南方週末》搶先站入隊伍，斗大的標題寫著「王立軍履新」。

石扉客氣他這幫哥們沒骨氣，季天琴則在一旁打趣地說：我還沒去過保山呢。氣不過的石扉客跟大夥打賭，如果王立軍的仕途真要到頭，他就送季天琴一張上

海到雲南保山的來回機票。



2月6日，王立軍夜奔成都美國領事館，消息全面封鎖。7日，微博上首先有消息傳來，成都出事了，但消息都很零碎，有人猜是成都附近的藏區有藏人自焚，也有人認為可能是重慶的「來俊臣」出事了。

螢幕掛在新浪微博，滑鼠不斷點擊重新整理，整整兩個晚上，石扉客就巴巴地坐在電腦前，不斷刷屏，網上出現各式各樣的段子：樓梯口幾個打麻將的大媽聊著，你們聽說沒，一個叫王麗娟的護士長夜訪美史館了。

石扉客趴在電腦桌就睡，2月8日醒來，螢幕還停在微博上，他看到重慶市新聞辦宣布：王立軍正進行休假式治療。這一次，真的天亮了，石扉客激動地在電腦前大叫，季天琴還偷偷向我透露「石老師都喜極而泣了」，迫不及待地趕往上海南京西路的辦公室，臨時的會議上，他宣布正式啟動〈起底王立軍〉。

他在筆記本寫下這五個字時，肯定想像不到半年後會造成洛陽紙貴。

2012年12月17日，廣州，我從大學城北地鐵口出站，對街的書報攤被圍圓了，過一會兒，又被圍圓，他們都搶著今天出刊的《南都周刊》；上海，石扉客去上班的路上，經過人民廣場的書報攤，他裝著沒事地問還有雜誌嗎？對方得瑟地回：沒了，一早就賣完了202本。

不可置否的，《南都周刊》這組〈起底王立軍〉是2012年最具影響力的報導，讓許多媒體人特別興奮，如網易新聞副總編輯陳峰高興地說「深度還是有市場的」，但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共同作者有個新聞圈不熟悉的名字—龍盛亞，到處打聽他究竟是誰，季天琴回說：「他是我背後的男人。」

背後的男人

王立軍出逃美領館後，全球都在關注這場中國近30年來最戲劇的政治變局，季天琴和各方觀眾一樣，在台前看得眼花撩亂，但她要繞到後台，就沒那麼容易。



2月中旬，季天琴趕赴重慶，那時題目已經確定，就是〈起底王立軍〉。有了上回的教訓，她更謹慎小心，不用自己的手機號，在路邊買了張充值卡；不住酒店，改找朋友家蹭住；要跟石扉客聯絡時，翻牆用 Gmail 聯繫；而且還要耐住無聊，她至少半年沒跟朋友見面，也沒在微博留言。

採訪最初，永遠是找熟人下手，她跟先前重慶採訪過的對象約碰頭，僅僅一週後，採訪資源捉襟見肘，她還沒接觸到重慶警界人士，依然在原地打轉。

重慶的濃霧依舊深重，這座城市已經習慣一種集體性的沈默，幾年內，很多單位都設置新聞發言人，要是記者問起什麼，都要推給這位覺悟高的發言人，官員們都默許自己沒有意志，更何況是出事單位公安局內的警察。

焦慮讓人抓狂，季天琴已經一週沒出門採訪，「每天醒來，我就想到我今天沒人要見」，時間一天天過去，她只能成天就在微博裡搜索。用的關鍵字搜索，當時，王立軍這組詞已經被屏蔽了，要變換各種關鍵字，有時候用他姓氏拼音的字母「WU」，有時候叫他「王麗娟」，反正看到有人能說點王立軍的事，他就把發文者的歷史貼文也順便翻了一遍，判斷他的立場、知道內情多少，以及有無接近的可能性。

一直到3月初，她才瞥見某ID發文稱，重慶市委要開大會，對王立軍事件定調子。她猜「這個人是體制內的人，或是跟體制沾邊的」，她寄私信問能不能見面，季天琴清楚，「在網路這個原子化社會裡，找到願意攀談的個體，實在很靠運氣」，但看來她的運氣不錯，對方回信願意見面。

談的內容依舊很邊緣化，圍繞在一些王立軍的軼事。犬儒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只剩虛偽與嘲諷的蔓延，儘管王立軍雖然消失在螢光幕前，仍沒有人會認真地跟記者談上幾句，他們更習慣於這種餐桌上的咒罵。季天琴顯得不感興趣，道別前她照例問：您看我還能找誰？

對方突然抓過季的筆記本，在上頭留下一串潦草的號碼，他說，如果這個人願意為你背書，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撥通了號碼。他對季天琴早做過功課，尤其熟悉她做過的重慶選題—〈紅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學〉、〈紅色衛視經濟帳〉、〈李莊背後的律師暗戰〉，並對南都能在薄王時代堅守底線表示讚賞。不過，他也解釋現在情勢還不明朗，一旦內部人士願意講話，他會主動聯繫。

對很多人來說，3月14日，溫家寶的講話給曖昧不明的局勢定了調，他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對王立軍事件必須吸取教訓。當天，她去電重慶，對方欣喜若狂地說：馬上訂機票吧。

3月17日，季天琴在一茶樓裡，首次見到龍盛亞（化名）。對方接過名片後，遲疑了半响後開口：你是不是寫過什麼針對重慶和王立軍的稿子？對方願意幫忙，真要感謝王立軍，「他在內部講話上總稱我們是『南方邪媒』」季天琴笑著說，「他們（深喉）在內心反而覺得，即使其他媒體發不出稿子，南都一定能發出來。」

茶會之後，龍盛亞說他還有些資料想讓季天琴看看。過去幾年，他感慨權力腐蝕人性，這片土地有無數殘忍與痛苦，他開始寫日記，記錄下所見所聞，通過這些碎片，得以拼湊還原王立軍的性格特徵、行事風格、審美風格。

更大的餡餅還在後頭。透過龍盛亞的介紹，她見到另一位深喉，看到王立軍的起居注。當她還為權威的材料迷的神魂顛倒，很快地，石扉客理性的頭腦驅散興奮，他懷疑這個深喉是重慶設下的陷阱，「如果拿了不該拿的密級資料，那是可以判刑的。」石扉客決心親自去重慶一趟，斟別這位深喉，也保季天琴周全，離開前，他吩咐公司的法務跟上目前進展，「就算有問題，我也跟你一起進去（監牢），至少我能心安理得。」

見了對方，了解他們決定幫忙，都承受了風險。他特別感激紅色高牆內的健康力量，面對體制的贊歌與人性的幽暗，「你還能感覺到他們在懷疑、掙扎著。」

但為了切割風險，他還是做出判斷：一是所有採訪內容都需要文件、案卷印證，二是捨棄大量高風險採訪，三是捨棄敏感照片和文件資料。

面對深喉，他們有一個鐵定的原則：就是絕對不能給對方帶來任何麻煩。因此，他們不通過電話或郵件溝通，要拿材料也是透過行動硬碟來傳遞，就連季天琴寫完初稿要深喉過目，她也是親自跑重慶一趟。



8 月份，歹徒周克華被重慶警方擊斃，也終結王立軍的打黑行動。石扉客派季天琴再入重慶，負責一篇〈悍匪末路〉，她心想，也正好將王立軍的五篇初稿，給相關人士看過。

截稿日，季天琴足不出戶，靠著前方的資料完成報導，不去新聞現場也避免見到同業，這篇稿子的署名是「賈凌絳」，取嘉凌江的諧音，用這個筆名也是不想外界知道她在重慶。距離上次她的名字出現在《南都周刊》，已經是九個月前了，她的同行都猜她已經跳槽了。

石扉客的賭盤

不到一週，谷開來故意殺人案開庭，一審宣判死緩；隔一個月，王立軍在成都接受審判，因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叛逃、受賄，數罪并罰獲刑 15 年。庭審現場曝光細節，加上微博大 V 們的爆料，手中尚未發出的稿子每天貶值。此時，石扉客野心勃勃地要求季再寫一篇，關於尼爾伍德案的稿子，這可能踩到中國傳媒界的一條紅線：涉及國家部級以上高官，只能採用新華社通稿。

「這個難度超乎我的想像，幾乎讓我絕望」季天琴坦實，她找過幾個內部人士，但尼爾伍德案新華社已經發出通稿，審判也結束了，一切原本懸而未決的都定調了。她只能繼續用上次的笨方法，在微博上找人，此前，她關注一位關鍵人物很久，10 月裡某一天，天氣預報沒有讓人躁動的原因，那是下午四點多，他剛發過一條網頁版的微博，而非平常顯示的 iPhone 客戶端，他應該在辦公室。

季天琴沒跟他預約，也沒打過電話，「我當時去就下定決心，不能讓他拒絕我，」其實，很多記者都找過他，但都被一口回絕，因為他手中握有的資料，能夠還原尼爾伍德案的事實，「不管怎樣死纏爛打，我一定要坐著不走。」但對方是體制內的人，對他來說風險太大，不能滿足季的需求。

如果要找個媒體發佈，他也會選擇《南都周刊》，他對季天琴先前的報導也有印象。最後，他承諾可以等到適當的時機。幾天後，他鬆口：你明天來吧。



「材料不能帶走」，深喉一開始就直截了當地說，他怕季天琴拍照，特意找了個助理「協助」她，只給兩天的時間，讓她就在辦公室裡手抄材料。季也落得輕鬆，就讓助理幫忙訂盒飯，眼前的關鍵材料太吸引人，也不記得吃了什麼，三兩口就扒光，趕著繼續抄。

關鍵材料的獲得，多種證據能相互佐證，但也因為材料太豐富龐雜，季天琴回憶每次改稿，都是被石扉客大刀闊斧的修改，期間被石吼叫過無數次，她也好幾次氣的拍桌子大罵。

他們分析稿子的風險，推敲各種可能引起的反擊，才決定細節與證據的使用，不過石扉客向我透露「我是有個打賭的，」確實，有些決定性的細節只有一個證據能支撐，那怎麼辦？「如果消息來源夠權威我就用，雖然我沒辦法找到其他佐證，但我能確信它沒問題，我就賭了。」

十月份，稿件完成了，接下來就是見報時機的問題。11月8日，中共召開第十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在這之前刊發是不可能的，等到11月20日，重慶市委書記改由孫政才接任，石扉客心想是個機會。但領導還是猶豫，按著不發。

12月初，石扉客單獨去了一趟重慶，離他身家資料被起底也過了一年，他坐在動車上情緒很複雜，打開電腦，寫了一封信給報社高層：

「這個題從2月份開始操作，週期非常長，我們開始拿到的料絕對是全世界媒體的獨家，操作的方向也證明沒有問題。但稿子久久不能見報，導致戰線拉的很長，大量本來非常獨家的信息不斷被解密消解，甚至成為街貨，只能非常痛心刪除；而新的信息又層出不窮，每個重要信息，都得去重新調查求證；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隨時監控這些情況，與之保持同步賽跑，惟恐錯過與遺漏。至於操作這個題目過程遭遇的風險，每個記者都被喝茶，我個人深深攪入其中。這個漫長的工作，讓記者和我本人都非常疲憊，只希望能早點見報就早點解脫。」

信末，石扉客補上一句「如果無法刊登，請讓我休息一段時間」，他打算用請辭要脅領導，高層考量後，把薄熙來改成重慶市主要領導，便簽章核發。很幸運地，也遇上南方報業裡開明的審讀員，誇「讀起來過癮多」就一篇篇地過了。



出刊後搶購的熱潮，也反應在報社內。廣州南方大院裡，凌亂的桌上擺著最新一期的〈起底王立軍〉，還以為是多的，正要伸手去拿，一旁的同事緊張地跑來制止：外面都買不到了，這是刻意留的，各地的記者都要趕回來拿。

回到重慶的動車上，他這趟去是要去見朋友。諷刺的是，往日的敵人，卻成為今日的朋友，那些過去監控石扉客的警察，居然都成了他的好友。走出重慶車站，他看見這城市盡是高樓、公路蜿蜒起伏、輕軌列車從頭頂經過，嘆息著：「當年黎強、龔剛模也跟我看一樣的景象，」突然怒沖沖地吼「他媽的，誰能想到幾年之後是腥風血雨阿！」

請他總結報導的經驗，他卻跟我說「我朋友說是我媽在保佑我，」號稱無神論的國度，這種說法不常見，「我也覺得是。」他接著說，王立軍叛逃美領館是偶然事件，我很慶幸，這幾年我沒犯過錯誤，報導裡的賭博是賭贏的。

沒有規則的社會裡，或許幸運，才是唯一能企盼的。

用事實說話



一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2012 年 3 月初，人民網轉載一條中國南車的消息：

我們注意到最近有關媒體對動車組配件採購進行的報導，所報導動車組配件採購價格與實際嚴重不符。

措詞直接、強硬，是在批評《新世紀》2 月份〈奢侈動車〉的報導，且表示「不排除提告」。

當晚，財新網不甘示弱發出聲明，指報導內的價格訊息，源自記者拿到一份「CRH2 型動車組配件供應商名錄」，強調財新傳媒堅持報導立場，並願意在必要時刻公布「名錄」。

雙方一來一往，砲火猛烈，看懵了一票觀眾。

「那時候鐵道部還沒有分拆，這樣寫不危險嗎？」我問坐在對面的王晨，正值午飯時間，我們在知春路附近的餐廳見面，大堂挑高明亮，穿旗袍的服務生為我們送上茶水與烤鴨，她手上夾著剛片好的鴨肉，一下被我問楞了。

可能不知道該如何向局外人解釋吧，她想了半响後說「用事實說話就不怕」。

會這麼提問，因為鐵道奇蹟已經是「中國模式」的樣板工程。歷經 30 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震撼世界的成就，讓不少人興奮地喊出「中國模式」。

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是因為它有一個強大有力的威權政府，因而能夠充分動員資源和控制社會，集中力量發展，實現 GDP 高速增長的目標，一些經濟學家

給它更精準的名字：國家資本主義。它的支持者相信，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是帶動經濟騰飛的火車頭。



2006 年中國國務院通過京滬高鐵的案子，中國鐵道部在劉志軍帶領下，全力投入高鐵建設，他曾宣示中國在 2020 年之前，鐵路營運要達十萬公里，高速鐵路建設一萬兩千公里以上。他的「跨越式發展」，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2008 年鐵道部的投資金額就從三千億人民幣（下同）暴增到七千億元。

正因為中國的高鐵建設是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鐵道部不但黨政合一、政企合一，而且是集公安、檢察、司法於一身的超級部會，中國媒體給它個更形象化的名字「鐵老大」。

王晨此次揭弊的中國南車集團，大陸人都知道其直屬鐵道部。雖然，2000 年鐵路車輛工業總公司與鐵道部脫鉤，將公司一分為二，組建為北車集團與南車集團，但兩家均屬中共中央直屬的國有獨資集團公司。王晨告訴我，南北車集團生產的動車沒有出口，最大且唯一的客戶就是鐵道部。

2.6 萬的洗臉盆、1.2 萬的水龍頭、10 萬元的馬桶，組合成三十萬的廁所；還有 16 萬的 VIP 座椅跟上萬元的液晶電視，動車為什麼這麼貴？王晨調查後發現，動車的許多供應商沒有從業資歷，也沒有生產研發能力，全憑關係進入，卻成為供應鏈上的壟斷者，排擠許多老牌供應商。

但鐵道部已經走過花甲之年，龐大又盤根錯節的權貴結盟，讓他的反應顯得遲鈍又傲慢。直到 2011 年的動車追尾事故，撞出公眾的不滿情緒，王晨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注意鐵道部的。

鐵道部崩解，似乎早有預兆。前年冬天，山西女商人丁書苗被悄悄帶走調查，趕上高鐵快速發展的時代，她靠著攀附劉志軍，從鐵路工程獲得的中介費，就高達數十億。她和很多中國商人一樣，靠著攫取的財富，去維持自己的人脈關係，商人做提款機，官員用權力為商人謀利，構成中國新型的政商關係。不過深諳此道的商人知道，檯面上絕無和官員的經濟糾葛。

2011年1月中旬，丁書苗被抓後，劉志軍在鐵道部內的親信張曙光，也趕赴美國處理海外資產，一個月後，2月28日，張曙光被停職審查消息公布。



張曙光被稱為中國高鐵總設計師，業務主抓高鐵引進談判與建設，是鐵路系統中最具實權人士，那幾年中國如火如荼建設高鐵的勢頭，連英國《金融時報》都忍不住調侃：中國哪時候會把高鐵從北京修到倫敦。

張曙光拼命建高鐵時，他的妻子王興已低調赴美，成為一家 Micropher（馬克夫）集便器的中國獨家代理，在她的幫助下，馬克夫成為高鐵集便器的主導品牌。選擇集便器不涉及行車安全，不引人注目且市場也不小，有數十億的規模，非常適合中間人進場撈錢。

簡單的經濟學推論

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常識：行政性壟斷企業衍生尋租空間。「他購買的價格肯定特別高」，這是經濟學上的推論，也是王晨調查王興後發現的黑金規律，但要證實她的假設，還需要更確鑿的證據。

王晨透過管道拿到價目表，寫出證據扎實的〈奢侈動車〉，獲得2012年騰訊網頒佈的年度調查報導。至於如何找到內部人，她說出財經記者都熟知的調查方法，「找律師去查工商資料」，給點錢就能讓你查，資料包括：企業成立時間、資本額、股東名單，以及招標人聯繫電話。

「你就要在短短的電話中說服他見面，如果能見面再培養他的信任，」這套調查方法聽來簡單，但她說「通常要打幾十個電話，才能見到一個人，」調查過程沒有小說裡的驚險刺激，更多是消磨時間和心情。

高鐵供應鏈上的供應商分為三類：一是技術型壟斷，以外資企業為主；二是親屬型壟斷，即供應商是某官員的親戚；三是關係型壟斷，通過與鐵道部官員搭上關係取得信任後成為供應商。後兩類型壟斷，即便沒有相關從業經驗，還是能用倒買倒賣的方式大賺中間財，像高達30萬元的廁所、上萬元的座椅，而且「這些人在主機廠要需要維修時，人都找不著，愛理不理的」王晨轉述主機廠內部人

士說法。



「關係不好的企業會有怨氣的，它會不高興的，」對人性的判斷讓王晨鎖定目標，找那些資質好但沒有得標的廠商，「他對壟斷的市場有怨氣，但是怕麻煩，而且他肯定有價目表，」因為他也在盤算送招商的領導什麼禮物。

她注意到一家廠商，在國外供貨非常好，但就是打不進中國市場，於是鎖定它。「我去了五天都沒突破，最後那老闆才接電話，我特高興。」王晨談起這段還是一臉小姑娘的雀躍。

見了面，她開門見山地跟對方說：我是記者，我想跟你拿動車招標的價目表。

直接說，可能嚇壞不少人，但是她的直率反而取得對方信任。

她認為，人際相處首重感覺，要做個能讓別人信任的人，就要「我會做什麼、不會做什麼，都告訴你」，而且說好了要保密，「就算那時候價目表引起爭論，我都沒有說是誰給我的。」在報導中，她也是寧願降低可讀性，用模糊的「內部人士」說法，而且不去描述他的外在、見面場景等等。

「目錄」上高價的座椅立刻攫住王晨目光：單人座椅三萬多、雙人座椅高達四萬，還有VIP座椅居然售價要十六萬左右。上海坦達和上海元通這兩家高鐵供貨商是衝入的兩匹黑馬，生產座椅的同行中，沒人知道這兩家上海企業的背景。但座椅的市場利潤又相當巨大，「未來會有1000列高鐵運行，而由此帶來的高鐵座椅市場規模將達上千億元。」一位當初曾提交座椅設計方案的供貨商跟她說。

王晨的調查發現，鐵道部在指定座椅生產廠商時，並未在已有座椅生產經驗的廠家中選擇，而是安插有關係的人成立新公司，再從國外引進技術白手起家。不管是坦達、元通，還是丁書苗，進入高鐵市場都遵循一貫的套路：先拿單再成立公司。但這種作法必然推高成本，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不僅堆高成本，也壓縮廠家利潤，讓靠關係入場的廠商更不願負起維修責任。

馬桶做的也是倒買倒賣的生意。高鐵列車上的馬桶就是TOTO的，打電話去

問，發現 TOTO 的在中國的獨家代理商根本不是高鐵的供貨商，這不奇怪了？追查後發現「他還代理廁所的地板、洗臉盆跟水龍頭」，洗臉盆標價 7 萬多，市面上只要一千多，而普通幾百元的水龍頭，動車上花了 1 萬元，組合成最奢侈的洗手間，南車採購價 30 萬元、北車採購價 120 萬元。



調查完成後，王晨直接跑到工廠去，採訪這些關係型壟斷企業的說法，「他們迴避，但不否認我們的報導」，除了上海元通之外，「他以為我是宣傳報導，就吹噓了關係」，她還是寫出來了，為此，對方跟她吵了一架。

記者的護身符

看過王晨的報導，最初，我很不適應它的風格，通篇的引用都是「內部人士」，充斥匿名的消息源大大地降低報導的可信度。

「沒關係，」王晨說的很有自信，「財新的內部核查機制很嚴厲，都要寫在 memo 裡。」memo 制度是胡舒立在《財經》建立的，現在跟著她一起到財新，要求記者每日採訪行程都要記錄，包含跟誰見面、對方的職稱、談話的內容，甚至要附上取得的關鍵證據，發給編輯、主編，以及胡舒立。

「為什麼我們寫了這麼多匿名人士，也沒出問題，」王晨談到財新的核實機制，原本輕弱的聲音突然洪亮起來，「因為我們是嚴謹的，是符合事實。」她說，「在中國，你要踩雷就要有保護自己的工具，真實性，永遠是記者最好的護身符。」

王晨的說法來自胡舒立，她曾說過：在中國，記者能犯錯的空間很小，為避免粉身碎骨，而「事實」正是記者保護自己的最佳防衛。

胡舒立以洞察新聞的邊界聞名，她在任《財經》雜誌十一年，尖銳地挑戰中國新聞監管體制，當其他記者噤聲或被拘捕，她依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美國《商業周刊》稱她「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有時候，你會覺得她的存在似乎在夢中。

聽過她的名字很久，但感受到她的影響力，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宿舍樓裡。

「四個多月幾乎都是在汽車輪子上度過的。…從中西部出發，最後經底特律回到聖保羅，走過 25 個州，晤談了 400 多人。」書的扉頁這段文字，讀來有美國西部電影的蒼涼與冒險，但它出自胡舒立的《訪美記》，這是一本中國記者必讀書，書標下一行小字提醒：新聞專業主義下的觀察與寫作。



1987 年，胡舒立獲得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五個月研究的機會。她和《費城詢問報》的調查記者聊天，在《今日美國》實習。

回中國後，1989 年天安門廣場的激情，激發北京新聞界的活力，他們走入遊行隊伍爭取新聞自由，胡舒立也在其中。軍人鎮壓，中共中央對運動一錘定音，胡舒立被停職 18 個月，她用這段時間寫成《美國報業見聞錄》，是中國第一本審視美國新聞與民主的關係，這本小書如今讀來並不過時，2012 年再次出版，給了更簡鍊的名字－《訪美記》。

「那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國度，每一家報紙究竟是什麼樣子，怎麼運作」，頭頂著沒溫度的日光燈，屋內的空氣窒息，混雜著男宿獨有的汗味，幾個男生圍坐在一塊討論《訪美記》，剛才說話的男生身材瘦小，凸起的顴骨上掛著黑色膠框眼鏡，突然轉頭問我，「你讀過院長的《訪美記》嗎？回頭送你一本。」他們是傳播學院的學生，口中的院長就是胡舒立。

「我走了，再見。」2009 年 11 月 15 日，胡舒立在《財經》網個人部落格留下短短幾句，無預警造成當年最大的媒體地震。一個月後，再次出現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廳，就任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的致詞典禮上，她全程低頭看著講稿，謹慎的樣子不若作家許知遠描述她一邊爬山一邊連珠炮的形象。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體裡當記者。因為沒有好編輯，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為沒有好主編，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編；因為沒有滿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來辦《財經》。」胡舒立想辦一份具有美國水準的雜誌，遊歷過西方，她清楚獨立是新聞專業的根本。

不過，依舊在黨管媒體體制下，所有的媒體都被要求有一個掛靠單位，《財

經》的掛靠單位是聯辦集團，掌舵人王波明是前外長之子，在西方接受教育，有過紐約金融市場的經驗，回到中國後，他想創立一本雜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找上了胡舒立。



胡舒立提出兩個條件：王波明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兩百萬元的預算，用以支付調查報導的費用，以及保持記者有尊嚴的收入。王波明同意了，但當年《財經》僅在投資階段，兩三年沒廣告收入。隨著《財經》重磅調查報導間或出爐，王波明接到抗議和撤廣告的電話也越多。

相對於日漸水漲船高的名聲，《財經》對採編的待遇重視不夠，創辦之初能以高薪支持記者，現在部分記者薪資低於業界水平，儘管聚攏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大旗下，但記者收入不高是不爭的事實。

敏感而又強勢的胡舒立注意到這問題，找王波明商量過，她要求採編團隊持股，跟目前掛靠單位脫鉤，且增加小股東入股。

2001年胡舒立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於其性質與組成的變化」，她希望增加對《財經》的控制，按照自己的理念構築獨立媒體。

我們都知道結果，她在這場博弈中，輸了。

但是，胡舒立沒放棄她擁有理想媒體的夢想。精密計算籠子的經驗與政商界綿密的人脈，都跟著她來到北京市鬧區溫特萊中心十五層的財新傳媒總部，而她將身兼中大院長與《新世紀》周刊總編輯二職。

計算邊界

「胡舒立當然很有經驗，她會知道邊界在哪裡？能走多遠？」曹海麗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辦公室對我說。朝陽門外大街，成堆的外資銀行，西裝筆挺的白領穿梭街上，《紐約時報》北京總部隱身於扎堆的商業大廈中，曹海麗也是辦公室內成堆的歐美白人中少數的亞裔面孔，位居總編輯高位。

她曾是胡舒立的舊部，與王晨合作過調查〈張曙光的祕密〉，關注鐵道部改革，但她最與胡舒立的成名作要到更早的〈非典系列報導〉。



2003 年春，SARS 危機爆發。3 月下旬，曹海麗被派駐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她發現所有人都戴口罩，就她一個人沒戴，顯得有些突兀，當時，香港淘大花園爆發疫情，她立即去採訪，寫了稿子傳回北京給胡舒立，她一看嚇壞了。

當時，SARS 的消息在中國國內被封鎖，衛生部官員向公眾保證：病毒已得到控制，廣東省的報紙被要求編發讓大家安心的報導。胡舒立看到傳來的稿子，立即上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看了一下，截至 3 月底，廣東就有七百九十二個人罹病，比官方公布的數字多出一倍。

胡舒立打算做一組報導，好心的同行建議她「這事太敏感了，還是不要做了吧」，畢竟在中國，報導重大災難新聞有政治上的風險，這個國家在 1976 遭遇唐山大地震後，政府將死亡數字壓了三年。

胡舒立就不相信政府能瞞的住，「透不透明有太大區別，關係公眾的生命權，一定要報導。」曹海麗繼續在前線報導 SARS 發生的過程，率先獨家報導 SARS 危機，胡舒立另派幾組記者，分別到四川、山西一帶採訪，《財經》用嚴肅的口吻戳破政府疫情沒有擴散的謊言。4 月，中國政府承認隱匿疫情，正式免除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位。

在最初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每週一刊的 SARS 增刊，疫情趨緩後，她仍想著要怎麼把報導做的深刻，追蹤長達四個月，發表 30 多萬字的相關報導。她們為信息突破的努力，應該要被記住，有一次，她在去山西的火車上打電話給朋友「聽說北京封城了，能不能想個辦法讓我回來，我的雜誌要按時出來。」

她的堅持，讓這組報導在全球引起回響，也為曹海麗和胡舒立贏得相應的榮譽，曹海麗獲得世界調查記者協會（ICIJ）調查報導提名獎，而胡舒立當年被《世界新聞評論》授予「年度國際編輯」的稱號。

她幾乎在每次核發稿件的過程中，展現近乎完美的判斷。「如果這事不是完

全禁止的，」她說，「那我們就要做。」她甚至批評中國媒體還殘留喉舌心態，「SARS 的事情，我們從來沒看到過任何部門說不報導，但是大家就很自覺不報導。」



什麼是敏感的新聞？「有新聞就做，別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幹不好，或者不敢幹」，尤其在這個新聞比記者多的時代，她只跟記者說「把事實說清楚，同時表達一種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所謂的風險，在她眼裡不過是記者拿來怠惰的藉口。

不少人都談到和她談話的經驗，會覺得她好像處在與現實不搭界的夢裡，曹海麗應該也這麼認為。2013 年《紐約時報》以〈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拿下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但也因這篇文章，《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在中國被屏蔽，至今未解。

撰稿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質疑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擔任公職期間，他的親戚利用這層政治關係攫取大量財富。其中，當國務院免除平安保險經營範圍的限制後，該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募資 113 億，現在市值已超過 3000 億，溫家寶的親屬，包括他的母親，在平安保險上市前就已經投資，擔任教師的母親在這項投資上，就賺了 7.6 億。

這篇報導引起的風波還未止息。「（外媒）不會收到禁令，也沒有任何審查，但他可以把你關掉，會讓你付出代價。」曹海麗認為黨國對媒體的控制力仍不容小覷，果然在 2013 年底《紐約時報》的記者等不到更換新的記者簽證。不過，這篇報導也揭開一條調查中國的路徑，從錢的線索開始追蹤，「你從商業入手會比單純寫政治更有影響力。」曹海麗說。

這也是胡舒立走的調查之路。中國在 90 年代以後，股市發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為財經新聞發展創造條件，她看準資本市場是公眾深度參與的市場，公開公正是基本原則，以財經報導切入討論金融壞帳、金融機構出路，將不再是「禁區」。一條用財經報導揪出政治貪腐的路，在經濟高速發展，政府影響與私人財富高度重疊的社會裡，是有效且可行的。

胡舒立經手的每篇稿子，都在修正她對新聞邊界的計算，這也意味著，她很

清楚什麼可以報導，也決定哪些不能報導。



同樣處理平安股權買賣，記者賀信認為財新做的〈誰買平安〉處理的更細緻。涉及 727 億港元平安股權交易，誰出錢？報導提及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匯豐集團出售全部股權，結果由泰國正大集團接手，雖然正大規模不小，但淨資產 90 億美元，要一次吃下 93 億的平安股權，還是讓人懷疑，錢從哪裡來？調查發現，正大背後還有其他機構出資。

乍看之下，看不出報導所涉風險，但如果對照著〈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一文讀，便可發現一條不甚清晰的洗錢路徑，出售方多數是溫家寶的親戚，然後，在一些商人幫助下，他們再把股權套現的錢，投入到房地產和金融等有利可圖的項目中。「他們（新聞監管部門）其實看不懂你在寫什麼，但是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了。」賀信語畢還帶著若有似無的笑容。

新聞啄木鳥

胡舒立當然也清楚，中國不可能像美國，用事實說話就能周全。

她在一場香港大學的座談會上提到，她和《財經》曾多次被起訴，而且幾乎都是敗訴。「我們不認為我們有錯，而且覺得自己絕無『失實』的問題，批評上市公司材料確鑿，非常有把握。」結果，一審敗訴以後打二審，因為他們批評的上市公司跟地方司法關係很好，在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她發現「全無道理可講，非常勞民傷財，」她不得不承認，中國辦雜誌要達到國際標準，確實要付出更多努力。

漸漸地，胡舒立較能準確感覺到一個敏感議題的報導時機，她說過，報導除了要發現事實，還要審時度勢。就像〈誰買平安〉在《紐約時報》出刊後兩個月發表，當時市場對平安股權仍高度關注，但監管者已經稍微放鬆管制。她是體制與市場的搭橋者，資源都能為她所用，但遇到政治審查，她會妥協，但不會妥協太多，她說：「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

她不是意見份子，在評論中進行批評時，沒有激情的語言，堅稱自己是忠實的反對派，即使在 2006 年上海社保案的調查之後，她仍然沒有點出問題是一黨專政下的權力尋租，而只是強調中國脆弱的法律致使官員及其親屬獲利。她在 2009 年接受《南都周刊》訪問時承認，她是在承認威權政府的前提下去關注中國改革，並希望推動與完善。

在胡舒立看來，這個社會要有喜鵲，也必須有啄木鳥。她希望扮演的，正是一隻啄木鳥的角色，永遠在敲打一顆樹，不是為了把它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胡舒立很急，總希望中國的進步快一點，再快一點。所以，她不僅侷限在證券和金融，而是採用更廣義的財經雜誌，例如：在公共衛生事件，他們做了 SARS 的追蹤；在反腐揭貪也有上海社保案調查；近年來，環境報導成為新的重心。

環境污染是百年帳

財新很快就奠定它在環境報導的地位。《新世紀》週刊記者宮靖是中國少數的環境調查記者，2012 年他以〈自來水真相〉分別獲得開發銀行的亞洲新聞獎亞軍，以及中外對話網站與英國《衛報》合作評選的中國最佳環境報導；2011 年他才以〈鎬米殺機〉獲得《南方週末》年度傳媒致敬人物。

「中國到這個節點，媒體透過調查把環境說清楚很重要。」宮靖把環境調查比喻成是「直面背後」的過程，它的正面是大家熟悉的中國：強大、繁榮，而背面是一連串安全奶、地溝油、PM2.5 的問題。「中國追逐高經濟增長，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外部性』」，宮靖不脫原本財經記者的習慣向我解釋，經濟學裡的外部性是指個體的經濟行為對其他人造成影響，卻沒有承擔成本。

講的是當下的中國，乃至未來百年要面對的環境污染。宮靖看到這層問題，從政經領域轉做環境調查，因為他覺得「政治新聞對民眾的影響是短暫的，但環境中有很多問題是不可逆的，影響的不只是一代人而已。」

想的夠清楚，讓宮靖的調查「接地氣」。(指更貼近老百姓真實生活)



「中國一半城市的飲用水不合格」宮靖在〈自來水真相〉中用嚴肅口吻指出。

宮靖發現周遭的人都喝瓶裝水，在家庭中更明顯，上海有三分之二以上都用桶裝水，而北京使用桶裝水的比例更高達 86%。他發現一個悖論：幾乎沒有人敢生飲自來水；同時沒有一家水廠自檢自測水質不合格。

哪個更接近事實？中國住建部是城市飲用水的主管部門，為了搞清楚飲用水的水質情況，2009 年部門內的水質中心曾做過一次全國普查。然後呢？「沒有然後了，住建部沒有公布水質數據。」宮靖說，「做這個調查最難在於怎麼證明水質不合格？」

他拿出一大張白紙，在上頭畫出自來水供應鏈條：水源地輸送至水廠，經處理後出廠，經過輸水環節，進入市政供水管道，或是居民樓的儲水槽。漸漸地，他發現水質不合格應該是水廠處理設施老舊以及自檢自測的問題。

「稿子也可以寫，但就是沒有結果，」採訪中國的水質專家後能得到大致輪廓，「但就是說不清楚哪裡出問題。」他明白調查結果需要 2009 年的水質數據。

宮靖訪問過很多專家學者，他們都建議他去找個關鍵人物，「他手上肯定有這份數據」，約見面的過程是一一次次碰軟釘子，幸好宮靖扎實的研究功夫給之前的受訪者留下印象，「他們去幫我說服他，他其實也想推動自來水改革這件事。」宮靖坦承幸運，因為有更多的調查報導即使做好準備也拿不到數據。

水質實際合格率 50% 左右，那麼，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公布的飲用水九成合格率從哪裡來？住建部的水質中心設有國家監測站與地方監測站，但均由地方水廠負責，同時每年公佈數據，真相大白「自來水真相解不出就是因為水廠的人掌握發言權、檢測權，沒有第三方介入。」宮靖直言批評。

說話的成本

宮靖的報導風格，和我之前讀過的王晨的調查報導就很不一樣，全篇文章都

是實名的消息源，包括住建部的水質工程師與地方水廠官員。



在中國，採訪對象講真話的成本是高的，宮靖在閒聊時跟我分享過一個故事，他曾到安徽農村調查手足口病的情況，因為地方政府未及時公開疫情，才讓患病孩童大量死亡。按理說，這樣的家庭遇到記者，應該是恨不得揭露政府的惡形惡狀，「好幾戶家庭把我趕出來。」他說這些家庭早就被村長交代過，如果接受採訪未來就領不到賠償，還有生二胎也會被阻攔。

中國人普遍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心態。我不禁好奇問他，為什麼不幫他們匿名？「他們沒有提出要求阿！」宮靖笑的直爽，有些反映他蒙古人的性格，但不多話，回答前都要想過，又有一份調查記者的謹慎。

他似乎覺得回答的不完整接著補充，「我都會把他們發言的部份讓他看過，讓他們對措詞進行修改」，語氣中斷幾秒後反問我「我採訪了足夠多的人，寫的也足夠通透，為什麼不能把名字寫出來？」

〈自來水真相〉，標題挺樸實，但也很貼切，就是真相是什麼？宮靖平和地說，「我是用理性的態度說出事實，不是為了攻擊誰。」他和王晨一樣，認為記者只要說清楚事實，把證據擺出來，就不存在新聞邊界的問題。

我每次對新聞邊界的提問都像一面鏡子，照出他們置身夢中不與現實搭界的模樣，抑或映照出我這個自以為世故的年輕人。

的確，財新的記者比起其他媒體，更不在乎新聞監管紅線，北京很多人認為是胡舒立的新聞專業與政商關係保護了旗下的記者。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

這樣的說法有其根據，1985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工人日報》派往廈門記者站，這城市剛被指定為市場經濟的試點，她與每個市政府的人見面，其中，時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對她印象深刻；1992年她是《中華工商時報》國際版編輯，當時接受西方教育知識分子回中國進行證券市場改革，她決定採訪所有的頂

級金融家，很早就與後來的高官建立聯繫，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中紀委王岐山。

被問到顯赫的家世與複雜的經歷時，胡舒立總會說：「這有什麼好說的啊！下一個。」回答更添她的神祕色彩。王晨聽過這些說法，「有什麼神祕啊，就是累而已，打好多通電話才見到一個人，」她反駁外界對財新的渲染，「我做的調查沒有高層給我提供資料的，否則我就不會全國各地跑。」

胡舒立不認同外界關於她政治背景的猜測。在接受《紐約客》訪問時，首次回應，她認為人們高估她與權力接近程度，「我是一名記者，他們也把我當記者對待，」她堅持讀者才是財新傳媒的保護傘。

「她並不完美」，經常牛眼看人的前《財經》資深法政記者楊海鵬說，她對草根底層缺乏體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曄則說，「她是很霸道的一個人，要記者按她的規則去做，」她會要求員工上班穿正裝、不准炒股，甚至不上微博，因為「你的老闆是胡舒立，不是曹國偉」賀信記得有次胡舒立這樣跟他說。

胡舒立是財新巨大漩渦的中心，所有人都圍著她旋轉。曾經，一位中層幹部建議她應該分權給別的管理者，她瞪大眼睛說：那我幹什麼呢？

「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為《中國新聞周刊》寫〈寄給 2049 年的信〉一文中如此強調。她一生的追求，就是中國新聞業能按她的理念發展：用事實說話，如果可以，讓它更清楚一些。



老將的網路實驗

一 資深記者如何在網路拓寬言論空間？

夏日裡的北京，輪胎輾過柏油冒出暑氣陣陣，街頭的電視牆跑馬過車蓋能煎蛋的荒誕新聞。我和一位記者約在咖啡廳訪問，思緒卻一直被他刷屏的動作打斷，他似乎能察覺我的不耐，語帶歉意地說「抱歉，今天薄熙來庭審。」

2013年8月22日，當薄熙來站在濟南的法庭上，不少記者向我描述，他是高大英俊、手段強硬，又有群眾魅力的政治領袖，如果中國實行民主選舉的話，他是有可能選上國家主席的。現實恰好相反，薄熙來如今犯有受賄、貪汙、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場世紀矚目的政治審判，黨國再次展示高度自信，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結果。首見在微博上「公開庭審」，不但讓薄熙來能充分行使自我辯護權利，而且由法院書記官即時發佈在網路上。

不少人認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前兆。

但在庭審前一周，各家媒體老總都收到一紙來自北京宣傳部的「通知」：禁止炒作，只准採用新華社通稿。

「放開手腳做」

當天上午，新浪首先在網頁做「庭審實錄」，將濟南中院在微博上發佈的訊息，節選整理製作成網頁專題。其他家入口網站急了，「當天下午，我緊急跟團隊開會，要他們放開手腳做」，網易新聞副總編輯陳峰說，「事情跟我們原先設想的不一樣啊！」

會如此驚訝，因為有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他們頭頂，中國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嚴禁入口網站自採內容，並要求將伺服器放在北京，儘管網路公司資本再雄厚，也能被隨時覆滅。要放開手腳，實需更大的勇氣承擔。



陳峰將編輯團隊分成三組人馬，一組人緊盯濟南中院微博與央視直播，隨時提取新聞訊息，搭配央視圖片做成「圖文直播」。另一組人，從龐雜訊息中提煉新聞，配合網路技術團隊，製作多個新聞專題，包括：薄家奢侈生活、薄案人物關係、薄言論對比、薄熙來這些年、薄熙來治下的重慶。

這些新聞專題或多或少觸碰報導禁區，例如薄家奢侈生活是中國首次完整解密高官財產；薄案人物關係點出薄熙來也涉及尼爾伍德案，這宗刑事案原本被中央定調為谷開來一人犯行；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提點這幾年唱紅打黑的冤獄，但在這場審判中都被刻意迴避。

這些選題還踩在模糊的界線，陳峰卻有個更大膽的狂想，派了一組記者去採訪律師李莊，這位在重慶打黑下的犧牲者。敢冒風險只因新聞人的稟賦「李莊當時跟薄熙來正面交手，他還是一個關鍵的人物」，陳峰就拍板讓李莊在網易大大咧咧地談「我替薄熙來畫了 70 多處庭審發言漏洞」。

首次開放微博庭審，在中國媒體圈一片讚揚的聲浪中，陳峰反而表現的深沈，「很明顯庭審規避了重慶的打黑問題，這才是薄熙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汙點。」他本像電影《新天堂樂園》中的安妮：期待著一場海嘯，結果海水只拍上了岩石。

審判者與被審者都在進行一場煞有其事卻無關痛癢的審判，很快地，花邊性超越一切，多年時政記者的經驗，讓陳峰比其他人更清楚，這不過是齣安排好的劇碼，「我可以不表態，至少也不傾向用過分讚美的詞。」

陳峰取巧迴避規定，在網易微博另外申請「當事人 news」的帳號，對李莊的訪談就由這位「網友」提問，由李莊在微博上回覆。這組訪談 8 月 25 上線，語句平實，揪出薄熙來辯詞中的邏輯失誤、避重就輕，同樣儘圍繞在收取賄款問題，刻意避免突出打黑。

儘管迴避爭議，但陳峰依然擔心政府的反應，直到有天他去國信辦開會，「有

個領導還主動跟我提到李莊圈了七十多個漏洞，說明這個事情沒出問題，」他嘟囔著「確實有那麼幾句話不是跟中央調子完全一樣，那也沒什麼問題嘛。」最後兩句話含在嘴裡，更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北京五道口附近，門前兩隻拱背的銅牛，牛角交錯、怒目相視，底下銘刻一行字：「核子重如牛，對撞成新態」，這裡是網易北京總部，玻璃建築砌成的高樓，我必須抬頭眯著眼睛才能看到樓頂的網易二字。

PU 夾板砌成網易辦公室明亮的空間，推開走廊盡頭陳峰辦公室的玻璃門，眼前的他，俐落的短髮，配戴細框的眼鏡，說話明快又言簡意賅，習慣在一段談話後，總結自己的意見，與一般高階經理人無異。

但更多中國人會記得他的另一個身分，報導孫志剛案的調查記者。

年輕的新聞英雄

2003 年 4 月 25 日，《南方都市報》刊登〈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一文，兩個月後，中國國務院宣布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一篇報導終結一條惡法，這是中國新聞史上沒有過的事。

他在 90 年代投身媒體，那是個金燦燦的年代。

鄧小平南巡回來，結束姓社姓資的辯論，準備全力衝刺市場經濟，中共政府要卸下財政包袱，在媒體推行「管辦分離」制度，只掌握報紙的刊號，讓黨報得以另立市場化子報，成為中國市場化媒體的蓬勃時期。

逐漸加劇的市場競爭，催促著媒體從黨的喉舌轉變為群眾的代言人，他們與讀者站在一起，扮演好監督有權者、關懷無權者的角色。一項針對北上廣居民所做的記者形象調查顯示，近六成居民認為記者職責是「輿論監督」，超過四成居民認為要「為弱勢群體說話」，記者無疑是為正義代言，有六成五的居民表示遇到不公平會向記者投訴。

那也是個洋溢希望的歲月。許知遠大學一畢業就被聘為《經濟觀察報》主筆；令狐磊大學還沒畢業就被《新週刊》總編看上；沈灝剛畢業就當上《南方週末》的新聞部主任。年輕又充滿激情的記者，自視為歷史的見證人。



陳峰作為他們的同齡人，也是熱血沸騰的，總想著要是能主管一家報紙，該辦成什麼樣子。不過，他畢業後，只找到老家鄭州的一家小報社當記者，月薪千餘。幾年後，2002年3月，他跳槽到《南方都市報》當時政記者。

那年，他30歲。在中國記者這行當裡，一般幹到35歲就會轉職，年紀不小讓他有些尷尬，而《南方都市報》只是個新生的報刊，甚至，刊號還在調整中。

青春總是狂狷，南都的總編輯程益中不過29歲，只編過文藝版，被調任負責一份大家懷疑能不能活下去的小報，卻在南方報業集團大會上喊出「《南方都市報》一出生就要風華正茂」，語音未落就被哄堂笑聲淹沒。

程益中要辦中國最好的報紙，需要中國最好的人才。從一開始就設計不封頂的評分和獎金，要讓記者的收入甚至高過部門主任，因此他在集團大會要求百萬投資，卻只換來一陣笑聲，他說：當時只是感到孤獨。

2003年的某天，陳峰在南都深度報導部待了一年多，距離他受許知遠感召已經十年。但他因為人生地不熟總寫不出稿子，便成天上BBS，偶然間，在當時最大的論壇西祠胡同上看到一則留言，說有個來自湖北的大學生在廣州收容所死了，家屬在四處申訴。

論壇上的記者比較多，此前也有不少記者看過這條消息，但大家普遍的反應是不能做，或是做了也發不出來，但陳峰手頭正缺線索，於是看到後立即向主任匯報，主任說：可以做。

於是，他開始採訪，卻碰上個棘手問題，案件牽涉到法院系統較多，他苦於沒有人脈，就找了跑廣州本地新聞的王雷一起採寫。

2004年4月24日晚上，陳峰和王雷花了3個多小時，將6000多字的〈被

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稿件寫好。總編在發刊前加了個小動作，怕報導無法見報，便將稿件先傳給幾家門戶網站。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刊發了這篇報導，王雷照常上班，還被同事開了玩笑說「你怎麼還在這，還不快躲起來」，因為，廣州市政府相當生氣，揚言要狀告《南方都市報》，但並沒有找到稿件有什麼破綻。

對此，陳峰至今還是挺得意，「報導的震撼力完全來自事實本身，而不去管你記者是誰。」

所有試圖反抗壓迫的行為，都是種青春叛逆的印記，第一口的啤酒、第一次聽到搖滾樂，甚至第一次說出真話，就像程益中喊出「我們有不可以說的真話，但絕不說假話」的口號，那樣鼓動人心。

沒人想到，這篇報導會將《南方都市報》推上風口浪尖。

報導出刊後引起熱議。雖然此前類似的新聞不少，但孫志剛是大學生而不是流浪漢，引起許多媒體跟進報導，在社會上掀起收容制度辯論，又有三名博士生上書人大常委會，要求進行違憲審查。終於，兩個月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布廢止收容遣送辦法。

一切都在改變，就連一向僵化的政治體制都露出鬆動的痕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被視作烏托邦，中國不會再退回過去；十六大是政權第一次順利交接，黨的總書記胡錦濤公開講話政治局將學習憲法治國；當 SARS 肆虐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先召開記者會公布罹病人數。

2003 年被中國自由派稱作「胡溫新政」，一種單純的信念支撐他們的樂觀，相信市場經濟無可避免地帶來政治開放與社會進步。

同一年，《南方都市報》得以刊出非典疫情、孫志剛之死兩篇重磅調查報導，中國共產黨自我調整的能力，讓人充滿期待，而記者是目睹改變的記錄者。

不過，黨國隨即恢復他的本性。2004 年初，《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及兩位高管無預警地被以貪汙、受賄、私分國有財產等罪名逮捕及判刑，外界普遍

認為是廣東省委書記對此前 SARS 與孫志剛事件報導的報復。



一抓一放，黨國的態度收縮如此之快，令人詫異。中國是虔誠的實用主義信徒，施政沒有統一的邏輯，像意識型態官員已從講「大海航行靠舵手」轉為「守土有則」了，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李永剛向我解釋中共宣傳部門邏輯。

雙頭蛇的媒體

中國在毛時代是中央高度集權，它將散布在社會的零散權力，全部吞沒在統一體中，個體失去自主，社會高度單一化。因此，我們總能看到懸掛著相似的油畫，那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國，毛澤東正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就像哈維爾描述的生活中的巨大全景，人們無需相信這一切，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默許，這就夠了。

改革開放後，另一個中國誕生了，這片土地流淌著信息與金錢，鄧小平喊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龐大的中產階級興起，他們追逐利益且渴求資訊，黨很清楚那套戈培爾的宣傳邏輯：「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已經不管用，他們要跟著社會變動調整輿論的禁區。李永剛將之比喻為雞蛋，為了要保護內核，中宣部只能擴充蛋白作為保護帶的功能，讓言論邊界模糊化。

都市報看準這層契機，投入調查性報導。當豪華與龐大的建築群旱地拔起，聯結廣袤的鐵路網絡，也有不少人摔下飛馳的經濟列車，社會充斥越來越激烈的情緒，媒體趁著這股情緒，進場製作強調揭發違法濫權的調查報導，在競爭激烈的報業市場攻城掠地。

而「管辦分離」的制度，也讓宣傳部門與傳媒間的關係也有細微變化，中宣部不再是頤指氣使的老大哥。

從前，共產黨將媒體視為「黨的喉舌」，喉舌是不具大腦行使主觀意志的，充其量只是黨的傳聲筒，與之相應，新聞工作者（在共產黨語境）歸屬黨組織幹部，領公家薪水、享公職福利。但管辦分離後，中宣部僅是媒體的主管部門，「這個主管是說，我在關鍵時刻仍然可以命令你，但平常時候，更多的是彼此合作。」

李永剛解釋，黨要媒體繼續做宣傳工作，但交換條件是，它在某些錯誤上選擇「爭隻眼、閉隻眼」的官場糊弄心態。



媒體的角色也更像是雙頭蛇，有兩個腦袋，一個腦是聽命於政府，另一個腦則跟隨著市場。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不喜歡聽什麼，你不能講歷史錯誤（六四、大饑荒），要確立共產黨執政地位，要保護共產主義歷史傳統，（不講共產黨建國前的承諾），不能談民族問題（台灣、新疆、西藏）等等。可是還有共產黨沒有明確指示廣闊市場，所以胡舒立說「只要沒有說不能報的，我們就要做。」

與傳媒商業化同時發展的，還有媒體集團化與中央財政下放。經濟權力去中心化，連帶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現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種博弈格局，也隱含某種合成與衝突，加上社會雜音的干擾，更添變數。

「中央政府在想什麼，或者地方官員在考慮什麼事，不是在封閉的官僚系統中想，還要考慮社會的影響」，李永剛進一步解釋這種格局帶給中國傳媒機會主義的空間，「它的溝通速度變慢了，媒體就有了表達空間」，事件發生到禁令抵達的時間變長，因為政府部門需要內部折衝與利益妥協，中國傳媒可以打「時間差」的策略。

中宣部，一個有權力吊銷刊號與撤換總編輯的政府部門，即使傳媒是雙頭蛇「它仍然掌握這條蛇的七寸」，內媒觸犯宣傳禁令，會得到一張類似足球賽場的「黃牌」警告，集滿三張，總編被辭或報社關門。

「自由意味著知道你自己的籠子有多大」，未經審訊失去自由五個月的程益中，在獲釋時如此描述中國的新聞行業。自由派對市場經濟必然帶來政治改革的期待落空了，黨只是沈睡的巨蟒，隨時都會醒來。

這個世上最神祕的政府部門，只出現在美國的衛星地圖。博士喬木描述初入中宣部的情景，門口矗著比人高的大理石，斑斕的花紋如山脈雲疊，背後的牆面幾個大字「守口如瓶，團結如一」，足以表明它的態度。

中國式集權靠四根支柱：槍桿子（軍隊）、手銬子（公檢法司紀）、筆桿子（宣

傳系統)、錢袋子(財政基礎)。大國崛起表露在建造摩天樓與鋪成鐵路網的細節，財政部門無疑成為核心，這讓建黨之初就一直緊跟步伐的宣傳官員很不是滋味，加上「宣傳官員它是反向問責，就是你做的有多好，大家不知道，但是一旦出了漏洞，就會有人問責」，李永剛解釋意識型態官員必然保守的態度，所以，當胡錦濤喊出「和諧社會」口號時，他們只會從嚴工作作風。

轉身擁抱網路

它用高速的經濟增長，交換十年的政治停滯。

2003 年南方報業甫創刊的《21 世紀環球報導》，因為一篇前毛澤東秘書李銳的專訪，不到一年就被勒令停刊；

2006 年，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在中國青年報《冰點》撰文說下一代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批評中學教科書至今還在竄改歷史，最後以停刊收場。

2007 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龐皎明因一篇揭露武廣高速鐵路黑幕的調查報導，被中宣部認定造假要求報社開除，且罕見地發文「新聞單位不得錄用此人」，逼得龐皎明只好改名繼續偷偷地幹調查記者。

2011 年南方報業將長平、喻塵、笑蜀等人清除；2012 年北京暴雨事件多家媒體被強制撤版；直到 2013 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廣東省委宣傳部強行更改獻辭內容，引發編輯部強烈抗議。新聞空間的限縮也由無窮的細節構成，嘴巴只剩吃飯功能，沒有說話的自由。

多年後，程益中回憶總編輯時期，他感覺到宣傳部的顯著變化，打電話給媒體下宣傳禁令的官員，通常在掛掉電話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對外透露下達什麼禁令」，禁令在祕而不宣貫徹執行。

逼仄的空間，催促出走的心，於此同時，幾乎沒人注意到悄然長成參天巨木的互聯網。中國傳媒業分別遭逢兩次強烈人事地震，先是 2006 年中宣部強迫《新京報》總編楊斌辭職，領導班子改由直屬中宣部《光明日報》接管；另一次是

2008年，寫出南方周末輝煌時期的那句「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的總編輯江藝平，被調任至新聞研究所。中宣部兩次強勢人事調動，引起報內記者不滿，紛紛辭職以明己志。



這給新生的媒體一個絕佳機會，要壯大自身影響力的入口網站，捧高薪邀請記者加盟，陳峰、王雷、傅劍鋒等業內傑出調查記者陸續轉戰網路。

技術革新最能突出體制的遲鈍，網上的海量信息、傳播迅速以及去中心化等特質，讓前美國總統柯林頓都曾嘲諷中國努力控制網路就像「把果凍釘上牆」一樣，無法做到。

因為，宣傳部一直以刊號與官位控制傳媒業，但網路服務供應商是商業公司，黨不能決定商業公司的人事，「就這層意義上，宣傳部就失去他威攝能力。」李永剛接著說監管體系的另一盲點，「黨對媒體管理是有轄區劃分的，但網路的虛擬空間超出黨劃定的權力邊界」，這才讓宣傳官員更感困惑。

就像矽谷匯聚世界一流腦袋，北京中關村也有種魅力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報社的訂戶數頂多幾百萬，但在互聯網上面，我們都用戶是幾億的」，王雷辭去南方報業子報的總編輯，沒有懸念地加入騰訊網。

「傳統媒體已經喪失議程設置能力了」，現任騰訊大浙網總裁的傅劍鋒說他當初察覺到媒體菁英心態的編輯流程，被網上大眾的點擊量所取代，才是觸發他離開南方週末的真正原因；而陳峰則是看到「中國在轉型社會，民眾對信息的需求量很大，中國報業缺乏全國性媒體，又屢次在全球新聞上失聲。」他回憶當初911事件，央視一個字都沒有報導，讓他對傳統媒體感到失望，轉身擁抱網路。

他們都在談網路的將來，會以一種驟然爆炸的方式鋪開信息網絡，包裹整個中國。

讓精品新聞上網

傅劍鋒是南方週末最傑出調查記者之一，曾臥底傳銷公司寫出系列報導，獲

薦央視年度記者候選；花五年時間觀察中國農民工犯罪，寫成〈城市裡的陌生人〉系列，反映中國底層的失敗人生；採寫富士康連環自殺報導，他綜合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寫成〈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引起廣泛關注，就像他在南方週末專欄中自稱：「以熱情、冷思關注轉型時期中國的真問題。」



他在 2011 年離開南方週末後，就任騰訊新聞中心副總監，待我去年拜訪時，他已經是騰訊大浙網總裁。浙江已經連續 8 天出現 40 度高溫，但絲毫無損我的興奮，他是中國著名的調查記者之一，讀過他每篇代表作，上頭螢光筆與潦草筆跡交錯，似要談上一天一夜才肯罷休，坐在上海往杭州的動車上，反覆在腦中演練待會的訪問情節。

大浙網是騰訊與浙江日報的合作項目，辦公室位於大樓二樓，他接起電話「我在開會，等等」，語畢，領我進辦公室等候，他迅速穿過走廊，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想法語命令，然後又一陣風離去，看著我說「我們只有半小時時間」。

他個子不高卻能將西服穿的妥貼，齊齊的短髮像是剛修剪過，不斷瞄向 iPhone 時鐘更暗示他是時間的控制狂。

「個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尤其社交媒體興起後，閱讀習慣被深度地改變了，特別是年輕一代，已經不閱讀報紙了」，他向我解釋離開南方週末的原因，他沒在 2008 年南周離職潮跟著離開，因為他想做一次新聞實驗，他覺得「大家經過網路信息狂轟爛炸之後，更需要安靜的東西，一種精品的新聞」，他花五年時間研究農民工犯罪問題，要用深度報導創造南周品牌價值。

未來的新聞業，必然是精品業，傅劍鋒為新聞業開處方，「這個時代大多數都是機械複製的作品，而我做的東西就是非常精緻的藝術品，就像瑞士的鐘錶或義大利的手工皮鞋」他說，訊息不值錢，只有分析才值錢。

但超前的想法不被南方週末採納，他帶著點子到騰訊報到，「他們都是複製貼上，下個標題就完成，我上任第一天就說，我們要做精品化的信息，要做原創性的新聞。」

他擔任騰訊新聞副總監時，分管「活著」欄目，這是第一步的創新，用紀實圖片新聞告訴你一個真實活著的世界，他用兩句話提醒讀者「影像衝擊心靈，感受事實的力量」。



傅劍鋒還是傳統的新聞人，他操作賣腎車間完全是製作調查報導的思路，「我們花了四個月時間，去臥底調查一個非法腎源供養基地，記錄下接頭、體檢、配型過程，」他強調，「現在媒體不太願意這麼做。」

他身上有自南方出走的氣質，如同《南方週末》1999年新年獻辭描述的，真實帶我們認清虛偽和欺騙，直面真實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傅劍鋒2011年底轉職騰訊網後，也在思考這份媒體的價值，「過去十年，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也是一個讓你捉摸不透，甚至有些沮喪的時代。」

太多的事件突襲而來，又喧聲潮落，公眾總是缺乏記性，媒體則永遠在路上，趕往下一場災難，他感性地說「中國的腳步太快，忘記了如何駐足」，於是他策劃〈喚醒記憶中的新聞當事人〉，挑選六個同屬時代記憶的新聞事件，進行追蹤報導，包括孫志剛案、克拉馬依大火，以及SARS後遺症，他有些忿忿地說「如果能給互聯網更多空間，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有價值的新聞。」

入口網站是要打擦邊球的，「有時弄點敏感題材，流量衝高，對他是有實際收益的」，李永剛認為商業網站，不會比宣傳機構保守。

一種樂觀的情緒四處瀰漫：網路上沒有禁區。

樂觀的情緒延續至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小商販推銷奧運會旗幟，斑駁牆面上張貼奧運聖火祥雲圖誌的海報，中國已經被濃厚的奧運會氣息窒息，網易聘了四位記者，沿著奧運火炬傳遞的路線，做成一系列城市速寫—百城記，深描中國鄉鎮風情，不只有北京CBD和上海外灘那樣上升風景線。

百城記成為網易代表作，也標誌著入口網站的影響力正式超越報紙。

中國的經濟增長震驚了世界，但成功舉辦奧運會後，沒有讓中國更融入國際

社會，反而要收回網上僅有的言論空間。



經理人的兩難

新的管理手段恰巧反映官僚系統再度擴張，「經濟上獲得制高點，加上對西方反應不在乎了，他們認為輿論管理滯後了」，許知遠向我解釋，中國政治態度變得傲慢，也與美國金融危機推高中國的道路自信有關。

國務院信息辦公室取代中宣部，成為管理網路內容的直屬部門，兩套原則管理網路，一採「接入負責」，政府提供入口網站壟斷地位，但業者必須配合政府審查；另一原則為「屬地管理」，由門戶網站註冊地所屬互聯網管理辦公室負責，中國較具影響力的網站，如新浪、騰訊、網易、搜狐等四大入口網站，全由北京市網管辦負責。

中國能大刀闊斧管理網路也跟經濟增長有關，據新華社報導，胡溫十年中每年維穩經費高出軍事預算，而維穩費用主要支出於維護「防火長城」，據美國哈佛大學貝克曼中心（Berkman Center）調查，中國至少屏蔽 10% 的國外網站。

中共政府管理網路的說法是「文明上網」，為了避免網路內容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一如體制內的生活，如此滿滿地滲透著虛偽與謊言，「官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下被奴役；剝奪個人的資訊被說成為人的最終解放」，想起哈維爾先驗式的預言不禁莞爾。

政府轉趨強硬的態度，顯露企業的雙面性，網路上的淘金者，既要打擦邊球衝高流量，又要確保資本安全才能展開逐利行為。

隨著入口網站壯大，態度更見保守。陳峰說「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在政府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民營資本的進步性常被黨的慣性吞噬，再有經驗的公司，都隨時可能夭折或死亡，「警察說上門就上門，搬走你的服務器，你能怎麼樣，直接把你網線給拔了，你又能怎麼樣？」陳峰說的不是臆想，這個國家曾因網上出現新疆暴動的留言，關閉一家已有百萬用戶的網站，直到一年後才獲重啟。



「只要說你網頁上有泛黃、有涉嗆，我要關閉論壇，」陳峰聲音不見宏亮，「網易是一家上市公司阿，他（政府）有很多辦法讓你在中國無法經營，可以經常來查稅、查非法信息，恐怕沒有哪個商業公司會跟政府對抗。」他小聲地說「今年騰訊有個編輯被抓，因為認定他新聞失實嘛，這件事社會上都不知道，騰訊又能怎麼樣。」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跟你討論」，當我問及網路管理的問題時，傅劍鋒臉上的表情有明顯變化，不再推滿笑，不再耐心解釋，語調也變得急促，再三問我「你是發表在學術刊物嗎？」、「太敏感的問題我沒辦法回答」、「時間要到了，我還有一堆事情」。

這是無法追問的問題，答案也無法明確，或許陳峰能說出這幫新聞老將投身網際網路的矛盾，他想要在網上傳遞有價值的新聞，但「我作為職業經理人，有義務確保公司資產安全。」

「我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儘管面對政治權力的威脅，蟄伏於網路的新聞人，仍為每次說出一句真話而感動不已。

曾任騰訊微博總監的王雷分享他操作北京機場爆炸案過程。去年七月，一名男子坐在輪椅上，一邊滑行一邊大喊稱自己「有炸彈」，隨即發生爆炸，「我們從知道消息，到找到第一個發佈訊息的人，再找到引爆男的微博帳號，知道他為什麼要上訪，前後只要一個小時。」

引爆炸彈男子叫冀中星，因遭警察毆打致下半身癱瘓，多年上訪未果，遂而在首都機場引爆炸彈抗議，僅他一人受傷。「我們去找到他的微博，讓大家知道他是怎樣的人，其實做的工作跟記者發掘真相的工作很像，」不過，「這樣還算是採訪嗎？」王雷笑了笑。

若粗暴地以世代分類，他們同屬 70 後。成長於中國的青春經驗，讓他們更

熟練地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在報業黃金時代進入媒體，啟蒙他們新聞專業的精神；與黨國走過偉大的時代，也見證它的恐懼與傲慢。



他們總在無奈與絕望的時刻，盡量讓自己不喪失信心。

「現在很多議題先在微博上傳播，然後傳統媒體跟進報導，網上再傳播，報紙再跟進，一環一環的，最後他就會突破原有的空間和邊界。」傅劍鋒談起網路的傳播能量還是難掩興奮，而陳峰也相信，只要世界還在轉，新聞就不會停，對網路與新聞專業的結合，他說「我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

夏天的風，結成秋天的果。新聞老將的網路實驗，還在繼續。

借力微博



一 記者如何透過微博找人？

結束一場採訪後，我興奮地和周遭的朋友炫耀，學到個新詞：「拼爹」，這個詞彙代表的是，一個初識中國的學習者，對模糊的大國了解的更深一些了，那種興奮感就像小學時，第一次解完整年級都算不出的數學題。

「現在不講拼爹了，改講拼乾爹」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上海女孩挖苦地說，「拼乾爹」的說法源於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三年過去了，現在中國人談起官辦的慈善基金會，還是戒慎恐懼地「不好說，這水太深了。」

據中國民政部 2012 年統計報告顯示，在郭美美事件發生後一年，慈善捐款金額就減少 74 億元人民幣。影響延續至今，2013 年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香港立法會展開長達兩小時辯論後拒絕捐款，網上也出現「一毫都不捐」活動，理由之一就是擔心「錢都讓郭美美買包買車了。」

郭美美是誰？為什麼會掀起波瀾？故事要回到 2011 年 6 月的一條微博。

被推著往前

暱稱「郭美美 baby」的女孩 po 出與瑪莎拉蒂合照，實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20 出頭，豪車數輛，名包成櫃，又牽扯上先前鬧過汶川地震善款流向不明的紅十字會，網民活像蒼蠅聞到肉腥，群聚後瘋狂人肉。

王星和絕大多數網友一樣，在微博上即時刷新每一條動態，「母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2 年內爆富」、「紅十字商會原為中紅博愛」、「瑪莎拉蒂是王軍送的」，撲朔迷離的劇情堪比好萊塢電影。

坐在電腦前不停滾動滑鼠的王星，是《南方都市報》網眼版的首任編輯，這

個成立剛滿三年的新部門，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名記者，報社長官對網眼的定位只說一句「考慮新媒體的融合」，至於該怎麼做？王星坦承自己起初「很茫然，還想不清楚。」



他唯一知道的，是要延續《南都》的價值觀：監督強權。這也是他奉行的新聞觀，他還記得在中學時第一次讀到《南方週末》的感動，那一句「陽光打在你的臉上」，讓他從此嚮往南方，大學還沒畢業，他就隻身搭上南向的列車，在南方報業當起無酬實習生，直到現在都沒離開過這大院宅子。

「好像有個天大的黑幕擺在那裏」，王星還能記起當初網上那股像鯊魚聞到血的興奮感，當下他對網眼下了兩個指示：一是要快，二是要做深度版的策源地。

網眼還陷在不著邊際的瑣碎中，事情發展卻已超乎控制。網友靠瑪莎拉蒂車牌找到車主登記為王軍，王軍是中紅博愛董事，而中紅博愛是紅十字會授權的商業營運項目，中紅博愛背後的持股方為王鼎集團，疑似利用合同在市場套利。

媒體被推著往前，調查改由深度部主任喻塵主導，他派王星調查王鼎集團的財務流向，但王星心裡不踏實，覺得「一直都是撲朔迷離的，又是能夠讓你有所進展的，好像就只能往前走了。」

透過律師朋友，調取王鼎公司的工商資料。紅十字會於 2006 年啟動博愛小站，即為捐血車旁的小商鋪，可在車體與店面投放廣告，委託商業系統紅十字會承辦，但礙於中國民政規定沒有任何撥款支持，另成立王鼎市場行銷公司運作。王星大致釐清商紅會的財務關係，卻禁不起網上的追問：

郭美美從紅十字會拿走多少錢？

一條微博引導至新方向。「郭美美是王軍的女朋友，」實名認證為中紅博愛總經理的翁濤在網上丟下震撼，「瑪莎拉蒂是王軍送的。」

郭美美母女首度上電視接受專訪回應謠言，稱中紅博愛的王軍是「乾爹」，解釋瑪莎拉蒂時，她說到自己不懂怎麼會引起熱議，甚至留下眼淚。



兩人隔空交火，案情演變成羅生門。

與其說郭美美事件是網上的瑣碎八卦，不如說是刺激中國社會嫉富的敏感神經，以及迷失著「羨慕、嫉妒、恨」的情緒。

中國的提速增長，帶來的是普遍的社會不公，積聚的憤怒情緒沒有渠道釋放，網路暴力似乎是唯一出口。在他們眼裡，網上關於郭美美鑲滿施華洛世奇水鑽的高跟鞋、51 億餘款的存款本，都是一次挑釁，像在嘲弄他們無能的人生。

王軍是男友還是乾爹？網上又有人說是她親爹？搜尋她的名字，相關結果近億個。其實，他們更想知道，她的「乾爹」王軍，是否從紅十字會獲取不當利益？

王星當然也想知道，他在微博關注唯一可能知道內情的翁濤，加他好友，「他沒理我，就找他的關係列表最開始幾個人，可能是他生活中的朋友」，請他們幫我推薦，翁濤確認好友後，跟他解釋「我是記者，希望能客觀地報導」，他就取消好友了，過了幾天，網上一直在查中紅博愛底細，他主動聯絡王星說「願意接受採訪，願意開誠佈公地談。」

「找到翁濤，算是一個突破吧，」王星回憶這場荒謬的網路追逐，他始終想用新聞專業來對話，從一開始就想約訪郭美美，「約了兩個月吧，當時沒約到，突然就說可以接受採訪了。」

兩個月可以發生很多事，郭美美從原本網上被起底的受害者，轉頭就簽了經紀人、成立工作室，準備進軍演藝圈，並在微博說將主動聯繫媒體承諾專訪。適逢此時，《南方都市報》刊發郭美美母女的專訪文章，出動兩位記者，一人專訪、一人側寫，還有一組影視記者同時記錄，佔據多達四個版面。不久前，另一家時尚類雜誌《嘉人》才以封面人物報導，稱郭美美是沒背景的單純女孩。

追逐黑幕的人

郭美美像是花衣魔笛手，總讓一幫人隨之紛紛起舞。



這組專訪，居然挑起中國新聞業的內鬥戰火。隔天，《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發微博，稱拒絕郭美美專訪，認為記者要搞清楚是否被郭美美利用，不應用專訪形式為其宣傳，而且媒體報導興趣應僅限於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從來沒有爭論的如此熱烈，意見領袖紛紛表示意見，《新京報》專欄稱「媒體被一個『無腦』的小姑娘擺佈，...以為自己是獨家，其實都是合唱隊裡的分唱部分」；而《GQ》新聞總監蔡崇達反省「有賣點、有商業點的信息都很容易成為我們衝動的緣由，讓我們容易片面化，甚至編織邏輯安慰自己。」連中央電視台當家主播白岩松都正襟危坐上主播台批評郭美美「不想『紅會』，只想紅」，也反問記者同業「我們是不是要真的接受一種『審醜』的利益鏈條呢？」

這波口水戰，讓《嘉人》首先發表道歉聲明，「我們無意於傳播錯誤的社會價值觀，無意於冒犯公眾情感。」其他媒體也紛紛撤下郭美美相關報導，但《南都》不打算屈從，王星首先在微博回嗆央視「主題先行」，早已判定郭美美是罪人，不該被報導也不能說話。

喻塵沉寂多時，以《南方都市報》深度版主任身分發文，他總結網民追逐三個月的郭美美不過是，一個愛慕虛榮的 90 後，我們每一個人都用「暴力」的慾望等待著黑幕，在記者窮盡真相時，黑幕卻沒有來。王星也感嘆這組報導不被接受，僅是因為「未能滿足一些觀眾的黑幕期待。」

「沒有副部級幹部，郭美美與紅會無關，只是一個小女孩在臭屁」王星說，「我也很失望阿，覺得好像搞了半天白搞了。」搞到最後，51 億存款本是假的、郭美美被包養也是假的，這場網上曠日廢時的獵巫行動，王星覺得記者要付更大責任「網友提出了線索，但是記者沒有去核實」，結果就是「一幫人編了一個假的東西，對著自己虛構的東西開始意淫，郭美美根本沒有參與。」

王星的說法很有趣，讓我想起知名的部落客韓寒，網路原生的他對紅紅火火的網民情緒更有感觸，他在一篇博文上寫著「我們有個毛病，就是喜歡逼著人道歉，就為了圖自己一個意淫的舒服。」

中國社會是暴力的信奉者，普通人沒法面對生活中的挫敗，便將集體性的精神暴力發洩在網上。不管郭美美怎樣解釋她與王軍的關係，王軍的名字在網上都與李剛、李雙江、盧俊卿並列為「四大名爹」。(李剛因兒子車禍後說出我爸是李剛成名；李雙江因其子犯下強姦罪，看望受害者時仍要求給兒子一個機會)。

業餘但可靠的爆料人

盧俊卿則因女兒盧星宇成名。

夏天，草木特別茂盛，北京的樟樹枝繁葉茂，撐起一片濃綠，各校也陸續進入忙碌的開學季，但郊區的近 30 間農民工子弟學校卻無預警發出停課通知。

一個女孩發在自己微博「中非希望工程將捐建 15 億，10 年內建 1000 所希望小學。」網上莫不調侃只因當年毛澤東說「是亞非拉兄弟抬我們進聯合國」，中國寧肯放著自己國家的孩子沒學上，也不能丟下非洲的失學兒童。

隨後，女孩身分被搜出，盧星宇，24 歲，身分是中非希望工程秘書長，掌管 20 億元項目資金，網友懷疑她是「郭美美第二」。背後扯出中國三大官辦基金會之一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是由青基會與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世華會）共同發起。

目前的中國法令規定，只有官辦基金會才能向公眾募捐。很快，青基會發表聲明，稱捐款來自世華會成員的捐贈。輿論開始轉向盧俊卿，他是盧星宇的父親、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天九儒商集團董事會主席。

周筱贇是億萬網友中的一個，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的名字總與一連串揭黑爆料一起出現：中石化天價酒事件、鐵道部訂票網站億元合約、中華兒慈會 48 億巨款神祕消失。

他是中國近兩年被討論最多的網路爆料人。騰訊網、網易、天涯社區、央視都頒給他年度人物，中國排名第三的浙江大學聘請他擔任碩士班指導教授，同是

211 工程的中山大學也找他當駐校記者，財新總編輯胡舒立認真研究他的個案說「周筱贇是可以複製的」，後來，她罕見地改變自己的說法，「經過深思熟慮後，周筱贇是不可以複製的。」



周筱贇為自己樹立「業餘但絕對可靠的爆料人」品牌。他在新浪微博有十萬粉絲，但沒人看過他的長相，在公眾面前出現，總是一副墨鏡、一副口罩；用來揭黑的武器，有四個微博、五個博客、兩個論壇，但他說自己真正建立品牌是靠「證據確鑿的爆料模式」。

也是他將盧俊卿推入公眾視野。事情爆發後「有一些『內線』開始聯繫我，向我提供大量內部資料，」一堆宣傳圖冊，整頁都是盧俊卿父女與中外領導人的合照，寄給會員的邀請函中，明確稱交錢可以跟領導人集體合影，交更多錢就可以跟領導人單獨合影，「他看準企業渴望與政府高官牽線的訴求，以拍照作為噱頭收取高額會費，我給這種模式取名『合影經濟學』。」

「我不相信人證」

見到周筱贇，是在夏日時節，廣州的天空透藍的沒有一片雲，沒有一點風，他仍戴著口罩與墨鏡出現，半開玩笑地說「我的敵人太多了，他們都想我死。」

我們約在廣州五羊村的南方大院，他是南方報業的資深編輯，正值晚飯時間，我們隨性而至，在小區裡的一家湖南菜館坐下，是那醉酒的夜，拉近陌生的心，隨後，他拿下墨鏡與口罩。

周筱贇坦言他收集證據有幾條鐵律，他從不採信人證，只採信書證和物證，他說，「我作為網路爆料人，要用更嚴格的法律標準要求自己，因為人證太容易被誘導、被脅迫，如果鬧上法庭，雙方各執一詞，就成了羅生門。」他採用的書證也要嚴格要求，如法律文件、政府文件、銀行票據等有證據力的資料。

他討厭文人般的抒情和想像，更重視證據，跟他大學是理科生有關，畢業後他考進復旦大學歷史博士班，跟著中國著名史家葛劍雄學習考據，「對我的影響就是凡是要講證據和邏輯，這可能使我顯得較真。」



他講過「單一指向性因果關係」，指證據和結論間的邏輯要求，他認為中國記者太多文學出身，對弱勢有天然的同情心，「這些人不適合當記者」他直說，「沒有證據和邏輯，我不相信任何感情。」

時間久了，他越來越不喜歡線人見面。「拒絕見面，一方面避免利益關係和人情關係，另一個原因是避免圈套，」他說，「反正我不相信人證，物證你可以快遞或郵件給我。」這也讓他省下麻煩，沒必要再去核實線人動機，因為「重要的是他爆料的內容是否真實，以及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中國的憤青特點就是不講理性」，因為不滿需要宣洩，社會的失意者容易變成網路的好戰份子，他們沉浸在某些時刻，北京奧運前後抵制家樂福，法國總統就出來道歉；砸爛日貨，日本駐華大使就給說法。集體非理性經常綁架中國社會，「在我看來，講邏輯、重理性的批評就不是憤青。」他想扭轉社會的氛圍。

娛樂化揭黑

私底下的周筱贇是同事眼中的開心果，說話時，語調激昂，瞪圓眼睛，手在空中擺著，我很難把眼前他跟網上話鋒犀利的周筱贇連結在一起，他回應的很簡單「揭黑沒必要那麼苦大仇深嘛」，他說自己是「娛樂化揭黑」，這種策略尤見他調查盧俊卿的世華會。

他發現世華會做的是會議經濟，業務人員成天給中國企業老總打電話，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如世界傑出華商大會、財富領袖論壇、華商資本論壇等，以投資為幌子詐取高額會費，而且「所謂『世界傑出華商』，有的冤大頭交了幾十上百萬，但最低 250 塊錢就賣，」周筱贇對線人寄給他的一張照片印象特深刻，路邊的一家小米粉店，布滿灰塵的電扇上頭就掛著世界傑出華商的證書，「非常戲劇化的衝突阿，放網上就引來眾多網友圍觀。」

路邊的米粉店、湖南的臭豆腐攤，周筱贇把網友寄給他的照片都公布出來，還不忘調侃「盧主席，收了人家多少錢？」連番攻勢，逼的盧俊卿氣的「懸賞 100 萬揪出幕後黑手」，周筱贇看機不可失，立刻在微博留言「舉報周筱贇就能

獲得百萬賞金」掀起一波網路舉報潮，成功展示一次網民逆襲。



隨後，盧俊卿透過律師怒斥「周筱贇無疑是嘩眾取寵，完全想炒作自己。」不排除提告，但還沒立案卻先被起訴，「他侵害我的名譽。」周筱贇找北京律師提起告訴，「雖然是名譽權官司，但我希望他在法庭上還原我的疑問，釐清事實。」

周筱贇清楚，網民的注意力短暫，「這事長期沒個結果，我以惡搞形式，可以讓網民持續關注」，在眾聲喧嘩的網路集體狂歡中，把嚴肅的揭黑化為喜感，反而有利於事件更廣泛傳播。

保護「深喉嚨」

但揭黑模式要能延續，最重要的是，積累大量的線人資源，周筱贇告訴我，他每天會收到近百封信件，靠的是「一旦出手從不失手」，他在博客的簡介上就這麼寫著，他有些自滿地說「從來沒有任何線人在我手上曝光。」

為此，他想出一套保護證人的「三重境界」：第一，打死不說，即使身邊親密對象都不和他們討論案件；第二，隱藏樹葉，他從偵探小說上學來，要隱藏一片樹葉的最好方是把樹葉藏在樹林裡，當對方懷疑他的線人時，他會含糊其詞回應，讓可疑的對象變得無窮多；第三，無劍之劍，就像諜戰片中常使用的「死信箱」(dead drops)，兩個人在不見面的情況下交換情報，透過公共空間，或是 USB，不管線上線下彼此都互不相識。

憤怒可能充滿快感，中國社會卻沒有暢通的管道排遣，因而興起不少掛名「輿論監督」的網站。「他們都幹些『敲詐勒索』的事」，中山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張志安曾告訴我，網路爆料人常一手向舉報民眾收錢，另一手就向被舉報對象勒索，用兩手策略做起生意。

中國沒有制度化的獨立媒體人，才是胡舒立在深思後覺得周筱贇不可複製的原因，當權貴聯盟拿鈔票當子彈，脆弱的理想太容易被擊潰。

穩定的媒體工作，恰好讓周筱贇始終保持「獨立」的形象。「我有一份比較

滿意的收入，生活中沒有太多花錢嗜好，不煙酒，對名牌也沒多大興趣。」他唯一的嗜好是看書，在報社內擔任歷史專欄評論員，辦公桌上幾乎被書堆淹沒，腳邊是成堆的報紙，「我每天早上都要看過廣州市所有的報紙。」



在媒體工作，讓他清楚傳播的效果。每次有重大的爆料，「我會到關注的大 V 名單去逐個發私信，發出四五百條，」雖然不見得收到私信的人都會轉發，「但只要幾個大 V 用戶轉就會有影響力。」至於，網絡爆料能否進入公眾視野，也和媒體是否報導有關，因此，他還會「到媒體記者的 QQ 群（類似 msn 群組）去發消息，比如藍衣群、小刀群，可能就會有記者會跟進報導。」例如王星就追蹤報導盧俊卿〈天九儒商的生意經〉。

他認識較多記者、律師、學者，這些人都能幫他分擔網上爆料的風險。尤其是律師，他大聲強調，「我的重大爆料內容，寫好後基本上都會請律師審定，在法律上要無懈可擊，規避可能的法律風險，」他聽從律師建議，盡量不下結論，在用語上也格外小心，「比如我會說『涉嫌違法』，而不會直接說『違法』。」

除了在用語上要求，他的揭黑爆料還有三不原則：第一，不碰敏感議題，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在言說空間裡有個曖昧不清的禁區；第二，不介入廣東省題材，因地方權貴構成聯盟，而暴力又頻繁出場，不介入本省題材是出於人身安全考慮；第三，不高於廳級，中國行政五級劃分為國、部、廳、處、科，嚴格規範不得越級舉報。

舉報內容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僅採信書證、物證，又有三不原則，周筱贇的要求對渴望伸張公道的網民來說，形同一堵高牆，不少人氣的罵說「你膽子太小」，他也承認，但他更喜歡另一種修飾的說法是「謹慎」。「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我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揭黑要先確保自身安全，就要證據確鑿，能不能扳倒大象，要看司法部門，周筱贇用平和的語氣解釋。

戰風車的周筱贇

他的揭黑爆料贏得掌聲，卻也招致不少非議，因為，犬儒的社會總有人說風涼話：有人質疑他在炒作，也有人說做這些有什麼用呢？他覺得自己有時像是獨

自和風車作戰的唐吉軻德，力量太微小了，曾經喪氣地投書媒體「網路能反貪，也只能反少數倒楣蛋。」



當他快走不下去，就會想起高耀潔醫生。她被譽為「中國防愛滋第一人」，自從 90 年代揭露河南農民賣血以及當地「血漿經濟」以來，多次受河南政府阻撓，以致 2009 年，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得不出走海外。周筱贇與她相識十多年，緣份起於他大學時，某天讀完高醫生文章便衝動買了火車票拜訪，老人溫柔且善意提醒「附近很多國保，趕快走吧！」之後，他更常去了，一邊協助整理手稿並計畫著幫老人出書。

「我在部落格說，我要做一個正直、善良、簡單的人，」他坦言受高耀潔影響很大，「她讓我明白，世上真的有只為公共利益，沒有任何個人利益的人。」他常在想，社會是不是太少較真的人？「如果這樣的人多了，社會也許會不同。」

為了網路揭黑，他常常只睡三小時，因為不能影響到本職工作，「我爆一個料，要熬夜好幾天、研究證據才寫出文章，」即使生理上充滿疲憊，但他「心理充滿興奮感」。

「我越來越謹慎了」，從前揭黑總想扳倒貪汙官員，他現在更清楚自己的角色，「我的定位不是調查記者，而是一個爆料人，我的作用就是給調查記者提供線索。」他知道自己該對抗的不是一個貪汙的小官，而是一個吃人的體制。

訪問結束前，他聊起喜歡的一部電影《V 怪客》，最後那幕，所有人戴起面具一起站出來的畫面，「我很喜歡那種感覺」，我終於明白，他為何會帶上墨鏡與口罩，周筱贇是誰不重要，他一直期待著網上能出現更多「周筱贇」。

吸金的國母

郭美美像隻蝴蝶，輕輕拍動翅膀，將中國所有慈善事業全捲進一場風暴。

九月初《南方週末》的重磅報導，拿出十年前調查「希望工程」的細緻，再次將矛頭指向另一個中國官辦慈善組織－宋慶齡基金會。



陳中小路和她的同事從河南、山東、廣東、北京、上海發回多達四個版的報導，質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旗下到底有多少公司？歷時一個月調查，卻發現難以窮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貪腐慾望卻在暗流湧動，以管理公眾善款為主的基金會，居然成了吸金團夥，成立了各類龐雜的公司。

據報導稱，河南宋基會是中國最會籌款的慈善組織，連續三年全國第一，但令人費解的金流，部分來自宋基會放貸，企業捐款付息的模式。更重要的，十多年來，數十億的捐款由宋基系公司把持，而公司卻又與宋基會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此外，宋基會的地產生意與掛名成立的幼兒園，誰在參與？誰在獲利？風險如何控制？同樣不被捐款人所知。

前《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對這組報導感到驕傲，他在微博將這組報導列入「史上最震撼的報導之一」。這組報導也讓陳中小路被《南方週末》評為 2012 年的年度記者。

我們約在一家裝潢時尚的茶館，內裝走中國風設計，座位分高台區和座位區，高台區內是一位梳著包頭、身著改良式黑唐裝的茶師表演茶藝，高起的書架區隔出座位區，我注意到小路坐在高台一隅，靜靜地，用 iPad 看書。

她個子不高，戴街頭流行的大黑框眼鏡，穿白色紗裙，原本就娃娃臉的她，見到本人更像大學生。「我幫你點了飲料，乳霜奶茶，」她說話輕聲細語，又有出奇的貼心「聽說台灣人都很喜歡。」實在很難想像，眼前這位柔柔弱弱的女生，寫的盡是些揭開黑幕的嚴肅報導。

談起宋基會的報導，她直說是偶然加幸運。

偶然間，她在編輯會議上，聽到同事有朋友和宋基會做過生意，信息片面且瑣碎，卻也是個線頭。

這篇報導，和以前《南方週末》的調查稿不同的是，沒有深喉爆料，她只能自己拼湊龐大的拼圖。最先，打電話問過從事公益事業的朋友，得到的回應都很

模糊：「聽說他們投資做的很大」、「聽說他們有統戰功能，不是一般的基金會」；儘管無奈，卻又不能打草驚蛇，貿然打電話去問，弄不好對方就找宣傳部下禁令。



笨方法更有效

「我用最笨的方法，在網上搜索資料」，她發現中國宋基會與紅十字會、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並稱三大公益基金會，總部設在北京，地方有六個省也有省級宋基會，但他們與中國宋基會雖有業務往來，但沒有上下關係。

經過剛開始網上搜索的興奮勁後，她發現調查陷入僵局，大量瑣碎的訊息無法形成思路，毫無頭緒的焦躁情緒，困了她兩周，每天就是上網，並裝作諮詢業務地打給各地宋基會。

方法雖笨，但終究形成了思路。她注意到官方媒體都提到，宋基會的負責人考察某建設項目，裡頭還有土地買賣、有旅遊度假村，還有房屋建案。她意外發現，各地宋基會都有房地產生意，還有遍地開花的貴族幼稚園。

在搜索各地宋基會的房地產生意時，看到河南宋慶齡基金會活動中心縮水變豪宅的事，該活動中心原本計畫建築面積達十六萬平方米，卻縮水至五萬平方米，另五分之四面積蓋起 15 棟 7 到 8 樓的樓房，預計售價為每平方米兩萬元，比起同區市價每平方米七千元，堪稱頂級豪宅。

四五月左右，有網友在河南本地論壇大河網發帖爆料，活動中心部分改建為豪宅的事，受益者肯定是豪宅開發商，順著線索追查，發現投資者是一家叫宋基投資的公司，透過當地報導比對，這是河南宋基會下屬的投資平台，被托管所有捐款，再查下去，發現宋基投資在河南投資多項房地產項目，已經是一家具相當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商了。

這個發現讓她意外，決定到河南鄭州看一看。

財經記者出身，她反射地先去工商局調出宋基會及所有關係企業的工商檔案，「詳細資料你不能帶走，我就坐著抄了好幾天」，陳中小路平淡地說。



不過，從工商檔案得到兩條寶貴線索：一是公司的股權結構變化，雖然業務往來的公司多為以私人名義登記的私營企業，但持股者多為河南宋基會秘書長張悍東及公司幹部；另一為公司財務報表，可看到大筆資金流動。

按中國規定，公益組織的支出僅限於公益捐款，「如果公益組織要使用捐款，沒必要再把錢轉到其他公司阿」，她對河南宋基會套利模式起疑。

她在鄭州一天跑了十幾個地方，把所有工商檔案上登記的地址全都跑了一遍，卻大多是早已搬遷或查無此人，至於報社補助的三百元差旅費，她笑說「光打車都不夠錢了。」發現藏在細節裡的魔鬼，總讓人能夠忘卻疲憊。

用數字說話

她發現河南宋基會財務表現極其詭異。據基金會中心網資料顯示，河南宋基會於 2010 年的資產為 30 億元，是全中國公益組織之首，而且已是三連冠，不僅如此，一個省級的公益組織，獲得的捐贈收入同樣高的嚇人，2010 年捐贈收入超過 10 億元，是國家級紅十字會的兩倍，要知道，2008 汶川大地震時，中國頃全力呼籲民眾捐款，也不過是 10 億元。

與募款能力形成強大反差的是公益支出。

按中國規定，公益組織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於總收入的七成，意味著河南宋基會 2010 公益支出需達到 4.8 億，但實際支出僅有 1.4 億。

如果有鉅額籌資卻又沒支出，照理基金會帳戶應有很多現金，但陳中小路調查發現 2010 年現金僅存一億，前兩年甚至只有一兩千萬。

大量的錢到哪裡去了？資產負債表給出的答案是，大量資金都在「應收帳款」下面，也就是說，資金被借出了。

陳中小路翻閱數十家宋基系公司的審計報告，幾乎所有資產負債表上，其他

應收款與其他應付款金額都非常巨大，少則數千萬，多則數億，對照審計報告內的詳細記錄，可以看到資金直接或間接來自河南宋基會，至於資金流向卻是五花八門，多數又集中於房地產生意。



一條逐漸清晰的灰色鏈條自眼前展開：宋基放貸、捐款付息。

而陳中小路查到的一則借款糾紛，能佐證這種秘密的商業模式。河南一地方法院的判決書顯示，當地一家企業向宋基會借貸 800 萬元，為期三個月，作為對價的是，企業必須捐回 160 多萬元，這就是「利息」。後來，借款企業拖欠還款，雙方告上法院，才讓利益鏈條曝光。

她靜的下來，能在成堆的工商資料、法院判決書中，找出些針頭線腦，可以觀察的到，這篇報導很不一樣，沒有太多的訪問，長長的篇幅中充滿了數據、邏輯和嚴謹的分析，如她說調查最難的是「沒有深喉指引方向，全靠你去把這些細節組合起來。」

完成報導後，不少人採訪都問她有什麼調查的訣竅，陳中小路總講不出所以然來，「沒事搜一下，碰巧就有了」，她覺得處在《南方週末》這大招牌下，身邊有太多傳奇色彩的記者，自己不擅長採訪寫作，唯一的長處只剩「勤勞」。

這也是她珍愛的特質，新聞是個毛躁的行業，只有整理資料能靜靜地，這個工作繁瑣、複雜，而且機械化，但也是最誠實的環節，你付出多少、收獲就有多少，她總說天蠍座的人特別虐，採訪中的隻字片語，都要拿到網上再搜索，「經濟報導沒有太多浪漫可言，靠的就是數字說話。」她說。

「選題被斃就不做了」

看上去很蘿莉的女生，除去調查記者的身分，就是我們生活裡都有的那個少根筋的朋友，「宋基會是屬於統戰部的，我朋友跟我說了才知道這挺敏感的」，她一派輕鬆地說。

難道不危險嗎？除去越級監督不說，地方的權貴結盟盛行，宋基會能在河南

有龐大財富，不能排除與河南省政府有關係，更何況中宣部還有禁止跨省監督的規定。



「收到禁令就不做了唄！」她吸了一口乳霜奶茶，緩緩地說，「發禁令是他要知道你在做這調查，在我們報導出來之前，沒人知道阿。」宣傳部與媒體的關係微妙，只要記者調查的案件不在風頭上，他們就無所謂；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官場有撇清的原則，犯錯的部門沒有高層權力關係的話，宣傳部是不會救的。」

她對我解釋發禁令的邏輯，聽上去卻更像是對自己說，說服自己能夠心安，放開手腳去做。至於，「選題被斃就不去做了，你沒有主動權，報社也沒有，」她用力擠出一絲無奈的微笑接著說「一切都是聽天由命。」

「你先假定沒有宣傳禁令，你能做到什麼，」語調充滿冷靜，「遇到禁令是你運氣不好，就像買彩票一樣，總會運氣好吧。」採訪很多人、花長時間研究，最後發不出報導的經驗是新聞工作的常態，普通到她已忘記如何抱怨。

宋基會的系列調查能見報，就像她在獲頒年度記者時說的「不就是碰上手氣比較好的時候嘛，還有一群同事帶我打了幾副好牌。」

用微博找到線人

微博上的病毒傳播，把報導推更遠。

通過新浪微博的關鍵詞搜索，陳中小路檢閱大量談到此話題的微博，九成以上都是網友無謂的評論，但還是有些有效信息，她會逐一留言或私信聯繫，「最多只有 20% 會回復你」，甚至，有人直接回她「你得罪的起張悍東嗎？」

但還是會有人給她可供查找的方向，「微博上有些人是認證的，很多註冊地址是河南，有些你能知道他實際身分」，這些人不但提供更多內情，也是後續追蹤報導的重要線人。

陳中小路在上篇報導沒有回答河南宋基會超強的籌資能力，這次，她鎖定它

的捐款來源，即公益醫保慈善集資項目。



2005 年前後，河南宋基會在省內開展集資項目，承諾公眾向基金會捐款一萬元後，基金會在一定期限內，每年返還高於銀行同期利率的「補貼」，期滿後還可領回「本金」。

完全游離在中國正常金融監管之外的資金流轉體系，而數目廣泛的農民是體系中的一環，醫保集資項目吸納他們在外打工的血汗錢，公益醫保證是能拿到的唯一證明，上頭沒有證明存款金額，也沒有標示儲戶可以本金返還。

數年來，正是這些老百姓，為河南宋基會膨脹的資產做出貢獻。我在北京採訪幾天後，廉價賓館房裡只剩我和那台老舊電視機，轟鳴地放送新聞，今日頭條是河南那座 27 米高宋慶齡雕像遭拆除，河南宋基會先前耗資 1.2 億打造，如今只剩一堆塵土，那些農民攢了一輩子的積蓄，也跟著塵土落地。

陳中小路將忽略的事實呈現在公共空間。她很早即對公益醫保存疑，但河南宋基會矢口否認，又苦無實例，不過，幸運再度降臨她頭上「真要感謝微博的重要支持，找到一位為河南宋基會攬儲的基層鄉村信貸員兒子」，對方是個孝順的大學生，擔心家裡錢被騙了，在微博上跟小路聊了比較多，「他專程回趟老家，問了更詳細的情況，還把公益醫保證拍出來傳給我。」

陳中小路說，「如果沒有微博，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些鄉村信貸員，恐怕會比較困難。」

糾結的 80 後記者

大學生的媽媽雖然提供資料，但心裡總覺得「這是存到國家單位的存款，就算出問題政府也會解決。」但據陳中小路稱，宋基會報導出來後，對方再度打電話給她，說村子裡通知公益醫保業務暫停，既不能存也不能領，並且宋基會表態之前的「存款」應為「捐款」，是不可能返還的。

報導刊發後，陳中小路有時候也會搜一下事件發展。河南宋基會先是高調駁

斥報導內容，後來河南省高層批示徹查此事，責令成立多部門調查組，然後呢？和中國絕大多數的案件一般，讀者預期的處理並沒有發生。對此她不以為意，「我現在覺得，你就做好你的職業、完成你工作，這樣就可以了。」語調依舊平淡，不過讓人感覺背後是種深沈的無奈。



生在 80 年代、成長於 90 年代，她是《南方週末》的同齡人，也閱讀這份「在這裡讀懂中國」的報紙長大，「在我中學時看『南方周末』，會把它視為某種主持正義，」準備高考時，在一票茫然的學生中，她說自己是比較有目標的「就想讀新聞系。」那年，她進了復旦，誤打誤撞讀了經濟，也雙主修新聞。

直到今天，她還很喜歡說起報到時的情景。大巴士自交流道下，看到霓虹閃爍「南方周末」的招牌，「我奮力地擠出幾滴眼淚，畢竟這曾是指路明燈啊！」她誇張地說。

現在，她卻很怕別人稱她「名記者」，「哪篇報導能引起轟動，對記者沒有太大意義，而且也有些運氣成分。」她現在更在乎社會的知情權，展示事情的真相，至於，後續的改變，或掀起的任何影響力，都不在考慮範圍內。

她的轉變，是種性格成熟後的思考，也可能是禁令頻繁後的逃避。「常常會覺得空間越來越緊縮」，她強調這是種感性的認知，由各種細節組成，經常出現在編輯會議上，編輯宣布哪篇稿子又被斃了；或在與同事的閒談中，花許多時間研究的題目又給否了。

還有那本在《南方週末》編輯部的黑色活頁孔夾，「每條宣傳通知就是一張傳真，上面標示報導該怎樣處理，要撤回記者，或不得報導。」一張紙是一點黑，遮蓋事實的一角，南周會把這些禁令裝訂成冊，放在辦公室讓記者翻閱，「聽同事說，這本東西越來越厚了。」

「想報導的事情不能報導，公眾應知曉的事實被掩藏，官方給定的說法很可疑，但真偽你不能驗證、新聞現場你不能去，所以大家都有種無力感吧。」小路談到中國調查記者普遍的糾結情緒。

「在中國當記者還是挺精采的」，話鋒一轉，她的說法讓人很容易想起「這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句話，狄更斯對 19 世紀英國的評價。



那是個煙囪林立、薰黑天空的工業年代，資本家幾乎囊括了所有資源，而工作者在強國的亢奮與撞到現實的無奈中掙扎。

記者該如何記錄時空錯位的中國。

樂觀是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們應該考慮能做什麼，憤怒於你不能做的事情，對現實沒有太大意義。」陳中小路告訴我他們部門主任最常說的一段話，改變社會是一種結果，讓貪腐的官員下台只是一種方式，「我做了完整的調查，啟蒙了公眾，從大的範疇來看，這也是一種改變社會。」

心態容易調整，但顛覆的體制承襲暴力的傳統，往往難以招架。陳中小路有次出差，在地方法院門口看到一群人在上訪，記者的好奇心驅使她上前，習慣性地拿了相機拍照，聽到訪民爭執的是土地問題，不關她經濟報導的方向，準備轉身要走時，被幾個高大的警察圍住，接著拖帶拉地拽進拘留室，就大聲叱罵、施以拳腳，「我的手跟腳都受傷，還有點嚴重，他們把我手機沒收了，當時挺害怕的，就一直哭，」陳中小路回憶，「我真的就哭到他們把手機還我。」

體制慣性中的暴力，讓記者「來不及勇敢」，陳中小路與她同齡的新生代記者，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升級。惡魔黨還在，零星的壞角色又頻頻出場，可能化身為網路上的謾罵，或是權力的傲慢。

王星調查的紅十字會、
周筱贇檢舉的世華會、
陳中小路揭露的宋基會，都像仍進石頭的湖面，漣漪後仍一片平靜。

他們糾結又孤獨，這一代記者該如何理解自身使命，讓我想起王星很有畫面感的譬喻：

「我們都是被動地被時代大潮裹著往前，胸中懷拽著堅持的信念，在大浪襲

來時，自大潮中跳的更高，盡量站的更穩，做出一點自己的東西。如此而已。」

預判未來的路，他說，「我想不好。」





去活在真實中

一 記者如何避免被民粹綁架？

暴力發生的瞬間，往往也是尊嚴被剝奪最厲害的剎那。

大陸導演賈樟柯新片〈天注定〉說的是關於暴力的故事。片中趙濤扮演的小玉是桑拿店櫃檯，下工時間在包間內洗衣服時，被突然闖入的陌生男子要求提供性服務，她壓住驚恐後拒絕，與對方發生爭執。

下一幕，卻徹底粉碎人的尊嚴。

一名矮個男子聞聲後進入房間，將人按在沙發上，用鈔票抽打小玉的頭，啐了一口罵道「老子有錢不行」、「你不是小姐，誰是小姐」。當人的尊嚴被不斷侵犯，中國式的隱忍不再管用，暴力，才能討回公正和尊嚴。剎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小玉成了殺人犯。

蘇三的冤屈流轉百年，至今仍以不同形式上演著。故事結束在小玉對著「蘇三起解」的傳統戲曲落淚，戲臺上一句句「你可知罪」錘錘入心。知罪嗎？認罪嗎？是我的罪嗎？

賈樟柯巧妙改編四個真實事件，鏡頭對準中國經濟轉型下的小人物命運，而小玉的原型正是大陸轟動一時的鄧玉嬌案。

危險的民意

2009年初夏，鄧玉嬌代表著纖弱與烈女兩種衝突的形象。網路盛傳鄧玉嬌是因為反抗官員性侵而進行正當防衛，一時間，她被奉為烈女，有網友為其改編「烈女傳」。《東方早報》評論鄧玉嬌契合中國傳統的文學想像，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經典題材。因此，受到網友熱烈追捧，在中國大地掀起陣陣喧囂。

鄧玉嬌案太像一部電影，波譎雲詭、跌宕起伏，特別抓人眼球，而南都的龍志原本也是刷屏追蹤的眾網友之一，對案件沒深入思考，他在餐桌上臨危受命卻不以為意，出發前還嘍嘍著這趟差事太輕鬆，不過是把民女抗暴的經典搬到報紙上，採訪主任給他的安排是：三天即可拿下，沒想到，這一去竟是一個月。

「官員」、「洗浴中心」、「特殊服務」等勁爆元素聚在一起，在輿論空間發酵，網上一面倒是对鄧女的同情與讚揚，儘管信息仍嚴重不足，主流民意卻早已對鄧玉嬌做出正當防衛的判決。

龍志在洶湧民意的背景下開始調查。他思索鄧玉嬌以及被刺死的小鎮招商辦主任鄧貴大，是個什麼樣的人？作為記者，讓他對輿論保持天然的質疑，越深入探訪，一個有別於網路上惡官與善女的二元形象，漸漸清晰。

關於鄧玉嬌，爺爺在退休前是法院庭長，還有個親戚擔任律師，至於鄧貴大出身背景是農民，是家族中唯一有出息的人。這層背景雖不能抹去官吏作惡的行徑，卻也淡化惡官與善女的強烈對比。

接著，他採訪到鄧玉嬌的同事兼閨密，親眼目睹案發經過，她看見一名男子先是尾隨鄧玉嬌走到休息室，鄧貴大用鈔票搨打她的頭，更重要的是，她證明當時休息室內至少還有兩名員工一名領班。多人圍觀的現場與尚不構成強姦罪的事實，都意味著，主流民意認定的正當防衛，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儘管龍志從未否認官吏的惡劣行徑，甚至只是溫柔地提醒，我們不該忽略一個事實：她殺了人，殺人總是觸犯了法律，縱使是正當防衛，也該有聲音質疑是否為防衛過當？龍志用調查到的事實，打破網路輿論樹立的形象，不管是烈女鄧玉嬌，還是鼠輩鄧貴大，都有年輕的張狂，或為人夫父的溫柔，龍志在採訪手記說「我只是在稿子中把當事人還原為人。」

鄧玉嬌引起公眾廣泛的同情，公眾甚至沒有興趣去關心，被刺死的鄧貴大是不是其罪當誅。這也是政府與公眾之間關係緊張的象徵，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夾雜社會矛盾，人們又投射進自己的生活經驗，至此，每個人心中都有個鄧玉嬌。

這組經過大量調查寫作的報導刊出後，網上罵聲一片，龍志遭人肉，網民紛紛寫信、打電話要求《南方都市報》開除記者龍志。彷彿一切都早已料想到，龍志在飛往湖北的飛機上，穿越雲層的巍顛顛的顛簸，他在隨身的採訪本隨筆寫下：假如民意是錯的，媒體該如何適從？



四年來，這句提問頻繁指向記者。暴力化的傾向在中國社會日漸顯著，大約四年前，上海青年楊佳闖進政府辦公大樓，刺死六名警察；在貴州甕安，十六歲少女非正常死亡，因家屬不滿警方的敷衍辦案態度，竟演變群眾上街，且火燒公安局。在城市街頭，一個小小的爭端都可能引起騷亂，整個社會就像火藥桶，任何火星，都可能點燃這憤怒之火。

暴力化的社會切合漢娜鄂蘭的判斷，她在〈論暴力〉的文章裡指出：「公眾事務的官僚主義越嚴重，人們就越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們不知道該與誰爭辯，不知該向誰伸冤，也不知權力的壓力該壓在誰身上。」

這些暴力行為都與中國的「維穩體制」有關，當胡錦濤 2004 年提出「和諧社會」時，必定料想到經濟增長帶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內部將有日益嚴重的衝突，原本多元的社會該迎來開放的政治體制，但他卻用和諧的口號鎮壓異議的聲音，所有的不同都被視為異端與挑戰，他們要加強對社會力量的控制。

在綿密的控制網絡中，孤單的個體常用最激烈的手段表達憤怒。微博是另一種發洩憤怒與挫敗的管道，巧妙結合現實生活中的民粹，這種想法過度強調群眾的價值，並把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力量。

危險的民粹延伸至網路中，得力於網路科技造就去中心化的烏托邦想像，消除網民的地位差異性，網路民粹者關注底層的訴求，雖然訴求具合理性，但常用暴力聳動的語言撩撥公眾情緒，反而激化社會矛盾與分裂。

圍觀、惡搞、人肉，乃至左右司法判決、集體遊行抗議，都是網路世界的群眾運動，因為網上的匿名性，讓線上圍剿就像是戴上面具趕赴一場狂歡派對。

蘇聯思想家巴赫汀（Bakhtin）曾提出狂歡化的理論，狂歡具幻想性，固有

的階級被暫時打亂，人們自由沉浸在狂歡想像中。網路有如狂歡廣場，正常的秩序被刻意貶低及扭曲，群體存在無意識的狀態中，情緒化的話語迅速蔓延，人們顯得暴躁易怒，容易形成一股瘋狂可怕的集體非理性力量。



微博乘載民意，既可載舟，也可覆舟。

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善喻剛在賓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發表研究，他發現當網民通過微博渴求正義，一定程度上影響審判結果。因為在本身缺乏司法獨立性的體制中，案件在傳播過程中被戲劇化和情感化，司法部門不得不面對來自民間與政府的雙重壓力，回應網民期待與公正判決之間產生張力。作者分析鄧玉嬌案最終審判結果因精神問題「有罪但免責」，就是對輿論的回應與安撫。

「活在真實中」

龍志在謾罵中，重新審視記者這份職業。「從前覺得作記者，就是客觀地告訴大家這是怎麼回事，從沒想過，真相不被公眾接受，該怎麼辦？」特殊的中國情境，記者常被要求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無庸置疑地要與雞蛋同陣線。這讓年輕的龍志感到困惑，「新聞什麼時候淪為對抗公權的工具？」他認為媒體永遠只有一個位置，即站在公正客觀的一邊。

一樁單純的刑事案，何以攪動全中國的神經，龍志覺得是因為媒體與公眾都不說真話。這層思考對他很重要，到網易 UGC 中心擔任總監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真話頻道加上副標：「活在真實中」。

「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he truth) 是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最著名的信念，他分析「後極權」時期的捷克，人們已經不相信意識型態的謊言，只是因為恐懼，所以假裝相信。就像他筆下的蔬果店老闆，張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雖然不相信意識型態，但也知道不張貼會惹來麻煩，而上門的顧客忽略這張海報，只關注洋蔥的價格，因為標語海報張貼的到處都是，構成巨大的生活全景。

極權體制下，國王害怕說出他沒穿衣服的小孩，所以強力消除雜音，但在後極權社會裡，我們都知道國王沒穿衣，他也清楚大家知道他沒穿衣服，但他就出

來，在那滿街晃，我們也看著他滿街晃，還照樣裝著他穿衣服。因為，**謊言與偽善**已點點滴滴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極權的動力已經衰竭，權力者不再有人是克里斯馬型領袖，不得不多講一些法制。消費主義盛行，腐敗更加嚴重，社會冷漠非人性，整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穩定，賴以運轉的條件是仍然是恐懼與謊言。

哈維爾呼籲人們：去活在真實中。

「提倡一種講真話的氛圍，」龍志要在中國踐行哈維爾的精神，「我們（網易 UGC）不需要口水，也不要無病呻吟，我們需要事實，要人們到這裡說真話，而不是假大空的官話、套話。」

140 字的力量，即時網絡技術，在一些中國觀察家眼中，微博是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但龍志不這麼認為，「網路上可看到很多暴力，用辱罵性的言語洩憤，整體氛圍很浮躁，沒有人願意靜下來溝通，尤其微博只有 140 字，看了標題就看不下去，情緒就上來了。」

龍志的觀察符合中國網民年輕化、民粹化的特性。根據中國互聯網中心 2014 年最新統計，中國網民規模截至 2013 年底突破 6 億人，專科與高中學歷以下佔七成，30 歲以下用戶超過六成，而月均收入 3000 元人民幣以下的網民約佔四成，是微博主力。年輕化使得網路言論更容易情緒化，低學歷的網民則更可能出現盲從的行為，而低收入的網民結構更好地與民粹思潮結合，「一人膽小如鼠，三人膽大如虎」的草根語言，激化中國網民成為暴力的信奉者。

調查記者是直面微博的受害者。商業資訊公司 CIC 與奧美公關聯合發佈輿情報告，2012 年十大媒體熱議事件中，有高達五成是由微博首發，傳統媒體議程設置能力已逐漸讓位於微博。

使用門檻低，微博是草根發聲的重要平台，也是個人洩憤的重要工具，仇富仇官的集體情緒，經常散布未經證實的反腐消息，經過不明真相的圍觀者轉發，影響範圍迅速擴大。



網民的主動轉發常挾帶情緒。社會的普遍不公，讓他們相信，暴力是唯一能被聽見的語言，在事件討論中，情感高於理性、立場高於事實，記者無法不受到影響，民意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當性」，以致許多專業記者成為網路輿論追隨者。

網路輿論對記者的心理產生微妙影響。盲從和非理性驅動的網路民意，不問事實，當記者的報導符合網民的的心理框架，會獲得輿論的讚揚，但當記者試圖更客觀的詮釋時，立刻受到輿論的抨擊。這種「愛憎分明」的表現，迫使許多記者報導此類事件時，只問立場、不問事實。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白紅義的研究也指出，微博正大幅消解新聞記者的權威。從傳統新聞邏輯來看，專業記者決定公眾讀什麼，這恰是記者權威感來源，沒人願意輕易放棄新聞的守門人作用。

中國的記者權威更複雜。改革開放前，記者是權力結構的附庸，隨著市場化改革後，新聞業以調查報導重新塑造記者權威感。只不過，微博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中國新聞業在權威化與去權威化的雙重力量中拉扯，在不同案例中，我們既能看到對新聞權威的鞏固，也能看到對新聞權威的消解，前者如 2003 年的孫志剛案，後者如 2009 年的鄧玉嬌案。

抓住七吋

唐慧案是另一個劍走偏鋒的故事。

《南方週末》一向是代表中國新聞權威的指標媒體。維護記者專業自主性的渴望深深嵌入在他們心裡，因為新聞判斷代表地位與權威，當互聯網介入後，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原本隱匿於幕後新聞產製被迫搬到台前，網民的積極參與消解部分新聞權威，微博興起後，它以更直接、即刻的方式影響記者的判斷。

南方報業注意到了。在龍志發表鄧玉嬌報導後的遭遇，讓《南方傳媒研究》特別召集中國記者與傳播學者，組織專題報告警惕網路輿論。《南方週末》是中國著名的老牌調查報紙，他們自認應擔負起正本清源的道德責任。



這種想法，卻讓記者柴會群栽了個大跟頭。

夏日的晌午，太陽懸在當頂，燒灼著一切，北京街頭的灰塵凝結不動，連街旁的行道樹，也無力地垂下枝條。但北京大學教學樓裡卻人聲鼎沸，《南方週末》新聞部總監曹筠武、北京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徐泓，與各家知名媒體的記者，悉數到場，旁聽的群眾擠滿能容納百人的教室。他們聚在一起為了討論《南方週末》八月初發表的〈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

封面上的一個問號，引發關注唐慧案的人群中激烈的爭辯。

按唐慧代理律師胡益華的劃分，唐慧案應該由三個案子組成：一是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二是唐慧被勞動教養覆議案，三是唐慧被勞教請求國家賠償案。

事件的原點，是唐慧女兒被迫賣淫案。2006年，樂樂在溜冰場認識少年周軍輝，留下紙條後離家出走，兩個月後，唐慧得知女兒被帶到柳情緣休閒中心賣淫後，求助刑偵隊警員楊軍祥，他帶回女兒樂樂但卻未將柳情緣老闆娘秦星刑拘，引起唐慧不滿。唐慧指控訴楊軍祥「中斷偵查 19 天」、「故意錯失破案時機」，對此，楊軍祥的解釋是，在柳情緣賣淫只有樂樂自己的陳述，沒有其他證據，因此未將秦星等人採取強制措施，而是跟蹤蹲守，直到抓到柳情緣「容留賣淫」的現行，才將秦星等人刑拘。

在唐慧眼裡，這擺明了是包庇罪犯。2007年，唐慧開始進京上訪，時值十七大召開之際，聞訊後，永州市公安局隨即將楊軍祥以「工作失職」為由，處以「嚴重警告」處分。當地律師認為，當信訪壓力大到可能影響地方或部門領導的官位時，「就會遷就迎合，甚至不惜犧牲下屬和法律。」

荒誕的現實，比荒誕劇作更為荒誕。

唐慧的際遇，與中國著名作家劉震雲的荒誕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主角李雪蓮有著驚人的相似。故事始自村婦李雪蓮不小心懷了二胎，和老公假離婚以躲避計畫生育政策，沒想到離婚之後，她老公索性另找了個女人結婚。她去理論，她

老公罵她不是李雪蓮，而是潘金蓮。李雪蓮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蓮，要證明之前的離婚是假的，一路告狀，從縣裡、市裡告到了北京。誤打誤撞，她告上人民大會堂意外碰見國家領導人，該省在兩會上被點名批評，省委書記一怒之下，把法院院長、縣長、市長全都免職。



李雪蓮最常說的一句話，「我就不明白，明明是假的，咋就變不成假的呢？」唐慧也不明白，女兒明明就是被迫賣淫，怎麼警方只肯說是容留賣淫。李雪蓮跟唐慧都是犖脾氣，要是沒讓這幫做惡的混球付出代價，心理不解恨。只不過，李雪蓮是虛構的，唐慧是真實的。

2008年6月，永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宣判，判處秦星、周軍輝死刑，其餘四人徒刑，尚有一人在逃。唐慧認為判決太輕，要求將七名被告判死並賠償184萬元，並追究警方責任。

對社會充滿恨意，因為她未滿十一歲的女兒被救後，經醫生確診患有嚴重的性病，並可能喪失生育能力，唐慧決意「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為孩子報仇」，為此，她年年上訪。唐慧曾自述「通過以死相逼和不斷上訪，迫使案件走向正軌。」

此案費時6年、歷經6個合議庭、18個法官審理後，2012年6月湖南省高院終審判決為兩個死刑、四個無期徒刑，但許多中國刑法學者認為是罕見重判。

在《南方週末》拋出〈唐慧贏了，法治贏了嗎？〉的驚天問號之前，這位「上訪媽媽」已經成為中國民眾追求法治公平的指標性悲情人物，經過微博轉發與媒體的號召，數以億計的支持者站在他的身後。

然而，柴會群對比永州中院與湖南高院的先後四份判決書、「樂樂被迫賣淫案」的歷次詢答筆錄，以及當事官員、警察、法院、律師和唐慧本人的回憶，指出唐慧案審判的每一關鍵節點，都有信訪與穩控壓力矛盾關係的合力作用，把地方政府的信訪考核達標與唐慧的訴求綁在一起，形成微妙的共生關係，迫使「該案情節定性愈加嚴重」。

柴會群指控的情節主要有二。



一是強迫賣淫罪是如何寫進判決書。因為缺乏「強迫」證據，永州警方最早以「容留賣淫」起訴秦星等人。柴會群對比判決書後發現，「強迫賣淫」的證據僅來自樂樂的自述，至於柳情緣三名性工作者作證稱：秦星沒有強迫，被告辯護律師稱樂樂並沒有被控制，可以去附近上網，這些證詞皆未被採納。

更早之前，在承辦員警楊軍祥被處分之前，他向柴會群透露「案卷裡都沒有這份自述材料」。立案罪名發生變化，始於唐慧跪見永州公安局長，新上任的局長批示「嚴懲徹查」，在這之後，警方重新給樂樂所做的詢答筆錄中，才與樂樂的自述一致，甚至連錯字都一樣。

唐慧明白下跪管用。她一路跪進警局、法院、檢察院，2007年6月，在聽說案件可能由區檢察院起訴後，她找到檢查長，要求由市檢察院起訴，被拒絕後，她在檢察院大廳跪了18個小時，其結果是檢察院更換了公訴人，製作了新的起訴書，特別將「強迫賣淫案」寫入其中。該罪名最重可判死刑。

另一是量刑是否過重。2008年6月一審宣判後，唐慧與被告皆對判決不服，均提起上訴，結果湖南省高院沒有開庭，因為中級法院未給判死的周軍輝指派義務辯護律師，直接將此案發回重審。2009年，重審判決維持原判，唐慧氣不過，坐在法院庭長的辦公室，在此吃住十八天。結果，湖南高院再次發回重審。

而第四次開庭前，唐慧突然要求取消這次庭審，否則將「死給你們看」，理由是，她發現「合議庭對犯罪份子異常好，不顧違反法律，允許犯罪份子家屬到庭審現場旁聽」。這次開庭最終取消，永州中院還同意唐慧意見，更換法官，但唐慧仍不以此滿足，在判決書出來之前，滯留在法院大廳十五天。永州中院下達的第二次重審判決：兩個死刑與四個無期徒刑，據柴會群接觸到的內部人士稱，判決書是經過唐慧修改、同意的。此前，中國還未有因強迫賣淫判死案例，就連無期徒刑也很少見。

比小說更荒誕的結尾。報導的最後，是七名被告的家屬也開始了上訪。

《南方週末》說明唐慧案給人們帶來的啟示：相信上訪。據媒體報導，唐慧

六年間進京上訪 23 次，省城上訪百餘次。因上訪屬地管理原則，唐慧 2007 年第一次進京上訪，因「維穩不力」，落戶小鎮的黨委書記被記申誡、黨政辦主任被免職。小鎮裡的幹部對她又敬又怕，每逢節日，少不了鮮花簡訊問候；唐慧的花店開幕時，不少花籃是幹部送的，鎮政府編給唐慧「困難補助」共計 21 萬元人民幣，就連唐慧到湖南省高院下跪後住院的醫藥費，都由鎮裡負責。

奇特的情景就這麼發生了。

唐慧曾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上訪既可以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又可以對正在進行的司法審判起到震懾作用，保證審判公正進行。」柴會群則認為，「唐慧是發現了信訪制度的漏洞，抓住有關部門的七寸。」

這個七寸是什麼？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穩控體制。

只是中國的訪民何止百萬，唐慧與他們的不同是，她及早地進入公眾視野。

媒體造就了唐慧

樂樂案重審期間。2010 年 6 月，永州一郵局保安隊長朱軍，槍殺三名法官後自殺，各地記者紛紛趕赴永州採訪。

唐慧找到記者們後稱，朱軍是樂樂的乾爹，他是為了樂樂的事情槍殺法官。

她接觸到《鳳凰週刊》記者部主任鄧飛，他是中國最著名的調查記者之一，也是圈內人脈資源最豐富的記者，2005 年創立 QQ 群「小刀」，至今超過 200 名調查記者加入，在群內分享資源、協調採訪，合力製作過許多重大報導。近年來，屢次在微博發起公益行動，竟獲奇功，讓他成為中國網民最信任的記者。

鄧飛很快發現唐慧在朱軍槍擊案中說謊，卻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微博寫道，「問她為什麼要騙我們，她淚眼汪汪說不這樣，她能找到記者喊冤嗎？令我酸楚無語。」

槍擊案後，唐慧四處向記者矇騙樂樂案與槍擊案的關係，還在街道大量張貼《告永州同胞書》，將此事稱為「一位孤膽英雄的勦匪行動」，不久後，唐慧因「擾亂社會秩序」被警方拘留。



得知唐慧被拘留後，鄧飛發了數條微博呼籲，一個月後，唐慧獲釋。

另一次鄧飛起到關鍵作用，是唐慧被勞教處分時。唐慧滯留法院大廳十五天，永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認定行為「嚴重干擾單位及社會秩序」，決議對其勞教一年六個月。

唐慧被勞教的消息傳出，鄧飛當晚轉評於微博，並引薦熟識的北京知名律師介入，在微博呼籲要「用法律方式帶唐慧回家」：「我們要讓高層看見，但我們更要依靠事實和法律，而不是碰運氣的特權或裹挾輿論來解決問題。」

微博上解救唐慧的呼籲，引來大批中國知名人士關注，包含創業家李開復與知名作家李承鵬，該條微博轉發評論達十四萬餘次。

事情轉折還始於官方微博的介入。

人民日報率先發帖：「湖南永州遭強暴幼女的母親因上訪被勞教的新聞傳出，...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應只有 GDP 和奧運金牌，更應包含百姓的權利與尊嚴、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新華社接續發表了一條罕見的措詞激烈的微博：「現代社會可以用無數種方式回報一位悲憤的母親，除了勞教。那是灑向文明傷口的一把粗鹽！」

微博的傳播後，傳統媒體的關注如期而至。

柴會群觀察，媒體關注始於鄧飛將唐慧介紹給搜狐微博總監夏茉茉，「然後她就聯絡了十來個媒體記者，去採訪報導這個事情。」包括與柴會群系出同門的《南方都市報》與《南方人物週刊》。

唐慧的角色發生改變，她從一個單純救女以及還女兒清白的母親，轉變為試

圖以一己之力與國家機器鬥爭的唐吉軻德，在媒體長篇累牘的報導中，唐慧是堅韌勇敢的「偉大母親」。



中央電視台《法治在線》的報導值得一說。該節目描述唐慧救女的一個生動細節：為了尋找女兒，唐慧曾到樂樂賣淫魔窟柳情緣休閒中心對面的一棟樓頂「全天蹲候」，還在牆上鑿了一個洞。

柴會群和我說，「我在現場發現，對面只有一棟居民樓，唐慧根本不可能上去，住戶更不可能同意她在樓頂鑿洞。」浮躁的媒體，為了豐滿整個故事，主動替唐慧編織了諸多細節。

毫不誇張地說，唐慧是被公眾和媒體搬上神壇的。七年間，由微博、論壇組成的網路輿論空間裡，公眾與媒體組成規模龐大的陪審團，客觀上，輿論成為唐慧後來撬動司法的唯一支點。

不平衡的報導

不難想像，柴會群的顛覆性報導會引起多大爭議。

網上如浪的批評，主要有二派人馬。

一個是《南方週末》等自由派媒體的老對手：左派。他們質問南方系何以翻案，網友翻出過往的報導評論為據，指稱南方週末一手將唐慧推上神壇，而後反手又將其出賣，是一套編寫好的劇本。

另一個才是反響的最強音，即曾經的同路人。

更多媒體同行質疑報導的思維方式，按財新傳媒主編王爍的說法就是，「有的調查報導顛覆常識，更多的調查報導驗證常識。為唐慧案的判斷基於兩個基本事實，一個是年幼女兒是否被迫賣淫，一個是唐慧是否因上訪被勞教，其他都是細節。如果忽略兩個基本事實，而過度注重細節，那是修正史學。」

同出南方大院的陳峰，也不留情面地怒斥：「這篇報導太荒唐了。」整篇報導有兩個主題，一是賣淫案是否判重了，二是唐慧是什麼樣的人，「結論是案子判重了，是因為唐慧是個胡攪蠻纏的女人，」陳峰在辦公室裡氣鼓鼓地對我說，「就算稍微了解中國的記者，都不可能寫出這麼荒謬的報導。」



陳峰批評最厲害的，是信息源的缺失。報導內的引述多來自唐慧的對立面，包括司法機關當地幹部與被害人家屬，「這篇報導既然對唐慧提出強烈質疑，為什麼不採訪唐慧本人或她的律師呢？」

平衡報導，是新聞的基本要求。記者不是神，不可能完全還原真相，所以才有多方採訪、平衡報導的一系列要求。「若按柴會群的寫法，可以把任何一個人寫成魔鬼。」陳峰不滿地說。

被同行厲聲批評，柴會群沒有回應，只是把微博顯圖換成紅嘴烏鴉的照片。

回到北京大學的教室裡，曹筠武先是為柴會群的報導作出回應，「很多讀者分不清楚《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週刊》的關係，把所有報導攪在一起，說是前後矛盾。」他也質疑該報導會有這麼激烈批評，是「輿論綁架」的結果。

至於，徐泓教授的更多提問，現場沒有充分解答。這位當過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新聞前輩，對報導「挑出不少毛病」，包含有點結論先行、因果關係過於簡單，而證據又不足以支撐。另外，寫作過程把唐慧個人摻進去，「交錯糾纏在一起，沒有解釋清楚。」

我和柴會群的碰面，是在北京那場研討會的隔週。地點約在上海共康路的上島咖啡，他比約定的時間早到，選了角落靠窗的位置，無意識地把玩手中的 iPhone，我忙迭上前打招呼，但對話一直不在頻率上，整個訪談過程，我們視線交錯，每當我定定怔著，他不是將眼光瞟向角落，就是在攪動飲料的吸管。甚至，我無意發現，他放在桌角的手機，在未告知的情況下一直開著錄音。

氣氛顯得有些惴惴不安。



大概是柴會群第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38 歲的年紀，在中國調查記者 35 歲就退休的群體裡，確實大了些，但在唐慧案的報導前，他沒拿過年度記者的榮譽，也從未像現在受到矚目過，一直只是個《南方週末》上海地方版的社會記者。

開口不拐彎，直面問題。對於有人批評他報導缺乏平衡，他簡單回應「其實就媒體報導唐慧案而言，確實是不平衡，只不過是對被告不公平。」他認為，唐慧和律師的說法已多見諸報章雜誌，公眾早已熟悉，就不必再多加篇幅。

至於這陣子的網路輿論，他說：

「我寧可要做社會的烏鴉，也不要做喜鵲」他談起微博上紅嘴烏鴉照片的由來，是取自范仲淹的名作《靈烏賦》當中兩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用來解釋他的新聞觀，他說「面對荒誕的現實，你要有勇氣說出真相。」

曾任《南方週末》駐上海的資深記者楊海鵬，得意地向我介紹柴會群是他的學生，一個「專精在醫藥領域」的優秀記者。唐慧案，完全不是他的報導路線。

應該沒人質疑他的動機，也有越來越多記者反思民粹的幽靈。不過，如果知道網路輿論充斥不理性，那麼，傳統媒體在接近採訪唐慧時，是不是更應克制情緒？不管網民認識的唐慧，是「聖母」還是「刁民」，都是媒體貼上的標籤。

柴會群談到一個細節，有諸多記者在之前的採訪中發現唐慧的種種漏洞，但與接近真相相比，符合社會情緒似乎更能贏得認同。他質疑當時採訪的記者，「都看到了案卷和判決書，如果能稍微研究，很容易就能發現案子的疑點。」

空間日愈逼仄，柴會群感慨「記者生存在權力與民粹的夾縫當中。」不過，唐慧和輿論就左右了判決結果，恰是說明司法是權力者的橡皮圖章，司法者與行政者都不能依法行政。

這篇報導是顛覆了，不過只將唐慧從「聖母」打成「刁民」，終究是另一種記者在刻意挑選下造成報導失衡的媒體暴力。責備受害者 (victim blaming) 是一

種讓自己好過的方式，一如中國每次文革的檢討，僅將錯誤指向紅衛兵，卻不質問毛澤東，忽略了指認結構中更高權力者的介入。



其實，柴會群的調查中也發現，2012年唐慧被勞教處分後，「當時媒體輿論一面倒向唐慧，湖南省委書記周強直接干預了這個案子」，他先是要求省勞教委推翻勞教決定，接著責令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調查組。「最高的權力這麼定了，下面的人都在看風，法官也就這麼判了」，這就是具中國特色的人治社會。

可能是忌憚權力者，畢竟「打蒼蠅不打老虎」是中國另一項媒體監督的特色，最終柴會群自我審查，刪掉了周強介入的痕跡。不過，《南都週刊》關於唐慧的報導中卻有這段敘述，記者採訪到湖南調查組的人，說「唐慧事件的迅速解決，與湖南省委主要領導力推『法治湖南』有密切關係。」

犬儒心態的盛行，讓記者成為一個勤奮的自我審查者，他們貼近真實，感到問題重重，對目前的政治體制充滿譏笑，卻又似乎在譏笑中就獲得滿足。面對可疑的民粹暴力，記者又成了市場經濟的信徒，選擇更多地去順應社會情緒。

無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

消費生活的麻痺、網路民粹的暴力，以及政治權力的偽善，交錯糾纏成哈維爾筆下的後極權社會。

從來沒有一個時刻，記者曾如此重要。

新聞記者是將真實生活的困境轉化為公共討論的人，是哈維爾所說「活在真實中」的促動者，曾經在新媒體時代擔心喪失影響力而顧影自憐的記者，因中國夢的提起，則讓他們的角色變得再次重要。

新聞業的天氣



一 記者如何面對自去年的言論緊縮？

2013 年的霧霾，大概是中國人對此時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公平。

中國山河一片霾，很多地方生活的市民，揭開一天生活的序幕，是從清晨查看 PM2.5 的數據開始。

北京，是最嚴重的城市。理解中國，可以從微博開始，網友調侃「厚得載霧，自強不吸」是新的北京精神，你一言、我一句，大家在網上接力吐槽，瞎猜著：「這一指數今天會不會爆表。」

我趕上百年一遇的大霧天。

8 月 29 日，北京天氣依舊有霾。剛結束一場採訪，擠上惡名昭彰的地鐵，車廂內緊貼皮膚的黏膩和混濁的汗味，令人無法神安。步出車廂，三步併兩步往旅館奔去，當我躺在床上想稍作休息時，電視機傳來的畫面，將我驚醒。

電視示眾

頭髮花白的老頭，身穿囚衣，戴著手銬腳鐐，坐在央視《新聞聯播》鏡頭前供認，自己在國外染上嫖娼惡習，來中國後繼續頻繁嫖娼，對嫖娼幾近痴迷。

他是薛蠻子，著名的微博大 V。「V」指 VIP 帳號，來自新浪微博推出的名人認證，一項擴大影響力的商業策略，將粉絲數超過 10 萬的帳號認證為「大 V」，在名字前加註金閃閃的 V 字。

在被北京警方抓了個嫖娼現行前，薛蠻子的微博有 1200 餘萬粉絲，在網路上確實有呼風喚雨的能力。



其實，薛蠻子十天前才上過央視。在那場由國家信息辦公室號召的「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上，他是與會嘉賓，站在國信辦主任魯煒身後，呼籲微博大V要「傳播正能量」。豈能料到，只過去十多天，他會二度登上央視版面。

這一次，卻讓薛蠻子火了。因為央視《新聞聯播》在節目後的十分鐘時段，以三分鐘時間報導薛蠻子的嫖娼新聞，接近三分之一長度，中國著名史家許紀霖在微博上調侃，薛蠻子是「享受了政治局常委的待遇。」

天才的網友總結了《新聞聯播》的三分定律：前十分鐘，領導人很忙；中間十分鐘，人民過的很幸福；最後十分鐘，其他國家都很慘，不是爆炸就是造反。播出時長 30 分鐘，只在當日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才會加長時間，而薛蠻子的嫖娼新聞就讓《新聞聯播》為他延長。

稍晚，央視還以十五分鐘新聞專題，披露薛蠻子描述嫖娼細節，甚至，包括公開他的性癖好，更重要的是，報導中對薛蠻子的稱謂，言必稱「網路大V」。

央視對大V發出檄文後，其他喉舌媒體也鮮衣怒馬地站入隊伍，齊聲討伐。《人民日報》報導薛蠻子常處在亢奮狀態，搭配精神科醫師訪問，「他可能是個性愛成癮的病人。」新華社發表短評批評他「偽善」、「斯文掃地」，僅憑買春人贓俱獲這項，就讓他「跌下神壇，既扇了自己一耳光，又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法律的警鐘。」

法律未判，央媒便同聲相應，將薛蠻子釘上道德十字架，不過，喉舌媒體急著定罪的行為，卻招致反效果。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出矛盾「國家電視台對薛必群供認罪行的報導沒有確認他的過錯，反而讓很多人產生關於法定權利的質疑。」更多市場化媒體和意見領袖批評警方「選擇性執法」，甚至連公認的中共立場維護者、《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說「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整』薛蠻子」。

不過，央視把薛蠻子「示眾」，富含政治意味。遊街示眾，是中國一種很古

老的傳統，有兩重含意，一是懲罰性的羞辱，二是殺雞儆猴，威懾公眾。出身紅色家庭的薛蠻子，似乎能心領神會權力者的邏輯。



畢竟，9月15日，看守所裡的薛蠻子又在央視鏡頭前說出了「回復粉絲留言感覺像皇上批奏章」的大V感受，做起「飄飄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評，讓人恍若置身文化大革命的活動現場，被批鬥者胸前掛牌地招搖過市，懺悔罪過後還要警惕世人，「大V只是考慮個人虛榮心的膨脹」，造成負面新聞放大，是一種「不負責任」。

不用喉舌媒體連篇累牘地批評了，薛蠻子的網路皇上論，先讓一票聲援者啞口無言。對網路謠言的集中打擊，網絡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被捕後，央視隨即在多個新聞節目中重拳嚴打「網路謠言」，懷疑秦火火造謠有幕後黑手時，李開復的微博首頁被鏡頭帶過，欲蓋彌彰地暗示他就是「背後大V」；而另一位擁有千萬名粉絲的微博大V，同時也是北京最大房地產商SOHO中國總裁潘石屹，則在央視公開露面支持官方做法，談到網路大V應「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表明自己是個可以改造好的微博大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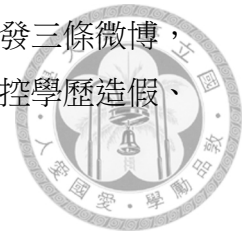
身家財產看的比言論自由重要，語氣叫人悲哀。

官方與大V的決裂，已漸清晰。不過，他們曾有過美好時光。

興奮的微博反腐

2012年底，胡溫落幕，曾經期待的黃金十年，只留下平庸與荒謬。人們把新一輪的期待投向習近平，一如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聖君情結，接著，他在人民大會堂上公開反腐，要「蒼蠅、老虎一起打」，沸騰民間期待新政的情緒。

陝西「表哥」楊達才是著名案例，這位官員在巡視重大災難現場微笑的照片，在微博瘋傳，眼尖網友發現，他配戴的手錶都是浪琴、奧米茄等奢侈品牌，二十天內該名官員被迅速撤職；接著是，以公民身分實行網絡反腐的朱瑞峰，他把一名重慶官員雷政富的不雅視頻公布在網上，曝光後63小時被免職。



這波微博反腐在 12 月 6 日推至高潮。接近午飯時間，羅昌平連發三條微博，向中紀委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詳細指控學歷造假、官商同盟、包養情婦等腐敗證據。

這位《財經》雜誌副主編的實名舉報，在微博上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雖不少人讚揚他「非凡的勇氣」，但真相總懾服於壓力，這點在德國傳播學者諾爾紐曼的「沉默螺旋」裡早有見解，當觀點屬於公眾中的少數派，人們會不願意表態自己的看法。這點羅昌平也同意，「只要劉鐵男上層關係夠硬，他並不會倒，充其量也只是軟著陸。」

記者實名舉報的風險高，而且「不符合記者的職務」，曹海麗說。這位《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總編輯，是外媒中少見的女性高管，也是羅昌平在《財經》雜誌的前同事，她坐在十九樓的辦公室裡說，「一個好的記者是用紮實調查採訪寫出好的報導來獲得影響力，而不是讓自己成為新聞的主角」，她覺得這會「有損職業規範」，而網路反腐沒有機制保障，最終只會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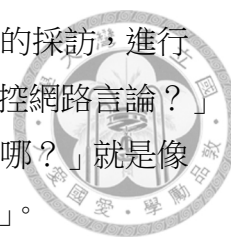
曹海麗告訴她的新聞同業「這一經歷不可複製，也不建議其他記者仿效」，雖然她的話，如今看來是驚人的預言，不過當時民間反腐的情緒熾熱不已，哪能聽進她的溫柔提醒。

經過半年的膠著等待，劉鐵男終在 2012 年 5 月被官方確認嚴重違紀，而羅昌平本人，也因為這開風氣的反腐行動而在年末獲頒透明國際清廉獎。正是受他的巨大成功激勵，《新快報》劉虎實名舉報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侵佔國有資產罪名。

他們怎麼都沒有想到，情況會如此急轉直下。

8 月份，劉虎被警方以涉嫌在網上傳播謠言的罪名刑拘。11 月，首位獲得透明國際清廉獎的中國記者羅昌平，在獲獎致詞〈在政治霧霾中前行〉裡表示，他希望中國記者能夠突破政治霧霾，及至月底，他被悄然調職研究院，不再負責新聞採編工作，讓焦急的圍觀者揣測，若不是遭到打擊報復，至少也是被冷藏了。

北京媒體圈盛行「秋後算帳」的說法，我以調查記者突圍為題的採訪，進行的很不順利，談話中有種撲面而來的窒息感。「你怎麼看中國政府管控網路言論？」當我這麼問，對方不是收起笑容，嚴肅地追問「你的論文要發表在哪？」就是像肥皂劇在高潮時要進廣告的邏輯一樣，「我先上個廁所，回來再說」。



但在兩週前，得到的答案不是這樣的。上海的資深記者楊海鵬還嘲弄國信辦對網路的監管，「只會讓自己更可笑」，頗有當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諷刺中國管制網路「是把果凍釘上牆」的口吻。

中國社會總是充斥重重的荒誕，以致預測大國的未來，從來都不可信。這層荒誕可能是在，我剛和劉虎取得上聯繫，就聽到他被刑拘的新聞；或是剛約好與財新記者陳寶成的見面，他就被官方定性為「非法拘禁他人」的惡犯。

毛澤東的遺產

風雨突來的轉變，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重新集權的形象化。習近平在 8 月 19 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白無誤地表明他的強硬決心：「意識型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是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一年多來，習近平不管是整肅貪腐官僚，或是重塑個人權威，都帶著點毛澤東的影子。

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延安整風是他樹立個人權威的政治武器。

那是混亂的 1942 年，毛澤東接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發起黨內的群眾運動，建立一套思想標準，要求黨員重視馬列思想、服從上級指示，並以此作為自我批評的標準。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要求黨員與幹部被檢討自己，把背景、行為及內心深處想法交代清楚，就像「洗臉、洗澡、打掃灰塵」一樣，然後彼此相互批評，揭發黨員錯誤也是為了「治病救人」。

據此，他運用思想改造與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奠定個人權力基礎。一是鼓勵群眾運用大字報對黨批評，為證明「言者無罪」，他先批評文藝活動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並公開講話，指出文藝是「成為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教育人

民、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加強對輿論的控制；另一是配合「反左」、「抓內奸」等運動，清查大量「國民黨特務」與「反革命份子」，大量加以殺戮，並審查幹部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



對照一年多來，習近平的做法有種可疑的懷舊。七月一日正式啟動的「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習近平的新一波整風運動。

在一次黨內講話中，習近平向全黨表示，為避免「亡黨亡國」，必須重走群眾路線。各階層黨員，自上而下分批展開自我檢討、互相批評的整風運動。習近平還親自到河北舉辦「民主生活會」，示範群眾教育實踐，接下來一年，從地方政府到國有企業，還有 8 千 5 百萬黨員將開展一波波群眾運動。

緊抓槍桿子與筆桿子，是中共建政以來顛簸不破的道理。

如果不能控制輿論，權力就可能旁落。《紐約時報》八月份揭露一份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向各級幹部嚴肅地發出秘密警告，特別注意七種反動言論，尤以西方民主憲政為首，其他包括公民社會、普世價值、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和質疑改革開放。

那次還是官方的內部文件傳達，現在，習近平將集權的欲求示眾，這也是一種自信與力量的展現。時間推回一年前，中國自由派敦促的政治改革，如今，期待落空了，或許我們本不該期待用舊監獄的磚頭去砌出新世界。

政治權力的話語仍支配言說空間，此後，喉舌媒體紛紛響應表態。新華社在九月初的通稿中披露最高指示「在意識型態領域領導幹部要敢於亮劍，不能愛惜羽毛」，接著《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呼籲官員在意識型態領域「要敢抓敢管、積極作為」，《北京日報》也於同日發表文章說，「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而《解放軍報》上那句「只有像當年守上甘嶺那樣，鉅在意識型態鬥爭的陣地上，戰鬥在最前沿，才能打贏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暗戰」，說的更是疾言厲色。

充斥在耳邊的「亮劍」、「搶占」、「陣地」、「制高點」，吵的砲聲隆隆，令異

議者心生寒意。互聯網上的自由作風，讓這個以鬥爭起家的政黨，再次有號召黨員衝鋒前線的征戰準備。



有同情者的論調，比起前幾任，習近平任內中國面對的挑戰更險峻。因此，習近平使用毛澤東的兩手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抓捕異議者

面對李永剛，有種放鬆的感覺。他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也是中國較早進行互聯網研究的學者，他的《我們的防火牆》一書沒有出版宣傳，卻在北京著名的獨立書店「萬聖書園」成了銷售排行第一名；另一個身分來的更早，他在 2000 年創辦網站「思想的境界」，有些像今日知名的網路媒體「共識網」，提供知識菁英思想交鋒的平台，最後卻因樹大招風被逼關站。談話時，他健談、機動、幽默，還善用譬喻具體化模糊的中國。

「今天的中國，我把它叫做代際衝突，」李永剛解釋，習近平與他的同齡人，是少年紅衛兵，第一代上山下鄉的知青，他們的生命週期，走過相對完整的毛時代，非常完整的改革開放，「他們對中國的變革，有清晰的時間感，特別容易憶苦思甜。」過去不容易，能走到今天，已經不錯了。因此，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態度保守，符合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判斷，推動改革，反而激化社會矛盾，促成革命。

但網路是屬於年輕世代。中國 90 後，生下來就是市場化，錯過八九民運，成長在政治張力小的氛圍，網路對他們而言不是工具，而是和水、陽光、空氣一樣的必需品，他們不了解毛時代，也不清楚八十年代的物資短缺，「但他們了解世界，所以 90 後睜眼看世界，學會了空間感」，他們評價中國的參照系是歐美等發達經濟體，以致他們總評價中國是「改革滯後」。

中國的傳統家庭是棍棒底下出好漢，對爹媽有份敬畏，算是威權下的產物，但今天 90 後的年輕人，不叫爹媽叫名字，對父母沒有敬畏。「這種家庭的微觀變化，很像黨國與民眾的關係變化」，因為，威權體制主要靠恐懼維持運作，無可預測的發怒，很大程度維繫它的統治，但新世代沒看過黨國發威，在網路言說空

間裡，擁有足夠充分的自由，面對惡魔黨，他們嫻熟網遊裡連網打怪的邏輯，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李永剛說「這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青春期。」



雙方的情緒都焦躁，當然，中國政府還是那套老舊思維，要在穩定中求發展，但網民卻不斷喊著「我等不了」，拉扯推擠下，黨國拿出管家的舊法寶，再次證明「我是管的住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政府開始了行動。

由國信辦主任魯煒召開的網路名人論壇，劃定了「七條底線」，先禮後兵。接著，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司法解釋，一條訊息被 5000 名以上的網民瀏覽或轉發次數達 500 次以上，即可認定為情節嚴重的誹謗罪，作為打擊異議者的武器。

八月底，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展開打擊網路違法犯罪行動，除了薛蠻子、秦火火、立二拆四被刑拘外，新公民運動主要創始人，也是溫和的改革者許志永，被北京警方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名批補。

2003 年孫志剛案件中，許志永與其他兩名法學博士上書中央，要求審查違背憲法的收容遣送制度，走入公眾視野。制度廢除後，他以促進中國憲政作為目標，揭露「黑監獄」、組織上訪者、呼籲官員公開財產及教育平權。

在許知遠印象裡，他的這位友人溫和且理性，甚至是在協助政府建設社會，卻遭到過分嚴酷的對待。他觀察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轉折點，發生在 2008 年，奧運會的巨大成功讓它更加傲慢，以更加尖銳的方式對待異議者，而且越來越肆無忌憚。

「在索多瑪城當義人的宿命。索多瑪的城民們，會圍著你，羞辱你，詛咒你，像你扔石頭，...在毀滅的大火與硫磺從天而降之前，他們願意放棄一切希望...」許志永被捕後，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郭玉閃在《致友人的一封信》如此寫道。

發表公開信的前一週，數輛警車停在郭玉閃的傳知行研究所門口，以未申請 NGO 資格取締了傳知行。我曾與他有過一面之緣，很容易被他滔滔不絕的口才

吸引，我說從台灣來的，他立刻補上福建人的身分介紹，送給我三大冊《思想的蝴蝶》，這是傅知行的研究刊物，內容與城市農民工的社會權利有關。



又有一个人被捕了。王功權不是異議者，是個成功的商人，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得利者，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他說：「我不是幹革命的，我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重複的暴力更迭中損傷太慘烈了...」他也困惑「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為這個國家的良性變革提供一些健康批評之聲，...這麼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做點事、說點什麼都會被渲染。」

中國對待異議者，沿用「非政治化」原則，以各種最令民眾反感的刑事罪入罪，如「擾亂公共秩序」，若一時裁不上罪名，可誣陷「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套污名化的標籤，透過系統性的教育深入人心，只要打上這兩類烙印，很多民眾都會厭惡及躲避，哪怕同情者也往往認為被打壓者言行過激。

仔細觀察這波被打壓者罪名，不是「擾亂公共秩序」就是「尋釁滋事」，曾研究中國監獄史的袁凌發現，「它就是個口袋罪，隨便可以把你往裡頭裝，」其他口袋罪還有流氓罪、投機倒把罪和玩忽職守罪，上世紀中共建政為了鎮壓反革命份子而羅織這些罪名，司法上沒有任何解釋，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很大。

縱使知道是口袋罪，這些異議者被捕的消息，並沒有驚醒陷入道德沈睡的中國社會，讓人想起電影《讓子彈飛》的一幕，「槍在手、跟我走」的吶喊，沒有點燃人們心中的怒火，搭順風車仍是主要的社會心理。

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場與魔鬼的交易。改革開放三十年，只看到市場力量興起，其中的涵意就是：我允許你賺錢，其他的別管。

政府敞開賺錢機會、鼓勵物質生活，人們躲入私人生活中，無所謂生命變得蒼白，接著，他們對他人的痛苦默不吭聲，暗示同意這場交易。



滑向犬儒的社會

人們似乎已經習慣活在謊言中。

中國存在三大戈培爾式的謊言：中國網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環境是充分開放的；中國不存在所謂審查制度，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功能。

但是，身旁的人卻又拒絕相信這一切，他們嘲諷制度的愚蠢和傲慢的官僚系統，不過，這一交談僅停留在私人空間裡。而正是這種強烈的恐懼和伴之而生的不安全感，延續了威權體制的運作。

嚴打後的一天，網路爆料人周筱贇和我在網上有過簡短對話，「這次嚴打明顯針對網路大 V，搞的人人自危，」他用一種罕見的惶恐語氣說著，「連『花總』都被上銬了，確實把我嚇了一跳。」花總和周筱贇一樣，是網路知名的反腐者，他因揭發「表哥」的名貴手錶而一戰成名，現在也淪為階下囚。

「不過，」周筱贇的語氣急轉，「新華社突然發了我的專訪稿，我應該安全了。」他自得地表示，自己對言論邊界的把握「還是做的比較好的。」

生活在中國，你經常能感覺到荒誕。在網路時代裡，報紙都快要消亡了，記者們仍在談「戴著鐐銬跳舞」，似乎沉迷於這項古老的技藝；憲法保障個人的言論自由，法律卻也能隨時懲罰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你甚至不清楚，究竟是哪句話可能會一不小心就顛覆掉這麼大的國家。

現實既然是一場大荒謬，我也用荒謬對待之。

中國社會陷入普遍的犬儒，執政黨放棄作為說詞的意識型態，民眾也裝模作樣地服從統治，政府表面上什麼都管，下面的人也學會遇著紅燈繞路走，而面對這張專制之網，民眾更有興趣知道，該怎麼巧妙地從網眼中鑽過去。

犬儒的盛行，是現實的困境不能言說，私下的議論不能轉化成公共空間的表達。若要克服犬儒，榜樣具有療效，聚焦為信仰獻身的人，能讓犬儒病患者相信理想的價值。這些本該是媒體業應擔負起的社會責任。



抗命中宣部

不過，这回媒體業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中國的知識份子集體感受到了 1989 年以來最嚴厲的言論管制」，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徐達內如此評論 2013 年的輿論環境。

中國新聞史會記下 2013 這個濃墨重彩的年份。這年，新聞界有兩件大事，一頭一尾，皆發生在廣州。

年初的南周事件，起因於抗議上級將原訂的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改為歌功頌德的見報版本〈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素有抗爭傳統的南方記者，選擇運用互聯網抗命宣傳部。

這場風波的矛頭，劍指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度震。根據南周記者的指控，是度震親自捉刀獻詞內容，引出習近平那句「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即便在媒體審查如家常便飯的中國，宣傳部直接插手編輯部的情況也相當罕見。

借助微博這隻全民麥克風，南周記者將昔日止於後台操作的新聞管制，公諸於眾，那條 1 月 5 日的微博聲明，僅 2012 一年內，《南方週末》就被廣東省委宣傳部強行撤稿 1034 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傳部粗暴的舉動，激起新聞界長久以來被審查制度蹂躪的怒火。南周內部的 50 多名編輯記者，連署發表公開信，指責度震修改獻詞，並要求其引咎辭職，隨即，《南方都市報》以評論〈讓無聲者有聲，讓有聲者多元〉送來溫情，而《新京報》也以「南粥」隱喻「粥還在翻滾，它似乎也有一顆勇敢的心」，至於網易新聞首頁出現「南方周末加油」的藏頭標題。



當自由派媒體向南方送去溫暖，那些親官方的媒體也不願置身事外。《環球時報》1月7日發表社論，稱「即使在西方，主流媒體也不會選擇與政府公開對抗」，諷刺「別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它無論如何也承擔不了的對抗角色。」第二天，在各級宣傳部要求下，各家媒體被要求轉載環球時報的社論。

微博上的一則插曲，記錄中國新聞業悲情的夜晚。1月9日凌晨，北京宣傳部親至堅持不願轉載的《新京報》，社長戴自更與對方拍桌子叫罵「我現在就口頭提出辭職」，但宣傳部態度更為強硬，稱武警已經包圍印刷廠，你們現在只有兩條路：要麼轉載，要麼原地解散。最終，新京報妥協，整個過程，報社哭聲一片，有記者說「做了那麼多調查報導，一直對國家未來滿懷期待，如今，頭一回，對這個國家產生一種憎恨。」

一切都是，抗爭過，努力過，沒有奇蹟。

但是，燃燒過後的灰燼底下，還有溫熱的心。在《環球時報》社論出街的同一天，女孩手捧50隻菊花到南方報業樓下，兩三個年輕男孩就在廣場前唱起《國際歌》，整個下午，自發的網友默默集中到廣州大道289號，有人在街角朗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公民有言論的自由」。

風波看似平息，卻在年底以極盡諷刺的方式上演續集。市民郭飛雄等人因年初赴《南方周末》聲援，被廣州警方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名起訴，作為呈堂證供的，是一份蓋有南方集團大紅公章的情況說明：「大院門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對集團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員和車輛的正常進出受到妨礙。」

這份曾經的自由主義報紙，倒掉它的理想，「恨不得當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評語，已經被失望的人們贈予《南方周末》。「新聞業徹底失去它的光環」，許知遠如此評價當下中國新聞業的精神危機。

應該釋放的活力，越來越有氣無力；本應關進籠子的權力，卻是肆無忌憚；原本瑣碎的花邊，居然佔據話語中心，新聞記者只能無奈選擇，在大時代做一隻駝鳥，加入這娛樂致死的時代。



「中國提前進入後現代」，許知遠擺著手解釋，言論管制還在，新聞業就迅速娛樂化，雙重危機阻礙著我們，任何接近事實核心的努力。

後現代社會的特徵，來自 90 年代初釋放科技潛力。時代的青年關注科技如何衝破禁錮的社會，他們也可以在中關村大談矽谷精神，生活在媒介氾濫的社會裡，他們感受前所未有的充盈，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傳媒的主人，有鍵盤就能向全世界說話，卻沒注意到，新科技的便利，卻再次讓生命的多元本質趨向單一，正切合馬庫塞的呼喊「我們快變成單向度的人了」。

中國人在「萌娃」和「歌手」的娛樂中麻痺，如同服用了《美麗新世界》中的強力迷幻劑「索麻」(soma)，網路空間是消費、私慾跟嘲笑聲的集合，而新聞記者自我放逐，不再給時代提供精神養分，「軟化了整個社會」許知遠批評。

「怎麼辦？」「我們不想談」

去年冬天，據北京氣象資料顯示，是 30 年來最冷的一年。

寒風狂吹，也抵不過新聞人內心的寒冷。年末時分，央視製作人王青雷的離職自白，為時代留下一些真話，他憤怒「我們憑什麼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斷誰是大 V 誰是大謠」，質疑「新聞準則一再被權力強姦，我們迴避法律原則，開動宣傳機器打擊網路謠言」，並嘆息「真正潰敗的原因不是無法抵抗新媒體的衝擊，而是無法在艱難的輿論環境中，用真實的聲音贏得公眾的尊敬和信任。」

要錢沒錢，要名沒名，2013 這年，中國新聞業終爆發離職潮。著名調查記者王克勤先在微博證實「被迫離職」，隨後，財新傳媒記者龐墩明因受不了中宣部壓力，「三次換名後」，他終於不當記者了。無獨有偶，我採訪過的財新記者王晨、陸媛也相繼離開新聞圈，至於《南都週刊》主編石扉客也不做調查報導，轉職到一家時尚文化類的雜誌。

時至今日，我常想起陸媛當著我面的那句吶喊「逃不過，幹嘛跟政府死磕呢？」像是道盡中國記者心中的無奈。



中國記者無不陷入「報紙必死」悲觀中，但仍有奮進者，只為那句心中的那句提問「可萬一新聞理想實現了呢？」

問到「新聞空間倒退，該怎麼辦？」財新記者宮靖將衛生紙折成小方巾，擦拭飲料凝結的水珠，若有所思地說「你只是好奇，但我們不想談這個。」我嘗試理解他的話，如果不是一種強大而又封閉的內心，該如何在快速變換的新聞業中生存，「就做本分吧！」他補充道，回答小心謹慎，總是避免自我美化。

同樣不致灰心的，還有《南方周末》的陳中小路，「在中國當記者還有很有意思的」，用一貫樂觀的口氣回答，「中國變化特別大，社會結構還不穩，從媒體的角度看，有太多事情值得去寫去記錄了。」

《南都週刊》的主筆季天琴，則在停頓了十秒後才緩緩吐出，「言論自由絕對不會是政府主動給予的」，一字一句都說的謹慎，「你不能因為不可預測的未來，就放棄眼前報導的機會吧！」

寫作這篇稿件時，聽說北京終於降下初雪。立春後，遲來的降雪一掃連續多日的霧霾，迎來久違的藍天。

新聞自淨器



一 記者如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請放人」、「再請放人」。

中國南方廣州的一家報紙，連續兩天，在頭版呼籲釋放被抓記者，尤其在官方打擊謠言的背景下，不少人說這家報紙是「吃了豹子膽」。

頭版式的戰書，搭配激昂的證言「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為了營救記者，《新快報》選擇不留退路地公開挑戰，畢竟，這已經是該報月內被拘捕的第二名記者了，前一個是劉虎，因舉報官員貪腐而被刑拘。

報導稱，該報記者陳永洲因調查中聯重科公司的財務問題，10月18日被從700公里外湖南警方拘留。中聯重科是中國第二大建築設備製造商，股票在香港、深圳都有上市。

「請放人」的呼籲，引發中國網民熱烈關注，24小時內，被轉發8萬多次。

曾經激昂的聲援，卻換來一記無情耳光。三天後，理著光頭、穿著囚服的陳永洲出現在央視鏡頭前，一字一句供認收受他人錢財、撰寫不實報導，稱報社管理高層也參與其中，甚至說出「我也希望整個新聞業能以此為戒。」

隔日，《新快報》刊登道歉信，為這場風波畫下句點。

新聞業的頑疾

胡舒立與她新聞後輩的筆戰才要開始。

直到今日，人們還是無從得知陳永洲被拘背後的全部真相，網上不乏仍高舉

「程序正義」大旗者，指責長沙警方勾結中聯重科、央視未審先判，胡舒立也呼籲「事件真相應繼續昭告天下」，她指責湖南警方乘中聯重科車輛辦案「行為可疑」，而且陳永洲被指控的「損害商業信譽罪」入罪空間較大。



但作為新聞理想主義者，胡舒立更想藉此機會告誡同業，她在《新聞尋租不可恕》說，「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並強調「中國的新聞尋租並不是個人操守有虧的偶然發作，而是存在相當一部分新聞機構與媒體人的頑疾。」

這種新聞尋租，已經極大損害到關係新聞業存續的公信力，為此，她在文末呼籲「政府應該給媒體更多空間，對記者權益合法保障，使新聞人自尊自持。」

這段自省的文字，讓這位行業領袖罕見地遭遇南方系反駁。宋志標說，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完成，否則就是「奉旨自律」，至於「自尊自持」的喊話，也被視為「倒向了可疑的勢力」，孫旭陽諷刺，恐怕以後做調查報導，都要先向慈愛的「老大哥」自證沒有新聞尋租了。

尋租是經濟學名詞，指個人行使權力，換取不當的經濟利益。中國的新聞業自由度不高的情況下，新聞尋租的情況更盛，記者可操控報導權，假借曝光企業黑材料，威脅敲詐被採訪對象，或是為企業撰寫宣傳性報導，以換取經濟回報。除了赤裸裸的「紅包」外，還有變相的贊助、廣告，以及招待出國旅遊等等。

眾所周知，中國會對敏感性的新聞報導進行審查，不過，對於報章雜誌上的商業性宣傳報導則寬容的多，只要你支付適當的金額。

想要在中文版的《時尚先生》(Esquire) 刊登貴公司高層的個人專題嗎？廣告部門給出每個版面約 60 萬台幣的報價。

如果要貴公司執行長出現在國家電視台央視的新聞節目中，電視顧問的估價是，大約每分鐘 12 萬台幣。

若是在黨政機關報《工人日報》上，登載一篇貴公司的宣傳性報導，代理廣告公司的報價是每個字 30 元台幣。



上面的數據，來自《紐約時報》去年中揭露的一篇報導。儘管，中國的法律明確禁止刊登未標明為廣告的宣傳性報導，而過去幾年，記者因收受紅包被以「受賄」罪名起訴的，也不在少數。全球最大的公關和廣告公司之一的奧美公司仍向《紐約時報》承認，在中國「安排刊登軟文非常普遍，尤其是精品業。」

對於把新聞業改革看成畢生使命的胡舒立來說，新聞尋租是她心中的刺，普遍的審查機制，還只是「國情問題」，不過記者尋租就是自甘墮落了。她不只一次大聲疾呼，中國新聞業健康成長，需要每個記者「從自身腳下做起。」

當然，由她率領的財新，矢志要當新聞業的自淨器，潔淨周遭空氣，去年發表「新聞尋租」三部曲，便是最好的例證。

還原「達芬奇」

2012 年開年之作，就注定財新將囊括整年的榮光。這篇《達芬奇案中案》獲得 2012 騰訊網評選「年度財經報導」後，又拿到南方周末年度傳媒致敬的「年度調查報導」獎，而這兩個獎項，一直是中國調查記者心目中的聖杯。

因為，他們選了一個最難的案子。

2011 年 7 月，中央電視台《每週質量報告》播出〈「達芬奇」密碼〉，節目一開始，北京一名女士唐英自稱從達芬奇購買上百萬人民幣的家具，但收件後發現質量低劣，對家具從義大利進口產生懷疑。央視記者經過半年「暗訪」，終於在東莞一家工廠，發現有一張床與北京達芬奇專賣店裡的一模一樣，工廠的「總經理」彭杰說，達芬奇銷售的家具「正是他們公司生產的」，並出示達芬奇公司付款的一張 9000 餘元的收據。

該節目披露，達芬奇將家具從深圳口岸出港運往義大利，再運回上海報關進港，這些家具就有了全套的進口手續，成為達芬奇家居所說的「百分百」義大利原裝進口。

達芬奇家居由潘東尼、潘莊秀華夫婦在新加坡投資設立，專營義大利頂級家具的銷售，是 Armani Casa、Versace Home 等 59 個義大利品牌，Ralph Lauren Home 等 15 個美國品牌在中國的銷售代理，被央視踢爆前一年，達芬奇營業額達 6 億人民幣，更連續三年維持二位數的淨利率，已提交材料準備上市。



節目播出後，達芬奇總部所在地上海，兩小時前就有近 70 名工商執法人員抵達，之後幾天，全中國的達芬奇家居門市歇業配合審查，並有部分家具和倉庫被查封。

8 月底，上海工商局檢查結果出爐，表明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明達芬奇家居有央視指控的售假造假問題，頂多存在宣傳誇大。

但這項結果，沒有見諸媒體。七月中，央視《每週質量報告》再播跟蹤報導〈「達芬奇」密碼 2〉，主持人開頭就說：達芬奇已涉嫌觸犯法律，理當嚴懲。跟隨這波情緒，達芬奇已經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七月銷售收入虧損 8000 多萬，辦理退貨合計 1.2 億，而原本期望那紙「還清白」的調查結果，沒有為他們平反，甚至，輿論普遍認為政府惡意包庇。

被逼到牆角的達芬奇，想要恢復商譽，不只一次對身旁朋友說「我們是新加坡人，在中國做生意，不認識什麼有權位的高官。」比起法律途徑，他們更相信潛規則，好幾次語氣無奈地說，「在你們中國，我們該怎麼做？」

找媒體，是朋友想出的唯一法子。他們請了好幾家知名媒體老總吃飯，對方聽完達芬奇的控訴後，都不願意進行調查，甚至勸他們死心，因為「央視你們打不倒的。」

他們真是受了一肚子憋屈。潘東尼獲頒過兩枚新加坡總統獎章，是星國知名的慈善企業家，這位視名譽高於生命的商人，在這波商譽重創後得了憂鬱症，潘莊秀華更是變得情緒不穩，時常與人談話到一半就崩潰大哭。有個心腸軟的老總告訴彼時還不知道胡舒立與財新傳媒的潘式夫婦，「胡舒立要是都不報，中國就沒有第一家媒體會報了。」

接頭的記者是高昱，一名財新的資深記者，對達芬奇的鳴屈覺得有些索然無味，要知道中國調查記者在市民眼裡普遍有「青天」形象，類似「伸冤」的信件每天可以收到上百封。但讓高昱真正吃驚，也對這個題目產生興趣的，是潘莊秀華控訴央視節目播出後的「公關陷阱」，他們被敲詐了兩千多萬。



不光彩的手段

北京長安街上的友誼商店，曾是外交官和外國人才能享受的特權象徵，時至今日，它仍是京城外資插旗的首選，兩年前，達芬奇將 9000 平方米中的 5000 平方米租下，用作頂級家具的展售廳。

2011 年 11 月，高昱帶著三位同事，小心翼翼地穿過琥珀色水晶燈與象牙古董鋼琴，來到友誼商店頂樓的達芬奇北京辦公室。接受採訪的除了潘莊秀華外，還有四位上午才從義大利飛來的頂級家具品牌總裁，Munafò 開頭就說「公平，我們專程飛來中國，只是希望獲得公平。」他是古典家居品牌 Jumbo Collection 的總裁，也負責為其他義大利品牌代辦所訂貨物的質量檢查與拼箱裝船。

他們從中午一直採訪到晚上十點。「主要就是讓他們完整回憶一遍」，包括央視記者的暗訪、播出後政府的調查，尤其是詳細問了達芬奇被「敲詐」的過程，跟《每週質量報告》記者李文學以及中間人崔斌的見面。

馬拉松式的採訪，在於不斷追問細節，是因為「我們需要先知道達芬奇究竟有沒有造假售假的問題」，畢竟，高昱他們這次要揭黑的對象，可是國家級的中央電視台，再怎麼小心也不為過。

高昱把採訪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式調查達芬奇家居的假貨問題；第二個階段是調查央視拍記者去東莞暗訪的情況；第三個階段是對《達芬奇密碼》播出後的調查。時序的安排，因為後面兩塊調查一定要去接觸央視，由於「不清楚央視的態度，不清楚崔斌有怎樣的能量」，高昱決定將相關採訪後置，擔心接觸太早會被攔下。不過，有利的是，達芬奇提供了央視記者在義大利採訪的錄像和潘莊秀華與李文學、崔斌等人的談話錄音。

大致疏理事件經過。導火線是唐英對達芬奇的投訴，其實只是一場原本普通的消費者與商家糾紛，唐英分兩次訂購了 200 多萬的家具，認為到貨家具「質量低劣、氣味刺鼻」，達芬奇為此致歉，全數退回 50 萬預支款並願意替換。之後，家具基本交齊，唐英仍覺得家具不滿意，要換到滿意才付錢，達芬奇停止送貨，要求先付款才繼續送新貨，雙方爭執不下，唐英的丈夫撻狠話說，「他認識央視《每週質量報告》的記者，如果不滿足他的要求，有辦法把達芬奇搞垮。」

後來，就出現了電視上的那集節目。

在《達芬奇密碼》中，指證達芬奇造假最有力的證人，就是東莞長豐家具行「總經理」彭杰。財新記者趕到東莞，在真正總經理黃文聰陪同下採訪彭杰，「我剛好有事來公司，順手就接起來了」，對方反覆詢問有沒有生產達芬奇那套歐式家具，他回答「我們有，可以來工廠看一下。」其實，彭杰是一名跑單員，才滿 24 歲，在小鄉鎮裡沒找到正職工作，就幫這條街上家具製造工廠介紹客人，平時賺取 1~3% 的抽成。

第二天，對方就出現在工廠。據彭杰回憶，對方自稱李總，個子高高、頭有點禿，說是要幫 20 套別墅配家具，這確實是個大單子，「我給家具廠跑單兩三年了，以前做的單，總價二三十萬都看不到」，超過 2200 萬的大單擺在眼前，彭杰既興奮又忐忑。

之後，李總反覆要彭杰證明能做出跟達芬奇家居相同的產品，彭杰心想，都談到價錢了，離拿下大單只差一步，「我就乾脆說就是我們幫達芬奇生產的。」彭杰誇下了口，卻沒想到說的做的一切都被偷拍，四個月後，居然是一場惡夢，節目播出後，「他精神崩潰了幾個月，還吃過一次安眠藥自殺」，黃文聰對高昱說，「他只是個孩子。」

2011 年 7 月 10 日播出的《達芬奇密碼》影響甚大，潘莊秀華病急亂投醫，經介紹找了中間人打點權貴，被索要公關費 660 萬人民幣；為了止血，也同意支付唐英 450 萬的和解金。不只如此，她透過關係見到《京華時報》總經理崔斌，一見面就拿出 300 萬的公關合約，稱他認識央視記者，可以幫忙擺平。

第二次見面，她終於見到李文學，那名暗訪的記者。李文學一直說還有 500 分鐘的影帶，「可以接著報，也可以不報。」席間，沒有提出價碼，事後才經崔斌轉告潘莊秀華，「要錢，幫忙擺平央視，不再做第三期。」



「要多少？」「一百萬。」

潘莊秀華終於得到了答案，她也願意支付，只要能平息風波，這點錢不算什麼，她馬上從香港帳戶匯款到指定帳號。

但是，無意間潘莊秀華從 Munafo 拿到一卷採訪帶，是央視駐義大利記者對他們的採訪，記者在電話中與北京的李文學起了爭執，被公司的監視器錄下來，但義大利商人聽不懂中文，便一直擱置著，直到潘莊秀華聽到影帶的內容，「你們確信達芬奇賣的就是偷拍工廠裡的東西嗎？你們能保證嗎？」、「你們之前告訴我，只要他們說這個不是他們生產就 OK 了。」

這下，潘莊秀華終於知道，原來一切都是李文學設的套。

但央視拒絕了採訪。

高昱給《每週質量報告》的製作人打過兩次電話，也給央視紀委打過電話，還依規定向央視新聞中心發去採訪函，明確告知財新傳媒接到達芬奇投訴，稱央視的報導是虛假報導，而記者李文學涉嫌敲詐勒索。只是幾天後，由新聞部轉達幾點：歡迎財新關注，但不便接受採訪，部門自查已經結束，《達芬奇密碼》屬於客觀報導。

調查報導不能只有一方的說法，高昱想到的解決方法是，「充分發揮沈默信源的作用。」其實就是大量引用央視系列報導內容，包括兩期的《每週質量報告》，還有央視《焦點訪談》播出的〈達芬奇造假〉相關報導。

高昱強調，使用這種公開的報導當做證據，因為信源無法反駁，記者在報導時要系統性闡述，而不是只挑對記者有用的；更需要在採訪查證時，記者主動站在「沈默」的一方，替他去質疑控方。



採訪時也是如此。高昱的調查團隊裡，有位女記者王姍姍，她在英國學紀錄片的，她把央視《達芬奇密碼》的系列報導，幾乎是一幀一幀的反覆看，把質疑達芬奇的每一個細節都拉出來。完全站在一個質疑者的立場，去糾問達芬奇高層每一個細節，又是一個長達五小時的採訪。

《達芬奇案中案》的採訪，長達兩個月時間，錄音資料差不多有 2000 分鐘，而寫作和修改過程，又花了一個月時間。

初稿出來後，除了總編輯外，副總編輯、主編、公司法務、法治記者、經濟記者，幾乎報社中層主管以上每個人看過一遍，胡舒立就親自操刀改了三次。畢竟，這事牽涉廣大，「尤其是針對央視的報導，我們必須慎之又慎。」高昱說。

胡舒立主要做的，就是不斷刪除旁枝，集中稿子的火力。她拿不准的細節全部刪除，看起來很不合新聞常理，「她可能是覺得細節表面上看非常精采，但細節也是比較容易引起爭議的。」高昱試著理解，「人的記憶有時會模糊，會不由自主的趨利避害」，枝節越多，出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她一直在做的都是「盡可能把風險控制在能掌握的範圍裡。」

特別報導《達芬奇案中案》出街後，隨即在微博瘋狂傳播，結果，央視李文學被重新調查，而《京華時報》總經理崔斌被免去職務。至於財新最關切的「有償報導」問題，卻持續在 2012 年暗流湧動。

新聞尋租的病根

當然，這不是單一的偶發事件，而是中國新聞界的頑疾。治病要找病根，時間必須推回至 1990 年代初期，中國媒體啟動市場化改革，要求媒體仍履行正面宣傳職能，並逐步履行自負盈虧，即所謂的「事業單位、企業管理」，這項制度被媒體人形象地比喻「把人捆住四肢，丟進海裡」。

廣告收入成為救命的浮木。一種介於新聞報導與廣告推銷的「軟文」出現，算是早期的「有償報導」，換成你我熟知的詞彙是「置入性行銷」，從新聞版面、

專刊到網站宣傳，都有對應的價碼。



更別說滿天飛的「紅包」和「車馬費」了。2005年，河南一場礦難，數百名媒體記者蜂湧而至，排隊領紅包的畫面都被記錄下來，記者的操守在流血的礦難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可怕的是，原本零星的貪腐行為，卻將整個新聞業拖進整體骯髒的環境中，《財經》記者譚翊飛特煩這種公關風氣，但採訪常需要地方政府協助，到了當地總少不了酒宴款待，「我不願與他們吃喝，卻要讓他們相信我是安全的，不是來做批評報導的」，這在中國，似乎難以兩全。

其實，對中國新聞業來說，「收紅包」絕對不是什麼新聞，一個通行自辯的理由是，由於中國媒體機構未能給予記者與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默許或鼓勵了那些新聞尋租行為。

長期研究調查記者群體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張志安指出，近七成調查記者的月均收入在五千至一萬人民幣範圍之間，甚至有一成五記者月均收入不滿五千，若按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報告，中等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上限與下限，落在一萬八到三萬二之間，調查記者遠遠算不上是中產階級。

弔詭的是，中國調查記者九成五都有大學以上學歷，甚至有一成五左右擁有碩士或博士學歷，主要駐紮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迅猛的城市化發展對比停滯的薪資，讓這群記者心理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2012年，他們又碰上「報紙將死」的警世預言，美國《新聞週刊》、《德國金融時報》雙雙宣告破產，西風東漸，廣告效應也在中國2012年下半年以來急遽下滑，足以構成致命的危機，尤以紙媒為重災區。

去年，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的報告指出，2012年第三季的報刊廣告投放同比跌幅達到15%，全年度廣告大幅減少17%，是2010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另一份由《富比士》所做的報告也發現，包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五份廣告收入領先的報紙，都在2012年同步經營負成長。



報紙將死，不再是「狼來了」的笑話。

它呈現在諸多細節裡，在街頭隨處可見銹跡斑斑、滿佈塗鴉的廢棄報刊亭，在飯桌上不斷聽到報紙雜誌裁員或倒閉的噩耗，在報社內總編喊著要「共體時艱」而降低薪水，心急如焚的記者處在不知明日何在的行業裡，一部分人也顧不上新聞倫理。

灰金鏈條

如果說《達芬奇案中案》的報導還只是記錄記者恐嚇取財的個案，那麼，這年陸媛所寫的《IPO 有償沈默》便是首次完整揭露中國新聞尋租的灰色鏈條。

這篇報導讓她獲得 2012 年由資深媒體人共同推薦的年度調查報導，並邀請她在《輿論監督研討會》上演講。能容納三百人的大講堂就連講台也特別長，原本不高的陸媛看起來更嬌小了，前排坐著前《南方週末》總編輯范以錦、財新總編輯胡舒立等一票媒體大老與新聞學者。

那場活動裡，我是聽眾之一。台上的她留著俐落短髮，簡介著自己的履歷：80 後、文科狀元、財新投資新聞部主任，以不合齡的成熟與從容的語速完美地結束演講，當下我就決定要採訪她，作為我中國調查記者觀察的重要案例之一。

第二次見面，是約在北京天通苑的一家咖啡廳。她上次演講的畫面還在腦中盤旋，手裡抓著待會要用的題綱，心臟像是要從嘴裡跳出來了。到了約定的時間，她遲到了，傳來簡訊說「我在醫院照顧我媽，會晚到。」

她像一陣風似的進到餐廳，坐下後從口袋掏出兩根棒棒糖「這請你吃」，說完後她直接拿了櫻桃口味的，說到興起處，她經常放聲大笑或爆粗口，表現山東女孩不扭捏做作的性格。

她回憶報導，是從一個陽光刺眼的下午開始。



她被借調到證監會快滿一年了，平常工作不忙的時候，會約同事在下午打球，休息時，一位被公認鐵面無私的官員直白地問她，某家知名媒體以 IPO 的調查報導敲詐一間擬上市公司數百萬，「這種敲詐方式是不是你們媒體業內常用的？」那一刻，「我感到羞恥。」陸媛還清楚記得那天的場景，就像馬克思說的「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陸媛當下無力反駁，雖早有耳聞，但缺乏證據，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於是，她暗自決定要曝光這條隱匿的灰色產業鏈。

中國內需市場快速運轉，帶動 IPO（企業首次公開募股）市場沸騰，充沛的工作機會與現金，讓創業者自信地高喊著要以「中關村精神」取代「矽谷精神」，每家新創企業都想著，誰能跨過這道坎，就可能是下一個馬雲或雷軍。

陸媛形容，企業 IPO 是「鳳凰涅槃」的過程，競爭對手、內部紛爭都可能在此時透過媒體檢舉，而中國證監會又規定「凡舉報投訴必查」，一些隱匿的消息暴露，股價打折，或是因此上市夭折，就算本身沒問題，證監會調查通常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也會延後上市的時間。

一些媒體與財經公關趁虛而入，想分一杯羹，「新創上市企業花費的此類額外費用平均 600 萬元左右，」一位證監會的官員對陸媛說，「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追究起可以入刑。但無人追究。」

這條灰色利益鏈條是終極目標是讓媒體封口，保證在掛牌前沒有負面消息，從招股說明書公告到掛牌上市的一個多月，是擬上市公司最緊張的一段時間，根據證監會規定，企業上市前需要在在至少一家指定的媒體刊登公告，但行業裡的潛規則是，規定的四家證券報都要刊登，而且至少投放 20 萬元廣告。

發生在盛景山河的遭遇，讓擬上市企業更忌憚媒體。在掛牌交易的前一晚酒會上，盛景山河董事長剛致完詞就被證監會叫去詢問，第二天，上市計畫擱淺，原因是《每日經濟新聞》在這天刊發三個版的報導質疑其財報造假，此後兩次重新提交上市計畫都遭到否決，退還所有募集資金。之後，擬上市企業願意不惜一切代價平息負面消息，若遇到媒體勒索，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

雖然不少被勒索企業對媒體恨的牙癢癢的，但陸媛卻說「最難的還是說服他們說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要心理，讓他們紛紛拒訪。為此，陸媛不只一次展示她的決心「我跟他們說，我要很認真的、嚴肅的進行報導」，才讓一些交往已久的朋友願意坐下來談，但心情還是猶豫，一家上市公司老闆怯怯地問「我做的是一件好事嗎？」他因害怕被報復要求陸媛匿名。

通常，企業在披露上市訊息的那天起，就是惡夢的開始。「一天要接五六十個電話，直到公司順利掛牌」，一家製造業的董事長秘書說，處理負面報導的事非常棘手，公司必須派專人負責，每通電話都要錄音，摸清對方職務，分析負面材料的真實性。

因為處理過程繁瑣，財經公關應運而生，成為灰金鏈條上重要一環。確定財經公司後，擬上市公司必須先支付一筆 15 萬到 40 萬不等的顧問費，之後財經公關會提交一份媒體覆蓋規劃，一般分為兩輪覆蓋，「財經公司第一輪媒體覆蓋費用就要 400 萬元，稱已圈定 20 家媒體投放廣告」，但專案完成後，財經公關沒有質實的評估指標，即使「有 8 家寫了負面報導，財經公關就會說他們投了另外 12 家媒體，工作到位。」

所有的廣告合約都是媒體和財經公關簽，「財經公關只開一張大發票，給企業入帳。」陸媛說，企業看不到原合約，無從監督，而且財經公關會在接洽時就聲明無法做細帳，不少企業抱怨「給他三百萬，花哪去，我也不知道。」如果企業在此期間發生負面事件，危機公關的費用要另外計算，在中國危機公關就是撒搞，「某家企業被曝出許多負面新聞，最終花了 1000 多萬來抹平」，陸媛轉述某投顧銀行總經理的說法。

即使早有心理準備，但報導刊發後一週，陸媛接到上百個來自上市企業、證券公司、媒體、財經公關公司的電話，無論喜怒，每個都很激動。曾經的新聞同業轉作財經公關的打電話罵她「你這是在砸我飯碗」、「你嫌我們手髒」等等。

直到有個證券報的記者朋友告訴她「以前在收到擬上市企業的廣告前，我們都要做一篇批評報導，今年，總編輯突然說不寫批評報導了，不然就涉嫌敲詐了。」陸媛聽到後，覺得自己的報導終能促成一點點改變，但接下來這位朋友的話，再

次把她拉回現實「我們做媒體的，也要生存。」



「媒體不能依賴廣告」，陸媛得出結論，卻也想不出更好的商業模式。當無可奈何的情緒，還在胸中鬱結，胡舒立認為正是媒體先前的旁觀態度，才讓「有償沈默」愈演愈烈，財新順著財經公關的業務繼續追查，半年後刊發《刪帖生意》，揭露灰色產業鏈的另一角。

王晨調查發現，刪帖生意成為一條由公關公司、門戶網站中高層，甚至部分監管官員裡應外合聯手操縱的灰色產業鏈。

刪一條負面新聞要幾千上萬元，屏蔽關鍵詞收費高達百萬元。雅歌時代的總經理顧文達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刪帖公司，他的客戶既有企業，也有政府官員，公關公司可以雇用駭客攻擊網站，把帖子刪掉。但這種手段只對小網站有用，對百度、新浪這種大網站，他們大多通過收買網站編輯或中高層。如果實在找不到關係，他們會通過發大量軟文，把負面訊息擠到後面，常常「一晚上不眨眼，在不同的論壇發 100 個帖子。」一名員工對記者王晨供述。

刪帖是門好生意，雅歌時代光是 2011 年毛利就高達 5000 萬，有業務員為賺取巨大利潤不惜鋌而走險，私刻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公章，偽造通知要求網站刪帖。甚至，雅歌時代還有固定的合作夥伴千龍網，承包該網站版面轉發企業負面新聞，直到企業付錢才給刪除。

逃開「逆選擇」困境

一年內，接連發表三篇「有償新聞」的報導。我問陸媛，財新為什麼要這麼做？維持財經記者的思考慣性，她幾近反射地用了經濟學裡「逆選擇」概念解釋「劣幣驅逐良幣」的道理，當社會中記者信用破產，讀者沒有理由相信單一記者的道德水平有可能高於平均線。

她忍受不了，當她採訪時受訪者調侃地說，你們記者天天搞敲詐報導；或是有企業私下問她，宣傳報導一篇要多少錢？「我也不是為了掙錢，就是覺得做記者有點意思，在這行業工作有榮譽感，」當一切堅固的意義，都煙消雲散了，她

說「那也不知道奮鬥的目標是什麼了。」



對胡舒立來說，還有魯迅式「怒其不爭」的憤怒，她的前部下趙何娟了解她「對舒立來講，錢不是她關心的，她一直想做的是當新聞業的自淨器」，提昇中國新聞業水平。

原本，財新和胡舒立，理應獲得中國新聞記者乃至社會最大的尊敬。但是，2013 年底傳來消息，財新傳媒的原掛靠單位浙江日報集團，因財新傳媒連年虧損，欲拋售手中四成的股權，正好由引進《中國好聲音》的華人文化產業基金(CMC，China Media Capital) 接手入場。

資本與管制，是中國新聞業普遍的悲哀。胡舒立的前部下羅昌平在微信推送滿是無奈的文章，題為《財新又新，舒立何立》，他感嘆「在這片土地上，高質量的新聞未必能賣出好價錢，卻要承擔巨大的風險。」

資本的鏹鏹，讓中國調查記者的舞步，變得更蹣跚、沈重了。

在路上，指向前方



一 網路會是記者突圍的出路嗎？

互聯網來了，會是為記者指路的北極星嗎？

這句提問，首先在北京鬧區裡的溫特萊中心 16 樓引發爭執聲。

「年輕有為」的記者

灰白磚牆砌出《財新》編輯部空間，走廊裡，鞋跟敲出的急切腳步聲預告著胡舒立的到來，跟在後頭的是高級記者趙何娟，剛結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工作，返回北京。她和胡舒立都有著獨特的輪廓，看上去個子小小的，氣勢卻同樣張狂，邊走邊嚷著「我要在財新做科技博客。」

但在兩年前，她還不是這樣子。

鎂光燈閃個不停。不到一米六的身高，站在能容納數百人的國際會議廳的舞台上，讓她更顯嬌小，財新高級記者趙何娟此刻的手心出汗、吞嚥著口水，怯怯地說「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演講，有不懂的地方，再麻煩妳們提問」，台下坐著近百位全球頂尖調查記者，而她是唯一被邀請為演講嘉賓的中國記者。

這是 2010 年國際調查記者大會的現場，剛才上台演講過的有，來自英國的戰地記者講述如何深入敵營；拍攝人口販賣過程的巴基斯坦記者，展示他間諜級的攝影器材，還有一張張醫生奸笑數錢，護士幫忙倒提嬰兒腿的照片。

趙何娟剛以《電信戰非洲》拿下 Diageo 盃非洲最佳商業報導大獎，環顧四周，受邀的調查記者多在 40 歲左右，50 歲以上的記者也不少，她注意到，坐在角落有個身材纖細、戴細框眼鏡的亞裔男子，事後知道，他是《中國經濟時報》的首席記者劉建鋒，不過看上去也比自己大了十歲左右。



趙何娟是全場年紀最小的記者，那年，她才 29 歲。

為她贏得入場券的調查報導，是深入衣索比亞、尼日採訪一個多月的成果。她發現華為與中興壟斷非洲近九成的電信設備供應市場，是因為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兩家國有銀行提供豐厚資金，使得他們可以開出優於西方競爭對手的報價。

報導中稱，2005 年衣索比亞要發展電信產業，最大的難題就是沒錢，當時中興得標，就是因為國開行提供 15 億美元貸款，協助衣國電信基建工程，也為中興換得 13 年的長期合約。此種發展模式，成為華為、中興進軍非洲的縮影，光是 2009 年，國開行就提供華為 300 億美元與中興 150 億美元的出口貸款額度，隔年，中興就順利拿下尼日的大型電信系統訂單。

中非的關係型貸款，為華為、中興屢次贏得非洲多國政府招標，甚至，肯亞政府未公開招標，就直接指定中興承包，即使中興開出的設備價格是市場兩倍。緊密的政商關係引來不少爭議，其實，中國早已是 WTO 會員國，不允許違反公平貿易原則，歐洲最大設備商阿爾凱特朗訊（Alcatel Lucent SA）總裁阿道夫（Adolfo Hernandez）曾公開抱怨「出口貸款哪裡都有，但中國不一樣，因為它們規模都很大。」但中國仍不以為意，一位進出口銀行的國際部業務對趙何娟說：如果有歐洲公司能提出理由充足的控訴，那就去向 WTO 提出申訴，「但截至目前，沒有一件申訴成功的案例。」

回到舞台上，她將報導過程介紹一遍，語畢，定定看著底下的觀眾，停頓三秒，他們報以最熱烈的掌聲回應，趙何娟直到這時候，才算鬆了一口氣。

「你們會經常被抓去關嗎？」會後的交流時間，一堆記者圍著她問，她的回答大多不精確，因為，她不知道該如何向國外同業解釋，中國的審查沒有他們想像中的危險，但仍然很危險。還有些問題是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像是「你怎麼這麼年輕就當上中國著名的調查記者？」

發問的記者對趙何娟的印象很片面，大概只是因為大會發的手冊，就是這麼

介紹她的，還有財新會固定把記者的報導翻譯成英文放在網上，他如果用「趙何娟」的拼音上 Google 搜尋，也的確能搜到許多趙何娟做過的報導。



「本來被說是年輕有為，應該是很驕傲的事，但我在那個情境下，就只覺得很羞愧」，趙何娟覺得這也是中國新聞業的羞愧，中國記者比起西方同業普遍年輕又浮躁，沒有經驗累積或思想厚度，此一落差就明顯表現在她與普利茲得獎記者大衛（David Barstow）的談話上，「你不覺得中國太沉迷於宏觀經濟的數字上嗎？」當大衛問起，趙何娟只能像個乖學生一樣地點頭。

這種內向的憤怒，跟著她回到中國，和胡舒立簡單交代後，她再次提起行李箱，飛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進修。

瀰漫的危機感

自從 1912 年報業鉅子普利茲捐款成立以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就一直遵從他的遺志「將新聞視為最崇高的知識份子的職業，以實踐的方法教育現在、將來的從業人員」，貼近新聞實務的訓練，讓趙何娟一進學院，就能感受到美國報業普遍的危機感。

2011 年，《紐約時報》搭起「付費牆」（Pay Wall），《美國線上》（AOL）以 3.15 億美元併購網路原生報《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佈的美國新聞業報告中也指出，這一年讀者使用網路獲取新聞訊息的比例遠遠超過報紙，而且報紙的網路版廣告金額也首度超越印刷版面。

「我能感受到瀰漫美國全新聞業的危機感。」進修期間，哥大新聞學院增加了許多社交媒體的課程，每週一次的業界交流，《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大西洋月刊》都在介紹自家媒體的新媒體實驗，趙何娟總結那段求學時光「還是挺受震撼的。」

趙何娟急了，2012 年初春回到中國後，她就成天追在胡舒立後頭，要她做些新媒體時代該做的事。其實，趙何娟也沒想多大的改革，原本她想模仿《華爾

街日報》AllThingsD 的做法，一個由報社知名科技記者莫斯柏格 (Walt Mossberg) 主持的科技部落格，她盤點過財新與自己的資源，分析道「財新有比較公認的品牌，然後我本身在科技領域還算是比較知名的記者，我覺得這種嘗試是可以在財新來做的。」



胡舒立卻不這麼認為，或者說，中國新聞業普遍都不認為報業的危機會這麼快發生。因為，中國市場化媒體發展大約落後歐美十年，而且，中國對網路服務供應商又有嚴格要求：不得自採新聞，因此，入口網站和微博都必須依賴紙媒提供內容。種種因素，即使最悲觀的預測者，也只敢推斷美國報業的衝擊在中國上演「還要五到十年」。

中國經濟維持高增長，遍地都是普利茲獎題材，新聞業似乎沒有理由悲觀，更何況胡舒立還是「內容為王」的虔誠信徒，只要能寫出精采的調查報導，讀者自然會掏錢來買。而這種論述也出現在她當年一次對新聞系學生的演講中「只要你辦的好，而且持之以恆，通過網路傳播，你就可以迅速地被注意到，而且是持續地得到關注。」

在她眼裡，網路是助力，怎麼會是衝擊。

胡舒立不能理解趙何娟的擔心，甚至有些生氣，畢竟她是胡舒立最看重的記者之一。29 歲就被破格拉拔為高級記者，而且是財新薪資最高的幾位記者之一，更何況胡舒立還為她出書，並送她出國進修，原本希望學成後能多投入在調查報導上，現在卻整天吵著要胡舒立授權給她做新媒體，終於忍不住抱怨「你這麼胸懷大志的人，怎麼會去做這麼小的事？」

趙何娟也不好受，他迫切地感受到微博正嚴重衝擊新聞業，由微博主導了新聞議程，而記者只是微博的抄錄人，「把某某人在微博上說了什麼，拼湊成一篇文章」，她正色向我強調紙媒「質量在下降，影響力也在下滑」，因為，報紙原本是信息壟斷下的產品，但在網路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內容發佈者」。

智慧型手機在這年突破性增長，也同樣讓她擔心。中國社科院的新媒體藍皮書指出，2012 年中國智慧型手機用戶淨增 1.26 億，達到 11 億戶，正式超越電腦

成為中國人數最多的上網終端設備。根據美國報業協會 2013 發佈的報告，美國的報業廣告收入在 2007 年快速下滑，這年正好是 iPhone 發佈的年份，而中國是 2012 年智慧型手機大規模普及。



「變革的來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趙何娟想起她在哥大時美國同業對她說的，於是，她在 2012 年 10 月毅然辭去財新的工作，在個人微博宣布籌設「鈦媒體」，鈦，是「Tech」諧音，也是宇宙金屬，耐熱抗腐蝕，象徵媒體永恆不變的獨立性。

回過頭看，她創業時間點挑的精準，因為中國社科院的傳媒報告顯示，自 2012 下半年起，中國報業廣告收入平均下滑 20%，這是從未見過的負增長，連趙何娟也感到意外，「我原本估計（報紙）大概還有兩到三年的時間，沒想到就只有半年。」

用戶核心的思考

趙何娟選擇科技博客創業，也頗符合「國情」，因為中國政府僅對網上批評時政的言論管控較嚴，且中國瓜分網路版圖的四大門戶新浪、騰訊、網易、搜狐，皆屬於民營資本，即使科技類的電信產業仍屬於國營資本，也是所有國企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一支，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產業是最早能夠市場化，和最容易嘗試新媒體創新的。」

趙何娟向我介紹鈦媒體的團隊，由「內容與技術各佔一半，總共是 12 個人，」她要求編輯要當「全能記者」，能寫能編還會攝影，儘管編輯三頭六臂，但人力比起動輒百人的大編輯台，不免有些吃緊，因此，她結合網路時代最熱的「群眾外包」與「業餘精神」，讓「過去的採訪對象，他們自己來寫」，例如中國著名的新媒體觀察家魏武揮，就是鈦媒體的專欄作家之一。

中央廣場、歐式建築、露天咖啡座，我在北京頗具異國情調的藍色港灣首次見到趙何娟，那是 2013 年夏日裡的一天，她先是興致高昂地介紹鈦媒體上線一年多的成績，「用戶增長穩定保持了一定水平，日均訪問量增速明顯，」接著，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作祟，話鋒一轉，又說「我已經對用戶需求做了一個多月研究。」

預告鈦媒體將在 10 月份有一次大規模改版。



她談到網路的三個核心：用戶、數據、服務。網路即生活的時代裡，訊息已經無處不在，媒體不再可能實現販售訊息賺錢，用戶才是網路創業的核心，創業者必須清楚知道「你的用戶是誰？特徵是什麼？你能給用戶提供什麼服務？」思考轉型階段，她每天都問自己這三個問題。

「你只有先去做互聯網公司，才能承接媒體的價值。」她像是得到神啟般做出結論，想起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與她交流的媒體人都把 LinkedIn 視為行業的潛在殺手，頗有當年梅鐸批評 Google 是小偷的影子，不過，LinkedIn 是一個美國的求職網站，她當時想不懂求職和新聞的關聯。

現在，她想通了，「無媒體不社交」是她總結的未來趨勢。鈦媒體隨時發佈最新的產業趨勢，面對的用戶是科技產業的經理人或是對科技產業感興趣的讀者，求職又是他們最企盼的服務，鈦媒體改版建立「找到」、「讀懂」、「分享」的一站式服務，用趙何娟的說法是「讓用戶都為自己代言。」

比較鈦媒體與 LinkedIn，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鈦媒體多出了「讀懂」的欄目，看似平凡的設計，卻隱含著趙何娟的一個心願。

「我必須承認，無論在哪個時代，深度調查都會有價值，」她在改版發刊詞寫道「鈦媒體在未來三年，希望匯聚中國最優秀的調查記者。」至於商業模式，她也想清楚了，這批記者要靠「供養」的，她解釋「是通過鈦媒體的商業化來支持資深的調查記者進行報導」。這項構想，是延續她賴以自豪的新聞價值，她一再強調「這是我一直想做，而且想堅持做的。」

淘寶網賣新聞

於此同時，劉建鋒也在嘗試新媒體。

自從兩年前他辭職後，就一直待在北京六環邊的《中國經濟時報》宿舍樓裡，那是個普通的郊區村落，附近只有一家雜貨店，用劣質的噴繪廣告掛起招牌，宿

舍樓是六棟相鄰的四層樓建築，而劉建鋒與妻小住在其中一戶兩居室裡。



七月的一個深夜，他坐在電腦前，字斟句酌、反覆修改，最後按下「發佈」，在微博說明他辭職的理由「技術與新的市場形式為去政治化、非商業化的小調查機構提供新的生存方式，三四人的團隊組建中，已明確要做什麼，怎麼做。」

他想成立一個與美國 ProPublica 類似的公共調查機構，我在 2012 年冬天見到他時，他還說「我準備過陣子去香港找資金，可以的話，就在香港登記。」這是異議者慣用的方式，把辦公室設在香港，以躲避中國的審查制度。

再見到他，是一年後的初夏，他因為籌資不順利，有些意志消沈，「我自感籌資無望，不得不放棄這個計畫」，但要他完全放棄獨立調查，也心有不甘，我曾和他過介紹台灣 Wereport 嘗試的眾籌新聞模式，原本無意義的閒聊，卻在他心中種下一顆種子。

不久後，他在微博透露新的想法「通過眾籌，實現自己作為獨立調查人的公共存在。」那場交流，促使他關注眾籌新聞模式。

關於眾籌新聞 (crowd-funding)，美國已有諸多嘗試，而且成績不俗。如美國自由撰稿記者 David Appel 在部落格呼籲讀者支持他的調查報導，因而揭露糖商雇用說客讓國會議員刪除 WHO 捐助預算的醜聞；前美聯社記者 Christopher Allbritton 也透過個人部落格募資，以進行伊拉克戰爭的第一手報導。不過，2013 年最耀眼的眾籌項目，來自 NPR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記者走訪世界各地，追蹤一件 T 恤從棉花到銷售的全球之旅，並以影像、照片、文字、圖表的多媒體形式呈現，14 天的籌款期內，獲得超過兩萬人共計 59 萬美元的支持，是籌款目標的十倍以上。

2013 年 7 月，他通過微博和部落格，貼出了一個《獨立記錄者誠徵後援》的計劃書，稱「我準備以獨立記者和社會問題觀察者身分，用獨立調查的手法，選擇一些制度問題、重大公共事件、爭議新聞人物以及重大內幕進行報導，一年完成 4 到 6 個選題。」



他開設一個淘寶店鋪，以 100 元為單價，出售總計 2500 份優先「閱讀權限」，「100 塊錢，也就是現在看場電影的價錢」他說。

意外地，這項計畫受到極大迴響。寫作計畫發佈十天後，就達成 11 萬元籌款目標，至 2013 年 11 月，募得資金 20 萬元，足以滿足一年基本生存與調查經費。不過，他沒有公布選題，「根據多年的媒體經驗，調查的選題是不能提前大肆張揚的，否則可能遭到干擾。」劉建鋒說，購買者在購買「閱讀權限」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將來收到什麼報導。

10 月中旬，劉建鋒署名「獨立調查記者」的第一篇報導〈平度超限戰〉已經出爐，主題是《新世紀週刊》記者陳寶成山東平度老家的「七年拆遷戰調查」。8 月，陳寶成因老家被拆與怪手司機發生衝突，要求對方等警方到現場後才準離開，警方到場後卻以「非法拘禁」怪手司機為由拘捕陳寶成，至今未放。

劉建鋒多次走訪平度，以平實文句陳述地方官員與陳家人對拆遷事務的長期對壘，此文公開後，《民主與法制》雜誌記者轉發推薦說「拜讀之後，最大的感受就是冷靜、理性、客觀。」

「都想嘗試一下」

微博上，羅昌平也稍來關心，稱劉建鋒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其實他二人並無深交，羅昌平的留言，更多是出自惺惺相惜的感情，因為，他也在嘗試新媒體。

5 月下旬，羅昌平瞥見這陣子頻繁見諸報端的「中國夢」，他想起前陣子也看過一部跟「夢」有關的電影，「既然是做夢，那就做大一點」，電影《全面啟動》中，演員說出這句對白時，手上的機槍換成火箭筒，直接砲轟對手。

他也在造一個夢。

去年 12 月對劉鐵男實名舉報後，陸續收到不下 30 家媒體的採訪要求，為了還人情債，他說「我接受過幾家媒體採訪，結果發現，他們要嘛不準確，要嘛就不完整，後來我在想，我乾脆自己寫吧。」5 月份，他與網易簽了獨家協議，將他這次實名舉報全過程記錄下來，在網易「真話」連載，還為自己的專欄取了個《打鐵記》的名字，來自「打鐵還需自身硬」這句老話。

與網易合作的背後是兄弟相挺的義氣。「我談過幾家（入口網站），他們都不想談，只有龍志說願意。」羅昌平生於湖南，中國最盛產調查記者的省份，鄧飛、龍志也都是出生於此，北京新聞圈稱他們是「湖南三虎」。

在北京追逐同一個碎夢，他們懂得要勉力前行，「他提供我很好的獨家版權」，後來，羅昌平想把這產品放到更多的平台去販售，「他也沒跟我說分成什麼，只叫我『那就嘗試一下吧！』」羅昌平說。

龍志則在網易的「真話」開啟嘗試。這個 80 後青年，經常戴著棒球帽，似乎要遮掩他因長期調查而日漸稀疏的頭髮，喜歡讀魯迅和巴金的小說，尤其愛巴金那句經典名言「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在中國的文宣規律下，即便調查記者用盡氣力發出的報導，也是在層層審查下的產物，而人們認知的世界，始終被遮住一角。「我想要呈現多樣化的真實」，龍志邀請調查記者和維權律師在「真話」開設專欄，寫他們的調查歷程，或在網上直接交流，「網民有什麼疑問，直接問他，根本不需要記者採訪。」龍志的作法，也巧妙規避黨國的要求。

袁凌就是羅昌平為他找來的專欄作家。

當〈走出馬三家〉發表後，雜誌刊號被禁，袁凌得以抽空搭趟高鐵旅行中國，也順便整理這陣子紛亂的情緒，「當列車穿過鄉村，你是沒有印象的」，他在那秒明白，自己始終是個貼近底層的寫作者，回北京後，他對羅昌平說「我想讓自己的文字離新聞遠一點，離熱鬧遠一點。」

不管未來刊號如何？紙媒何在？袁凌進入不惑之前後，決心為自己完成一

次轉型，他希望自己是歷史的寫作者。回首二十年的採訪歷程，屢次躲過死亡的囓齒，他是倖存者，也是見證者，這次，他要回顧《我親歷的九十九次死亡》在網易連載。



新聞的兩項責任，一是影響當下，二是記錄歷史。既然，記錄歷史可以由調查記者的手記，還原大量報導細節所完成，龍志也想做到，影響當下。

我發現每當重大突發事件時，「真話」頻道上會有個「真話哥」的網民傳來第一手的現場消息，當我問起，他臉上閃過少見的猶豫，壓了壓帽沿說「這個角色，其實不太好說，因為我們現在被盯上了，所以我對外的說法是，一個網友自己做的。」

騰訊，作為主要的競爭品牌，當然也要有類似的新聞產品。

賈葭擔任主編的「大家」，要在海量的信息裡淘金，或者，用他更準確的說法是「要做最好的中文評論媒體。」

《大家》與一般 UGC 網站不同，採「邀請制」，只邀請華文世界最高水準的專欄作家，而賈葭做過影視編劇、《GQ》主筆、《鳳凰週刊》資深撰述和《陽光時務》副主編，多樣化經歷反而有助他邀集中港臺頂尖作家加入，如台灣中正大學教授羅世宏與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張鐵志。

僅上線半年，《大家》就編發了 1400 多篇獨家專欄文章。這些文字，是中文網絡世界裡最熠熠生輝的部份，如專欄作家連岳與《中國時報》記者朱建陵辯論「何為自由主義？」，還有香港作家柴子文與連清川針對「香港公民權」的再思考，都是中國報章雜誌中少見的評論主題。

不僅文章主題游移在言論尺度，其實，騰訊獨創的評論頻道，早已進入中國互聯網管制的灰色地帶。對此，賈葭僅簡單向我說明，「主管機關在問的時候要說是個名家博客，」他們小心翼翼地設計過，「每篇文章都跟著一個 blog 網址，他們要檢查時，我們可以說這是名家博客嘛。」賈葭笑著說。

他談起網路趨勢，臉上滿溢自信，「騰訊用戶量達 7 億，幾乎是全國人口的一半，它的影響力是遠遠超越傳統媒體的。」但問到他對《大家》的長期規劃時，卻換了一種悲觀的語調，說「我沒有太多願景，這是朝不保夕的啊！」他邊嗑瓜子邊說「我們有七八個編輯在後台做編輯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就是處理那些危險的言論。」

網管辦不斷在適應學習，光是以微博來說，他們就創建了過濾關鍵詞的三層監控系統。第一層利用相關技術搜索被封殺的關鍵詞，第二層以人工審查擬發表的內容，第三層則由工作人員追蹤當前事件，改進並更新封殺的關鍵詞名單。

對付賈葭的方法雷同，互聯網高層流傳的一份內部通知說，任何「有害」的信息一旦貼出，必須在五分鐘內刪除。賈葭的團隊也經常接到一些要求刪除稿件的指令。

黨國最有效的控制方法，還是維持恐懼的慣性。管理網路的機關很多，有國信辦、公安部、工信部，還有北京網管辦，「在國家眼裡，媒體是分分鐘可以被滅了。」恐懼滲透到內心，每個人都是自覺的審查者，心裡就住著小中宣部。

在網路尋求言論的邊界，成為這一代新聞人共同的任務，「在我具體工作中，盡可能讓比較新鮮、非主流的觀點出來，但我心裡很清楚，絕不能讓黨國不喜歡的觀點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

前方的路，黯淡未明，匆匆行過的記者，僅能遙望指路的北極星，繼續前行。

訪問羅昌平那天的插曲可做為註腳。

那天，我在明亮的《財經》辦公室裡與他談話，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響打斷，是《南都周刊》的來電，他們表明對《打鐵記》很感興趣，希望將這組文章打包在他們的電子雜誌上架，羅昌平回「我們先嘗試，我就分成，如果你覺得高了，那就低一點無所謂」，掛上電話後繼續對我說，「我又不想掙這個錢，只要能幫我覆蓋到更多渠道，我都想嘗試一下。」

一個月後，《打鐵記》在《南都周刊》上架，也在《拇指閱讀》上架。



自救之路

時不我待，催促著媒體人加快步伐。微信公共帳號，憑藉著粘性、私密和相對寬鬆的審查制度，成為 2013 年最重要的新興載體，《拇指閱讀》是其中代表。

原《21 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的左志堅，現在是《拇指閱讀》創始人，這份以書摘和書評為主的自媒體刊物，上線一個月粉絲數量就過萬，在一篇「玩轉微信」的推薦文章裡，拇指閱讀被稱作是「閱讀領域冒出一顆新星」、「是一個既有趣又有營養的公號。」

創業都源於夢想，「讓愛讀書的人以書會友」是個單純的夢。左志堅介紹自己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如果能在讀書時，與朋友分享筆記或討論段落，該有多好，就是這麼一個簡單念頭，他辭去高薪穩定的工作，再次將滿腔熱血投入創業。

營運初期，他每天在微信推送 800 字的精品書摘，「大概需要一小時來維護和更新內容，」過去的媒體經驗，讓他做起來得心應手「做過新聞行業，肯定對內容敏感，了解什麼樣的內容適合推廣傳播。」

很快地，微信粉絲就過萬了，他也不斷想著該如何轉型。

「千百年來，寫字人都有一個夢想，希望能靠寫作維持體面的生活。」他在一篇《冷看微信自媒體》的文章開頭寫道。12 年的新聞工作，他看到「整個文化產業鏈中，缺乏好的內容生產者，因為大部分利潤都被通路拿走了」，轉型，就必須將眼光拉遠，「希望搭建一個電子書平台，讓從事高質量寫作的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報。」左志堅說。

美國矽谷的車庫精神是「不冒險不會有大成功，膽小鬼不會有大作為。」左志堅聽進去了，這是一次很勇敢的冒險行動。他招了五個員工，花錢請頂尖設計師做 UI（使用者介面）設計，但遲遲等不到融資，讓他一年發不出薪水，甚至想過要賣掉房子繼續做。



幸好，《拇指閱讀》在 2013 年底拿到經緯創投數百萬元的投資，之後，App 也順利在 iOS 和 android 兩大系統上架。

點擊進入《拇指閱讀》，首先顯示動態欄，展示的內容是你關注朋友對某本書的筆記、評論，側邊第二欄是私信，讓你與好友也能私下聊天，大致囊括社交媒體功能；至於，第三欄「書城」與第四欄「書架」，則部分實現左志堅搭建電子書平台的夢想，目前盈利模式靠販售電子書分成與廣告收入。

登山的人都說，「登山者的命運是星星決定的，如果星星在閃耀，那麼他將是幸福的。」左志堅形容創業和登山很像。

西藏啟孜峰，海拔 6206 米，左志堅在 2007 年衝頂時，身體一度逼近極限，只有自己的呼吸聲與心跳聲相陪，衝上頂峰後，四周一片寂靜，偶爾風聲呼嘯，抬頭仰望的，仍是那顆指引的星星。

還有一個人，也走在星星指引的路上，他是許知遠。

他從 2013 年 5 月起擔任一本雜誌書《東方歷史評論》的主編，在出版的基礎上，同時開展歷史沙龍與微信公共號等多層次嘗試。

9 月初，我們約在北京三里屯一處酒吧碰頭，點了麻婆豆腐燴飯配海尼根啤酒，頗符合他中西合璧的氣質，見面那陣子，中國厲行打擊網路謠言，抓捕異議者也特別勤。他給我說了最近編發的一篇文章—「謠言關乎政治」，形式上是《漢代的謠言》一書的書評，其中有兩句「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環境裡，誰定義謠言？眾多史事證明，朝廷不僅有著廣泛的控制權，而且有一個不斷擴大的定義，因此暴君權臣得以用『謠言』的名義去打擊政治對手的言論。」

許多讀過文章的人都會和我一樣，驚訝地問「這能講嗎？」許知遠擺擺手說「也沒有讓你不講，我們第一反應就是可不可以講」，那是因為，人們明確感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威脅，長此以往，每個人變成自我審查者，即使沒有得到明確的警告，自己就先放棄了自由。



「所以我說，個人意志比以往都來的重要」，這個國家還是宣稱有「言論自由的」，憲法裡保障的公民權利，就是提供公民「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的最有力武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教授 Kevin O'Brien 以此角度研究中國公民抗爭的空間，發現中國法制與現實的落差，為公民抗爭提供政治機會。而新聞記者必須帶頭，集中所有的興奮喊出那一句真話，讓後繼者匍匐前進。

「說句實話，沒什麼敏感的，大家把自己嚇死了。」許知遠喝下最後一口啤酒說著。

在黑暗的歷史時刻，總有一群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

耳邊響起《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的旋律，那首 1950 年代美國公民運動風起雲湧的代表歌曲：

「Got my hand on the freedom plow (把我的手放在自由之犁)
Wouldn't take nothing for my journey now (現在我絕不放開)
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 hold on. (把視線投在北極星上，堅持下去)」

這次，中國的調查記者再次擔起行囊，行走在新聞的路上。

採訪後記



完成所有採訪後的半年，3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正當我在書桌前寫論文，我看到一條訊息從電腦螢幕跑馬而過，揭示微信遭遇迄今最嚴重的一次打壓。

將近 40 個微信公共帳號被封。週四清晨，當這些公共帳號的運營者向往常一樣打開微信，會看到視窗彈出訊息：「你的帳號被大量用戶舉報，涉嫌違反法律法規和政策，已被永久封禁。」突然其來，且不容答辯。

總部位於加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彙整了一份名單，有幾個知名的帳號被停，例如：羅昌平、共識網與真話頻道等。值得注意的是，被封帳號中也有信奉毛澤東思想的網站「烏有之鄉」，《紐約時報》研究員安替對此評論，「此次的審查的對象不是某個特定陣營，而是一般化的政治討論。」

北京當局在釋放出訊息：微信不可以變成民意平台。

去年，中國才對微博這類的社交網站進行打擊。今年 1 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說，2013 年微博用戶數量比去年減少了 9.2%，部分降幅即是中國政府打壓的結果，同份報告也顯示，有 37% 的網友花把更多時間花在微信上。

從微博學到的經驗，黨國要把微信「扼殺在搖籃裡」。

曾經冀盼微信公共帳號能帶領突圍的人們，恐怕又要失望了。不過，我認識的這群獨特的調查記者群體，已習慣於擺盪在興奮與失望的兩種情緒中。

描述記者群體，從不是件容易的事，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早說過：「新聞業是惶惶不安的人、貪得無厭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無恥屈服的人最多的行業之一。」

更何況中國調查記者群體，在龐大的母體中略顯微不足道。據統計，截至

2012 年底，中國持有新聞記者證的記者將近 25 萬，但真正從事記者工作的估計超過 30 萬人。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來自中山大學教授張志安的《中國調查記者生態報告》，即便是以最寬鬆的標準來定義，中國調查記者也不過 300 多人。不容否認，報導中介紹的對象多是中國記者的「異數」。



而且，對於中國調查記者來說，好像還不能用「一個群體」來形容他們。在訪問過程中，他們經常互相指責，例如前《經濟觀察報》記者劉建鋒批評他的長官王克勤是「沽名釣譽」；因為《財經》出資者聯辦集團與中紀委的關係密切，讓前《南都周刊》主編石扉客懷疑羅昌平的實名舉報是「奉旨監督」；還有《南方週末》在新年獻詞風波中號召記者上網抗命中宣部的舉動，在財新記者賀信的眼裡也是「過分煽情」。

儘管中國的調查記者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信徒，但在曾獲哈佛尼曼獎學金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曹海麗眼裡，兩者還有很大差距。「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前提是獨立性」，曹海麗強調記者必須獨立於黨派與組織，接著才是一連串的新聞採訪與寫作技巧，她也承認這在中國很困難，因為「媒體不是獨立的，你媒體人也很難獨立。」

扭曲的「管辦分離」制度，讓中國媒體不僅承擔政府的宣傳任務，更多時候還必須努力地打「擦邊球」為報社創造營收。雙頭蛇的媒體，有兩個腦袋，一個腦聽命政府，另一個腦跟隨市場，在這種環境底下，記者難以培養獨立性的性格。

任何客觀的因素，似乎都在佐證：中國不可能建立調查記者的制度。但在長長的訪問中，在他們講述調查報導經驗的某些時刻裡，你還是能感覺到這群人有著獨特的輪廓。

中國調查記者是種「韌性的力量」。他們有憤怒、有理想、務實、自我、討厭權威、不願妥協、重視事實、啟蒙公眾、相信實踐、不相信眼淚。他們像一團悶住的火，急著想點燃改革的火種，但在有權者雷厲風行整飭言論下，他們又是堅韌的草，風吹了就倒，但依然「咬定青山不放鬆」。

歷史不僅是數量和規模所決定，理念和個人更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我

特別喜歡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段話：「不要否定一小群努力想改變世界的人所展現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能真正發揮作用。」



他們終究是記錄者，不是一名行動者，或許讚嘆行動的力量，但又知道自己難成為其中一員。他們都對政權不滿，同樣期待著更美好的社會，但中國調查記者只願意當個描述者，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但胸中又懷拽著一份「理想」，在政治機會來的時候，把言論空間推的更遠一些。

不過，「理想」不是茶餘飯後拿來聊天的材料，我在訪談中發現，他們特抗拒「新聞理想」這個詞，就像《南都周刊》主筆季天琴誇張地說「聽了就倒胃口」。更多時候，他們喜歡自己像中國搖滾教父崔健《藍色骨頭》歌詞裡的描述：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只要我有筆，誰都攔不住我，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還有什麼工作比這更來興趣呢。」



第二部分 採訪企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報導緣起

調查記者「被」離職

台北到北京，八點五萬公里，航程四小時又二十分鐘。

時空的距離可以計算，但，遺落的心該如何衡量？

炙熱的九月，我踏上皇城腳下的這座城市。彼端的台灣，社會醞釀著「反媒體巨獸」的力量，近萬人走上街頭，不到半年，已經給行政體系極大壓力。

此端的北京，社會一樣躁動。當暴雨重擊北京，被視為中國良心的調查記者王克勤卻失語了。原來，他的「暴雨失蹤者」排版完成，立刻被宣傳部撤下，同時，他率領的調查報導團隊被解散了。

我為了這件事，採訪了王克勤，他說，調查記者就像社會的白血球，少了它，是會生重病的。但這個國家，卻是一步步將自己推向病魔的兇手。

8月，曾報導《甘肅 14 名嬰兒同患腎病疑因和三鹿奶粉所致》，成功揭露毒奶粉新聞事件的調查記者簡光州被迫辭職。他在微博上表示：「東早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所有的悲歌，所有的夢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為那份純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簡光州已經是去年以來第三位辭職的調查記者，2011 年的 11 月，中國法制報導的調查記者楊海鵬離開了《財經雜誌》；2012 年 7 月，因報導「烏坎密碼」、「錢雲會之死」而成名的調查記者劉建鋒，也宣布辭去《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的職務。

同段時間，代表中國輿論監督最堅實力量的南方報業集團，遭遇到權力重組的危機。2011 年初，著名的政論作者長平被徹底驅逐，南方都市報評論部被改

組，有評論員和評論編輯被清除，同年 3 月，南方週末資深評論員笑蜀被休假，2012 年 5 月，深度新聞部主任喻塵被辭退，評論周刊從八個版減到四個。¹長平在被離職時，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說：「我被多次告知不要寫批評文章，如果我同意的話，將會得到更多好處。」²



早一些，中國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劉建鋒也在七月份離開《經濟觀察報》的職務；更早一些，2011 年 11 月，《財經》資深調查記者楊海鵬因上海官方的政治壓力被解雇。

有人說，中宣部對調查報導的管理突然收緊，是為了 2012 年底召開的「十八大」能平穩落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在人民大會堂莊重承諾：「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任何組織或是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當時，這段講話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中國改革派，包含許多調查記者在內，都相信這是新一屆習李政府啟動改革的宣示決心。

《南周》新年獻詞被禁，改革者失望了

但是，1 月 2 日深夜，卻讓懷有改革期待的人，失望了。

1 月 2 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及新年獻詞，在已經編排完成、編輯下班、送廠印刷的過程中，被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度震攔下，宣傳部直接授意時任《南方週末》總編輯的黃燦，親自大幅修改特刊主題及獻詞內容。

1 月 3 日，人們在報攤上見到的《南方週末》，歌功頌德，錯漏百出，2013 年的新年獻詞，從原稿《中國夢，憲政夢》，到編輯部與審查要求「自宮」後的版本《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再到最終出街的宣傳部「強姦」版《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

編輯記者們不堪受辱，從 1 月 2 日深夜就開始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抗議。他

¹ 參考自侯方域，「南方事變」，陽光時務，2012 年 9 月 8 日。<http://www.isunaffairs.com/?p=10133>

² 見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27/china-press-freedom>

們一邊怒罵，一邊貼出新年獻詞的原始版本、審查後的編輯部妥協版本、與最終出街的宣傳部直接修改版本，供讀者比較。而針對《南方週末》事件，輿論壓制力度也空前地大。新浪微博搜尋引擎遮罩了「南方週末」，而關於南方週末的一切討論都一刻不停地刪除。



一天之內，至少 25 名相關編輯的微博被禁言，至少 5 名南週記者被直接刪除帳號，這個數字還在迅速增加。

與《南方周末》希望實現憲政改革夢想的新年致辭相似，《炎黃春秋》的新年致辭認為中國現實制度不符合憲法精神，網站也接著被關閉。

著名作家錢綱也在微博上問：「即使在過去十多年的媒體環境下，南周的十餘篇新年獻詞還能自主發表，為什麼在如今新領導頻頻回應民意、顯示開放和善意之際，還有這種粗暴之舉？」

艱困的新聞自由之路

中國媒體受到的管控壓力始終沒放鬆，間接導致越來越多調查記者辭去他們的工作，加劇了中國民眾對於中國新聞媒體未來的悲觀情緒。

中國著名調查記者王克勤，過去曾以報導《邢台愛滋調查》、《山西疫苗亂象調查》而成為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去年（2012）十月由他領導的經濟觀察報調查新聞部也遭到解散。他在個人微博寫下：「秋涼了，冬的腳步正在逼近。」暗示中國調查報導正面臨極大壓力。

在當前局勢下，中國政府將維持「社會穩定」視為首要工作，而任何負面的報導都被視為不穩定的要素。因此，旨在揭發社會陰暗面的調查性報導被視為「危險因子」，而在發表過程中常常受到各種阻礙。

除此之外，相對高的職業風險，以及相對低的薪資報酬，也讓一個個調查記者離開崗位。如同張志安與沈菲（2011）所做的《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中指出，40%的調查記者「不打算繼續」從事調查性報導，30%的調查記者「不確定」是否繼續從事調查報導，願意繼續從事 1-5 年的調查記者的只有 13% 左右。



前陽光時務主編張潔平也有同樣地觀察，她認為：「中國調查記者30到35歲是個坎兒。」大致上，中國調查記者離開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相對工作付出和職業風險，調查記者的收入待遇和福利保障等物質性回報較低；另一方面，中國從事調查報導遭遇的官方控制越來越嚴峻，調查記者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但是，中國部分調查記者堅持「改變中國」的信念，他們仍然堅持扮演社會中的「有機知識分子」角色。即使簡光洲說「理想已死」，但他仍決心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在微博寫下：「我或許不再是一名新聞記者，但是我希望我會做到以下幾點：拿到博士學位；完成一本關於批判新聞產業的書籍；成立一個『獨立記者』調查計畫的非政府組織，旨在不受任何約束去揭露社會，環境以及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並希望藉此每年能夠在經濟上資助十項計畫。」

不約而同地，劉建鋒也在個人微博上寫著：「未來數年政事變局，獨立小團隊、公共媒體趁勢崛起，技術與新的市場形式為去政治化、非商業化小型調查機構提供新的生存方式。目前，三四人的精幹團隊組建中，已明確要做什麼、怎麼做…」。

中國新聞業調查報導的前景，是充滿希望？還是絕望？這個疑問，存在許多人心中。

第二節 報導目的



自 1992 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後，兩岸經貿往來愈趨頻繁，雖帶來經濟利益的互惠，但也隱含著不可知的風險。

這一矛盾，首見於 2003 年初的 SARS 疫情。也是這一年，開啟台商「春節包機」首航。

那一年的 3 月，台灣發現第一個 SARS 病例，此後近四個月的抗煞期間，台灣共有 346 個病例，其中 73 人死亡。台北市和平醫院因院內感染而封院，約 1300 位病人與醫護人員被困院內，且當年股市、房市狂跌，全國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六百億，至今仍是許多台灣民眾的痛苦回憶。

兩岸交流的風險在 2008 年的「毒奶風波」明朗化。同年，兩岸開放直航之後，無論是台商、台幹，還是陸客、陸生都可便捷地往來於兩岸，往來人數激增，在經濟上的依賴程度也逐漸攀升。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台辦於記者會中公開證實三鹿奶粉有以「維多利亞全脂奶粉」名義銷往台灣作為食品加工，後來，中國國家質檢總局也指出，同一批奶粉六月間曾銷往台灣，數量達二十五公噸。³該事件引起台灣民眾高度關注。

9 月 18 日，行政院衛生署宣布全數大陸奶製品停止販售，直至廠商個別提出檢驗證明。同月 21 日，衛生署宣佈金車公司部分產品⁴使用山東都慶公司產製的奶精（屬植物性蛋白類產品），驗出微量三聚氰胺，經金車公司主動告知，即日起全面下架回收。22 日，檢方查出之前進口三鹿奶粉的台威公司，疑似將大量受污染奶粉出貨給大型連鎖賣場大潤發，而該批奶粉可

³ 羅添斌、鍾麗華、曾慧雯、周敏鴻（2008 年 9 月 13 日）。中國三鹿奶粉，台灣進 25 噸。自由時報。

⁴ 據聯合報 9 月 22 日報導《用大陸毒奶精 衛署：金車 8 產品下架》。9 月 21 日，中華民國衛生署宣佈金車公司生產的「伯朗咖啡」曼特寧風味三合一、曼特寧風味二合一、藍山風味三合一、焦糖瑪其朵三合一、阿拉比卡三合一、法式香草三合一、奶茶等即沖飲料及「easy cook 快煮湯」雞蓉玉米濃湯等八種產品使用山東都慶公司產製的奶精（屬植物性蛋白類產品），驗出微量三聚氰胺，經金車公司主動告知，即日起全面下架回收。這是全球第一回發現中國植物性蛋白類產品摻有三聚氰胺的案例。

能已經被摻入賣場製作的麵包，被消費者吃下肚。



事件持續擴大，衛生署（23 日）晚間發佈的檢驗報告證實，三億食品原料有限公司、汎昇實業有限公司與佳泰食品企業有限公司所進口的都慶公司奶精含有三聚氰胺的成分。由於大陸都慶公司是重要的食品原料供應商，國內許多知名食品廠都向其進口食品原料，影響層面比想像中嚴重，需下架的產品市值恐達十億元新台幣。

乃至最近中國沸沸揚揚的 H7N9 禽流感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4 月 24 日）公布國內出現首例 H7N9 感染個案，患者為一名 53 歲蘇州台商，而上海、江蘇崑山、蘇州是中國 H7N9 重災區，也是台灣大廠投資重鎮，當地台商、台幹及眷屬約 30 多萬人。台灣成為全球第一個中國以外爆出 H7N9 疫情的國家。

當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民眾往來越來越密切，中國成為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對象。上述看似為公共衛生事件，其實背後隱藏著中國新聞自由的權力博弈。

2003 年，被中國改革派稱為「胡溫新政元年」。那年春天對新政府來說，無疑是個短暫的春天。3 月初，衛生部內部開會通知，北京已經有了 SARS，但為了確保開好「兩會」，要對此事採取嚴格的保密，不許宣傳。

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2012）曾撰文批評中宣部管控媒體力度越來越大。在 2003 年抗煞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禁令，有十一天多達 30 多條，甚至對頭版等重要版面上，具體上什麼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標題字號、圖片的規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確規定。

當局封殺有關 SARS 疫情的報導，同時公開地否認北京存在疫情。

4 月 3 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衛生部長張文康說「北京只有 12 例『非典』，死亡 3 例。中國對『非典』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並留下

了最為人所知的名言：「北京是安全的。」⁵



幸好，中國社會有一群人好為先鋒，為挽救更多人性命而勇敢地「違反紀律」。程益中回憶當時，即使宣傳部的禁令鋪天蓋地，「南方都市報還是不斷想方設法突破封鎖，揭露真相，發出聲音。」終於在年底刊出〈非典再現廣州〉，但隨後也遭編輯部門遭到整肅。

在另一起毒奶事件中，2008年9月，《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於以《甘肅十四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為題，率先揭露中國奶製品行業添加三聚氰胺的黑幕，並首次將責任企業之一「三鹿」的名稱公開曝光。這起震驚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令30萬嬰幼兒受害，位列「2008年中國十大憲法事件」之首、美國《時代週刊》「2008年全球十大新聞」，退一步想，如果當初沒有簡光洲的報導，則不知會有多少無辜嬰兒受害。

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新聞體制，都有權力高度集中的特點，對權力者的監督歷來就十分困難。不過，中國媒體歷經商業化轉型過程，使得傳媒市場發生很大變化，市場力量帶起專業主義在中國新聞業的討論。雖然，市場力量並未獲得充分發揮，仍然受制於國家力量的介入，不過，儘管當政者仍然期望掌握言論，但是像以前綿密的言論控制方式，成效卻已經大不如從前（王毓莉，2007）。

中國傳媒被認為要扮演「輿論監督」的角色，而調查報導就是中國記者用來體現官方對新聞業要求，並樹立其自身形象的報導文類。中國共產黨（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從第十四屆（1987年）開始，就在總書記的報告文，出現「輿論監督」一詞，至十八大（2012年）已經連續援用二十五年。

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在「輿論監督」的口號下醞釀發酵，讓越來越多調查記者不甘於被控制，反而採取「打擦邊球」的報導策略，一面推進新聞自由，一面加大監督力度。

2010年兩會期間，時任湖北省長的李鴻忠接受京華時報女記者提問時，

⁵ 參考《陽光時務》。〈非典十周年祭－Keep Clam and Get Ready 健康源於好制度〉第四十五期。

因不滿記者提問鄧玉嬌案，拒絕採訪並搶走女記者錄音筆離席而去，此舉引起各家記者公憤，發出要求李鴻忠去職的信件，不到 48 小時及連署破千。三年後的 2013 年 1 月初，因廣東省委宣傳部度震修改新年獻辭，引起《南方週末》編輯記者集體抗議。



近三年來，中國記者集結抗議力量，以微博作為主要傳播平台，與管制官方互相博奕，可謂風雲激盪。新年獻辭事件後，中國記者挺身要求編輯自主，港台知識分子也發起「關於罷免廣東省宣傳部長度震的公開建議書」連署活動，為中國新聞自由請命。

中國調查報導在特殊政治背景下成長，但監督的對象不能及於政治高層。於是，調查報導的選題集中於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諸如近期的毒奶粉與地溝油。而這些選題又與台灣民眾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應對中國調查記者的生存狀態與新聞自由投之關注。

本研究目的除了關注調查記者的生存狀態，黨國如何控制記者？透過什麼機制？此外，也試圖勾勒中國調查記者如何自處？如何運用網際網路，發展個人突圍策略？在網際網路中反抗的空間有多大？又有什麼新的限制？

第三節 報導背景



1978 年改革以前，中國記者像是半個政府機構工作人員，黨用一種政治控制的方式將他們納入黨的體系，成為黨工作的一部分（Wu, 2000）。國家補貼媒體，黨的媒體獨佔讀者市場（Zhao, 1998）。當時，記者擁有很高社會地位，以黨的喉舌的形象出現（de Burgh, 2003）。

1978 年底中國政府批准新聞媒體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逐漸以廣告收入取代財政撥款（羅世宏，2012）。此一政策出台，讓所有傳媒必須「自負盈虧」，推行「一元體制，二元運作」⁶的目的，一來是為了讓傳媒能成功吸納市場利益，並同時免於市場化可能帶來的黨的政治控制的弱化。因此，為求生存與經營，中國大陸的傳媒紛紛走向「貼近群眾生活」的經營方向，開始走向「商業化」發展（王毓莉，2008）。

1980 年代的改革，給中國新聞界帶來了一定的自主空間，同時，記者也喪失特權（Pan, 2000）。因此，記者對專業主義的訴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一種追回特權的行為（童靜蓉，2006）。新聞記者有追求新聞自由的本能，以及對職業角色重新定位的需求，於是推崇新聞專業主義，這種訴求給予他們一種在為公眾服務的感覺，並在公眾面前樹立相應的形象。

對媒體機構而言，他們必須區隔於過去作為黨的喉舌與宣傳機器的角色（He, 2000）。在市場壓力下，媒體必須迎合廣告商以及大眾的需求。為了得到讀者的認可，他們則要盡力地試圖迎合人們的口味來構建一個能被公眾更快接受的形象。推崇新聞專業主義，比如「追求真理」、「幫助公眾」，以及「反映社會黑暗面」這些受到公眾歡迎的話語，實際上被媒體機構用作一種佔有市場的策略（童靜蓉，2006）。某些市場化報紙已經證明，發展調查報導能夠在市場取得勝利。

傳媒商業化起於 1978 年，1992 年鄧小平南巡發表「南方講話」⁷之後，媒

⁶ 按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的說法，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為國家所有制，二元運行就是既要國家撥款，更要利用國家賦予的權利，去獲取廣告利潤。

⁷ 鄧小平 1992 年初南方講話的重點是，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時機，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姓資姓社」的問題。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將「改革開放」「擴大市場化」的發展原則進一步確立。

體加速商業化發展，中國報業結構於此開始調整，透過「週末版」、「擴版」與「兼併子報」三個階段的連續邊際調整而成（陳懷林，1999:12-13）。許多原本虧損的黨報，頂著原有報紙的刊號兼辦晚報與都市報等子報，扭轉黨報的形象。例如：南方周末，即是黨報南方日報的子報，1990年代開始發表許多長篇調查報導，改變該報的形象。

中國媒體發展調查性報導也受到黨中央的支持。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輿論監督」的新概念。當媒體機構與記者有商業化與專業化的需求，中國共產黨同樣對調查報導有需求，因為共產黨必須控制逐漸失控的地方政府與指出貪腐的官僚，因為這些問題，將衝擊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Zhao, 2000）。

中共從十三大到十八大，從趙紫陽⁸到胡錦濤⁹，再到習近平¹⁰都強調中國傳媒的「輿論監督」角色。甚至，200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出台，將輿論監督列為十種反腐敗與監督機制之一。但是，馮建三（2008）認為，中共目前仍堅持傳媒是黨的喉舌，而輿論監督的出現，一方面是基於現實壓力，也來自黨政中央的主觀意願，輿論監督只是黨政行政權力的延伸。

中國的新聞輿論監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黨性原則，發揮社會整合功能。此一工作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落實，中宣部被視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監控所有出版宣傳體系，給予媒體出版指令，並進行出版審查（Brady, 2006）。迄今，中宣部掌握中國宣傳系統半世紀，仍堅持媒體是黨的宣傳工具，黨領導報紙，作為黨的一部分，報紙必須推廣黨的方針政策（丁淦林等，1997）。

儘管中國歷經傳媒商業化，在有限程度上增加傳媒的多樣性，但在政治敏感的話題領域中，批判性言論仍沒有多少空間（何舟，1998:14-17）。中國的調查

⁸ 趙紫陽 1987年說：「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和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導，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⁹ 胡錦濤 2007年說：「...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與實效」

¹⁰ 習近平 2012年說：「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報導只能落實在「低層次監督」¹¹，有學者稱其為「打蒼蠅不打老虎」，或只打「死老虎」（何清漣，2007）。



中國調查報導發展，像是在拔河遊戲的兩頭拉扯；一頭是以中宣部為代表的管制力量，另一頭則是市場經濟的驅動力量（He,1998）。但，中宣部的人治成分高，曾經有 1985 年出任中宣部長的朱厚澤，提出著名的「三寬」政策；也有保守派如劉雲山，堅持記者最主要的工作是讓群眾，「保持對黨的忠誠」。在控制寬鬆時，調查報導容易刊出，反之則不然，導致中國媒體改革三十年間，宣傳部門成為改革與保守勢力反覆爭奪的陣地，而調查報導也時有時無，且品質良莠不齊，導致中國的輿論監督在西方學者眼中，只是「半獨立的第四權」（Gordon,1999），一種尚未制度化的權利。

著重在政經互動，忽略了記者的主體性位置。事實上，經過三十年的媒體市場化發展，許多標榜「輿論監督」的報紙，製作許多品質優良的調查性報導，吸引許多年輕記者通過激烈競爭加入這些媒體。這項觀察也呼應了張志安與沈菲（2011）《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他們發現中國調查記者隊伍的年齡結構年輕，約有 76% 的調查記者年齡在 35 歲以下，50 歲以上的不到 3%。符合趙月枝（Zhao,2000）的觀察，這群年輕記者，成長於 1980 年代，成長過程親身感受到傳媒商業化改革與調查報導發展，會極大化自己身為記者的職責，不斷挑戰政治當局底線。

這群年輕記者還有另一項特徵，都是 90 年代中後期上大學，正好遇上 1994 年中國正式接入互聯網，開啟中國傳媒融入全球化趨勢¹²（羅世宏,2012）。互聯網開始進入公眾生活，也帶來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言論壟斷的藩籬開始被衝破。

在互聯網發展之初，中宣部尚未意識到互聯網對自身權力的巨大威脅，一邊聽任互聯網「野蠻成長」，一邊忙於整肅平面媒體，建立閱評組審讀新聞。但公安部門比宣傳系統敏銳，於 1998 年開始啟動監控互聯網的「金盾工程」，一期工

¹¹ 依據馮建三的說法，低層次監督是指從藥品、食品、生態環境...等民生議題至對其他公共領域的人事之監督

¹² 1994 年 4 月，世界銀行貸款中國專案「中關村地區教育與科研示範網路」（NFCC）通過美國 Sprint 公司連入 Internet 的 64K 國際專線開通，中國方始正式被國際承認為有 Internet 的國家。

程在 2005 年底完成（陽光時務，2013）。



中間的時間差讓互聯網發展已勢不可擋，面對海量訊息和不斷更新的翻牆技術，宣傳部門才意識到事態嚴重。

於是，中國政府一面封殺諸如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全球流行的社交媒體網站，另一方面鼓勵國內發展類似的網站，結果出現許多創新網站，諸如符合中國網路使用習慣的新浪微博和類似臉書的社交網站人人網。

這些網路營運商也左右為難，因為一方面用戶要求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審查當局要求他們自行審查其平台，否則就可能失去營運執照。例如飯否網站，這一中國早期的微博平台，因為用戶張貼有關新疆暴亂的發言，該網站於 2009 至 2010 年間被關閉 16 個月。

新浪微博成功的秘訣是，它知道如何討好政府。新浪微博使用各種方法來滿足政府的審查要求。過濾關鍵詞是限制內容使用得最廣的方法，有些關鍵詞能完全阻止某一帖子的發表；一些關鍵詞標誌後提供編輯審查其帳號；還有一些關鍵詞在這些平台的搜索引擎完全不能搜索到，導致難以看到這些發文。此外，新浪微博給公安部門進入網路後端的權力，以便他們能夠直接輸入關鍵詞並立即刪除影片和照片。

根據香港鳳凰週刊《中國微博政治》一文報導，新聞創建一個過濾關鍵詞的三層監控體系。第一層利用相關技術搜索被封殺的關鍵詞，第二層以人工審查擬發表的內容，第三層工作人員追蹤當前事件，改進並更新封殺的關鍵詞名單。

但是，第一層的關鍵詞過濾，在實際微博運作空間，網民發展出許多詞彙規避關鍵詞審查，因此作用有限。而第二和第三層採用人工審查，他們採用傳統的圍堵手段，對付迅速傳佈的新媒體，不免顯得左支又絀。據網路上披露新浪管理層的一個內部通知說，任何「有害」信息一旦貼出，必須在五分鐘內刪除。發表與封鎖的時間差，創造了一個新的網路生態系統，微博上隨時都有新聞發表，其傳播速度遠超過審查者封殺的速度，因而能影響公眾對某些事件的看法。

2012年，中國微博用戶總量達3.27億，當中，許多粉絲人數多達數十萬或百萬的新聞記者或公共知識分子，透過微博實踐「自媒體」的作用，突破官方的新聞和意見封鎖，對重大突發事件或公共政策議題有相當大影響力（羅世宏，2012）。對中國記者來說，微博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台，以發表不能在傳統媒體上發表的訊息，其中包括審查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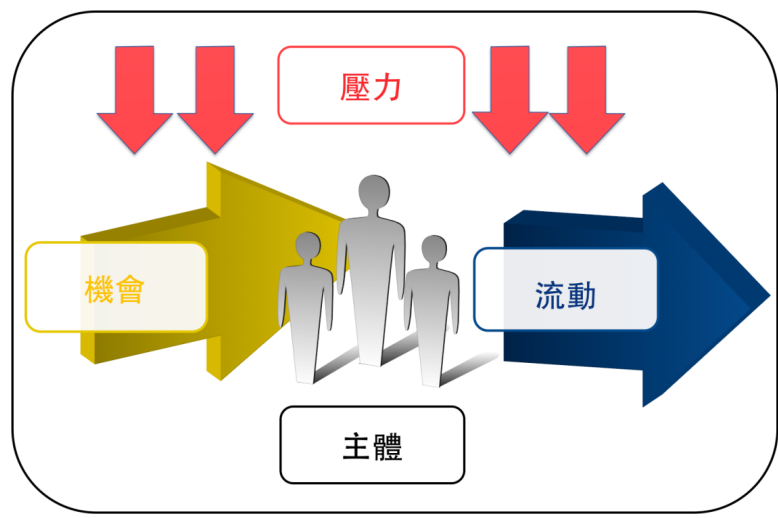


中國的新聞實踐是一個流動且不斷變化的過程，研究中國媒介改革中，值得關注微小的實踐特徵（陸擘，2005）。本報導除了觀察中國媒體控制格局的變化，更關注這群年輕調查記者的實踐策略。他們如何在壓力中建構新聞專業主義？他們如何形成我群的內部凝聚？以及他們如何透過互聯網創新實踐其專業義理？

雖然，這群人在中國只是少數，但我特別喜歡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段話：「不要否定一小群努力想改變世界的人所展現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能真正發揮作用。」且讓我們相信，這群調查記者有「美麗中國」的力量。

為了瞭解中國調查記者在黨管媒體的壓力下，如何認知到自身的專業角色，並且，在採訪經驗中如何強化自身的倫理目標，以及不斷累積自身資本？最終，這群調查記者或在傳統媒體中等待機會，或在互連網開創格局，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持續拓寬中國輿論空間。本研究架構如下，以下文獻探討也將由壓力、主體性、機會三部分延伸討論之。

圖一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繪製）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中國如何控制媒體

一、中宣部職能

在國際共運史上，馬克思、恩格斯於 1847 年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列寧認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明確了包括黨內教育、群眾鼓動、文化運動以及報紙、刊物、通訊社及出版工作等方面的「宣傳鼓動工作」範疇¹³。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也仿效蘇共之中央鼓動部，而成立了「中央宣傳局」。1925 年中共四大《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提出：「為使宣傳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統，中央應有一強固的宣傳部負責進行各事，並指導各地方宣傳部與之發生密切且有系統的關係。」並正式改名為「中央宣傳部」。1928 年 10 月，中共中央要求建立與健全中央宣傳部的組織，各省委要立即建立宣傳部；各縣市區委應設立宣傳科；黨支部要有宣傳幹事，負責宣傳工作。1941 年《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中規定「一切對外宣傳的領導應統一於宣傳部」，並建立了中宣部領導、審查報紙雜誌的制度。在中共 1949 年建國以前，中宣部負責管理文化教育和新聞工作；建國之後，將其職權擴張至掌管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等涉及意識型態的主要工作。

中宣部的職能經過幾波擴張。1951 年，中共首次確認中宣部職能，在《中共中央關於健全各級宣傳機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規定了七大職能：領導對於反革命宣傳的鬥爭、領導審查理論教育、審查文化藝術、監督學校教育、審查新聞傳媒、幹部管理。

根據上述規定，中宣部對中國大陸媒體、網路和文化傳播相關的各種機構有監督權，以及能夠對新聞、出版、電視和電影進行審查。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黨政分離，實際運作上，兩者卻是緊密關連。中宣部屬於

¹³ 參考自《陽光時務》第三十九期

中國共產黨的下屬組織，但它對國務院組成部門，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也有監督權。



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宣部被取消，職權改由中央文革小組兼管。直到1977年10月，中共十一大恢復中宣部，其辦事機構擴張為一室五局：辦公室、理論局、宣教局、文化藝術局、新聞局、出版局。管轄範圍包括宣傳員網、報紙、刊物、出版、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廣播、學校等。在省級及省級以下的文化與廣播電視行政管理機構由同級黨委宣傳部管理。

恢復中宣部後，中共中央重新界定其職能。大致上有以下七點：

1. 指導全國理論研究、學習與宣傳工作；
2. 引導社會輿論，指導、協調中央各新聞單位的工作；
3. 從宏觀上指導精神產品的生產；
4. 規劃、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務，配合中央組織部做好黨員教育工作，負責編寫黨員教育教材，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和改進群眾思想工作；
5. 受黨中央委託，協同中央組織部管理文化部、新聞出版署、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幹部，會同中央組織部管理人民日報社、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華社等新聞單位和代管單位的領導幹部，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部長的任免提出意見；
6. 負責提出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發展的指導方針，指導宣傳文化系統制定政策、法規，按照黨中央的統一工作部署，協調宣傳文化系統各部門之間的關係；
7. 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其他任務。¹⁴

中宣部經過幾波組織改造，大致上抵定其職能範圍，往後的職能擴充也以此「七大職能說」為藍圖範本。其中，第二項原則揭示中共政府控制媒體的核心思想，將媒體定位於「黨的喉舌」、「報刊是黨的宣傳工具」。¹⁵意即新聞媒體必須為黨的利益說話，粉飾太平是記者的職責，至於什麼是事實並不重要。

¹⁴ 參考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宣部職能〉

<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75332/5230610.html>。上網日期：2013年5月5日

¹⁵ 毛澤東，1955年，《駁輿論一律》



根據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邏輯，以及緊緊跟隨革命導師列寧主張的鼓動宣傳思想。列寧曾指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要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早期完成用嶄新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武裝無產階級的任務：「實際的宣傳鼓動工作始終應放在第一位」。¹⁶中共承接他們的經驗，並將這套宣傳系統發揚光大。

毛澤東對於「新聞」有自己的見解¹⁷，他曾說過：「報紙對於工作及人民來說，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作用¹⁸。」他深知媒體可以動員群眾，可以穩固政權，所以，報紙必然是黨的宣傳工具。他也說：「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¹⁹。」因此，共產黨為了向全國人民宣揚意識型態，以及正當化其政權合法性，必須嚴格管控全國的媒體內容（Tong, 2010）。

其實，戈培爾、列寧和毛澤東三人，管控新聞輿論的目的雷同，都是為了穩固統治。首先，集權國家需要管控社會的各個層面，北京的領導班子必須為全國的發展與安全負責，即是要「穩定壓倒一切」；其次，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要求無產階級的黨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馬列主義將新聞視為「上層建築」²⁰的一部分，屬於統治工具，沒有獨立性，必須依附某一階級。

¹⁶ 參考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翻譯列寧之〈從何著手？〉一文。該文原刊於《火星報》第4號社論，影響俄國社會民主黨頗深。<http://cpc.people.com.cn/GB/10896816.html>

¹⁷ 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報紙的工作「就是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政策。」「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鬥爭」。因此，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輿論工具。

¹⁸ 毛澤東，〈給劉建勛、韋國清的信〉，《新聞工作文獻選編》，頁88。

¹⁹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台北：新銳出版社，1994），頁152

²⁰ 馬克思認為社會結構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一是經濟基礎，另一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型態以及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馬克思也認為在階級社會，上層建築具有階級性，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這裡所指的精神生產資料，即包括新聞。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與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2



二、 媒體集中領導

共產黨的統治從來都包含兩部分：一是暴力原則，這種暴力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槍桿子出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二是通過宣傳與教育控制人們的思想，讓民眾相信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是最好的統治，所做的一切包括任何暴行都是正當的，凡對共產黨政權持批評態度者就屬於「反動落後份子」，用暴力消滅他們是必要的（何清漣，2007: p.89）。

當時，中國社會處於毛澤東鐵腕統治之下，沒有任何思想自由。中國人形容當時的情況是「10 億人一個大腦」，即毛澤東的大腦。「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指示辦事」。

1978 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對媒體管制曾放鬆過一段時間。當時，鄧小平認同「黨內民主論」²¹，並用這種理論作為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²²鬥爭的理論工具。

這一時期的思想爭論，主要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之爭，鄧小平為右派和知識分子平反，得到政治局多數支持，也令自己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正式成為最高領導者。這段時間，雖然仍有新聞控制，但鄧小平與當時中宣部掌胡耀邦高舉開明旗幟，對新聞與政治控制相對寬鬆。再者，當時媒體數量少，便於政府管理控制。因此，當時對新聞媒體只有內容審查，不會有強硬的處罰手段；對社會輿論更為寬鬆，國家安全部尚未進行思想監控。

朱厚澤 1985 年出任中宣部長，曾提出著名的「三寬」政策：「對於跟我們原來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的寬鬆、有彈性一點。」因而，被稱為「三寬部長」。

但是，自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政

²¹ 「黨內民主論」即允許黨內有不同意見與批評聲音

²² 「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說的都是對的」、「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堅決照辦」

權」、「人民軍隊」的政權合法性受到挑戰。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對此進行反思，一致認定這次事件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侵蝕的結果，於是採取了新的意識型態戰略，一面在教育系統恢復近乎廢棄的政治思想教育；另一面則對新聞媒體採取新的管理方式。



鄧小平為新聞媒體的管理制定新的標準：「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意思是共產黨要一手堅持改革開放，一手重建宣傳與政治思想工作

(Brady,2006)。具體的管理有幾項特點：

- 第一，將管理「制度化」，除沿用 80 年代的相關法條，同時又不斷頒佈各種法規、文件，強化控制管理。至今仍在發生作用的法律法規共有 60 多部²³；
- 第二，實行「雙軌制」領導，由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與共產黨領導的中宣部共同管理，但實際上，黨的權力大於政府部門；
- 第三，確立「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原則。所有「政治良心犯」不再以政治罪名治罪，如果能羅織貪汙腐敗罪名，全用這些罪名懲治；實在找不到這些罪證的，則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懲治；
- 第四，對於重大事件的新聞管理，則奉行戈培爾的宣傳格言：「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這種「資訊不完全」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
- 第五，在嚴厲控制政治意見表達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在性、吃喝玩樂、流行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中國展現高度開放（何清漣，2007:p.99-102）。

中國政府對傳媒業最主要的管理手段，即是實行「雙軌制」領導。一條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宣傳部，指導傳媒對中共政府做「正面報導」；另一條線則由政府的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各省新聞出版局負責行政管理業務。

²³ 《關於嚴厲打擊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 年）、《報紙管理暫行條例》（1990 年）、《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1990 年）、《音像製品管理條例》（1994 年）、《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1994 年）、《電影管理條例》（1996 年）、《出版管理條例》（1997 年）、《印刷業管理條例》（1997 年）、《廣播電視管理條例》（1997 年）、《期刊管理暫行條例》（1998 年）、《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2002 年）。見何清漣書，頁；115

實行「雙軌制」領導來自共產黨自六四事件後，不得不的政治改革承諾。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自毛澤東之後，再也沒有人能擁有絕對的權威；因此，新一代的北京領導班子必須承諾政治改革。在毛澤東身後有限的政治改革中，中共努力將黨政分離，中宣部只能提供新聞出版署建議，不能直接對媒體單位強制執行懲罰。中共為了發揮中宣部功能，審查新聞內容和引導公共輿論，以協助政策落實，只能不斷提高中宣部地位，以增加它的引導功能（Brady, 2006）。

為了達成此一功能，中宣部和各級政府的黨委宣傳部採取幾種手段。其一，實行「主管主辦制度」，每一個公開刊播的媒體，頂頭都有一個主管和主辦單位，媒體必須掛靠在政府機關或相關組織，主管單位負責政治控制，而主辦單位負有資金盈虧之責（羅世宏，2010）。其二，中宣部可以「推薦」某些黨員擔任媒體的高階主管，或是「建議」撤換某些主管。此措施將媒體高層納入黨國這套龐大的官僚系統之中，讓媒體高層享有與同級官員享有同等的政治經濟待遇；反之，任何政治上的失誤，都會讓他們承受很大的壓力，所以他們偏好採取保守的編輯方針。

自江澤民 1990 年代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後，「唱好主旋律」這一名詞成為中共宣傳部門的重點工作詞彙。時任中宣部長的丁關根曾指出，宣傳工作要從八個方面著手：要幫忙，不要添亂；要唱響主旋律，不要搞「噪音」；要注意社會效益，不要見利忘義；要遵守宣傳紀律，不要各行其是；要「聚焦」，不要「散光」；要狠抓落實，不要搞花架子²⁴。

因為，1989 年「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對媒體採取「收緊」政策，幾乎每年都要以各種形式強調新聞管制，以官方的說法是「弘揚主旋律，維持社會安定」。為了確保宣傳上不出現「噪音」，從中央到地方經常需要召開「定調子」的新聞宣傳工作會議，會議上由宣傳部門直接指示禁載規定。

而在會議期間之外，中宣部新聞局主辦的《內部通信》，會對違反宣傳政策的報刊提出警告，或是提出新的禁載規定或報導方針。至江澤民統治後期，丁關根領導的中宣部對媒體控制越來越嚴，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宣傳部

²⁴丁關根：宣傳思想工作要幫忙，不要添亂；要唱響主旋律，不要搞「噪音」，人民日報 1994.01.30 第 1 版

門不再鄭重其事地下發文件或電報，對媒體發號施令；而主要採取口頭傳達或手機簡訊通知，直接命令總編輯。原因在於禁令越來越多，越來越繁複，書面行文需要層層批閱，過於繁複，也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而口頭傳達和手機簡訊通知，手續簡化、效率高、見效快（程益中，2010）。



除了新聞審查之外，中國成立近 200 家新聞研究機構和新聞研究社團，40 多家公開發行的新聞專業期刊，其中大多數著作都是在論證中共的新聞管制合理，以官方話語表述即「新聞理論研究要為新聞實踐提供正確的理論支援」²⁵。

1994 年，中共十四大以後，為了全面、及時、有效地加強新聞輿論宏觀管理工作，中宣部在新聞局下設新聞閱評小組，並要求各省仿效中宣部作法，建立閱評小組。在政府的新聞部門與黨委宣傳部之間，閱評工作重疊交叉，作用在於可以互相監督。如果有些媒體出現「重大政治錯誤」，政府系統的審查員沒有審查出來，卻被黨務系統的審查員找出來，則被視為失職，輕則警告、重則解聘，最重時還要負相應的政治責任。這種交叉管理造成審查者「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從嚴工作作風（何清漣，2007:p.121）。

總結此一時期，中國 90 年代實行的新聞管控，一方面採事後審查和事後懲罰的方式進行恐嚇，同時頒佈各種法規及文件，並以後果論治罪，讓媒體高度自我審查。另一方面實行「主管主辦制度」，以豐厚待遇收編媒體高層，讓他們自認是公職人員而非專業媒體人，按黨的標準行事。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2003 年上台不久，即公開宣示：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定要繼續地、不失時機地沿著既定方向邁進，不能停滯不前，不能纏繞著某一問題消耗時間，更不能倒退²⁶。組織政治局集體學習憲法治國，並提出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理念。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依其施政，在 SARS 期間，2003 年 4 月 20 日是中國

²⁵ 參考《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新聞工作的重要論述》，摘自〈求是理論網〉http://big5.gstheory.cn/sxxxjy/zyls/200907/t20090724_7868.htm

²⁶ 〈中南海政改神話破滅〉，《爭鳴雜誌》，第 399 期。

人民最為振奮的一天。那日，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宣布北京的疫情從原先有所隱瞞報告的 37 例，突然暴增加至 339 例。記者會後幾個小時，中國政府宣布將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免職。



緊接著五月份，《南方都市報》的〈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順利發表，當局要求法院儘速開庭審理並全面檢討收容審查制度，六月份即廢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當時，中國政府的種種施政，透露出前所未見的改革意向，得到許多讚頌和期許，這一年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元年」美名。

但其實就在這一年底，黨國即恢復了他的本性。普遍認為，因廣東省委書記對《南方都市報》11 月報導〈非典再現廣州〉不滿，加上之前對孫志剛事件秋後算帳。2004 年 4 月，《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總經理兼副主編喻華峰、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委李民英無預警地被以貪污、行賄、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名逮捕及判刑（何亮亮，2004）。呼應前文提及的「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原則，對政治犯治罪改以各種聲名狼藉的刑事罪治罪，如：貪汙、收賄等。地方法院一直未能找到貪汙的證據，加上中共黨內開明派元老任仲夷及多位知識分子抗議聲援之下，當局將程益中只能無罪釋放，但他也被迫辭去《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總編輯職務。

跟著胡溫體制職掌中宣部的劉雲山，原為新華社通訊員出身，在掩蓋真相和製造謊言具有一定專業，在他任內，管制媒體的力度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手段越來越多，措施也越來越具體和針對性。

首先，將宣傳禁令轉為進入地下秘密狀態。據程益中（2012）回憶，這一時期的顯著變化是，打電話給媒體宣傳禁令的宣傳部官員，通常會在掛電話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留任何字據，不得透露下達了什麼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麼部門下達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達禁令的領導姓名。」中宣部的禁令在秘而不宣中貫徹執行。

如果記者破壞此秘密原則，便會遭到嚴厲懲罰。2004 年 9 月 17 日《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新聞助理趙岩在上海被捕；同年 11 月，湖南《當代

商報》記者師濤被湖南長沙國安拘押於山西太原。兩人均被以《洩漏國家機密罪》起訴，趙岩被判 3 年徒刑、師濤被判 10 年徒刑。而兩人所謂的罪證，就是他們像外界公布了宣傳部門給媒體發的禁令。



其次，中宣部逐漸將新聞控制制度化。一面繼續沿用「政治問題非政治化」原則，對待思想言論等良心罪犯，以各種最讓民眾反感的刑事罪入罪，如嫖娼、詐騙、貪汙等；如果一時裁不上這些罪名，則誣陷為「洩漏國家機密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危害國家安全罪」。

另一面，這一時期，頒佈言論獲罪的罪名也越來越多，明文列入《刑法》的就有：〈煽動分裂國家罪〉（第 103 條）、〈煽動顛覆政府罪〉（第 105 條）、〈煽動民族仇恨罪〉（第 249 條）、〈煽動民眾抗拒法律實施罪〉（第 278 條），這四條罪名都是針對媒體及言論自由而來。另外，2004 制定的《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將新聞自由收的更緊，該法第 8 項第 2 條規定「發表、散佈文字或者言論，或者製作、傳播音像製品，危害國家安全的」將以刑事責任究責²⁷。

劉雲山成功將新聞控制轉型為一種體制化暴力，一隻手將宣傳禁令秘密化，另一手則頒佈諸多規範文件，讓記者、編輯自我審查，達成高度自我審查。不過，禁令下達的祕密化與私人化，宣傳禁令也日益成為宣傳部門官員權力尋租的一大工具。一方面上級官員為了美化自己的政績和粉飾太平，需要倚重宣傳部門，使得宣傳官員有更多拍馬屁和或提拔的機會；另一方面，官員、權貴、大企業在出現醜聞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進行艱難和無效的媒體公關，而是儘快擺平宣傳部門的領導，以便更好地從源頭上封鎖和控制消息。

蘇州大學傳播學者杜志紅，曾在微博上說：「宣傳部門的禁令，保護的基本都是腐敗分子的利益和違法犯罪的行為；每道禁令背後能收多少保護費？」²⁸北京大學新聞系教授焦國標（2004）也撰文批評中宣部是「中國唯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陽照射不到的唯一黑暗王國。」

²⁷ 取自 http://www.stats.gov.cn/tjgl/swdcglgg/xgfg/t20041118_402209113.htm

²⁸ 〈微博揭露湖南省委宣傳部禁令〉，《多維新聞網》。上網日期：2013 年 5 月 7 日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8-08/57989646.html>



同時發展的還有中國高速且不平均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央為了加速經濟改革，而向地方放權的種種措施，都再再削弱了中央的權力。高度且不均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地方資本集團，而且他們偏好影響政治決策，以得到更多利益；加上省市級政府享受突如其來的自治空間，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決策權，可以最大化官僚的利益；以及地方黨委宣傳部官員將宣傳禁令私人化，作為個人尋租工具。三者之間關係緊密，形成龐大的權貴資本集團，這種「地方資本主義」(local protectionism)讓黨中央與中宣部的控制越來越困難。

中共也注意到地方利益集團會損害其合法性基礎。確實，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會犧牲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為代價，往往也忽略人權與法律。地方保護主義逐漸損害國家經濟發展，以及為黨國帶來合法性危機 (Yang, 2004)。為了修正此危機，黨國再度加緊媒體管控。2005年中宣部推出審讀員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體派駐行使刊前審查職責的審讀員。中共管制媒體，原本已有的新聞閱評是事後審查制度，如今又設置審讀員這一事前審查角色，一前一後如同買了雙保險。

胡溫執政十年，帶來人權惡化、司法倒退、權貴崛起與腐敗加劇等，導致社會矛盾激增。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基礎繫於經濟發展，為了持續宣揚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性，中宣部必須緊抓住新聞輿論。從2008年劉雲山在《求是》雜誌發表的談話可見一斑，他說：「能不能把宣傳輿論工作抓在手上，關係人心向背，關係事業興衰，關係黨的執政地位。」可見，中國即使經過三十年經濟改革開放，但唯獨對媒體，仍堅持「黨的喉舌」地位，不願放手。

緊抓媒體的手，正掐著中國輿論空間成長。自從2002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法委進入政治局常委，維穩經費越來越高，黨國有意識地限縮調查報導的空間，卻反而讓調查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更為突顯，更主動地尋找策略，拓寬中國輿論空間。

找不到圖表目錄。



時間	中宣部長	新聞媒體之管理措施
1948	陸定一 ²⁹	毛澤東：「報刊是黨的宣傳工具、黨的喉舌了，並強調：「黨報的基本任務是正確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
1955		毛澤東確定了新聞媒體的「黨性原則、黨的喉舌、輿論一律、新聞無法」四大原則 ³⁰ 。
1976 年塑造中共意識型態合法性的，克里斯瑪型領導人毛澤東過世，中共不得不通過改革開放重塑並維持其政權合法性 ³¹ 。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戰略		
1978	胡耀邦	批准《人民日報》等八家媒體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逐漸以廣告收入取代財政撥款。
1981.01.29	王任重	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要求對報刊、新聞、廣播、電視等工作，必須加強集中統一領導。
1987.03.29	朱厚澤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地，妥善地做好報刊整頓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須端正新聞輿論的政治方向，首先要把有關報刊及其出版單位整頓好，要求中宣部協助國務院新聞出版署迅速完成《新聞法》的起草工作 ³² 。
1989 六四學運後，江澤民率領共黨高層與中宣部共同反思六四事件，一致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侵蝕結果，最終決定「加強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		
1989.11	王忍之	江澤民要求加強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必須堅持黨性原則，要求新聞宣傳在政治上必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在新聞宣傳中旗幟鮮明地堅持不懈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不允許報刊、廣播、電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提供陣地，要求認真地積極地組織力量批判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中產階級論、全盤西化論、馬列主義

²⁹ 陸定一自 1945 到 1966 間斷擔任中宣部長，事實上，並未握有實權。1966 年，毛澤東指出，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陸定一為首的中宣部遭到批鬥，遂開啟文化大革命。

³⁰ 毛澤東，1955 年，《駁輿論一律》

³¹ 趙鼎新在《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一書中提及

³²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授兼主任的孫旭培，參與《新聞法》立法過程頗多。

		過時論，對於一切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新聞活動，不但不能給予自由，而且要依法制裁 ³³ 。
1993.06	丁關根	新聞出版署發佈《關於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與出版單位職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與出版單位之間必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規定主辦單位對下轄新聞出版單位負以下責任：監督新聞出版單位緊跟中共的路線、審核宣傳報導與出版計畫、批准重要稿件、對新聞出版發生的錯誤負政治責任等等。
1994		中宣部成立新聞閱評小組，最初出刊為《新聞輿論動向》，後來改名為《新聞閱評》。1996年以後推行至全國各地方黨委宣傳部門。新聞閱評小組成員由極左媒體的退休領導組成，他們透過批評和揭發各家媒體不利於黨的言論，來持續發揮餘熱。
1997.02		中共國務院發佈《出版管理條例》，規定報刊發行必須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必要的上級主管機關」，確立「管辦分離」制度。
2000.07		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出台《違紀違規報刊警告制度實施細則》，黨委宣傳部和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對報刊提出警告的情況，統一刊登在新聞局出版的《內部通信》上，若一年內累積三次警告的報刊，由行政部門給予停業整頓行政懲罰，撤換總編輯或社長，並給予必要的行政懲罰。
2001		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署《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黨）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幹部的任免權。
2002.11.20	劉雲山	新聞出版總署、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

³³江澤民（1989）〈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1/content_2600239.htm

		採編人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參加培訓的新聞記者學完全部課程並考核合格後，由培訓主管單位給予頒發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的《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合格證書》，《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合格證書》是新聞採編人員領取記者證的必備條件之一。
2003 年 SARS 肆虐、《南方都市報》刊出〈孫志剛之死〉，以及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矛盾激化，黨國為維繫其政權合法性，加強管控媒體。		
2003.08	劉雲山	新聞出版總署發佈《治理報刊攤派實施細則》 ³⁴ ，第四部分第一條就明確規定：「用定額管理的公費訂閱重點黨報黨刊的範圍，是指《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省級黨報刊、地市級黨報刊」。意思是中國報刊可以繼續生存的是中央的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誌）、政治正確且 5 年以上沒有任何違規記錄、讀者自費訂閱量超過 80% 的報刊、黨報所辦的都市化子報，其餘報刊將被迫退出市場。另外，《實施細則》指出「管辦分離後，主管部門仍要履行主管職責。主要包括對報刊的輿論導向、出版質量進行監管；...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任免報刊主要負責人。」重申媒體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
2004.11		出台《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當中第 8 項第 2 條規定「發表、散佈文字或者言論，或者製作、傳播音像製品，危害國家安全的」，就是指使用出版物或其他傳播媒介「煽動犯罪活動」。
2006.03.22		中宣部發出《關於新聞編採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強調公開的採訪活動，必須出示經新聞出版單位認定，由國家新聞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核發的記者證。若有虛假報導、情節嚴重者一律吊銷記者證，五年之內不得從事新聞工作。
2006.06		國務院發佈《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明確規定「履行

³⁴ 全稱為「關於落實中辦、國辦《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浮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的實施細則」

	<p>統一領導職責或者組織處置突發事件的人民政府，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統一、準確、及時發佈有關突發事件事態發展和應急處置工作的資訊，並對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進行管理。但是，發佈有關資訊不利於應急處置工作的除外。」這條文等於為中共設下安全閥，什麼時候政府認為有利於處理應急工作，什麼時候才發佈資訊。</p>
2010.07.20	<p>中宣部發布了關於大連輸油管道爆炸事件的報導禁令「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各地方媒體不要派記者前往當地採訪，已經派出的記者請立刻撤回」。</p>
2011.01	<p>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案件報導工作的意見。第一條首先要求「為兩節、兩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其二「嚴格控制災難事故和極端事件報導」，此類報導不得進行異地監督；其三，「穩妥把握」徵地拆遷報導，對依法拆遷不要質疑，對暴力拆遷中發生的「自殺、自殘、群體事件」不報導；其四，反腐敗案件要防止「低俗化」，不得討論、質疑「政治體制改革」內容。2012年的十八大召開前，嚴格限制時政民生報導，不許刊登敏感社會新聞。</p>
2011.07.29	<p>中宣部連下三道禁令，叫停溫州動車事故報導。「鑑於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各地方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相關報導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導和權威部門發布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發任何評論。」</p>
2012.07	<p>北京 07.21 發生暴雨，事件後三天，中宣部下達禁令「對北京水災報導要減少數量，要堅持正面報導，不要搞反思性報導和評論。」《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助理王克勤所做的《北京暴雨失蹤者》調查報導，即惹惱政府部門，版面立即被撤下，甚至差點查封《經濟觀察報》。</p>
2012.09	<p>十八大前夕，中宣部頒佈密令嚴格控制輿論，要求媒體編輯、記者在未經編輯部同意和總編輯批准，不得以本報記者、編輯的身份開設微博。</p>

2013.05	<p>中國共產黨提出「七個不要講」，首先由中國華東政法大學教師張雪忠在微博上提及，主要內容為：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後來 2013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非公開發表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通報提及「要切實加強對當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把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做到有載體、有活動，形成學習制度」間接證實「七不講」內容。</p>
筆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中國調查報導發展史



一、 中國傳媒改革歷程

1. 享有特權的中國傳媒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建國，中國傳媒即被視為「黨的喉舌」，且將此一規定奉為圭臬。既然作為黨的宣傳工具，因此，中國傳媒制度規定，境內傳媒必須納入中國政府的「事業單位」，並將傳媒工作人員納入行政級別體系。上級政府和黨委宣傳部對傳媒的高層人事和編輯方針擁有決定權。

中國傳媒的編輯方針為「堅持黨性原則，以正面報導為主」，記者必須優先報導上級領導活動，正面宣傳落實政策，並要嚴格遵守報導準則。同時，傳媒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按「幹部標準」定級；經濟上依其幹部級別享有各種福利，如工資、醫療、住房、外出差旅費的報銷等級。

享有特權的中國傳媒是屬於「差額財政撥款事業單位³⁵」，政府規定和保障傳媒的運作資金、設施資金和員工的工資待遇。政府撥款多少和員工待遇的厚薄，主要取決於媒體機構與個人行政級別的高低（陳懷林，1999）。

當時，中國傳媒沒有任何財政支配權，其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被納入政府計畫，即所謂「統收統支」。相較於美國、日本都傳媒收入，廣告都佔七成以上，中國因長期實行計畫經濟，使廣告市場不斷萎縮，甚至在文革時期完全停止廣告經營。在 1970 年代，中國傳媒主要收入是直接的財政補助，如設施、工資；或是間接的政府津貼，如報紙公費訂閱。

長期以往，政府的財政不堪負荷。1978 年國務院批准《人民日報》等八家傳媒試行「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給予傳媒有限的財政支配權。但推行效果有限，因當時中國社會陷入基本意識型態之爭，一方是華國

³⁵ 事業單位包括衛生醫療部門、學校、新聞媒體等，其辦公經費、人員基本工資由財政給付，但住房等福利待遇資金則需由單位自籌。

鋒堅持「兩個凡是」的保守力量，另一方是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改革路線。改革派為了拉攏媒體，有限地釋放言論空間，例如：劉賓雁 1979 年的長篇調查報導作品「人妖之間」，即揭露中共建政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污案（Zhou,2000）。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確立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人地位。文革剛結束，鄧小平高舉「改革」旗幟，從恢復高考、討論真理標準等。至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時，中共中央將新聞傳播媒介改革，正式納入黨的議程，甚至在報告書中提出新聞「輿論監督」功能，此階段新聞改革達到高峰。

但是，這波改革太快太急，終釀成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新聞改革嘎然而止。中共中央重申黨報黨性原則，報導須以正面宣傳為主。這段時間，中國社會糾纏「姓資姓社」爭論，主流媒體被左派分子掌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調查報導在這段時間不可能開展。



2. 中國傳媒「商業化」改革

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不要搞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解決「姓資姓社」爭論，擴大市場化發展格局。

在此期間，由於傳媒來自政府的財政補助減少，因此開始走向「商業化」改革。這段時間，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政府要求傳媒仍履行其正面宣傳的職能，並逐步實現自負盈虧。但是，他們既要「馬兒好」（提供宣傳公關服務），又要「馬兒不吃草」（自負盈虧），就不得不容忍甚至鼓勵傳媒另闢生財之道（陳懷林，1999）。上級部門對傳媒的「違規」舉動，不直接表態也不取締，最終也只是模稜兩可的批示。

中國的傳媒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從黨國的宣傳部門角色，逐漸向專業化市場報角色過渡。學者陳懷林（1999）觀察，中國大陸報業結構調整，即是從「週末版」、「擴版」與「兼辦子報」三個兼段的連續邊際調整而完成。

Tong Jingrong 與 Colin Sparks（2009）針對當代中國調查報導所做的研究，呼應了上述觀察。他們訪問這些市場化子報發現，當他們轉型製作調查報導時，就像是在參與一場賭博。他們原本是經營不善的報紙，如果能以製作調查報導建立讀者群，就可以得到廣告挹注，就算失敗了，其實他們損失的很少。

1997 年創辦的《南方都市報》即為此類典型案例。母報《南方日報》是廣東省委機關報，他們停辦虧損的子報，然後頂著原有報紙刊號創辦《都市報》。因為，南方集團的領導們也知道，《南方日報》是門賠錢生意，幾乎不可能拿它賺錢，跟所有黨機關報一樣，它受到嚴格的傳統和條條框框限制，給讀者陳腐規矩的觀感（Panphilip, 2010／詹涓譯，2012）。即使編輯們想把報紙辦好，加入更多真正的新聞元素，但讀者會覺得只是暫時性的修補。想要賺錢，必須創辦一份全新的、打破陳規腐敗的報紙。結果，《南方都市報》非常成功，創辦不到三年，就成為

中國最厚、最賺錢的報紙，有 72 個版面，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對於上級領導來說，只要報社的改革能使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獲利，即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上繳豐厚的稅款，就可以得到寬容，甚至受到鼓勵。而且，中國傳媒在 90 年代的制度創新，有學者認為是一種「束縛創新」(bounded innovation) (陳懷林，1999)。因為，政府仍為傳媒提供財政上的「保險」。

雖然傳媒被要求自負盈虧，地方政府仍為部分傳媒的重大基礎建設和設備更新撥款；部分報紙，尤其是黨委機關報，仍得到公費訂閱的支持；傳媒在稅收上也得到減免、返回等優惠。其次，政府為傳媒維持「壟斷經營」的局面，禁止私營資本和境外媒體投資中國傳媒產業，就連其它國有企業也不得染指傳媒業。在封閉市場與財政優惠的因素下，傳媒無意放棄「利益」，只會在黨管媒體的結構下進行有限的創新。

不論如何，1990 年代以調查性報導為特色的市場化媒體，在中國傳媒市場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一方面，隨著中國政府推行高速且不均的經濟發展，帶來貧富差距與工人失業等問題，激化社會矛盾，與不可見的社會風險，為調查性報導提供豐富的題材。另一方面，市場化媒體大量增加，傳媒市場急遽擴張，閱聽眾也越來越高，他們看膩「假、大、空」的官樣報導，強調揭發違法濫權的調查報導，反而深受閱聽眾支持。

正是在此一背景下，調查報導進入蓬勃發展時期。1994 年，中央電視台的深度報導節目《焦點訪談》開播，受到觀眾熱烈歡迎，1998 年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前往中央電視台視察，特意为《焦點訪談》題字：「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鼓舞許多記者。隨後，1996 年《新聞調查》欄目問世，正式發展為專業化電視調查報導。

作為中央電視台唯一一檔深度調查類節目，《新聞調查》以記者調查採訪方式，挖掘被掩蓋的事實真相。時任新聞評論部主任孫玉勝：「我們要做中國的《60 分鐘》。」(Zhou,2000) 但卻因為報導常涉及敏感事

件，《新聞調查》製作好的報導播出率不到 50%³⁶。



1990 年代不容忽視的還有「南方系」的崛起。《南方週末》創刊於 1984 年，但直到 1990 年代中期才鋒芒畢露，開設專門調查報導版面，並製作許多具影響力的報導，例如：〈張君案檢討〉、〈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等。

另外，1997 年創刊的《南方都市報》，一開始即由時任副主編的程益中主導，他曾說：希望報紙可以按照《華盛頓郵報》的模式監督並防止權力被濫用。果不其然，成為中國珠三角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例如：2003 年刊出〈孫志剛之死〉與〈非典再現廣州〉兩篇調查報導，樹立其專業形象。以及 2003 創刊的《新京報》³⁷，也曾率先報導「河北定州暴力事件」及「哈爾濱水污染事件」。

被《時代》雜誌形容為「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³⁸，她在 1998 年創刊的《財經》雜誌，更是 1990 年代調查報導的標竿媒體之一。雖然定位為專業的財經類雜誌，但其視角不局限於金融、產經、企業等領域，曾多次刊發對市場有重大影響力報導，例如：2000 年刊發〈基金黑幕〉、2001 年的〈銀廣廈陷阱〉，揭露銀廣廈舞弊行為，直接導致銀廣廈被銀監會摘牌。其報導形式開創財經類調查報導形式，她曾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提及，儘管中國對媒體嚴格控制，但她在《財經》雜誌上打擦邊球，「要對政府的無能與金融不法行為做出突破性報導」³⁹。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被認為是中國調查性報導的黃金年代，因市場化媒體與調查性報導的結合，發表了許多有影響力的報導。但此一時期，中國傳媒改革表現出更重要的特徵是，調查報導在媒體機構的制度化，以及記者重建新聞專業義理。

³⁶ 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5/17/content_4559712.htm

³⁷ 新京報是中國大陸首家獲正式批准的跨地區聯合辦報試點，也是中國首家股份制結構的時政類報紙。負責人以《南方日報》為主，編採人員來自《南方都市報》，首任總編輯由《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兼任。但在 2005 年，北京當局突然撤編，且《新京報》由中宣部主管之《光明日報》接管，光明報業集團入股《新京報》，且將持股比例提高至 51%。

³⁸ <http://zh.wikipedia.org/wiki/胡舒立>

³⁹ 2009 年 11 月 9 日從《財經》雜誌辭職，轉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2009 年 12 月 30 日胡舒立及其團隊入主《新世紀周刊》，正式改名為財新《新世紀》，並積極發展全媒體集團。



當市場化媒體迅速增加，逐漸升高的市場競爭，建立無畏揭發違法濫權的信譽對媒體本身變得非常重要，他們必須扮演好監督有權者、關懷無權者的角色，以獲得讀者的支持和增加獲利。

一方面，媒體機構視調查報導為開拓媒體市場的策略工具；另一方面，調查報導必須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如果沒有組織的支持，記者很難獨自完成報導（Tong & Sparks, 2009）。因此，媒體機構逐漸將調查報導制度化與專業化，例如：《南方都市報》、《中國經濟時報》都有調查報導的團隊。

媒體機構對調查報導的制度化，也為這些調查記者提供雙重保障：第一，組織負擔進行調查報導的主要花費；第二，組織發展出新的計酬方式發給調查記者薪資（Tong & Sparks, 2009）。而且，現在政府更多是處罰媒體機構，而非記者個人，這也讓調查記者更敢做調查報導。媒體機構聘請有經驗的編輯與記者，主導報導方向，以及如何報導。這些過濾，一方面保護記者，另一方面也讓報導能順利刊出，減少直接挑戰當權者的風險。

媒體機構在建構專其業媒體形象的同時，也提供一套機構話語，用以指導記者工作準則，也樹立他們的專業形象（童靜蓉，2006）。例如：《南方週末》的「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南方都市報》的辦報宗旨是「辦中國最好的報紙」。

新聞記者親身參與 1990 年代的媒體改革，逐漸地，他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改變了，以前認為自己是黨的喉舌，現在更認同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給予他們一種為公眾服務的感覺，並在公眾面前樹立相應的形象（Zhao, 1998）。根據一項 2003 年，針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居民對記者態度的調查顯示，59.5% 居民認為記者職責是「輿論監督」，44.4% 的居民認為是「為弱勢群體說話」，只有 23% 居民認為是「國家的喉舌」。此外，公眾心目中的記者是正義的化身，有 64.1%

的居民在遇到不平事會尋求媒體協助。⁴⁰



新聞記者專業化的形象，吸引越來越多優秀的年輕記者，通過激烈的競爭進入新聞業。他們大多是 80 後，「八九學運」在他們還很小的時候發生，對他們直接影響不大；成長於 1990 年代，親身經歷中國新聞媒體改革；念大學時正好趕上中國接入互聯網，接收大量的資訊與思想衝擊。這些經歷讓他們進入新聞圈，可能會極大化新聞記者的功能，不斷地去踩中國政府的底線。

⁴⁰ 北京青年報發佈，由友邦顧問市場調查公司執行，請見：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11/07/content_6237886.htm



3. 中國傳媒的三角政治

1990 年代，與媒體商業化同時發展的，還有媒體集團化。1996 年開始，官方一方面壓縮報刊總量，另一方面促進黨報吸納小報或創辦子報，導向報刊整合，推動報業集團化發展。

報業集團化自 1996 年，中共中央批准第一家報業集團—廣州報業集團開始。隨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經濟日報報業集團陸續成立。目前，中國的報業集團約有 39 家⁴¹。

2003 年 7 月起，新聞出版總署進一步整併一千多家報刊。其發佈之《治理報刊攤派實施細則》規定：「用定額管理的公費訂閱重點黨報黨刊的範圍，是指《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省級黨報刊、地市級黨報刊」。

該規定除了揭示中宣部繼續主管三報一刊外，也確立了中國傳媒的「管辦分離」制度。按此規定，省級和地市級黨委各主管主辦一份黨報，其餘報刊，僅保留廣告年收入在 400 萬元以上的縣市級黨報，轉型為面向市場、自費訂閱的報刊，但改由省級、地市級黨報主管。若報刊讀者自費訂閱率不到 50% 的報刊一律停辦，約計停辦 600 餘種。另外，允許廣告年收入在 5000 萬以上的報紙和廣告年收入 1000 萬以上的刊物接收被劃轉的辦刊（呂尚彬，2009；轉引自羅世宏，2012）。

然而，中國錯誤的市場化政策，以行政命令取代自然的市場競爭，主導大規模媒體整併，反而讓經濟權力與象徵資本更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由一小群人控制中國的傳媒體系，為往後的中國傳媒發展埋下引線。

觀察中國社會轉型的另一切入點，就是中共中央的權力去中心化。中國政府追求高速經濟成長，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央權力削減，以及地方權力的增長。

⁴¹ 〈中國報業集團 10 大創新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6/05/content_4648646.htm



中國財政集權和分權與中央和地方的權力消長是同步的，而財政分權透過兩個階段完成，分別是企業下放與分稅制改革。與半世紀以來的政治權力相對應，中國共歷經三次財政分權：1958-1961 的「大躍進」、1970-76 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開放後對企業「放權讓利」，經過幾次循環後，才採取了目前的分稅制。

第一次企業下放的思想形成於 1956 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從 1957 年到 1961 年，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 39.7% 下降到 13.8%，中央管理的全部 9300 家企業事業單位中有 8100 家下放地方。1966 年毛澤東再次提出，「一切統一於中央，卡的死死的，不是好辦法」，中國國務院再次實施企業下放，下放之後，中央管理企業事業單位剩下 142 個。這兩次企業下放的結果大同小異，管理權力全面下放導致經濟混亂，最後以財政權力重新上收結束。

1970 年代末，對企業「鬆綁放權」、「擴權讓利」成為經濟領導部門的主流意見。1980 年代，國務院推行「企業承包制」，其基本原則是：「包死基數、保證上交、超收自留、欠收自補」⁴²。中國政府持續下放控制權，1992 年國務院發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重申賦予國有企業 15 項企業自主權，但這些下放權力並未真正落實到企業，部分被地方政府攔截。其中，投資自主權與直接融資權轉移至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可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多。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明確實行市場經濟，中央開始實行分稅制。1993 年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分稅制，分稅制的目的是提高「兩個比重」：全國財政收入佔 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的比重。實施分稅制後，確實促進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⁴³。

因為經濟權力的去中心化，削減中共中央的經濟領導角色，也導致

⁴² 企業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包括：(1) 上繳利潤定額包乾；(2) 利潤比例分成；(3) 上繳利潤遞增包乾；(4) 虧損企業減虧包乾；(5) 兩保一掛：保上繳稅、保技改項目，工資總額和實現稅利掛鉤。(吳敬璉，2011：190-191)

⁴³ 見〈財經網〉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1-24591.shtml

政治權力去中心化，影響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但是，中共中央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必須執行「放權讓利」政策，讓地方官僚掌握部分財政權，可以極大化自身利益。



國企下放、財政賦權，形成龐大的地方利益集團。當地方政府掌握財政權，企業會偏向影響地方政策，以取得更多的發展資源，如土地、貸款等。而地方政府則會向企業「尋租」，一方面投入地方建設，另一方面則滿足個人的貪婪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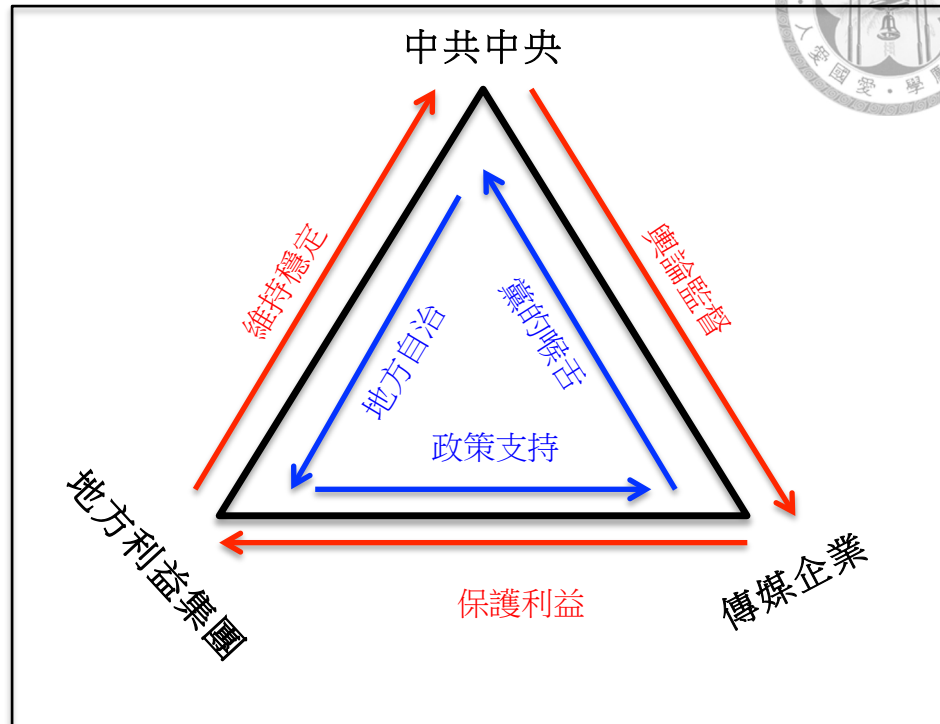
學者稱這種官商勾結的形態為「地方保護主義」(local protectionism)，地方利益集團帶來貪腐問題，而這些貪腐事件同樣以共產黨政府的名義批准，將會動搖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確實，地方政府為了保護共同利益，會控制人力成本與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往往也忽略了人權和法律。地方保護主義正逐漸損害中國發展基礎，以及為黨國治理帶來合法性危機 (Yang, 2004)。

經過 20 年的改革，地方利益集團與媒體集團也發展出密切關係。媒體集團與地方利益集團掛鉤有三個主因：首先，媒體對廣告商的經濟依賴程度增加；其次，媒體有賴地方政府制定有利的政策以維持壟斷地位 (Tong, 2010)。再者，2002 年中共十六大首先提出「文化產業」；2006 年十一五計畫中的新聞出版規劃，都鼓勵媒體集團投資非媒體企業。媒體集團需要地方政府支持，以便獲得低息貸款和廉價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維持傳媒獨立性 (wang, 2008)。

中共中央、地方利益集團與傳媒企業三者互動形成一組三角政治，而輿論監督就在互動中的空隙推展前進。(見圖二)



圖二：三角政治圖



在三角政治圖中，三者作為行動者，都有其目標。中共中央希望維持穩定，地方利益集團希望保護利益，而傳媒企業希望有更多獲利，製作調查性報導在過去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爭取市場的工具。這組互動關係中，折射出雙重意義：首先，中共中央的權力在各層面顯得衰弱，但仍希望維持其領導地位；其次，中宣部對媒體的控制鬆動，地方利益集團增加對媒體控制能力，以保護自身利益。

中共中央希望限縮地方權力，並重建民眾對共產黨的治理信心，因此默許，甚至鼓勵媒體針對地方政府行使「輿論監督」。但是，共產黨對媒介監督有種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依賴調查報導監督地方利益集團；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調查報導揭露中央政府之政策失誤，會影響人民對共產黨的信心（Zhou,2000）。這種矛盾心理，影響後來中共媒體政策的反覆。

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跨媒體、跨區域、跨行業」的構想。2003年，南方報業集團與光明報業集團簽下共同創辦《新京報》的協議，同年成為第一個獲中國政府批准的跨地區經營的報紙。跨區報紙行使跨區

監督，多出許多新聞自由空間，主因是跨區報紙繞過地方利益集團的控制；其次，跨區報促進子報與母報新聞共享，若子報受到地方政府管制，可將新聞線索洩漏給母報進行調查報導（Tong,2010）。



跨區報導為異地監督提供契機，數年間，中國傳媒加強披露地方官員貪腐案件。終於，2005年廣東及河北等十七省市聯名上書中央，要求禁止媒體從事輿論監督後，中共中央也在2005年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實施辦法》，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地方性媒體、都市類媒體，不得跨地區進行輿論監督採訪報導，專業類媒體不得跨行業進行監督採訪報導（任賢亮，2005；轉引自王毓莉，2009）。

地方利益集團要控制媒體，保護自己利益及維持地方政府良好形象。地方的黨委宣傳部為地方利益集團服務，對地方媒體控制分為：停止報導負面新聞，以及定調新聞報導方向。這兩種媒體控制的方法，原為中宣部控制媒體的方法，現在被地方利益集團採用，保護自身利益。

地方官僚希望媒體建構其良好形象，特別是報導地方政府的經濟成就，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已成為評估地方官僚升遷的標準，另一方面，也為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及吸引外來資本投資基礎建設。

中國媒體在此互動關係中，採取一種反抗與順從混合的矛盾情緒。因為中央與地方抗衡而產生的張力，讓中國媒體有機會得到更多新聞自由與獨立報導的空間。調查新聞作為一種新聞自由的實踐，能快速提昇媒體聲譽，重新獲得公眾認可，以及擴張媒體市佔率。但是，中國新聞業發展調查報導不僅是為了新聞理想，更是一種經濟策略，因為這是被認為提昇市佔率最快的方法。

中國傳媒在改革過程中，傳媒已經成為一種多層次的文化產業。上市的傳媒企業，業務性質上不再單純是傳媒文化企業，而更像是「包羅萬象的百貨公司」，投資範圍包括健康娛樂、五金家電、百貨服裝等（羅世宏，2012）。因此，媒體屈從不僅是因為地方勢力擴張，也是中共中

央發展媒體集團化的結果。傳媒企業成長會影響調查新聞空間有兩個原因：第一，媒體企業發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第二，當媒體企業成為利益集團的一份子，就不會批評與自身利益高度相關的事件。



總的來說，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媒體的目的不同，中央政府控制媒體是為了重建民眾信心與維持社會穩定，而地方政府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這種目標的不同，產生媒體控制的空隙，反而讓媒體能從中獲得些許新聞自由。

而傳媒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利益，中國傳媒在日漸開放的媒體市場中，轉型成為跨媒體跨產業的「財閥」(chaebol)，為了獲利，必須維持政治結盟與商業利益的平衡。製作調查報導或是與利益團體結盟，也成為新聞業變動的選擇之一。中國調查報導的空間，就處在三者的變動關係之中。



二、中國記者主體性

1. 中國新聞專業主義

專業主義的概念源自社會學，如果一個職業被認為是專業，一方面，這個職業必須具備相應的特點能夠將這個專業從社會上的其他專業和門外漢區別出來；另一方面，一個專業在社會中具有權力，而專業特點被認為是維護這種權力的保證（Freidson, 1994）。專業主義被視為是一項職業成為專業的策略。

新聞專業主義是一套論述新聞實踐和新聞體制的話語，強調的是新聞從業者與新聞工作的普適性特徵；它又是一種意識型態，是與市場導向的媒體和作為宣傳工具的媒體相區別，以公眾服務和公眾利益為基石的意識型態；它還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是與市場控制與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專業社區控制模式（陸曄、潘忠黨，2002）。

簡言之，專業主義是專業話語的價值體系，是一種專業意識形態。它在專業從業者的職業行為起到指導作用，並且作為一種專業策略而形成一種權力的來源。新聞從業者對專業主義的追求被視為記者的自我認同，以及為記者建構的身分認同（Elsaka, 2004）。

中國新聞專業的實踐不同於西方，根基於自由主義思潮，而是社會脈絡中各種權力折衝的結果。後改革時代，中國社會中各種權力的博弈和意識形態的較量構建出幾種不同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這些話語幫助建構了記者的身分認同（identity）。

1949年後，黨的新聞部門控制了中國新聞傳媒。記者被賦予的身分是黨的喉舌，因此也就有了相應的權力，他們應當是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宣傳員（Zhao, 2000）。1980年以後的經濟改革促使中國新聞業的變革，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市場的介入和國家財政控制日漸減弱。國家決定停止對大部分媒體的經濟補貼，以及扶植報業集團和廣電集團陸

續成立，內容也更加開放並促使調查報導出現。



八十年代的改革給中國新聞界帶來變化，新聞業捨棄媒體作為黨的喉舌的意識形態，必須重建行業新的認同。一方面，新聞業對於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給予他們一種在為公眾服務的感覺，並在公眾面前樹立相應的形象；另一方面，新聞也需要通過專業宣稱來重新獲得公眾的認可，並且追回在市場化過程中喪失的特權。例如，調查新聞的出現贏得了「輿論監督」的名聲（Zhao, 2000）。也就是說，媒體機構需要通過某種專業宣稱來建立專業的形象以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



表二：中國新聞空間收縮

時間	事件	概述
2003	《21世紀環球報導》事件	《21世紀環球報導》隸屬南方傳媒，創刊於2002年5月，因關注敏感議題，如〈南京湯山投毒案〉，及關懷愛滋人權，且在中共十六大後討論「政治文明」議題。2003年3月10日停刊，被認為導火線是刊發了前毛澤東秘書、被稱為「體制內異見高官」的李銳的專訪。
2003	《南方都市報》事件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引起是否廢除收容制度的公眾討論和公民維權的浪潮。之後，當局捏造罪名對南都總編輯程益中，總經理喻華峰司法整肅。
2004	《青年參考》事件	《青年參考》為《中國青年報》的子刊。2004年5月21日，《青年參考》刊發陳傑人報導的武漢女大聲賣淫專題。當局對中青報施壓，逼迫副總編輯樊永生辭職，青年參考報主編梁平被免職，記者陳傑人被辭退。

2004	盧躍剛公開信事件	<p>盧躍剛是中青報記者，也是著名報導文學作家，曾發表〈大國寡民〉。2004年5月24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趙勇發表「喉舌論」。盧躍剛隨後發表公開信稱：中國媒體人「就是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紀錄」。</p>
2004	《冰點》事件	<p>《冰點》原為中青報專題新聞版，後獨立成刊。2004年12月19日，中宣部「閱評小組」強迫冰點撤除文章〈我敗給了專制、壟斷、醜惡、沒人性的教育制度〉。主編李大同憤而寫下〈冰點十周年祭〉，批評官方無預警撤稿。</p>
2005	《新京報》事件	<p>2005年6月至9月，《新京報》報導河北定州襲擊事件和寧夏民工王斌余殺人事件，引起宣傳部不滿。12月，總編楊斌和兩名副總編被免職，《新京報》由直屬中宣部的《光明日報》接管。</p>
2006	《冰點》停刊事件	<p>2006年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批評中國歷史教科書。引起中宣部不滿，1月24日下令停刊，各大媒體被禁言此事。在多方抗議下，2月《冰點》復刊，但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被撤職。</p>

2007	《中國經濟時報》事件	2007年7月，《中國經濟時報》刊登記者龐皎明揭露「武廣高速鐵路」黑幕的調查報導。9月，報社受到中宣部壓力，認定報導為假新聞，開除龐。且宣傳部下令「新聞單位不得錄用其人」
2010	《經濟觀察報》仇子明事件	7月27日晚，《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報導上市公司凱恩公司關聯交易黑幕，被凱恩公司所在地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向全國發出通緝令。此事在微博引起熱議，最後縣公安局撤銷告訴，公安局長赴京向仇子明道歉。
2011	南方集團裁撤編輯、記者	2011年1月，《南方都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長平「被離職」，評論版改組，多位編輯和評論員被辭退。3月，《南方週末》知名評論員笑蜀被「放學術假」，也離開工作崗位，2012年6月，深度報導版主任喻塵因主張軍隊國家化，也「被辭職」。
2012	《東方早報》簡光洲被辭	9月份，簡光洲在微博寫下「理想已死，我先撤了」，他在微博貼出離職單，僅寫「個人原因」。他在2008年曾率先揭露三鹿毒奶粉致14名嬰兒得腎病，讓多位高官下台，包括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

2012	北京暴雨事件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成災，當局立即封鎖消息。《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有關遇難者的報導被當局命令撤版，當局還逼迫南周刊登歌頌水災殉職官員的報導。《中國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王克勤所寫〈暴雨失蹤者〉也遭撤版，隨後他率領的調查報導團隊解散，被懷疑與此事有關。
2013	《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	2013年1月，南周的新年獻辭被廣東省宣傳部強行更改，引發編輯部內部抗議，並在微博上公開事件經過，且編輯記者實名連署抗議。引發輿論關注，甚至演化成爭取新聞自由的社會抗議運動。
2013	《新京報》	2013年1月，中宣部強令各媒體轉載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論〈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新京報》內部投票，全票同意拒絕轉載，但北京市委宣傳部上門督導，社長戴自更辭職抗議。
2013	《炎黃春秋》被關	聲援《南方週末》原版新年獻辭主題〈中國夢、憲政夢〉，《炎黃春秋》也刊發自己的新年致辭，題為〈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1月4日網站無預警被關閉，直至18日下午恢復開通。
資料來源：《陽光時務》第38期、維基百科。筆者自行製表		



2. 傅柯的「衍生權力」到「倫理主體」

傅柯 (Michel Foucault) 早期研究社會網絡中繁複的權力關係，提出「日常生活中的抗爭」(everyday life struggle)，主張從日常生活網絡中研究權力，分析政治領域外的各種權力運作形式，讓權力有更豐富的解釋；但是，他到晚期選擇「倫理主體」這一概念，來解釋主體面對權力規範時的能動性，特別適合用來解釋，在層層新聞管制中仍尋找新聞突圍空間的中國調查記者。

傅柯在七〇年代完成《規訓與懲罰》(1979) 和《性史：第一卷》(1980)，他對當代社會權力的研究也集中於此，傅柯在其中解釋當代社會如何以各種微妙的權力，邁入「趨向規範化」(increasingly normalized modern society) 的社會。他反對單一且壓迫的統治權力，提出「衍生權力」(bio-power)，這種權力的特質是「產製力量、促進成長，並加以秩序化」(Foucault, 1980；轉引自張錦華，2010)。衍生權力控制身體，使主體屈從，但不以暴力壓迫，而是精緻地運用各種規範，使人體主動工作。而且，這種權力是「看不見的」(invisible)，因此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不易遭受阻力。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更細緻地介紹「規範」的衍生權力，他認為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圓形監獄」(panopticon)。監獄的設計者是英國哲學家邊沁，他的設計為一組同心圓建築，獄卒位於圓形監獄中央的高塔，四周的環形建築分隔成一個個囚室。囚室有兩扇窗，一扇朝外用於採光，另一扇面向中央的高塔，方便獄卒可以隨時監視到任何一個囚室，而囚室中的犯人因為逆光，無法看到獄卒，反而擔心自己隨時受到監視。

「一種全新的監視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邊沁說。傅柯認為，這種設計能夠發揮細緻權力控制，是因為三種特性：其一，監視的效果無所不在，因為中央高塔對四周囚室的透視，達成「全景敞視」。國家僅需少許人力，就能發揮高效的監視效果，而且犯人會覺得自己

是透明的，自覺自己隨時受到監視，而注意自己的行為。



其二，此種權力機制是「非個人化」(disindividualized)的。因為這種「非個人化」的特質，使得誰在監視塔中並不重要，即使沒有人，權力運作依然持續進行。這種機制設計，讓監視者與犯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形成犯人內心的恐懼。其三，這種權力是「衍生權力」，不是統治權力明顯、單向的壓迫力量。它主要功能是產製犯人的「自覺意識」，讓他們自覺地「自我審查」(Foucault, 1979；轉引自張錦華，2010)。

傅柯的這套權力觀，特別適合用來分析中國的媒體控制。國務院、中宣部，以及地方黨委宣傳部頒佈多如牛毛的法律、規定、行政命令等。此外，一下子成立「新聞閱評組」實行事後審查；一下子又安排「審讀員」進入報社執行事前審查。種種措施，就是要讓編輯、記者恐懼，達到「自我審查」的目的。

通過制度性規範所發揮的衍生權力，更能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地規範個人的目標作為，它讓人主動地要求自己，融入規範化的社會。傅柯認為，這種權力的作用不是一種施加「意識」於主體的現象，而是主體無可避免的處於權力的「技術」當中，傅柯強調這種「身體政治技術」，是經由細緻的知識建構、組織分類、生活作息、儀式制度，累積實踐而成的。因此，權力已經延展為「日常生活的政治」(張錦華，2010)。

傅柯同樣強調與權力的抗爭，他說：「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抗爭」。不過，如果人只是屈從於權力的話，那抗爭的目的何在？顯然，傅柯不認為主體全然是被動的，他鼓吹個體的抗爭，也反對全然控制的可能。由此，傅柯後期的研究便聚焦於「主體」本身。

他對主體的研究散落在《性史：第二卷》和《自我的技藝》等書，他對主體的考察，從性領域 (sexuality) 為出發點。傅柯去分析「個人如何藉由一些實踐，去解釋、認知並承認他們自己是慾望的主體」，透

過系譜學的考察，他發現一種有別於基督教傳統的主體觀：每個人形塑自己的生活風格，將主體的形成當做一種生存美學(張彥南，2007)。



然而，生存美學不是抽象的哲學信條，它是生活的技藝的學問。這套學問代表著在生活中所訓練和積累的生活藝術，包含著非常實際和具體的技巧與技能，同時又包含著只有親身經驗才能獲得和感知的經驗(高宣揚，2004)。也就是說，主體的形成是透過每次生活中的選擇與實踐，因為規範不是強加於主體，而是被推薦給主體，而主體可在某種程度下選擇順從或抗拒。

如果主體可以自我決定選擇順從或抗制，那就代表主體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傅柯分為四個層面，分析主體能動性：其一，決定倫理要素(*elements of ethics*)，個人決定自我的倫理規範，我們有哪一部分的行為與道德相關？其二，屈從的模式(*mode of subjection*)，個人如何建立自己與道德義務的關係，如何認知個人的位置，以及應當選擇什麼實踐方式？其三，自我實踐的方法(*technology of self of ethical work*)，這套將自我塑造為倫理主體而改變自我的方式，是會長期努力，或者偶一為之？其四，倫理主體的目的(*telos of ethical subjection*)，當我們從事道德行為，我們渴望成為的存在是什麼？(張錦華，2010；張彥南，2007)。

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倫理主體目的，而每個人自我實踐的方法和屈從的模式也各不相同。傅柯的分析，不再強調壓迫性的權力關係，而是重視自我如何形塑，透過不同的方法與技藝，以自己的風格，選擇實踐的方式，而非千篇一律地區從規範(*Mcnay, 1992*；張錦華，2010)。

國內的研究中，鄭宇君的博士論文《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性：一種倫理主體的探究模式》，首次將傅柯的論理主體，用於反思當代新聞專業的倫理問題。研究中說，記者主體是透過兩套系統建構，一種是透過學校教育教導如何做為專業記者，包括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透過學校施放宰制技術；另一種是媒體機構的集體意識，包括新聞價值判斷，及不能漏新聞的競爭壓力，藉由反覆訓練轉化為記者的身體，使自己

與其他記者一樣思考與行動，寫出相似的新聞稿。



自我技術的施行，則是發生在新聞現場，記者如何做出價值判斷與採取行動？一旦媒體組織與教育機構所賦予記者的道德義務在現實下產生矛盾與衝突時，記者可能會有良心不安的焦慮感受。傅柯指出，在自我當中與道德最相關的部份是我們的「感受」。有些記者面對這種矛盾情緒時，採用認同機構集體意識的屈從模式，將判斷的責任推給媒體機構，認為記者誇大不實的報導，是報社要求的特定風格，個別記者只是服從而已。

但是，作者有不一樣的選擇，她在良心不安的情緒下，重新面對與自己的關係。良心不安是我們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因為自我感受的分裂正是倫理的開始，它指向是人對自我的關心，這個對自我的關心才可能促使主體採取行動。在該文中，記者倫理主體的目標應是「追求真實」，作者討論如何透過追求真實的意志突破集體規範對個體的束縛，經由長時間的自我修煉促成個體由內而外的轉變，為自己打造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

傅柯以「倫理主體」的概念，分析個人如何運用自我技藝，追求自我的目標，開啟的主體能動性分析的領域。本研究運用傅柯「倫理主體」的概念，探究中國調查記者如何從採訪經驗中認知自己的倫理目標？以及如何透過自我技藝實踐倫理主體？



3. 布迪厄：「場域理論」與「生存心態」

布迪厄試圖超越主體論與結構主義的二元論，提出「場域」(fields)的理論概念，描述主體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當行動者(actors)依其資本數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決定場域中的社會位置，由長期涵養的生存心態(habitus)被社會結構限制選擇，同時，又因主體追求「秀異」的渴望而展現主體能動性。

布迪厄試圖透過「場域」，把社會結構的動態性質，呈現出來。在他看來，社會結構並不是靜態實存的物體，而是行動者進行象徵實踐的社會空間，而這個社會空間即是由人的行動場域所組成。行動者在各個場域中的實踐活動，都與社會結構關係緊密，一方面，社會結構為行動者的具體實踐，提供客觀性的制約性條件；另一方面，社會結構本身也仰賴行動者的整個實踐過程(高宣揚，2002：228-229)。

場域理論是一個兼具靜態與動態過程的社會空間分析，用社會空間一詞，不僅可以凸顯社會位置之間的關係面向，更可以表明行動者互相施展權力運用策略的鬥爭過程。首先，以靜態面來看，行動者所有擁有的資本結構與資本總量，例如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決定其在社會階級空間的位置。

場域的動態面，就是行動者依據其所在的位置，以及其所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努力奮鬥以爭取對自己更有利、或更有價值的位置(張錦華，2010)。布迪厄指出，場域是「一種鬥爭的場域，就是在這種鬥爭場域中，所有的行動者相互遭遇，而且，他們依據在力的場域結構中所佔據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鬥爭手段，並具有不同的鬥爭目的。」(Bourdieu，1994；轉引自高宣揚，2002)。

布迪厄形容場域中的鬥爭過程，像是在玩一場遊戲。他說：「為了使一個場域運作起來，必須同時具有遊戲規則和隨時準備投入遊戲的人們；而這些人必須具有特定的『生存心態』，在他們的『生存心態』中隱含某

種瞭解和認可該類型遊戲和遊戲賭注內在規則的態度。」(Bourdieu, 1984; 轉引自高宣揚, 2002)。事實上,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 其核心概念在於「生存心態」(habitus), 因為它是構成結構與實踐之間的環節。



既然行動者主動參與遊戲, 就是願意接受一套內化的遊戲規則, 這套遊戲觀則即為布迪厄解釋結構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的關鍵概念:「生存心態」(張錦華, 2010)。布迪厄認為, 生存心態是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媒介。換言之, 生存心態是社會行動者實際行動的衍生原則, 同時也是社會環境的結構條件所形塑的(邱天助, 2002)。我們的行為既是被社會結構限制, 而社會結構又是我們重複實踐而更形穩固, 其中, 生存心態就是一套內化的規則, 影響我們的感知與行為。

若依照布迪厄的定義, 生存心態是一套持久的傾向系統, 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獲得的(Patrice Bonnewitz, 2002; 孫智綺譯: 100)。所有的價值與規範, 都仰賴社會化的學習過程, 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 最具決定性的是早期所受的教育, 灌輸我們的初級慣習。而在初級社會化中, 家庭占重要角色, 我們自發地複製父母的語言思想行動, 並內化父母的社會位置空間特性。因此, 慣習可以說是將外在性內化的機制。

布迪厄一再說明, 生存心態是一套持續的系統。隨著行動者的實際經驗逐漸累積, 在原來的初級慣習上, 又加上了次級慣習。慣習是一直不斷在重新建構的內在結構, 也是過去與現在經驗的產品。也就是說, 我們的行為和習慣從來不是完全被事先決定的, 我們還有選擇, 但選擇受制於慣習, 所以也不是全然自由的(Bonnewitz, 2002; 孫智綺譯:102-103)。

生存心態一方面是歷史積累的結果, 另一方面, 他所習取的概念結構也具有產製個人和集體實踐的作用, 也就是建構歷史的功能(張錦華, 2010)。用布迪厄的話:

這是一種同形構造關係, 也就是同質性裡的多樣, 反映出他們生產的社會條件之同質中的多樣, 使得同一階級的不同成員可以統一在特殊的慣習中。(Bourdieu, 1980; from Bonnewitz,

2002)。



簡單地說，個性的差異不過是階級慣性的變種，事實上存在著眾數慣習 (*habitus model*)。布迪厄曾形象化地概括成「交響樂式演出」 (*orchestration*)，在群體中的個人仍可區別出自己的差異性與特殊性，但在演奏中的和諧性和整體性，是以看不到和觸摸不到的象徵性結構體現出來的 (高宣揚，2002:218)。生存心態的基本效果，就是多數人共同的生存心態形成了客觀存在的社會共識，進一步強化既存的社會結構。

布迪厄不斷強調生存心態有積累性，後來習得的概念結構，會不斷整合且調整初始生存心態。每個人都是通過社會化而進入社會體系，學習社會的集體規範、價值與信仰，這套客觀結構會指導我們的行為。生存心態就是把客觀結構內化成一套預設立場，而這套存於腦中的預設立場，再次無意識地外在化，使得行動者所有的思想、認知、行為都與階級關係一致，但他們還以為是自發的創見 (Bonnewitz, 2002；孫智綺譯:114)。這種無意識是指，同個階級的行動者在情境當下，不需要計算、不需要揭示目的，就自然而然地重複做出一致選擇，再製社會秩序。

但是，生存心態不是顛簸不破的，如果社會環境發生變動，就可能影響生存心態。一方面，當初形成生存心態的環境，與現在生存心態要去作用的環境出現失調的時刻，這時候，客觀環境改變，而生存心態因慣性還不會跟著改變，就會出現「滯後作用」 (*hysteresis*)。例如：九〇年代中國傳媒商業化時，有些記者仍認為媒體屬「黨的喉舌」，但外在事件新聞主義興起，會讓他們開始重新反省原有概念的適用性。

另一方面，生存心態會隨著行動者所經歷的社會歷程重新建構，例如年輕的八〇後中國記者，從大學知青投入調查記者的工作，因為要適應新狀況，他必須轉化他原來的生存心態。

國際上研究中國傳媒的作品不少，大致上以香港及歐美華人對中國傳媒的研究比較豐富，但是，針對記者主體性的研究並不多。香港城市大學的何舟“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 discours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以認知失諧的觀點檢視中國記者如何面對中國共產黨消逝的意識型態。



何舟的研究呼應布爾迪厄關於生存心態的觀點，中國記者在九〇年代以來，因傳媒商業化而發展的新聞專業主義，已經與中國共產黨傳統將傳媒視為「黨的喉舌」的觀點發生衝突，而中國記者為了解決認知失諧的情況發展出不同策略。他先提出，人們在日常生活出存在兩種話語空間，一種是公共論述空間，包含在大眾媒體、公開文件、公共論壇以及正式會議上；另一種是私人論述空間，包含與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談話。而中國記者在這兩種話語空間中，發展出五種不同生存策略。

研究發現記者採取五種策略去處理認知失諧的問題：(1) 記者在公共論述空間發表的言論是共產主義，但他本人不相信，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薪水、工作保障、接近權力；(2) 記者已經被馴化，個人和公共論述都是接近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不存在認知失諧的問題；(3) 記者扮演雙重角色，在公共論述空間遵從共產意識型態，但在私人論述空間仍保有自己的觀點；(4) 記者為了減少失諧感，將公共論述空間的邊界往外推，在私人論述空間仍保有自己的觀點；(5) 記者採取基進策略，直接與不同的意識型態結盟，完全消除認知失諧狀態，在公共論述空間和私人論述空間都表達不同於共產黨的言論。

以布迪厄的話作結：「生存心態並不是我們有時候所認為的命運。做為歷史的產物，生存心態是開放的傾向系統，它會不斷受其影響。生存心態是持久的，但不是不變的。」(Broudieu,1992 ; from Bonnewitz, 2002) 他的研究揭露社會結構，或闡述生存心態的權力結構，都是為了讓個體能更清楚地發現這層權力關係，並理性地決定自己的行動策略。

基於布迪厄對主體與結構的辯證解釋，本研究試圖探尋中國調查記者在新聞場域當中，如何受到價值規範與權力干預的節制？他們如何在採訪經驗中，累積自身文化與社會資本？以及他們如何運用這些資本展現主體動能以達成自身追求秀異的渴望？

第三節 中國網路政治



網路的出現，超越傳統媒體，以其不可比擬的優勢，調動社會資源，使得言論自由在中國獲得前所未有的進展（李凡，2011）。中國網際網路的起點，開始於1994年。那年，世界銀行貸款中國專案 NCFC 工程⁴⁴的 64K 國際專線開通，中國正式被國際承認是具有 Internet 的國家。

網際網路進入中國，打破資訊控制，讓長期隔離的中國民眾，渴望與世界連接；而對中國政府來說，發展「信息高速公路」是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在此一脈絡下，中國網路產業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到2012年12月，中國互聯網中心（CNNIC）《報告》顯示中國已有268萬個網站，5.64億網民⁴⁵，超過北美與歐洲網民總數。

網際網路具有互動性、匿名性、傳播迅速、去中心化、爆炸式鏈接等特性，讓美國總統柯林頓曾說，中國努力控制網路就像試圖「把果凍釘上牆」一樣，無法做到。

但中國共產黨政府，再次向世人展現其能耐。1998年，中國架起世界上最大的防火牆，西方學者讚嘆這門技術，稱它做「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它的功能是，對認為不符合中國官方要求的網站內容，進行干擾、阻斷、遮蔽。

然而，在權力加緊控制的同時，反抗也應運而起。中國網民在論壇用「拼字法」躲避關鍵字審查，在微博直播「重大事件」逼官方出面負責。他們是一群靈活的社會行動者，創造性地發展出規避和反網路控制的方式。

國家權力與抗爭力量是一組持續互動的關係，當控制制度越精密，反抗力量也會不斷自我完善。而，言論自由，就在試煉中成長。

⁴⁴ 該專案全稱為「中關村地區教育與科研示範網路」（NCFC）

⁴⁵ 見〈第3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



一、中國互聯網發展

1. 中國網路控制體制演變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主流媒體大談「信息高速公路」，主流論述認為「信息化是現代化的關鍵」、「中國進入原子能時代晚了西方一世紀，這次進入網路時代卻幾乎與美國、歐洲同步」(楊國斌，2011；何清漣，2007)。在網路發展上，中國只落後十年，如果不緊抓機會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高路，中國將永遠無法趕上西方發展國家。

由前述可知，中國領導人雖認可網路的經濟價值，但不過是將網路視為另一傳輸黨的政策方針工具。正如穆勒和譚自湘所說，中國領導人「相信網路不僅給他們帶來現代化，而且可以加強中央的控制力，促進社會的穩定。」(Mueller & Tan, 1997；轉引自楊國斌，2011)。網路作為一種「新媒體」，但中國官方仍將其視為「媒體」，管理方式也沿用管理傳統媒體思維，採「圍堵封死」的策略。

中國的網路控制體制，最上層提供一套「文明上網」的意識型態，下層再由控制的制度與實踐的調整所構成。一方面，有關當局發佈各層面的嚴格法規，另一方面，隨著網路反抗行動不斷調整措施。與網路相關的第一個政策框架，是1994年由國務院公布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該條例初步確立一整套調整網路空間行為的法律規範體系，並規定公安部為主要負責機構(胡泳，2010)。從總體上看，中國法律對網路上自由流動的信息提出嚴格要求與審查，另外，投入巨大的資源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防火長城」，輔以對國內媒體嚴格限制，網路內容供應商的責任分離，以及引導網路輿論的宣傳策略。主要可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政府對網民在網路上的傳播行為，設立事先的行政許可。例如：2002年8月1日實行的《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指示：「從事互聯網出版型活動，必須經過批准。未經批准，任何

單位或個人不得開展互聯網出版活動。」此外，中國官方採取一個擴大化的「互聯網出版概念」，不論是在網路發佈自己作品，或轉發他人作品，都被納入「互聯網出版」的主體審查制度。



而且，前述之《規定》，要求從事互聯網出版工作需符合必要的資金、設備、場所，以及明確的出版範圍，此一要求使得個人網站很難成立。而且，規定互聯網出版機構應依照重大選題的規定，履行備案手續。同時，明確規定互聯網禁載內容（何清漣，2007）。與《規定》類似，2008年1月底施行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要求網路視聽節目需要事先許可，或向當局履行備案手續。

其次，中國政府不僅全面控制與互聯網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還制定專門法規，對網路內容提供商實施對網路準入的控制，以及對網路使用者加強內容管制。

1996年2月國務院發佈《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其中明確規定：進行國際聯網，必須使用郵電部國家公用電信網提供的國際出入口通道。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其他通道。接著，1998年11月決定對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經營單位實行經營許可證制度，明確規定國家對互聯網的壟斷。

2000年9月25日，國務院公布《互連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規定對經營性互聯網實行許可制度；對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實行備案制度。例如中國第三大入口網站新浪網，就擁有十多項許可證，包括：電子服務公告許可、網路視聽許可、登載互聯網新聞業務許可、互聯網教育信息服務許可、互聯網出版許可等。

互聯網許可證，及專項備案手續，是中國特色的網路管理方式。如2005年9月發佈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將互聯網新聞界定為時政類新聞信息，包括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報導，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評論，甚至時政類BBS與通訊信息那列入管理，

這是以往沒有的。按此規定，非新聞單位設立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應當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新聞單位互聯網登載之新聞信息，若超出原刊發的新聞信息，也應經國務院辦公室審批。這一規定，禁止絕大多數網站生產新聞。



另外，所有網站的域名和 IP 地址都要在信息管理部門登記備案。2004 年 11 月 5 日公布的《中國互聯網域名管理辦法》，推行了極其嚴格的市場准入制度，第十一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和域名註冊服務機構，應當經由信息產業部批准」，此一規定，讓個人將無法按照之前慣用做法隨意註冊域名，只有企業營業執照或有組織機構代碼證的所有者才可註冊域名（胡泳，2010）。在此之前，中國的民間機構和公民可以自由開辦網站，例如天則經濟研究所有自己的網站。

中國網路管制的手，伸入言論的空間。內容管制開始於 199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發佈的《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這一辦法詳細地對網路內容進行規範，列出九種禁止在網上傳播的訊息⁴⁶。「九不准」成為中國網路內容管制準則，持續沿用在後來出台的相關法規之中。直到 2005 年新出台的《互聯網新聞信息規定》，在原本的「九不准」之外，新增兩條：「煽動非法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以及「以非法民間組織名義活動」的信息。顯然，增加這兩類是為了控制網路用於社會動員的可能。

中國持續加強網路控制，是來自 2004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會議中確定的。該會議提出網路控制新原則：

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加快建立法律規範、行政監管、行業自律⁴⁷、技術保障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加強互聯網宣傳隊伍建設，形成網上正面輿論。

⁴⁶ 1.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2.危害國家安全，洩漏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3.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4.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5.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的；6.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7.散佈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教唆犯罪的；8.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9.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內容

⁴⁷ 此處所稱「自律」，不同於一般指主體以社會責任感自我約束，而是指行業「自我審查」



在這一管理框架下，除了前述新增對禁載信息的規定外。2004年6月，官辦的非政府組織－中國互聯網協會，在網上成立「中國互聯網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⁴⁹，鼓勵公民舉報「不良信息」。

中國政府也規定了網路服務提供者（ISP）的嚴格責任。不僅應對網路用戶張貼的內容負責，而且應配合政府過濾網路上有害、非法的內容。例如2009年剛公布不久的《侵權責任法》，在網路侵權立下兩個原則：一是提示原則，即「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即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二是明知規則，即「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胡泳，2010）此兩原則，讓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配合政府網路審查，並從嚴監管網路言論。

此外，中國政府還非常重視在網路上形成正面輿論。一方面，建立過濾系統，屏蔽敏感內容或封鎖不利於政治穩定的信息；另一方面，在2004年引入「網路評論員」的新機制，即網民們嘲諷的「五毛黨」，張貼正面宣傳，引導網路公眾輿論形成。

中國政府也規定了網路服務提供者（ISP）的嚴格責任。不僅應對網路用戶張貼的內容負責，而且應配合政府過濾網路上有害、非法的內容。例如2009年剛公布不久的《侵權責任法》，在網路侵權立下兩個原則：一是提示原則，即「網路用

⁴⁸ 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http://www.people.com.cn/BIG5/40531/40746/2994977.html>

⁴⁹ 見 <http://net.china.com.cn>



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即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二是明知規則，即「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胡泳，2010）此兩原則，讓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配合政府網路審查，並從嚴監管網路言論。

此外，中國政府還非常重視在網路上形成正面輿論。一方面，建立過濾系統，屏蔽敏感內容或封鎖不利於政治穩定的信息；另一方面，在 2004 年引入「網路評論員」的新機制，即網民們嘲諷的「五毛黨」，張貼正面宣傳，引導網路公眾輿論形成。

中國政府制定各層面的法規，意欲將網路權力全面收攏，但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是一種「零碎化的威權體制」（馬駿、侯一麟，2004）。具體領域的實踐執行者，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記者無國界組織 2007 年發表一份報告，當中即描繪中宣部網絡局與北京市委宣傳部新聞辦的關係

中央政府是網路監管行動的主導者，雖發佈許多具有強制性權威的法規，但網路上海量的信息與傳播管道的多元化，讓國家專控的封鎖權力正在消失。最好的監管方式，就是要讓地方政府、機構、網民達到自我審查。

控制，就是為了限制對方在行為上的不確定性。要怎樣達成此目的呢？一種方式是增加違規的成本，如果對方不服從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另一種方式是減少對方的行動自由（李永剛，2008）。正如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秩序建構就是反對陌生的拉鋸戰。」⁵⁰

⁵⁰ 鮑曼（1997）。《後現代性及其缺憾》



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制定各種嚴厲且不合理的規定，就是要搶占監管的「制高點」。當處罰變得具體且真實，反對力量不足以撼動監管者立場時，如果又不想選擇魚死網破的雙敗格局，就只能選擇合作（李永剛，2008）。合作，正好是威權者預期的均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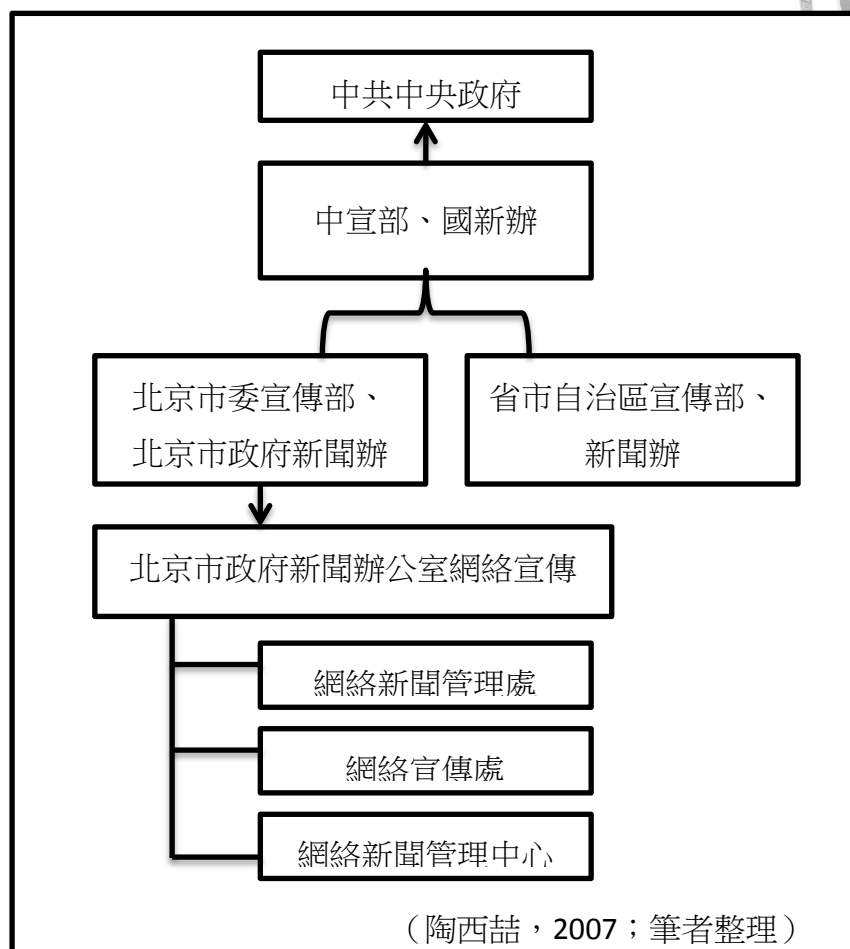
對地方政府而言，它的利益是仕途升遷，對上級政府表明政治效忠，是理性的選擇。他們力求表現，會不斷揣測高層意圖，在任何機會表達效忠。另一方面，中國正進入矛盾激化的轉型期，任何被互聯網踢爆成為焦點事件，都會斷送官員政治前途，因此加強監管成為保護政治生命的重要手段。

陶西喆⁵¹（2007）曾寫過《揭開中國網絡監控機制的內幕》一文，當中即具體描述北京市互聯網宣傳管理辦公室如何擴張其職權。中國較具影響力的網站，全由北京市網管辦管理，包括：百度、搜狐、新浪、雅虎、鳳凰網等。基於政治穩定的要求，北京市網管辦會針對當前熱議事件，或按照上級部門指示，更多是自己判斷，逕自做出撤下首頁、壓制後台、封閉跟帖、屏蔽訊息等措施。見下頁圖：

⁵¹陶西喆（2007）所著之《揭開中國網絡監控機制的內幕》，由「記者無國界組織」協助編輯、翻譯、發行，但陶西喆是化名，因擔心官方的威脅。



圖三：中國網路控制層級圖



中國正掀起網路淘金熱，網路服務運營商的價值偏好是利益，他們必須確保資本安全下，才能展開逐利行為。一端是逐利慾望，另一端是權力的維穩需求，取得平衡最好方式即「自我審查」。這些網路服務運營商為了滿足政府的期待，也避免自身陷入處罰，往往會採從嚴監管。一般有三層運作層次，首先配合政府設立關鍵字過濾；其次是對重大事件的應變管理；再者是建立專門的網站巡視隊伍。

在中國網路氣氛中，大規模普遍自我審查，才是真實的底色。可能是犬儒心態作祟，中國網民不管是政治冷漠的消極自我審查者，還是謹慎小心的避害角色，他們都成為網路監督角色。網路服務商的配合監管，和網民普遍的自我審查心態，才是中國互聯網築起「心理長城」的最大力量。



2. 網路行動的抗爭

中國政府在憲政轉軌期，要重建自身的政權合法性，採取的措施可分為顯性政治控制和隱性政治控制。顯性的控制包括法律、鎮壓、逮捕等等；此外，隱性政治控制的實施途徑傾向過濾不利於政治穩定的訊息，同時強力控制大眾傳媒系統，發佈經過篩選的訊息，形塑統一的正面輿論，影響民眾的感知。互聯網的出現，將中國控制的帷幕，撕開一道裂縫。

中共中央也清楚，互聯網上海量的訊息，以及傳播迅速、去中心化等特質，他們都逐漸喪失控制信息的權力。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矛盾升高，若持續採圍堵策略，將所有矛盾鎖在壓力鍋內，可能會刺激抗爭，甚至導致革命。他們必須限度釋放政治機會，如同 Meyer & Minoff (2004) 所說的：「一個政體關閉其他行動的機會，同時可能開了空間允許一類行動。」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將網路上的熱議對象，引導至某些特定議題。

除了以執政者觀點，為了維持穩定而必須釋放某些言論空間外，另有政治學者以「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 的角度詮釋民間的政治機會。Kevin O'Brien 和李連江 (2006) 描述中國政府，為了滿足各方的需求，常常提出「治國要靠民主與法制」、「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需求」等，且中國現行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運作，卻另行規定阻礙人民行使權利。中國網路上說溫家寶是「影帝」，就是說這個情況，中央常常講些漂亮話，與人民感知到的現實有差距，在此差距中產生了政治機會，人民能於此「依法抗爭」。

互聯網釋放政治機會，而網民也創造性地回應國家的控制。在中國複雜的媒體環境下，人們不是被俘虜的觀眾，而是熟練的行動主體。他們熟練地使用網路，踩在官方認可的邊界附近（楊國斌，

2011)。合法地、正義地回應網路控制，巧妙地表達抗爭。以下介紹幾個有代表性的網路抗爭案例：



2.1 規避關鍵詞

為了避免政府網路辦公室的懲罰，大大小小的網路服務營運商願意與中國政府合作，紛紛自我監視，在各網站均設置網路篩檢程式，目的是過濾被視為「非法字符」的關鍵詞。過濾關鍵詞是限制內容用的最廣的方法，有些發帖後關鍵詞會被用「*」代替；有些關鍵詞要經網站審核後才能顯示；還有些關鍵詞完全禁止，連搜索引擎都完全不能搜索到（陶西喆，2007）。中國數字時代蒐集並整理這些關鍵字，放上網站的「敏感詞庫」，其中包括「薄熙來」、「一黨專制」、「利益集團」、「政治體制改革」等。

哈佛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 Gary King，與他人共同撰寫了 2012 年中國網路媒體審查研究報告。該團隊建立了一個包含 1100 萬帖子的資料庫，來自中國 1382 個網路論壇，他們研究發現，13% 帖子處於網路監控下。且出乎意料地發現，批評政府的帖子並未遭到嚴厲的封殺，而意圖聚眾示威的帖子在幾小時內就被清除⁵²。Gary King 事後對保護記者委員會說：「我們的研究假設是，與批評政府的人相比，試圖發動民眾的人更有可能成為法律行動的目標。」

但語言比起電腦程序更具有無窮的創造性，通過不斷實踐，中國網民已經發展出一套反過濾的符號策略。亞洲週刊曾有一期報導，寫的就是網民與網警鬥智的故事。中國網民透過研究與試探關鍵詞過濾，總結出不少破解方法，包括字符隔斷法、諧音法、拆字法、拼音化以及圖像化等等。例如針對「法輪功」這個關鍵詞，就採用「法/輪/功」、「發掄功」、「發論功」、「FLG」等詞語規避，而且單一方法不見得有效，往往要混合多種方法，才可以騙過電腦系統。

於是，關鍵字越變越多，大型網站必須雇用更多專門人員，審核網路訊息。但語言的創新使用如此普遍，過濾詞技術效果有限。

⁵² 見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05314/301912>



2.2 牆裡的人想出去

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的方法，就是建立「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 GFW) 與金盾工程，控制信息自由流通。建立防火長城，功能就是過濾被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境外網站，封鎖其 IP 地址、網址，及含關鍵詞的內容。根據 2004 年哈佛大學 Berkman Center 的研究，該中心測試了 203,217 個網站，其中約 10% 的網站遭到中國網路防火牆封鎖⁵³。起初，連國際新聞媒體，如 BBC、CNN，及港臺媒體都在封鎖之列，有些海外民運份子的網站，也遭封殺。

突破資訊封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翻牆」。《亞洲週刊》曾報導，中國三分之二的網民每天都翻「牆」(GFW)；而最近三年內才開始翻「牆」的佔 52%；而有 80% 的網民翻「牆」只是為了「正常」地使用 Google 等互聯網基礎服務。

目前所知，在中國廣泛用來翻牆的軟體分兩類：一類是通過代理服務器 (Proxy) 的方式，這在中國被普遍的使用，著名的代理服務器有自由門等，它的代理服務器設在境外，而且 IP 不斷變換，中國政府無法封鎖；另一類是 VPN，就是一種虛擬網路，利用加密技術，使得中國防火牆無法攔阻 (劉天笙，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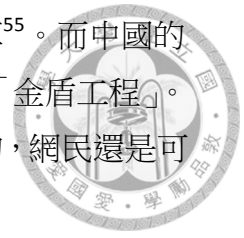
中國人對翻牆的需求，讓全球網路服務商垂涎此一市場，根據全球著名 IT 調研公司 Frost Sullivan 於 2011 年發佈的報告，中國的 SSL、VPN 市場已經達到了近 5000 萬美元的產值。2008 年以來，為數不少的創業者開始湧入這一領域。新的國外服務提供者在 2009 年新疆事件之後迅速崛起，如 StrongVPN，12VPN，Astrill，ExpressVPN 等等，有些價格昂貴，使用一年就要 60 美元⁵⁴。

據新華網報導，中國 2013 年的維穩費用高達 7690 億人民幣，

⁵³ 見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2540000/newsid_2541600/2541681.stm

⁵⁴ 參考自谷禹 (2012 年 4 月 20 日)。「牆裏的人想出去 翻牆的成本」，《陽光時務》。
<http://www.isunaffairs.com/?p=4500>

約台幣 3.8 兆，比軍事費用還多出 300 億人民幣預算⁵⁵。而中國的維穩費用，很大一部分就用於支持「網路防火牆」與「金盾工程」。中國政府付出昂貴代價，只得到部分控制資訊的目的，網民還是可以透過各種方式獲取需要的資訊。



2.3 網上串連抵制「綠壩」⁵⁶

2009 年 6 月 9 日，中國工業信息部發佈《關於計算機預裝綠色上網過濾軟件的通知》。《通知》明確規定，中國境內生產銷售的個人電腦，出廠時應預裝「綠壩」最新適用版本；進口個人電腦在中國境內銷售前，應預裝「綠壩」最新適用版本。

若安裝綠壩之後，它在系統目錄之下，自動在後台運行。當用戶使用電腦時，所有瀏覽、使用行為都會被收集起來，然後傳送到一系列數據資料庫進行過濾，其中包含不良網址資料庫與關鍵字資料庫，如果沒有通過，螢幕就會顯示「此信息不良！將被過濾掉！」的訊息框。

首先在媒體上刊載批評的是《華爾街日報》當天的報導《中國收緊互聯網控制》，認為全社會強制安裝綠壩軟件，中國網路審查機構可能會對中國網民施加前所未有的控制。報導一出，「綠壩」立刻引起網民質疑，新浪、騰訊、搜狐、網易四大門戶網站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網友拒絕安裝。

該事件逐漸在網上掀起熱議。有網友指出「綠壩」本身的安全性存在巨大漏洞；網友還指出，「綠壩」具有強制安裝、難以卸載等特性。除批評軟體特性，有網友開始質疑其侵害隱私權和私有財產權；有人譴責它意圖限制網民言論自由；更有人批評官方花 4000 萬人民幣購買軟體，浪費納稅人的稅金。

中國網民也從網路抨擊，到具體行為抗爭。先有駭客攻擊「綠

⁵⁵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維穩費又飆升-多軍費 300 億/>

⁵⁶ 參考胡泳(2009)。〈中國網民權利分析:困境與共謀——以「綠壩」事件為例〉，《新聞記者》，11: 66-71。

壩」網站，癱瘓它的官方網頁至不能運行。接著，這個軟件的原始碼被破解，過濾的關鍵詞庫與網址列表公諸於眾。網民也對「綠壩」肆無忌憚的惡搞，嘲諷的圖片、影片、歌曲迅速出現。還有網民架設反綠壩官網，在網路上號召簽名串連。



這波線上反抗，很快也延燒到線下行動。先是，一位記者在個人博客上發表《綠壩響應書上的隱身人：金惠是如何盜賣軍隊研究成果牟利》。質疑金惠公司盜賣國防研究計畫。另家媒體《第一財經》也跟進，報導金惠股東背景撲朔迷離的怪象。

香港樹仁大學教授魏永征，與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向國務院遞交建議書，認為工信部的通知違反多項法律，並要求工信部針對這一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舉行公開聽證會。

草根社會的反抗力量，終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6月15日，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和加拿大等19家行業組織聯名致函工信部，呼籲重新評估所有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個人電腦，需強制安裝「綠壩」的要求。24日，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發表聲明，敦促中國政府放棄要求從下月起在待售的個人電腦上安裝戶聯網過濾軟件的建議，聲稱此舉將違反世界貿易原則。兩天後，包括中國歐盟商會在內的22家國外貿易協會聯名致信溫家寶總理，請求重新考慮預裝「綠壩」軟件的決定。

在各方壓力下，中國政府終於讓步。6月30日晚，工信部向外界宣布「根據實際情況，可以推遲預裝綠壩軟件」。7月2日，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來自互聯網上網民們生動的、開放的討論，才是促使中國政府改變決定的最大推動力。」艾未未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這次勝利是代表「網民的力量是可以體現出來的，網民的聲音是可以被聽到的。」

2.4 中國的「五毛黨」

中國政府積極控制網路輿論，最重要的就是運用「網路評論員」，

在網路上引導正向輿論。例如前年發生在溫州的動車追撞意外，在中國網路幾乎一面倒批評政府的聲浪中，卻有一些十分醒目的不同意見，例如「世界上哪個國家沒有列車事故，沒什麼大驚小怪的」。這些意見，看起來明顯偏袒政府。這類意見出現後，底下就會有網民直接抨擊「你是五毛黨的吧！」、「五毛黨的，給我滾！」。

「五毛黨」是中國網路用語之一，指涉那些受僱於政府，專門發言做正面宣傳的人，類似的用語還有「網坪猿」、「小秘書」。五毛黨在 2006 年首次出現，起源於某個匿名網友將〈安徽省共產黨宣傳部的地方視察報告書〉上傳到網路上，有段文字提到「長沙市對外宣傳辦公室雇有網路評論員，基本月薪六百元，每在網路上發文一條加 0.5 元薪資」（史板明夫，2012；黃怡筠：）。「五毛黨」的用語有鄙視意味，指這些人「為了一塊錢銅板就能出賣靈魂。」

中國政府非常重視網路輿論，光是刪除不利於黨的信息還不夠，於是在 2004 引入「網路評論員」，在網上發表支持政府的留言。2012 年 6 月，哈佛大學的一篇研究論文〈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就指出，中國中央政府大約動用了兩萬到五萬名網路警察以及為數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名的「五毛黨」投入網路言論監控。

在 2012 年 10 月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藝術家艾未未擔任客席總編輯，採訪「五毛黨」成員，文中提到「成千上萬的評論中，幾乎有 10~20% 一看就是網評評的。」

訪談中，五毛黨成員分享他們的工作任務。接到上級指示後，他們按指示把網友思想引導到某方向上，或是模糊一下焦點，或是煽動一下情緒等等。重要的是，必須隱藏好自己的身分，有時候必須申請好幾個帳號，一下扮演意見領袖，一下扮演追隨者，一下又是旁觀者。他分享一個有效的策略是，讓自己跟自己在網路上吵架，既吸引網民注意力，且轉移原本熱議的焦點。吸引旁觀者目光之後，再以意見領袖的姿態出現，拋出些強而有力的證據，把輿論都引導

過來。



一個例子是他之前引導漲油價的網路輿論。油價要漲的前一天收到通知，要「穩定網友情緒，轉移公眾注意力」。第二天漲價新聞出來，網路路聲浪一面倒地罵國家、罵中石油、中石化，他發了條評論「漲吧，隨便漲，哥不在乎。最好漲到 50 塊錢一升，活該你們這些沒錢的窮人開不起車。」目的就是要激怒網友，轉移注意力。結果，頁面的討論從油價討論轉移到抨擊他說的話，他也說「效果真的很好。」

中國政府大量運用「五毛黨」，的確能模糊一時的焦點，或煽動民眾情緒。但是，此一做法也可能害中國政府陷入「塔西陀陷阱」，當政府失去公信力，不論網路上的好話是真是假，都會被網民偏向解釋為「五毛黨的評論」，反而促使官方與民間「兩個輿論場」分化越來越嚴重。中國調查記者在微博評論時政，或是轉發調查新聞，都能引起廣大網民關注，佔據民間輿論場重要發言位置，互聯網上的關注力量，反而能回饋傳統媒體以拓寬報導空間。



二、 中國微博政治

微博的成功，與互聯網的封鎖有關。

2009 年，臉書串連的茉莉花革命，推倒北非及中東多個政治強權。同年 7 月，中國發生新疆騷亂，Twitter 和中國第一個高度克隆的產品「飯否」，被中國網友當成新聞工具，把消息用英文發出去，引起國際關注。

不久後，當局相繼屏蔽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體，並封禁 Twitter 的中文模仿者「飯否」、「噤歪」、「噤咕」。其中，當時已有百萬用戶的飯否，直到一年後才獲重啟。而 Facebook、Twitter 至今仍被擋在「牆外」。

也在同一年，新浪微博成立，不到一年，新浪微博在中國井噴式成長，2010 年即達到 6500 萬使用者的規模，那年，也被稱為「微博元年」。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CNIC）發佈《第 3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到目前為止，微博已吸引 3 億 9 百萬用戶。

為什麼新浪微博可以在中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微博和 Twitter 一樣，都是一種「線上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 SNS)，而所謂的「線上社交網站」，便是讓個人建構自己的背景資料 (profiles)，並公開展示「與認識的該網站成員之間連結」的線上環境 (Donath & boyd, 2004:72 / 轉引自尤芷芸，2009)。SNS 獨特之處並不在於允許個人認識陌生人，而是 SNS 允許使用者可以串連 (articulate)，並使得社交網絡可視 (visible)、明朗化，且大多數 SNS 用來維繫網友線下已存在的人際網絡。

由於 SNS 是圍繞個人關係所開展建構的網絡，以個人為出發點

將線下世界的人際網絡複製到線上，此種 SNS 的線上社群運作邏輯是以朋友找到朋友、會員拉會員 (Member Get A Member, MEM) 的形式，反而可以將網絡拉得更遠，傳播範圍更廣泛、速度更快速。



然而，中文微博又不等於中文版 Twitter，微博的魅力，在於他的本土化生長。新浪將應用在博客上的「名人策略」，繼續體現在微博上，打造「大 V」，是新浪提升微博人氣與影響力的主要手段。從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邀請名人、博主及媒體菁英，特別是明星加入新浪微博，港臺明星更是積極爭取的重要目標。新浪影響力排名前百名中，有 20 多名來自港臺，既有蔡康永、阿信、王力宏這類的明星，也有李開復這類的企業名人。

與政治權力取得平衡，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2011 年《富比士》3 月份的報導，也曾就這一問題訪問新浪總裁曹國偉。文中指出，不可否認地，新浪受益於北京當局查封當時市場的最大競爭者「飯否」。而曹國偉也從飯否事件上學到經驗，要在互聯網市場上淘金，就要學會和中國政府合作。

「新浪雇用至少一百人，監控網路上的留言」曹國偉對《富比士》說，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低估的數字。新浪的做法，正好表現出中國企業的兩難。未來資產 (Mirae Asset) 新興市場投資部門的分析師認為，新浪微博擴展市場的策略有限，且 2015 年可望創造 58 億人民幣的盈餘。但《富比士》說，新浪擴張市場的策略，更像是一場賭博，因為北京當局擔心微博上信息自由流通，會變相鼓勵社會動員。

因此，新浪微博雖在 2009 年上線，但一直都是北京當局的「待觀察名單」，當時網名為「新浪微博 beta 版」直到 2012 年 8 月，才變成正式版。新浪不得不採取一些策略，取得官方的信任。

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今年初發表一份針對中國網路審查的特別報告，文中提及新浪微博使用各種方式滿足政府的審查需求。過濾關鍵詞是限制內容使用最廣的方法，有些關鍵詞可以完全阻止某一帖子的發表；其他一些關鍵詞標示後進入後台供編輯審查；還有一些關鍵詞則在搜尋引擎完全無法搜尋到。如果用戶不顧這些發表禁忌貼文，其帳號可能被暫時關閉以示警告，若持續違反規則，將永遠被禁。此外，微博服務供應商還給公安部門進入網路後端的權力，以便他們能夠直接輸入關鍵詞並立即刪除影片和照片。

微博服務供應商，維持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平衡關係，也引起媒體的興趣。香港鳳凰週刊 2012 年 3 月份即以「中國微博政治」為題，揭露中國網路空間審查機制。新浪創建了一個與前述關鍵詞過濾系統配合的三層監控系統。第一層利用相關技術搜索被封殺的關鍵詞；第二層利用人工審查被封鎖帳號擬發表的內容，然後將相關內容提供給第三層；第三層的工作人員追蹤當前事件，以幫助第一層人員更新他們封殺的關鍵詞名單。

新浪還設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發帖團隊。據鳳凰週刊報導，新浪有一支至少由 600 人組成的隊伍，成員多數是自願者，這些自願者被組織起來，對如溫州高鐵列車出軌等緊急情況發帖維穩。這些自願者是原本在網路上積極發帖支持網路監管政策的網友，這些人會被邀請參與新浪團隊。這與新浪 2012 年採取的信用積分制一致，新浪微博社區對個人用戶獎勵信用積分，如果網友散發「不實」信息或者進行人身攻擊，則被扣分。

中國的互聯網市場的龐大商機，是新創企業家兵家必爭之地，看著前方有百度李彥宏、騰訊馬化騰、淘寶馬雲的成功，也有飯否這類黯然退出市場的案例，讓網路服務商願意更大程度與政府妥協。互聯網世界的權力鬥爭，本質上就是伺服器控制權之爭，誰控制了 3 億微博用戶的伺服器，就是控制了中國所有微博使用者的所有資訊。現在，中國微博服務商願意主動交出伺服器控制權，等於把分散的資訊控制權重新向中央「集權化」。



中國著名媒體人安替即撰文分析這一現象。前微博時代，「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那麼，2009年後的微博管理，即落實「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資訊控制權威作基礎」。

微博伺服器，是被中國中央政府控制，所以，互聯網進入中國以後，第一次地方政府完全無法控制對自己不利的言論，而必須有求於中央。但並不是所有微博熱議，都可以獲得中央微博管理機構的奧援，只有像鐵道部或薄熙來的事件，政府才會在事件醞釀中，趕緊下達禁言令。



表三：新浪微博審查

2010.7	2010.9	2011.12	2012.5	2012
微博整頓	審查專員	微博實名制	信用體系	分級管理
四大門戶網站新浪、搜狐、網易及騰訊的微博，有的轉為「測試版」，有的短暫關閉。媒體報導稱，是因為當局發現部分微博出現過激言論，且沒有屏蔽關鍵詞。	各平台加大對內容審核的投入。新浪微博正式聘請十名審查專員監督網站內容。後來在官方推動下，這個制度推廣到各大網站。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安局、通信管理局和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共同制定的《北京市微博發展管理若干規定》出台，自 2012 年 3 月 16 日起實施。	新浪在 2012 年 5 月 28 日正式實施醞釀已久的微博信用體系，推出了用戶積分制以及用戶組成的社區委員會。	《鳳凰週刊》披露，新浪微博開發出諸多技術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傳播，並對用戶設計分級管理，有普通、初級、敏感、高級、封殺、危險、凍結等詳細分類。

參考資料：《陽光時務》第四十三期

從某種意義上說，微博成了共產黨政權控制地方的維穩工具。地方政府為了因應這樣的變化，開始雇用公關公司「違法刪帖」。《新世紀》週刊最近就報導了中國「違法刪帖」的無限商機。刪一條負面新聞需要幾千上萬元，屏蔽關鍵字收費更高達百萬元人民幣，即使收費昂貴，找上門的客戶仍絡繹不絕，當中既有知名企業，也有政府官員。

據報導，公關公司大多通過收買網站編輯人員、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監管部門官員完成刪帖業務。有些公關公司為了高額利潤不惜鋌而走險，通過私刻政府監管部門公章，偽造通知要求網站刪帖。更甚者，公關公司為自己製造客戶，與惡名昭彰的千龍網合作，在網路自發企業負面新聞，直到企業出面給錢才給刪除，這一行徑已變相為勒索。



中央政府急著收攏資訊控制權，以及地方政府找上公關公司「違法刪帖」，都再再顯示中國草根社會的力量。用上海交通大學最新發佈的《2012年中國微博年度報告》的說法：微博反腐迅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

據商業資訊公司 CIC 與奧美公關公司發表的白皮書，2012年十大媒體熱議事件中，有高達五成由微博首發，紙媒後續跟進，而幾乎所有事件都在微博上擴大傳播。去年微博反腐的成效亮眼，一手打「表哥」、「房叔」，另一手公布「雷政富不雅視頻」，都讓地方官員遭到懲處。還有調查記者楊海鵬在新浪微博上寫下，他「聽說」旅館死亡的英國商人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和重慶市委薄熙來有關，也迅速在微博傳佈並引發熱議，最後導致薄熙來被「雙開」⁵⁷下台。

相較於大眾媒體，微博更能發揮其「自媒體」特性。在微博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辦一份「報紙」，而你的報紙影響力的大小將完全取決於讀者的接受程度（趙鼎新，2012）。新浪創造了一些微博大 V 們，如大陸女星姚晨的微博粉絲人數 4588 萬，將近台灣人口兩倍。一旦消息進入微博，經這些意見領袖一轉發，能在短時間之內獲得大範圍傳播，引發「蝴蝶效應」式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從雷政富不雅視頻公布到其被免職，僅用了 63 個小時。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觀察中國的微博現象後，他發現網路輿論已經變化。民族性問題是中國網路輿論的發端，南方週末 2003 年刊登的《網上輿論的光榮與夢想》⁵⁸一文認為，1999 年 5 月 9 日人民網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是互聯網針對時事新聞討論的濫觴。

網上民族主義的情緒，一直延燒到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正式

⁵⁷ 新華社在 2012 年 9 月 28 日下午 6 點發佈了薄熙來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雙開懲罰

⁵⁸ 見 <http://tech.sina.com.cn/i/c/2003-06-05/1556195040.shtml>

推上頂點。但奧運後甫一結束，三鹿奶粉爆發三聚氰胺事件。中國崛起的豪邁論調，與民間的傷痛悲傷輪番演奏。當上海成功舉辦世博會後，很快又發生震驚中國的膠州路大火；在全球經濟衰退，而中國經濟成長在全球一支獨秀之際，溫州的動車事故讓大規模的鐵道投資放緩腳步。

網路民意洶湧，直到化作微博上震聾發聵的一聲吶喊：「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為陷阱，不要讓房屋變為廢墟。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個體，都不應該被這個時代拋棄。」

2008 以後，中國網路輿論更關注於民生議題，胡泳稱此變為化「網路社會力」的崛起。他在博客上寫下：「風向在發生變化，當你的孩子不能不能喝上安全奶、不能坐上安全校車，當你出門用餐會吃上地溝油，當你居住的城市霧靄沈沈、你無從得知 PM2.5 的真實含量時，你會更關心中國社會何處去、中國人民怎樣才能幸福的問題，而不是打打殺殺的義和團主義。」

胡泳提出的觀察，和另一位媒體人笑蜀相似。前《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在 2010 年寫下〈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一文⁵⁹，他說「億萬人的圍觀，億萬人的目光聚焦，就能聚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探照燈，就能一點點穿過利益的高牆，就能一點點照亮我們的現實。」圍觀的力量，不僅來自網民，還有來自媒體。對中國的記者來說，微博提供一個前所未有的平台，同時也是調查報導的一項利器。

江西宜黃民居遭強拆，鍾家三人自焚，鍾家姊妹預備赴京上訪，卻被宜黃縣官員給堵在廁所，鍾如九的一聲聲呼救，透過前《鳳凰週刊》調查記者鄧飛的微博，直播這場「女廁攻防戰」。這場直播，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南方都市報》、《新世紀週刊》、《瀟

⁵⁹ 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97>

湘晨報》跟進報導，也引發中國洶湧民意，受到中央政府重視，最終 8 名官員被處理。



村長錢雲會的命案是另個典型例子。去年底，12月26日，各大微博流傳著一名村長慘死車輪下的照片，死者是寨橋村村長錢雲會，生前曾因村裡土地被侵佔而屢次帶領村民上訪，因此，當他遭遇車禍身亡，網路上傳著「是被有些人故意害死的。」、「就在案發的頭一天，該路段的攝像頭被拆掉了」。這起事件也引起媒體關注，《東方早報》、《中國青年報》、《21世紀經濟報導》、《三聯生活週刊》都跟進報導。但這次更特別意義是，媒體人笑蜀在網上號召成立「公民獨立調查團」，由教授、作家、記者、關心的公民共同組成，這也是首次網路形成的動員。

去年的烏坎事件，也是一個觀察中國的窗口。由於土地被村委會私下變賣，過去曾十多次上訪都沒有結果，與地方政府產生矛盾，村民的抗議一直遭到官方封鎖，村民開始自行拍攝剪輯成影片《烏坎！烏坎！》或集會相片，透過網路供民眾下載，且每天於新浪微博把村內集會的圖文傳播出去。此舉，反而引來國際媒體關注，不少國際媒體派記者進駐村內，其中包括 BBC、每日電訊報、NHK、紐約時報、台灣與香港多家電視台與報紙等。國際上的輿論壓力，讓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回應，廣東省籌設工作組與烏坎村溝通，將被轉賣的土地歸還，且涉貪官員也施以最嚴厲的「雙開」懲罰。

從前述這些事件中，我們看見互聯網與調查報導，已經互相滲透，從而發揮更洶湧的輿論監督。張志安（2012）提出他的觀察，不可否認地，微博部分突破了被限縮的報導空間。發生公共危機事件後，因其迅速傳布的特性，記者可第一時間在新聞現場發佈消息，先在微博上引起公眾關注，如果政府沒有及時公布真相，群眾圍觀便會對政府形成壓力。

對記者來說，有不少調查記者利用微博作為突破口，將無法

刊發的調查報導，利用長微博的方式發表，再邀請意見領袖轉發或評論，形成網路熱點。現在，很多公共事件是在微博上首發，微博也成為記者尋找新聞線索、觀察事件動態的重要空間，甚至約訪受訪者都由此管道。依托微博不只調查記者，也包含許多公民記者，降低傳播成本讓公民調查成為可能。

然而，微博也有其侷限與挑戰。微博上的訊息，因為傳播者不可視，可能會有失實言論，記者要擔負把關風險。還有信息的碎片化，不利於調查報導所需的邏輯展開與深度閱讀。

另外，據社會學者趙鼎新（2012）的觀察，微博一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而另一方面卻在網路公司的操縱下形成虛假的輿論權威，網路上的群眾更像是「烏合之眾」，一方面表現的特別不服從權威，另一面又特別容易對權威崇拜，這種特性會讓網路上的爭論永遠朝兩極化發展。在反權威和民粹的潮流中，記者要保持冷靜客觀的角色，會有困難，這也可能是數位時代下中國調查記者的挑戰，本研究也希望呈現中國調查記者在互聯網看到哪些機會？以及面對哪些新的挑戰？



第三章 採訪規劃

第一節 報導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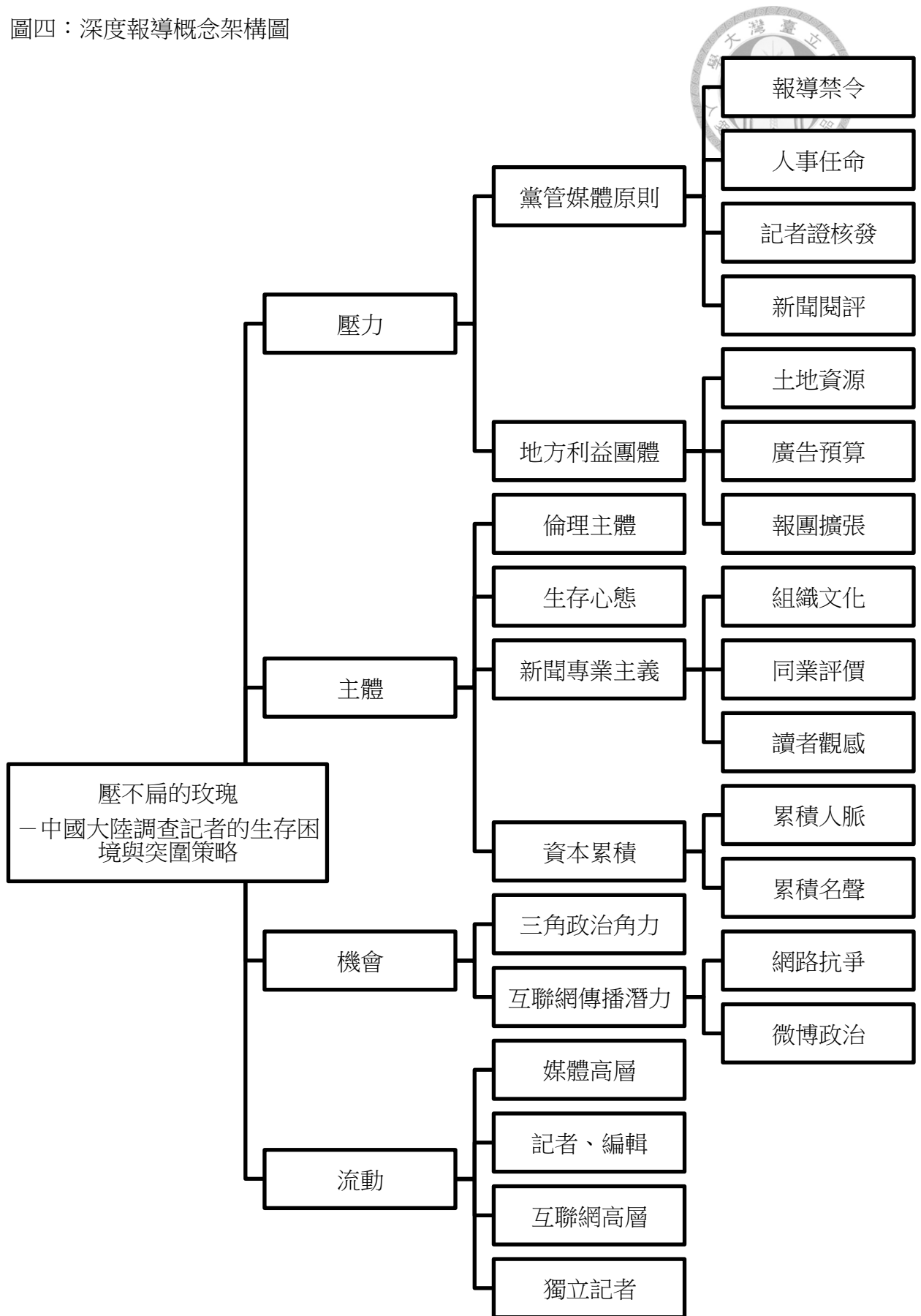
一、報導形式

本文寫作是一篇大型深度報導，主要結合背景性報導、人情趣味報導及解釋性報導三種新聞寫作。深度報導的意義主要有三項：(1) 提供讀者新聞事件的完整背景；(2) 寫出新聞事實何報導新聞發生時，周遭情況的意義所在，以及此意義的可能演變；(3) 進一步分析上述兩點所獲得的資料（彭家發，1986）。與美國專欄作家朱蒙德（Roscoe Drummond）說：「深度報導就是使昨天的新聞背景與今天的事件發生關聯，以獲得明天的意義。」（周慶祥，2009:2）簡言之，深度報導就是要連結過去、預測未來，並深入分析當下事件，進一步闡釋其新聞意義。

本文的價值觀假設為，新聞記者應擔負社會責任，我認為這是一種新聞記者的基本價值，而無關乎威權或民主政體。因此，我們不僅應該關心台灣，更應該將關懷推向華文媒體圈。立基於這項價值，筆者關心中國大陸的新聞傳媒發展，尤其是被稱作「半獨立第四權」的調查記者生存狀況。

本深度報導期待透過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能給予「中國調查記者生存困境與突圍策略」一個更完整的面貌。台灣讀者看中國傳媒表現，大多停留在「黨的喉舌」的形象，但其實不然，中國自 90 年代以來刊出許多高質量的調查報導，而且這些報導別具時代意義，因為一黨專制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幾乎掌握所有政治與經濟資源，缺少政治上的監督力量，維繫其政權合法性只存在道德約束而已，不免難以信服民眾。而中國調查報導某種程度上扮演「半獨立的第四權」角色，即使沒有制度化的權利，但為了回應社會的需求，黨國也希望紓解社會矛盾，再加上記者對專業理想的堅持，才讓中國調查記者可以在壓力與機會中，持續擴展輿論空間。依據文獻整理如下：

圖四：深度報導概念架構圖





二、報導概念架構

長久以來，調查報導奉行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新聞理論，於此，本報導提出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奉行黨管媒體的原則下，仍會有調查報導出現？」筆者認為，因為中國大陸有一小群調查記者，比其他人更能看到報導機會，更能堅持新聞專業主義，在言論持續收緊的壓力下，持續做出努力，拓展民間輿論空間。而且，我認為調查報導是基於社會責任論，而與政體無關，唯有當權者掌控媒體形成對社會的操縱，且無法充分滿足社會的需求，因而社會興起對媒體的社會責任要求。

中國是一個有新聞管制的國家，在黨管媒體的原則下，但是中國各領導人執政時期，對媒體控制的力道不一（見表一），為了回應國際壓力，或是紓解國內壓力，黨國必須適時釋放言論空間，即使威權政體也不會完全封死言論空間，否則對政權穩定有害。而且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破碎化的威權，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集團，為各自利益考量，打壓或放任調查報導發展，調查記者所處的新聞環境中，壓力與機會並生。所以，即使在中國政治控制下，調查報導仍有其生存空間。

只有生存空間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中國新聞業，涵養了一批有新聞理想的記者。1990年代，中國傳媒實行「市場化」改革，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部分媒體從黨國的宣傳部門，過渡到專業化市場報角色，他們轉型製作調查性報導，不僅有助於建立市場報的讀者群，也得以重構記者的專業形象認同。例如1997年創報的《南方都市報》，報社內部已經建立追尋新聞專業的組織文化，不僅擴編成立調查報導團隊，也由報社負擔記者進行調查報導的主要花費。這群記者心中仍保有對新聞的熱情，讓他們能隨時等候機會出手。

以調查性報導出名的市場報，同時也必須面對來自同業與讀者的壓力。中國製作調查性報導的媒體不多，學者估算行業內的記者也不過三百人，若記者未能抵抗政府壓力而文章被撤下，往往能引起同業聲援支持，相反地，記者如果刊出歌功頌德的文章，也會招來同業批評。另一方面，市場報以調查報導建立穩固的讀者群，相對地，這群讀者也以專業的標準檢視媒體表現，若在熱議的事件中媒體缺席了，可能招致共黨喉舌的罵名。同業評價與讀者

觀感，讓這些記者在堅持新聞理想的道路上，能走的長一些、久一些。



中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深，遇上網路的快速發展，正好給封閉的言論空間撕開一道裂縫。中國政府雖然不斷完善監控網路言論的技術，但網路的具有傳播迅速、匿名化、去中心化等特性，讓黨國無法像掌握傳統媒體那般容易，加上中國網民主動地回應控制，創造性地發展初規避與反控制的方式。

其實，新華社前總編輯南振中幾年前提出「兩個輿論場」的說法，黨報、國家通訊社、國家電視台組成的官方輿論場，與都市報和互聯網構成的民間輿論場的重疊部分越來越小，而且社會輿論筑便被民間輿論場引導，據奧美 2012 發佈的報告中顯示，該年有五成的熱議事件都是微博首發，再由媒體跟進報導。由此可見，風頭正健的微博也順勢拉抬傳統媒體輿論空間，網民的關注成為記者進行報導的正當理由與支持力量。

中國內部的社會矛盾，與它向世人展示的強國形象，是一體兩面。中國追求高經濟增長，採取政治威權但經濟半市場化的發展模式，稱其為半市場化，是因國家可以透過威權體制的行政立控制經濟與市場的運行，結果權力變成可交易的商品，甚至成為個人資本，為其壟斷社會資源，最終，權力擴張與資本主義的貪婪造成公權力腐敗。具體問題有官員尋租、權貴階級、貧富差距擴大等。而以上的問題又造成社會流動性低，家庭背景變成社會階級是否向上流動的關鍵原因，也使得社會愈發不公平且對立加深，仇官、仇富、勞資矛盾的現象在中國越來越嚴重，維穩的經費也越來越高。

中國政府有意識地收緊言論空間，自十六大將中央政法委納入中央政治局名單開始，胡溫十年的言論空間越縮越小，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愈發緊張，而這兩三年中，中國新聞傳媒被整頓的情形前所未見。從 2011 年初，長平被驅逐，拉開中央整頓大戲的序幕。事情發生後，長平接受英國衛報訪問，他說「我被辭職，不是因為一篇特定的文章，而是我一直以來都寫批評政府的文章」，他的離開，是否意味中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手，抓的更緊了？長平沒有正面回應，只說「整體媒體環境，確實正在發生變化。」

2011 年 3 月，《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被「放學術假」，離開工作崗位，

同時，評論版全面改組，多名評論員和編輯被清除。去年 6 月，深度報導版主任喻塵因主張軍隊國家化，也「被辭職」，深度報導版也全面叫停。南方報業遭逢巨變，種種跡象將矛頭指向去年 5 月空降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及其指派接替的南方報業南方報業黨委書記楊健。他們的任務，就是定點清除「前南方力量」。

變化，正在發生。不僅南方系受到整頓，先是 2011 年 11 月，《財經》資深調查記者楊海鵬在微博寫下：「今天正式從《財經》離職。感謝《財經》一年來對蟹家的關照。蟹媽一審判決前一周，我簽下（離職）告知書，沒有任何前兆，也不能問原因，只感到《財經》面對的壓力巨大。當夜，脊背上一層層透冷汗，惶惑無以名狀。」

再來是去年 7 月，《中國經濟觀察報》調查報導室首席記者劉建鋒，宣布辭去職務；緊接著，8 月份因成功揭發三鹿毒奶事件而聞名的《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也在微博宣布自己「被離職」，並寫下「理想已死，我先撤了」。這段宣言式的自白，不僅加深中國傳媒工作者的悲觀情緒，卻也點出一項事實：中國記者，正在出走。

被稱為「中國的林肯·史蒂芬斯」的調查記者王克勤，在今年 2 月份也透露辭職的消息。在中國，王克勤、羅昌平、楊海鵬、石扉客四人，雖分屬不同媒體，報導領域也不盡相同，但同樣調查記者的專業與信念，鼓舞許多年輕記者。但是，十八大過後，這群滿懷希望的記者沒等來政改，動盪卻先起，王克勤無奈地在微博寫下：調查記者，一桌四人三人離職。

學者張志安與沈菲所做的《中國調查記者生態報告》，即使以最寬鬆標準來定義，中國可稱得上調查記者的不過數百人，而且，四成的人正考慮轉行。支持這個行業的，不是高薪資與制度化的組織，而更多是個人脆弱但真誠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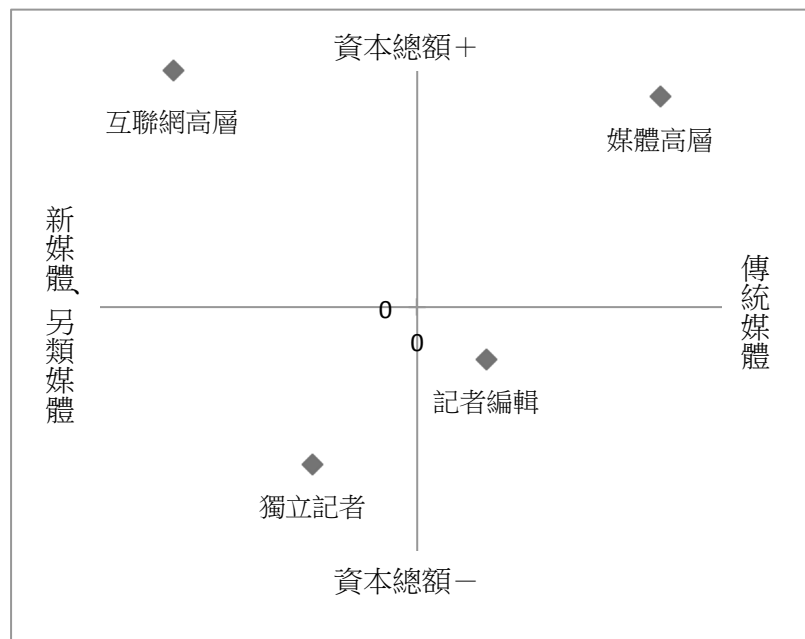
這些事證，為我們展現一個中國面貌：中國調查記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



三、報導切入點

本報導的軸線，是觀察中國調查記者所面對的壓力，與他們的反抗策略。胡溫十年言論受到更多管制，而中國調查記者首當其衝，他們遭逢壓力，或在主流媒體內潛伏，等待機會；或像煙火一樣迸發，出逃到互聯網，開創空間。但壓力是無形的，於是本報導以他們的職業流動作為切入點，觀察他們在不同空間位置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並且詮釋他們的行動意義。本報導觀察他們的社會空間，以兩個維度細緻區分：


圖五：中國調查記者社會空間圖



(本研究製作)

研究調查記者的社會位置應更細緻，我加入兩個維度觀察其變化。在水平座標上，是以媒體類型區分，向右走是指記者待在傳統媒體圈；反之，記者若選擇向左走，則是離開傳統媒體圈，以互聯網作為突破出口。在垂直座標上，我加入資本總額的變量，最上端是擁有最多資本者，相對的另一端是擁有較少資本者。

我整理出上圖中四種流動的類型：第一，調查記者流動到另一家媒體擔任管理職，晉升為媒體高層；第二，部分調查記者受到新興互聯網



企業邀請，擔任新聞頻道顧問，獲得的薪資比從前當記者要高出好幾倍；第三，記者受夠官方的控制與編輯部的命令，但對新聞工作仍有熱情，互聯網正好為他們釋放出空間，讓他們有機會成為獨立記者，但缺少媒體組織的保障，與薪資不固定等種種因素，在中國選擇獨立記者的道路，比其他國家更艱辛；第四種，也是最普遍的一種，調查記者到另一家媒體繼續擔任調查記者，累積自己的作品與名氣，再往其他象限移動。

本深度報導觀察調查記者的流動後的社會位置，而且因應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發展出不同的突圍策略。因為，多屬於中國 80 後的調查記者，他們得以運用新科技的傳播潛力作為調查報導的利器，更重要的是記者跨越心中的高牆，克服恐懼，並進一步擬定、修改自我策略，達成心目中相符的專業形象。



第二節 訪談對象

本深度報導以中國調查記者的突圍策略為主軸，因此採訪對象的選擇為，仍從事調查性報導相關工作的新聞從業人員。首先，必須先定義何謂調查性報導？中國的調查性報導又有何不同？

調查性報導，據密蘇里新聞學院《新聞寫作教程》的定義，指的是「一種更為詳盡、更帶有分析性、更需要花費時間的報導」，其調查記者的目的就是去挖掘那些被藏起來的消息，揭露被隱藏起來的真相；因此，許多調查報導的選題都針對政府腐敗和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

中國調查報導的發展脈絡與美國不同。首先，美國新聞業是建立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上，於 1966 年通過資訊公開法，其立法主要目的在保障人權與落實民主法治；再者，美國是民主政體，以兩黨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與三權分立的國家運行規則，作為權力制衡的手段。但中國不然，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黨專制威權政體，傳媒系統在黨的嚴格管控之下，且中國政府資訊不透明，中國的調查記者就像沒有牙齒的「紙老虎」，失去主動調查能力。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存在調查性報導的空間。「輿論監督」這個概念架構起中國當代的新聞業，與西方調查性報導相比，雖然神離居多，但還有貌合之處，也就是對傳媒「看門狗」功能的強調，但深究其內涵，中國堅持傳媒是黨的喉舌，基本上中國的輿論監督是黨的行政權力延伸，不同於西方第四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並且要盡量揭發其不法和徇私，這是西方的新聞理念。根基於理念上的差異，中國傳媒的輿論監督不能及於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但其關於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等民生類的調查報導，以及財經類專業門檻高的調查報導卻蓬勃發展。

瞭解中國調查報導的脈絡後，便可以知道中國調查報導題材集中於民生與財經議題，屬於學者所稱的「低層次監督」。本報導採訪對象為中國調查記者，他們與一般寫深度報導的記者不同。一般的深度報導可能是解釋性報導，針對某些公共議題提供解釋和觀點，報導可以是正面的，也比較不會面

臨壓力；但調查性報導選題更偏向揭露被隱藏的信息，報導多數是負面的，面對的壓力直接且嚴厲。



本深度報導選擇採訪對象的標準，對調查記者的定義為：需要有一半以上工作時間從事調查報導，且有三篇代表性作品以上，主要以社會、時政、財經等領域的負面題材為主，記者對被遮蔽的真相進行突破採訪。更重要的是，他們即使離開原本媒體後，轉職到其他媒體或到互聯網自辦媒體，也要持續做與調查報導相關的工作，拓寬輿論監督的空間，否則排除於樣本外。

本報導試圖兼顧中國大陸各地的調查記者，但若採訪對象多元，勢必造成變項繁複，在加上旅費限制的因素。因此，我選擇以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城市，以面向市場的都市化報章雜誌為主，透過訪問各媒體資深記者，並邀請推薦人選之滾雪球方式收集名單。將名單納入圖四的象限圖中，預計訪談對象整理如表四。實際採訪對象請見附件二。

表四：預計採訪對象

象限位置	預計訪談對象	概況	備註
第一象限 (記者轉作媒體高層)	王克勤	前《中國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助理、〈調查採訪室〉主任、「大愛清塵」發起人	已採訪
	程益中	前《陽光時務》總編輯	已取得聯繫方式
	羅昌平	《財經》雜誌副主編	已取得聯繫方式
	胡舒立	財新《新世紀》週刊總編輯	已取得聯繫方式
第二象限 (記者轉作互聯網高層)	傅劍鋒	騰訊新聞中心副總監	尚未取得聯繫
	賈葭	騰訊網《大家》欄目編輯	已取得聯繫方式
	陳菊紅	騰訊網總編輯	尚未取得聯繫
第三象限 (記者在互聯網自辦媒體)	趙何娟	《鈦媒體》創辦人	已取得聯繫方式
	左志堅	《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拇指閱讀》創始人	已取得聯繫方式
	王甘霖	王甘霖獨立調查	尚未取得聯繫
	朱瑞峰	人民監督網	尚未取得聯繫
	周浩	記者、紀錄片導演	已取得聯繫方式
	龍志	《南方都市報》記者、紀錄片導演	已取得聯繫方式
第四象限 (記者留在傳統媒體內)	張潔平	前《陽光時務》主編	已初訪，約第二次訪談
	劉建鋒	前《中國經濟觀察報》記者	已採訪
	譚翊飛	《財經》雜誌記者	已採訪
	簡光洲	前《東方早報》記者	已取得聯繫方式
	王星	《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	已採訪
	陳中小路	《南方週末》記者	已取得聯繫方式
	宮靖	財新傳媒記者	已採訪
	陳寶成	財新傳媒記者	已同意受訪
	李大同	記者、報導文學作家	尚未取得聯繫
	盧躍剛	記者、報導文學作家	已取得聯繫方式
第三者名單			

	張志安	廣州中山大學副教授	擔任中國大陸地區指導
	笑蜀	前《南方週末》評論員	已採訪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已取得聯繫方式
	錢綱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畫主任	已取得聯繫方式
	曹海麗	《紐約時報》中文網執行主編	已取得聯繫方式
	楊憲宏	1985 年聯合報環保記者	已取得聯繫方式
	楊渡	1986 年時報新聞週刊記者	已取得聯繫方式

表五：採訪題綱：

壓力	
整體氛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請您描述，從十六大中央政法委進入政治局，胡溫執政時期、劉雲山職掌中宣部之後，這十年來的輿論氛圍變化？ 2. 自習近平總書記上台後，曾莊嚴承諾依憲法施政，也說反腐要蒼蠅老虎一起打，後來又傳出「七不講」，您如何觀察這些發言？
個人壓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您在調查報導的過程中遇過什麼樣的危險？或是聽過其他記者遇過危險？您感受過來自何種上級的壓力？ 4. 我們都關注到，南方報業近三年的人事異動，國外媒體報導直指「中國媒體控制收緊」。請問您有在報稿時哪些題目受到阻礙嗎？這段時間，報社編輯部內有哪些新的潛規則？ 5. 除了南方報業外，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觀察報》的資深記者王克勤、劉建鋒離職。您覺得，這是全中國都面臨同樣的新聞收緊壓力，或是只是區域性的現象？
主體	
倫理主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 您大學本科是主修什麼的？您為什麼想當調查記者？您覺得與一般記者有什麼不同？您又是怎麼當上調查記者的？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採訪經驗？ 7. 您對調查記者的定義是什麼？是更接近「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性？還是取自於西方的「第四權」概念？
新聞專業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8. 您為什麼仍然留在主流媒體內製作調查報導？媒體組織提供給您哪些支持？您如何辨認政治底線？誤觸雷區時，媒體組織又是如何保護你？ 9. 您為什麼選擇離開主流媒體？主流媒體內的輿論空間有何變化？離開主流媒體您有覺得失去什麼嗎？ 10. 中國調查記者間有 QQ 群或郵件組交流訊息，請問您們如何透過郵件組分享新聞資訊？您曾與其他媒體的合作經驗為何？ 11. 中國新聞業界有《南方週末》的年度傳媒致敬，而輿論監督研討會也選出年度最佳調查報導。這些獎項對中國調查記者的意義是什麼？同業之間的評價又如何影響自己的寫作？ 12. 中國存在名調查記者的現象，您自己如何評價？您經常在個人微博評論時政嗎？您在微博上的粉絲如何影響你寫作？

機會	
	<p>13. 您從事調查報導時，有多少比例是透過網路獲得新聞線索？如何處理可信度問題？如何利用微博擴大報導的影響力？</p> <p>14. 最近，越來越多調查記者離開新聞業。前《南方週末》記者傅劍鋒到騰訊擔任新聞中心副總監，前《新世紀》週刊記者趙何娟辦起科技新聞網站〈鈦媒體〉，您覺得為什麼這麼多記者往互聯網產業移動？</p> <p>15. 您為什麼選擇自辦網站或加入門戶網站？您在互聯網有哪些空間是比傳統媒體更自由的？您在互聯網會受到哪些管制？</p> <p>16. 互聯網沒有採訪權，您覺得影響力比以前更大還是更小？關注的議題和擔任記者時有何不同？處理的方式又有何差異？</p>
影響	
	<p>17. 這些事情發生後，有加深中國新聞業的悲觀情緒嗎？或是有發生其他事件，提振中國新聞業的士氣？您對這件事有什麼感受？身旁記者有什麼感受？</p> <p>18. 互聯網開創中國調查報導的空間，您從記者轉作獨立紀錄片導演後收入來源為何？曾遭遇過什麼壓力？和以前擔任記者的報導空間有何差異？</p>
未來	
	<p>19. 您認為台灣戒嚴時期的記者突圍方式對您們有影響嗎？如果有，是在哪些層面有影響？</p> <p>20. 您覺得中國調查報導的前景如何？為什麼這麼預測？</p>

第三節 寫作架構



本文為一專題報導，分為十篇主題，篇篇獨立但前後連貫。第一篇先描述中國調查記者目前面臨的困境。習近平接班後，權力全面集中，尤其自他在 2012 年 8 月 19 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宣示「意識型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後，中國言論空間全面緊縮。但兩岸交流愈趨頻繁，台灣需要了解更透明的中國，而中國政府卻有隱匿資訊的習慣，我們需要中國調查記者潛入利益漩渦、挖掘國家的祕密。

從學者的調查得知，幅員廣闊的中國，嚴格定義下的調查記者僅有三百人，而且中國前幾年有一項調查，記者被名列十大高危險職業第三位，僅次於礦工與警察，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因為這些巨大的危險，而形成獨特的工作團體。從歷史角度切入，2003 年是中國調查報導關鍵的一年，這年胡溫政府上台，因前期的開明作風，讓《南方都市報》的〈孫志剛之死〉得以刊出，鼓勵市場報前仆後繼製作調查性報導；但自 2008 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後，政權變得傲慢且不在乎民間的意見批評。

經濟劇變下的中國，司法不公、官僚傲慢，造就趨向暴力化的社會，於是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作為因應，每年維穩預算要高出國防預算。槍桿子與筆桿子是中共建立政權的基礎，但在和平時代，經濟部門取代宣傳部門，致使宣傳部門接收上級的維穩要求後，會從嚴工作作風。持續壓縮新聞空間，迫使傳統媒體內的菁英媒體人流動到互聯網，卻也將新聞專業精神帶到網路，持續擴大網上的言論空間。習近平發起 819 淨網行動重拳嚴打網路，從央視公開審判網路大 V 薛蠻子起，就不斷壓縮網路言論空間。面對重重壓力，仍有不少調查記者秉持專業的調查新聞原則，在 2012 持續做出數篇具影響力的調查報導。

從他們的突圍中，折射出更大的意義。第二篇以《Lens》雜誌袁凌的〈走出馬三家〉為案例，從採訪經驗切入，觀察他如何突破找到核心消息源？這組報導具有高風險，不僅討論高敏感的勞教制度，更牽涉馬三家是中共改造法輪功基地，為了能刊出，袁凌如何切割風險？他又如何克服內心恐懼，不做自我審查？羅昌平是袁凌的上司，他如何幫記者

頂住其他壓力？採取何種策略讓稿子能順利刊出？



第三篇的案例是〈起底王立軍〉，這篇報導是 2012 年調查報導代表作，不僅囊括南都深度報導金獎、南都全媒體特別大獎，銷售量也十分驚人，小報攤一早就搶購一空。前幾年，重慶瘋狂地陷入唱紅打黑，氛圍是風聲鶴唳，季天琴對重慶選題極感興趣，陸續進入重慶報導，從黎強案，她發現重慶「打黑」不對勁；到李莊案，擴及打擊律師群體，激起律師反彈。石扉客也在微博關注重慶打黑發展，邀請季天琴加入《南都周刊》，季加入南都做《圍觀重慶》，如何潛伏重慶？怎麼發現監聽？為何被要求撤離？季天琴又是如何找到關鍵人物？如何說服他提供資料？如何躲在重慶沒人知道？報導完成後，為何石扉客等了三個月才出刊？最後又是如何突破阻礙、順利刊發？

第四篇文章說明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的信念，用事實當記者的保護傘。介紹兩個案例，一個是記者王晨所做的〈奢侈動車〉，就是用經濟翹動政治的範例，這篇報導獲得騰訊網 2012 年度調查報導獎。王晨是調查鐵道部的專業記者，從調查〈張曙光秘密〉發現官商勾結，從經濟學推論壟斷企業必然有權力尋租，開始製作〈奢侈動車〉。王晨分享她報導的過程，從企業對立方找消息來源，找到得標廠商的內部人員，用財新的 memo 制度把控風險。你要踩雷，就要更專業。除了經濟議題，環境議題在中國越來越迫切，財新宮靖的〈自來水真相〉提問：中國所有水質檢測標準都聲稱達國際標準，但為什麼沒人敢生飲？他不僅拿到官方不公開的數據資料，也採訪到水廠跟水企業的內部員工，揭露地方水廠球員兼裁判。

第五篇介紹部分資深記者加入互聯網產業，擔任新聞網站的管理職，利用互聯網偷偷開個窗口，偷渡自己的理想。前《南方週末》調查記者傅劍鋒就是代表人物，2011 年他離開《南方週末》投身互聯網產業，曾任騰訊網新聞中心副總監，原創品牌欄目《活著》等。陳峰和王雷，原本是《南方都市報》撰寫〈孫志剛之死〉而聞名的調查記者，也相繼出走至網路服務商，陳峰是網易新聞總編輯，網易有幾個核心欄目：看客是圖片專題、數讀是資料新聞、另一面則是深度報導，他向我介紹這

次薄熙來庭審中，他如何結合傳統媒體與互聯網人才，當天發表多篇專題。



第六篇介紹中國最重要的社交網站－微博。2010年是微博元年，短短時間內，它傳播力量突然爆發，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就是微博主導議程的範例。王星當時是南都《網眼版》編輯，被責令追蹤郭美美新聞，他事後回想，因為事情撲朔迷離，只能一直做下去，最後證明，只是網民對著自己虛構的劇情意淫，而記者放棄調查能力。隨著郭美美事件發酵，微博上關注中國官辦公益組織。網路爆料人周筱贇注意到，中非希望工程要10年內在非洲興建1000所小學，周筱贇主動介入調查，發現其父盧俊卿的世界華商會，其實在搞「合影經濟」的詐騙手段，不僅深入調查，找到內部人士說法和合約證據，並持續在個人博客發文攻擊，甚至起訴手段，要求對方公開說明。

《南方周末》調查記者陳中小路在2011年發表一系列〈宋基金會地產生意〉，揭露官辦組織一手拿人民的捐款，另一支手卻拿錢炒房、放高利貸。這一系列報導，讓陳中小路被評為南方報業年度記者。經濟學背景，讓她習慣用數據分析，不同於社會記者先找個案，她花了三週時間去查公司工商資料，並從工商資料裡追查貸款模式，這篇報導不同其他調查報導，沒有內部人說明情況，她只能自己拼湊資料，透過法院判決書她找到宋基金會用來洗錢的人頭公司，翻閱法規發現宋基金會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最後透過微博找到關鍵人物，願意提供宋基金會放高利貸的收據，最終完成一組證據鏈完整的調查報導。

第七篇討論微博的民粹化。信息碎片化的特色，催生民粹輿論陣地，削減媒體議程設置能力，並企圖左右新聞報導方向，鄧玉嬌案即是一例，22歲的洗腳店打工女孩鄧玉嬌刺死地方招商辦主任鄧貴大，網路盛傳鄧玉嬌因反抗官員性侵犯而進行正當防衛，一時間，她被稱為「烈女」。南方都市報記者龍志，試圖還原兩人真實面貌，鄧玉嬌不是烈女，她有精神與失眠困擾，鄧貴大只是地方小官，出身貧苦農村，家族只有他一人到城裡工作，但結果引起網上輿論熱議，龍志被人肉，甚至有人寫信到南都要求開除龍志。



《南方週末》記者柴會群寫的〈唐慧贏了，法治贏了嗎？〉是另一極端案例。唐慧案該事件起源於她的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案，唐慧因上訪而被勞教，後來唐慧起訴永州勞教委，今年 7 月二審宣判唐慧勝訴。此案還引發信訪與「穩控」合力導致的司法不公，對判決結果因壓力導致量刑過重的討論質疑。此前，媒體和網民合力將唐慧打造成「聖母」形象，柴會群基於網路上的爆料，在報導中將唐慧描寫成鬧訪的訪民，而且懂得運用穩控的壓力與官方叫板，此報導一出引起輿論爭議。陳峰強烈批評柴會群不理解中國現實，龍志覺得他忽略或刻意避免了維穩的背景，楊海鵬稱柴是很優秀的醫療記者，卻不知怎地寫了社會題材，他這次看不下去，因為題材過於「殘忍」。

第八篇描述當下中國新聞業言論緊縮的情況。8 月 19 日習近平主持全國宣傳會議，在講話中提到：「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宣傳思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等內容，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委員劉雲山提到：「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網際網路，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發表講話之後，各地黨委書記、宣傳部長、黨刊黨報都紛紛表態，並且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展開打擊網路謠言活動，八月下旬，網路大 V 薛蠻子則因涉嫌「嫖娼」被逮捕，幾天後他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交代嫖娼過程；8 月 25 日新快報劉虎因涉嫌「造謠傳謠」被公安局拘留；最高法院甚至出台荒謬的「500 條」規定。

第九篇則是描述中國新聞業廣告收入全面下降，商業收入緊縮後對調查報導的影響。中國傳統媒體 2013 年廣告收入急遽滑坡，上半年盤點，中國報刊廣告市場投放季度同比跌幅達 12%，廣告收入下滑可能與中國經濟放緩相關，但報刊的收入滑坡遠遠超出整體經濟不景氣的關聯效應，主因為門戶網站瓜分多數的廣告資源。而且中國記者薪資是底薪加稿費制，十年底薪都未調整，據中山大學張志安副教授所做調查，中國調查記者超過六成薪資落在 5000-10000 元間，還算不上中產階級。管制下的尋租，可將權力變現，部分報刊做起「有償沉默」的生意，財新記者陸媛聽到很多企業界朋友向她抱怨，她珍惜這份工作，不想讓劣

幣驅逐良幣，開始調查這一選題，但調查過程比想像更困難，被勒索企業不願意說，也無法取得核心的帳目資料。最終，她說服了對方，順利拿到證據。



還有一些記者，跟著中國互聯網產業興起，選擇自創媒體。第十篇主題：觀察這群記者在互聯網找到哪些空間與機會？他們又如何被新的控制力量限制？趙何娟創立的鈦媒體就是典型的例子，鈦媒體是一個獨立新聞網站，關注科技價值與趨勢，而創辦人趙何娟曾任職於《財經》雜誌與財新傳媒《新世紀》週刊，曾得過 Diageo 盃最佳商業報導提名，以及《南方週末》年度致敬記者等，代表作有〈電信戰非洲〉、〈邵氏棄兒〉系列報導。另一個案例是劉建鋒原本想模仿台灣的公眾集資平台，贊助調查報導，但未能成功，他變換想法，在淘寶上「先賣後發」，贊助自己進行調查報導。

另外，微信公共帳號，憑著使用者粘性、私密性以及相對寬鬆的審查機制，成為最重要的新興載體。前《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的左志堅，現在是《拇指閱讀》的創辦人，該微信公共帳號每日發表推薦書評，提供公眾閱讀風氣，未來更進一步，他希望搭建電子書平台，讓從事高質量寫作的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報。羅昌平也在實驗，他在想，如果每個人說話的成本都降低了，還需要記者嗎？於是，他在網易真話頻道連載〈打鐵記〉，並與《南都周刊》合作，將〈打鐵記〉做成 app 上架販售，他說「抽成多少我不在意，我想在新媒體有更多嘗試」。

為閱讀方便，筆者將採訪企劃整理如附件一。

附件一：深度報導企劃書



第一篇

1.題目：時代的紀錄者

2.主題：

- (1). 習近平接班後，權力全面集中，尤其自2012年8月19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意識型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後，中國言論空間全面緊縮。
- (2). 兩岸交流愈趨頻繁，台灣需要了解更透明的中國，而中國卻有隱匿資訊的習慣，需要調查記者幫我們挖掘國家的祕密。
- (3). 2003年，胡溫政府上台，因前期的開明作風，讓《南方都市報》的〈孫志剛之死〉得以刊出，鼓勵市場報前仆後繼製作調查性報導。
- (4). 經濟劇變下的中國，司法不公、官僚傲慢，造就趨向暴力化的社會，於是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作為因應。
- (5). 和平時代，經濟部門取代宣傳部門，致使宣傳部門接收上級的維穩要求後，會從嚴工作作風。
- (6). 持續壓縮新聞空間，迫使傳統媒體內的菁英媒體人流動到互聯網，卻也將新聞專業精神帶到網路，持續擴大網上的言論空間。
- (7). 習近平再次打擊網路，從央視公開審判網路大V薛蠻子起，就不斷壓縮網路言論空間。
- (8). 2012下半年，報紙廣告市場全面衰退，激化新聞尋租現象。
- (9). 面對重重壓力，中國調查記者秉持專業的調查新聞原則，在2012持續做出數篇具影響力的調查報導。



3.探討那些問題

- 為什麼中國在2013年言論緊縮？
- 胡溫十年的新聞空間變化為何？
- 中國社會為何滑向暴力與犬儒兩端？
- 宣傳部門為何會加大力度打擊？
- 調查記者到互聯網擔任媒體高層，會如何擴大網路言論空間？
- 為什麼習近平特別打擊網路言論？
- 中國媒體市場下滑後對新聞業將帶來什麼影響？
- 為何中國調查記者在言論緊縮的年份反而製作更多優質的調查報導？

4.採訪那些對象

1)當事人：陳峰、王雷、傅劍鋒、王星、周筱贇、羅昌平、陸媛、陳中 小路、季天琴、王晨、趙何娟、劉建鋒、左志堅

3)第三者：張志安、李永剛、賈葭、許知遠

第二篇

1.題目：最堅實的後援



2.主題：

- (10). 中共三中全會，決議廢除勞教制度，這。2012年《Lens》發表一篇〈走出馬三家〉報導，引起全國關注，再次將廢除勞教制度帶到公共討論視野。
- (11). 馬三家是中國最敏感的勞教所，不僅因為它是勞教制度的示範基地，還因為它也是關壓法輪功的秘密勞所。在中國，它是不能被提及的地方。
- (12). 撰稿記者袁凌分享他的採訪歷程，起初接觸訪民，他覺得被一團黑色情緒裹挾，有三年時間他只是記錄，並把採訪的資料堆在角落，不敢翻閱。
- (13). 有三年的時間，他在不同的媒體，重複報稿，但始終因為題材敏感，未能報導。直到他在《財經》遇到羅昌平，願意幫他頂住上層的壓力。
- (14). 了解題材敏感，他採訪更加謹慎。他為了規避風險切割法輪功、交叉訪問印證訪民說法、追問細節並多方核實、採訪突破找到獄所內部人士、面對戲劇化情節克制
- (15). 發刊的策略，羅昌平刻意選擇《財經》底下，一本流行文化類雜誌《Lens》發表，在封面上完全沒提及《走出馬三家》這篇報導。雖然躲過審查順利出刊，但最終《Lens》無法抵抗風險而被停刊。
- (16). 信訪與勞教是中國最矛盾的兩種制度，一方面鼓勵民眾反映輿情，另一方面公安可對擾亂社會秩序份子實行勞教，可連續關押長達四年，而近來又因訪民人數過多，勞教所不堪負荷，加上地方政府維穩壓力，在北京近郊興起「黑監獄」。矛盾的現象，成為中國記者最好的題材，南都王星〈久敬莊裡的強姦案〉、南周龍志〈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財經譚翊飛〈保安公司專職截訪〉，這些報導都為他們贏得當年深度報導大獎。
- (17). 《走出馬三家》能成為廢除勞教制度的最後一篇報導，註定在歷史留名，但卻也仰賴中國記者持續對此議題關注。以及羅昌平願意扛著壓力，讓此篇報導刊出。
- (18). 羅昌平與袁凌有著特殊的緣份，十年前，羅昌平剛進《新京報》時，袁凌是副主編，後者是前者的領導，十年會位置卻互換了。但不便的是，他們同樣對新聞堅持。袁凌當初為了當記者，放棄清華博士學歷，也放棄北京戶口，至今，仍是一名北漂，羅昌平則願意為了稿子刊出，不惜離開胡舒立的團隊。
- (19). 很長一段時間，他背負罵名，被說是忘恩負義。他與胡舒立的緣份，開始於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羅昌平剛進財經，胡舒立是中國新聞業最有衝

勁的女人，她願意花三倍的經費投入社保案，前後動員近三十位記者，持續追蹤長達三年，與記者站在深喉樓下等了一夜，只為拿一份資料。羅深受她的影響，矢志做為專業記者，數年內產出驚人，揭黑題材涉及中央、官場、軍方、首富，而胡舒立對他也極為賞識，不僅為他出書作序，還公費送他去讀最昂貴的中歐商學院EMBA。

- (20). 但他們的分裂從「央視大火」開始，羅昌平寫完了稿，但始終被按住不發，胡舒立雖然敢言，但仍有她的考量，畢竟央視是中宣部的錢袋子、中央的喉舌單位，敏感度遠超過以往的揭黑報導。2009年，胡舒立決議與《財經》分家，羅昌平當時問了聯辦的老闆王波明：央視這篇稿子能發嗎？他答應了，自此，羅昌平與舒立團隊分道揚鑣。
- (21). 思考後，他希望能保有雙重獨立性，不僅獨立於編輯，也獨立於組織。選擇留下後，他發現重建廢墟比打砸招牌更難。他在副主編位置上，努力發出每篇稿子，但壓力不只來自上層，也來自記者，他始終不喜歡談這些，他深知在這位置上，就要能扛下壓力，就像他之前的長官一樣。數年後，安元鼎、馬三家、公共裙帶的報導陸續問世。
- (22). 安元鼎報導後的某天，公安帶了幾個人找上門，稱報導失實，要找記者問話，但作者譚翊飛出國旅遊，幸好，財經有獨創的「memo制度」，每個記者必須寫下消息來源、談話內容，以及夾帶核心的文件資料，同時抄錄給編輯、副主編與主編。這項新聞專業的要求，要求記者每個信息要能重複驗證，也多次保護《財經》脫險。
- (23). 坐在北京東二環《財經》的辦公室裡，最近，薄熙來公開庭審成為中國媒體人最關切的議題之一，每個人總能說上兩句，羅更多回想起年輕時的他，調查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過程，薄與陳，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政治明星，都是呼聲極高入常人選，評斷中央級領導是中國媒體大忌，兩篇危險係數都高，但羅昌平公允地說：石扉客的〈起底王立軍〉給同業的振奮更大。



3.探討那些問題

- 〈走出馬三家〉的採訪過程，如何突破找到核心消息源
- 為了能刊出，報導如何切割風險，如何克服內心恐懼，不做自我審查
- 簡介勞教制度，以及零八後普遍的維穩壓力，興起的外包維穩工作
- 袁凌的記者生涯，2000年初當記者時，聲望與收入都相對高
- 袁凌來自農村、擁有強烈草根情結、到北京求學工作、相信媒體力量
- 羅昌平作為雜誌領導，如何幫記者頂住壓力，並讓稿子順利刊出
- 羅是中國著名的調查記者，80後卻多次獲頒南方傳媒年度致敬人物，他最早成名的作品是〈上海社保案〉，他分享《財經》如何打團隊戰
- 胡舒立啟蒙並賞識羅昌平，她早年率領《財經》團隊，對籠子的精準計算，以及用經濟翹動政治版塊的報導風格，是中國新聞業的新路徑。
- 財經與財新分家，羅昌平選擇留守，也更清楚要堅持自身雙重獨立
- 他繼承《財經》敢言風格，並嚴格要求記者專業性，以保護記者。
- 《Lens》發表「馬三家」後，宣傳部以其他理由撤銷刊號，羅昌平感嘆監管無底線。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 袁凌、羅昌平
- 2)競爭者: 王星、龍志、譚翊飛、石扉客
- 3)第三者: 胡舒立、楊海鵬、白紅義、陳中小路、趙何娟、傅劍鋒

第三篇

1.題目： 拿料的功夫



2.主題：

- (1). 〈起底王立軍〉是2012年調查報導代表作，不僅囊括南都深度報導金獎、南都全媒體特別大獎，銷售量也十分驚人，小報攤一早就搶購一空
- (2). 前幾年，重慶瘋狂地陷入唱紅打黑，將薄熙來打造成紅色傳統繼承者，王立軍作為薄的一把手，身兼重慶副市長、政法委書記與公安局長，完全控制媒體信息管道，並厲行打黑，將民營企業家打成黑社會，將其入監、沒收財產、甚至處死。
- (3). 重慶的氛圍是風聲鶴唳，很多男記者都不敢去，但看來嬌弱的季天琴，還在上海《新民週刊》就對重慶選題極感興趣，陸續進入重慶報導，從黎強案，她發現重慶「打黑」不對勁；到李莊案，擴及打擊律師群體，激起律師反彈
- (4). 同樣感覺重慶有問題的，還有《南都周刊》主編石扉客，他在王立軍被央視打造為「打黑英模」時，就在微博上說：他是騙子，直到李莊案後，他深感重慶隨時會讓文革重演，積極規畫重慶選題。同時，季天琴加入團隊，一起規劃〈圍觀重慶〉
- (5). 季天琴潛伏重慶，不住酒店、不直飛重慶；為了見到被害人家屬，偽裝成送快遞的；到重慶調查另辦手機，平常用Gmail聯繫；曾調查王立軍造假學歷，去電核實後接到恐嚇電話；收到宣傳部嚴斥，要求從重慶緊急召回記者
- (6). 重慶也開始反擊，王立軍對公安內部講話，聲明媒體場域我們沒有主動權，但到法院就是我們地盤，鼓勵幹警起訴媒體。石扉客獲知後，大感震驚並在微博砲轟，並公開向王立軍邀訪，請他回應說法。結果，重慶派人到他長沙老家調查底細。
- (7). 民粹勢力向他反撲，網路打假名人方舟子，曝光之前與石扉客的書信，信中提及石扉客正在調查王立軍。結果，他家人的信息被五毛公布在網上，網上謠傳他與季天琴有不正常關係。
- (8). 宣傳部嚴管《南都周刊》，禁止任何重慶相關選題，石扉客變換策略，改以報導重慶打黑中的維權律師，發表〈大牌律師轉型〉，他說：要在黨管媒體下想辦法做，媒體的天職是報導，不說話難道等著遭殃嗎？
- (9). 戲劇性轉折，王立軍夜逃美領館，石扉客聞訊後激動落淚，啟動《起底王立軍》規劃，但他更加謹慎，為避免污名化就先自我污名化，也不在微博上發言，保持低調
- (10). 季天琴用微博找到關鍵深喉嚨，真誠和死纏說服他，不住酒店借住他家，花

三天時間把關鍵證據抄下來

- (11). 規避風險，石將薄王關係切割，但關鍵尼爾伍德案，新華社通稿等於官方定調，最大風險是在通稿上嵌入細節，事實上推翻通稿，還原王立軍共謀身分
- (12). 稿件在八月份完成，等待時機，預判十八大後會有短暫政治放鬆期。三個月等待中，稿件隨時得更新狀況、補訪內容；以及時刻面對消息源的巨大關注。石扉客與領導叫板「不登就辭職」，也遇上開明審讀員，才讓報導順利發刊。
- (13). 中國新聞業，大環境持續收緊，現在更仰賴個人強大的心理耐力。石扉客自中南政法大學畢業後進入媒體工作，特別關注警媒關係，而監督警權，也是中國調查報導一組重要題材，從十年前南都陳峰、王雷的〈孫志剛之死〉，確立調查報導能為媒體加值，此後各家媒體紛紛成立深度新聞部。
- (14). 陳峰回顧十年變化，指出媒體環境確實變差。當年，一篇報導能引起高層關注，進而廢止收容制度。王雷卻認為報導的作用是引起公民討論，包括三博士「公車上書」，公民力量覺醒才是關鍵。
- (15). 如今，宣傳部監管手段更即時、更彈性；新聞娛樂化讓調查報導越來越不被讀者關注；更不用說官方不在乎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南都周刊《起底王立軍》別具意義，也讓他相信深度還是有市場的
- (16). 2003年，南都刊發〈孫志剛之死〉，確立一個媒體的品牌，但沒有人注意到，中國最大門戶網站騰訊網，也在同年被政府評為重點發展網站。當時，還沒有媒體人看的上門戶網站...



3.探討那些問題

- 重慶唱紅打黑的背景，提及事件「黎強案」
- 媒體競爭激烈，不能漏新聞的壓力，讓記者自願當起薄王的化妝師
- 審判李莊前，重慶要求中青報發通稿抹黑律師收黑錢，引起律師界公憤，群起寫評論反攻
- 李莊案停審記者合作記錄現場，律師提供協助分析重慶打黑問題
- 王立軍為何要提「雙起論」？警媒關係如何變化？
- 石扉客在微博關注重慶打黑發展，季天琴找深喉，發現石扉客也在調查
- 季加入南都做《圍觀重慶》，如何潛伏重慶？怎麼發現被監聽？為何被要求撤離？為什麼一定要撤離？
- 石在後方幫季分析情況，陪季去見深喉囉核實內容。
- 被宣傳部嚴令警告後，石扉客想其他角度切入報導
- 重慶反擊，在網上散播謠言；方舟子洩底造成網路民粹攻擊石扉客。
- 石把自己與家人逼到危險境地，沒人敢與他聯繫，他也不再在微博發言
- 戲劇化轉折，王立軍出逃美領館，《起底王立軍》選題啟動。
- 《起底王立軍》這組報導風險在哪裡？石扉客如何規避風險？
- 季天琴如何找到關鍵人物？如何說服他提供資料？
- 報導完成後，為何等了三個月才出刊？最終如何突破阻礙、順利刊發？
- 同個時期，為何只有這一篇重慶報導？
- 深度報導還有市場嗎？為何陳峰與王雷都不在傳統媒體當記者？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 季天琴、石扉客
- 2)競爭者: 賀信、陳峰、王雷、袁凌
- 3)第三者: 陸曄

第四篇

1.題目：用事實說話



2.主題：

- (1). 十一年《財經》主編經歷，胡舒立屢屢揭露財經黑幕，《商業周刊》稱她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2009帶著採編團隊加盟《新世紀週刊》，堅持讓事實說話，以經濟翹動政治版塊。
- (2). 王晨所做的〈奢侈動車〉，就是用經濟翹動政治的範例，這篇報導獲得騰訊網2012年度調查報導獎。王晨是調查鐵道部的專業記者，從調查〈張曙光秘密〉發現官商勾結，從經濟學推論壟斷企業必然有權力尋租，開始製作〈奢侈動車〉。
- (3). 王晨分享她報導的過程，從企業對立方找消息來源，找到得標廠商的內部人員，用財新的memo制度把控風險。你要踩雷，就要更專業。
- (4). 王晨的說法呼應胡舒立，胡舒立說過：在中國，記者能犯錯的空間很小，比外地如美國的記者要小得多。為免粉身碎骨，「事實」正是記者保護自己的最佳防衛。
- (5). 紐約時報中文網總編輯曹海麗是王晨的前同事，她們曾合作過多篇鐵道部報導，她回憶報導鐵道部的風險，並肯定胡舒立把握報導尺度。前不久，紐約時報中文網才以〈溫總理家人財產的祕密〉獲得普立茲獎，但也因這篇報導，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在中國被封，至今仍未解禁。
- (6). 同樣談溫總理家人財產，財新的〈誰買平安〉就寫的隱晦，但賀信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講什麼問題，上海的資深媒體人楊海鵬與寫稿的紐時記者熟識，他回憶紐時的深喉嚨是他當初援救出來的，他只直接指責過紐時記者處理不夠細緻。
- (7). 籠子裡的空間有多大？面對著審查與自我審查，胡舒立說：不要想太多，想做就去做，找到真相，就去報導。她會妥協，但不會妥協太多：「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與權力周旋，是一門藝術。
- (8). 除了經濟議題，環境議題在中國越來越迫切，財新宮靖的〈自來水真相〉提問：中國所有水質檢測標準都聲稱達國際標準，但為什麼沒人敢生飲？他不僅拿到官方不公開的數據資料，也採訪到水廠跟水企業的內部員工，揭露地方水廠球員兼裁判。
- (9). 宮靖認為，環境問題是中國未來百年的核心問題，因為以往的經濟發展未考慮負外部性，他也認為證據紮實沒有邊界問題，他的〈自來水真相〉全文消

息來源都實名，在中國調查報導中非常少見，他也獲中國輿論監督研討會年度記者，以及中外對話與《衛報》的「中國最佳環境報導獎」，本文亦獲亞洲開發銀行「開發亞洲新聞獎」

(10). 反覆調查、引證資料、不斷求真，胡舒立也要求記者不收紅包、不能上微博討論報導題材，她認為在中國做調查要盡量低調，堅持報導真實，風險就不會高，記者要想的是如果沒有禁令，你能做到多少。

3. 探討那些問題

- 胡舒立所提倡的新聞專業主義是什麼？獨立與真實
- 財經模式如何影響中國新聞業？用經濟議題翹動政治版塊
- 案例：奢侈動車、誰買平安
- 外媒在中國是補充性質？
- 環境議題是中國需要迫切面對的問題，用環境報導推動改革
- 案例：〈鎬米殺機〉、〈自來水真相〉
- 在新聞管制環境中，如何把握好報導的邊界？
- 使用匿名性消息來源的考量？如何規避風險，保護自身安全？

4. 採訪那些對象

- 1) 當事人：王晨、宮靖、胡舒立、曹海麗、趙何娟
- 2) 競爭者：
- 3) 第三者：賀信、楊海鵬

第五篇

1. 題目：老將的新聞實驗



2.主題：

- (1). 2003年，《南方都市報》的兩個年輕記者－陳峰與王雷，無意間在論壇看到孫志剛被打死的消息，他們深入調查寫成〈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引來公眾熱議，而他們註定被歷史記住，因為他們讓世界知道－中國也有調查報導。而這篇報導也喚起中國社會關注，三名法學博士生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國務院宣布廢除收容制度。
- (2). 當年也是政治換屆年，胡溫在SARS處理上透明化，以及明快廢止收容制度，不少人認為這是「胡溫新政」的訊號。然而，政治黎明總是短暫的，該年底當局羅織罪名逮捕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雖然在各方聲援下，程益中無罪獲釋。看似公民社會再一次戰勝，沒想到卻是，接下來宣傳部十年從嚴作風的前哨而已。
- (3). 2005年，《新京報》報導定州殺人事件，引起中宣部不滿，總編輯楊斌被免職；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刊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引起中宣部強烈不滿，被迫停刊；還有2010《經濟觀察報》仇子明事件、2011年南方報業將長平、喻塵、笑蜀等人清除；2012年北京暴雨事件多家媒體被強制撤版；直到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曾為文指出，宣傳禁令來的更彈性更即時。皆證明胡溫十年的新聞空間不斷縮小。
- (4). 新聞空間的限縮，可以從兩個時間點切入觀察。紐時中文網總編輯曹海麗認為，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還需要關注國際觀感，前段時間對言論稍微放開一些；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維穩的壓力覆蓋全中國，作家許知遠更擔心，舉辦奧運會後，中國向全世界表達實力，提出三個自信，共產黨的傲慢與恐懼帶來輿論收縮變化。
- (5). 相反地，十年間門戶網站快速成長。門戶網站早期仰賴傳統媒體供提供內容，後來為了打造自身品牌，也陸續成立新聞中心，並看準紙媒報導空間越來越狹隘，許多優秀媒體人紛紛離開紙媒，門戶網站以高薪挖角，讓他們主持新聞欄目。
- (6). 2006年南周內部與派任長官不合而集體辭職，當時南方報業菁英媒體人，如陳峰、王雷、傅劍鋒等人都投向門戶；2008年，網易與媒體記者合作，推出「百城記」，引起巨大關注，也讓門戶網站躍躍欲試自產內容，但礙於規定，門戶網站不具採訪權，因此各家新聞中心都遊走於灰色地帶，偷偷地自製新

聞產品。

- (7). 菁英媒體人將新聞專業主義帶往互聯網，展開一連串試驗性產品。陳峰是網易新聞總編輯，網易有幾個核心欄目：看客是圖片專題、數讀是資料新聞、另一面則是深度報導，他向我介紹這次薄熙來庭審中，他如何結合傳統媒體與互聯網人才，當天發表多篇專題。
- (8). 網易還有另一項創新，就是UGC中心，由前南都調查記者龍志主持，他設立真話頻道，找來記者還原事實真相，或是讓被斃的稿子有機會還原。例如，羅昌平的《打鐵記》就是描述他實名舉報的過程；袁凌《我親歷的死亡》是多年調查記者的心得
- (9). 前騰訊網副總編輯傅劍鋒，今年剛到大浙網就任，他之前花了很多時間，想把騰訊新聞打造成精品新聞的平台，創立數個深度報導欄目《活著》、《記錄》、《視界》、《中國人的一天》，他曾用製作調查報導的思考製作〈賣腎工廠〉、〈深海搏命〉，也曾規劃〈喚醒你心中的新聞當事人〉，他覺得中國社會太健忘，他要為時代做記錄
- (10). 雖然官方不准互聯網自採新聞，但四大門戶都在打擦邊球。王雷是騰訊微博總監，他分享如何在微博上搜尋熱議事件，找到事件的主角，在微博上發私信問他，就可以寫成稿子了，這樣算是採訪嗎？
- (11). 騰訊也有創新的品牌欄目—大家，這是新創的評論類欄目，由資深媒體人賈葭主持，他要做最好的中文評論媒體，但他卻沒把握能做多久，因為評論的文章更針對性，他已經多次接到國信辦警告，為了規避風險他對外只說《大家》是部落格平台
- (12). 不可否認，互聯網極大地擴展了傳媒影響力，陳峰認為，現在一篇好報導放上互聯網，全中國人都看到了，他補充，紙媒的衰敗門戶網不是兇手，反而是紙媒的膽量和格局都變小了。
- (13). 互聯網不僅給門戶新聞更多創新空間，也在倒逼傳統媒體改變。



3.探討那些問題

- 2003年後，劉雲山職掌中宣部的十年間，為什麼新聞空間全面限縮？
- 宣傳部下禁令的方式變得更細緻，也更毫無節制，90年代以來培養的專業主義精神，屢次與監管力量發生衝突
- 2003年，騰訊網在深圳註冊，為什麼官方打壓紙媒空間時，反而門戶網逆勢成長？
- 紙媒菁英轉戰互聯網，新聞專業與新興網路科技，碰撞後如何發展？
- 國信辦規定互聯網不具採訪權，但各家門戶要靠獨家內容吸引用戶，他們又會發展出哪些打擦邊球的策略呢？
- 互連網擴大紙媒傳播能量，而且也在倒逼傳統媒體改變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 陳峰、龍志、傅劍鋒、王雷、賈葭
- 2)競爭者: 王晨、羅昌平、袁凌
- 3)第三者: 李永剛、許知遠、曹海麗

第六篇

1.題目：借力微博



2.主題：

- (1). 2010年是微博元年，短短時間內，它傳播力量突然爆發，江西拆遷女微博直播強拆，南方週末發表著名社論〈圍觀改變中國〉
- (2). 《南方都市報》率先做出改革，成立網眼版，針對網路上熱議事件，搜索網路資料與用微博訪問，做成初具規模的深度報導，若可持續追蹤，會再轉給深度部同事。
- (3). 王星是首任網眼版編輯，他與同齡的許多記者一樣，讀《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迎接新年，很早就對南周充滿憧憬，主修俄羅斯語的他，在大學就到南方報業當實習生，畢業後繼續在體育類子報當編譯，直到他被南都深度版主任找去開闢網眼，他給網眼的定位－讓新聞從這裡開始。
- (4).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是微博主導議程的範例。一名實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用戶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而引發社會爭議，她「開馬莎拉蒂」，並牽扯「中國紅十字會」，幾天內，網民起底她的個人資料，包含車牌號碼、車主姓名、她的男友是誰等等。王星事後回想，因為事情撲朔迷離，只能一直做下去，最後證明，只是網民對著自己虛構的劇情意淫，而記者放棄調查能力。
- (5). 隨著郭美美事件發酵，微博上關注中國官辦公益組織。網路爆料人周筱贇，先是看到北京農民工小學開學前校舍被拆，再看到微博上轉發一條消息，中非希望工程要在10年內興建1000所小學，發文者是24歲盧星宇，身分認證是中非希望工程執行主席。周筱贇主動介入調查，發現其父盧俊卿的世界華商會，其實在搞「合影經濟」的詐騙手段，不僅深入調查，找到內部人士說法和合約證據，並持續在個人博客發文攻擊，甚至起訴手段，要求公開說明。
- (6). 周筱贇扎實的揭黑爆料曾獲2011南方傳媒年度致敬人物、騰訊網2011年度記者、財新傳媒卓越駐校記者等榮譽。他曾說，一生影響他最深的就是高耀潔醫生，他大學曾主動在網上聯繫高耀潔，突然某個週末就買了火車票跑去河南，跟在她身旁當志工，幫忙將手稿謄打進電腦、陪同出席演講等等，他發現只有跳下來做事，社會才能改變。
- (7). 也在媒體工作的周筱贇善用傳播策略，為了吸引媒體關注，他寄了五六百封私信給大V，請他們協助轉發，果然引起媒體注意，王星也曾介入報導。
- (8). 不過對王星來說，周筱贇的爆料價值不大，頂多是把議題推上公眾視野，他花更多時間在調查華商會的工商資料，翻閱大量的卷宗與資料就能把事實還

原，他不做價值判斷，對網上的爭吵也不感興趣。

- (9). 宋慶齡基金會也是中國官辦公益之一，而且掛靠在統戰部之下，算是很敏感的單位。《南方周末》調查記者陳中小路在2011年發表一系列〈宋基金會地產生意〉，揭露官辦組織一手拿人民的捐款，另一支手卻拿錢炒房、放高利貸。這一系列報導，讓陳中小路被評為南方報業年度記者
- (10). 經濟背景，讓她習慣用數據分析，不同於社會記者先找個案，她花了三週時間去查公司工商資料，並從工商資料裡追查貸款模式，這篇報導不同其他調查報導，沒有內部人說明情況，她只能自己拼湊資料，透過法院判決書她找到宋基金會用來洗錢的人頭公司，翻閱法規發現宋基金會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最後透過微博找到關鍵人物，願意提供宋基金會放高利貸的收據，最終完成一組證據鏈完整的調查報導。
- (11). 小路和80後的年輕人一樣，看《南方周末》長大，上大學經歷過短暫沒「牆」互聯網，對他們來說，當記者是很讓人嚮往的。她還記得從高速公路交流道下來，看見南方周末的霓虹燈閃爍，心裡有多激動。
- (12). 微博幫記者傳播影響力，也能更容易找到消息源。2011年，微博也提供社會新的組織力量，2011年8月大連反PX集會、11月烏坎事件，帶動網民上街「散步」爭權利，以及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新浪微博對此事討論超過1000萬條，催促溫家寶到現場視察。微博帶動公民意識覺醒，許志永趁勢提出健全法治社會「新公民運動」的溫和改革主張。
- (13). 這一波改革風氣持續延燒，2012年掀起微博反腐浪潮，「表哥」、「房姐」等官員被調查，最著名的當屬羅昌平實名舉報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當局快速立案調查，劉鐵男被雙開處分，羅昌平也因此獲得透明國際清廉獎，獲獎致詞《在「政治霧霾」中前行》表示，在中國，若要驅散政治陰霾，推進腐敗防治工作，不可能只靠政府，也需要公民社會和私營領域的共同努力。但甫獲獎，就傳出被撤離《財經》副主編



3.探討那些問題

- 2010是微博元年，它如何在社會中迸發力量？
- 2011年，微博最熱議的話題之一，就是郭美美事件，吸引全國媒體熱烈跟進報導，為什麼一個微博上的炫富少女，會吸引眾多媒體關注？
- 在郭美美事件中，記者與網民的互動為何？王星是網眼版首任編輯，網眼版是南方都市報一項創舉，用新媒體方式調查網上熱議事件，王星如何調查網路上撲朔迷離的郭美美事件呢？
- 郭美美事件帶動網民對官辦公益組織，遠因是08年川震紅會挪用捐款爭議，但這波關注促使網路爆料人周筱贇調查中非希望工程，以及其背後組織世界華商會「合影經濟」的詐騙手法，他如何核實網民的資料？又如何把網路事件帶到媒體視野？
- 陳中小路揭露宋基會房地產生意、放款手法，她在沒有深喉爆料情況下，如何建立嚴密證據鏈？如何規避風險？如何用微博找到當事人？
- 微博從2010到2012年，人數迅速成長，也推動多起公民爭權的「散步」；知識分子藉著微博提「新公民運動」；羅昌平實名舉報貪腐高官劉鐵男，對方被雙開處分。不少人對維搏有熱切期待，笑蜀寫下〈圍觀改變中國〉。
- 2013年夏天，微博上的熱鬧，隨著新一波整風運動而靜脈下來，當初的期待，現在看來格外諷刺…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王星、周筱贇、陳中小路、張東鋒
- 2)競爭者：
- 3)第三者：李永剛、白紅義、陸曄、許知遠

第七篇

1.題目：去活在真實中



2.主題：

- (1). 微博上信息碎片化的特色，催生民粹輿論陣地，削減媒體議程設置能力，並企圖左右報導方向
- (2). 2009年5月，22歲的洗腳店打工女孩鄧玉嬌刺死地方招商辦主任鄧貴大，網路盛傳鄧玉嬌因反抗官員性侵犯而進行正當防衛，一時間，她被稱為「烈女」。因鄧玉嬌案契合中國傳統文學想像－民女訪抗胥吏欺凌。6月法院判決，鄧重獲自由。
- (3). 南方都市報記者龍志，試圖還原兩人真實面貌，鄧玉嬌不是烈女，她有精神與失眠困擾，鄧貴大只是地方小官，出身貧苦農村，家族只有他一人到城裡工作，但結果引起網上輿論熱議，龍志被人肉並要求南都開除其職務。
- (4). 龍志回憶這段過程，讓他沈澱以及思考更多，媒體的職責是要告訴大家事實本身，而不是跟大家一起憤怒，這件事情影響他後來去網易UGC中心，他在UGC下方加了一句「活在真實中」，他決定要提倡中國社會說真話的氛圍。
- (5). 商業資訊公司CIC與奧美公關聯合發佈輿情報告，2012年十大媒體熱議事件中，有高達五成是由微博首發，微博已逐漸取代傳統媒體議程設置能力。越來越多第一手資料率先在網上曝光，白紅義分析這種調查記者的神祕性與權威性被削減，有記者開始劍走偏鋒，刻意反對網上輿論。
- (6). 場景：2013年9月，北京大學教學樓裡，《南方週末》新聞部總監曹筠武、法治版編輯蘇永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楊迪、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徐泓、夏楠、胡億華兩位律師齊聚一堂，為了是討論8月初《南方週末》記者柴會群寫的〈唐慧贏了，法治贏了嗎？〉一文。
- (7). 唐慧是中國湖南永州人，該事件起源於她的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案，唐慧因上訪而被勞教，後來唐慧起訴永州勞教委，今年7月二審宣判唐慧勝訴。此案還引發信訪與「穩控」合力導致的司法不公，對判決結果因壓力導致量刑過重的討論質疑。
- (8). 此前，媒體和網民合力將唐慧打造成「聖母」形象，柴會群基於網路上的爆料，在報導中將唐慧描寫成鬧訪的訪民，而且懂得運用穩控的壓力與官方叫板，此報導一出引起輿論爭議。
- (9). 陳峰強烈批評柴會群不理解中國現實，龍志覺得他忽略或刻意避免了維穩的背景，楊海鵬稱柴是很優秀的醫療記者，卻不知怎地寫了社會題材，他這次看不下去，因為題材過於「殘忍」。



3.探討那些問題

- 網上的輿論如何影響調查報導？若記者要考慮讀者感受，容易順應公眾情緒
- 網上的評論是情緒性的，反映出割裂的中國社會，仇富、仇官心態
- 媒體失職配合網民打造新聞當事人英雄形象
- 鄧玉嬌被稱做「烈女」，當記者還原她真實形象時，為何引起撻伐？
- 錢雲會之死，媒體很長時間，只是重複網路上疑點，而不去查證
- 微博將記者在後台的採訪工作搬到前台，原有的權威感被削減
- 唐慧曾被《南方人物週刊》描寫成偉大的上訪母親，而後又被《南方週末》柴會群形容成鬧訪的訪民，稿件只在顛覆形象，沒有談及背後信訪與維穩的矛盾
- 微博成為民粹的基地，網民對記者起底、謾罵、打電話表達情緒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 龍志、柴會群
- 2)競爭者: 劉建鋒、季天琴、陳峰、楊海鵬
- 3)第三者: 白紅義、胡泳

第八篇

1.題目：新聞業的天氣



2.主題：

- (1). 2012年到2013上半年，微博反腐顯得亢奮。周筱贛「八問鐵道部」、「表哥」、「房姐」紛紛被起底，紀許光曝光雷政富不雅視頻，層級最高當屬《財經》副主編羅昌平實名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曹海麗為此採訪羅昌平，並表達不同意見，但不影響這波反腐浪潮。受到振奮，劉虎也實名舉報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涉嫌助人侵佔國有資產、瀆職等等罪名。
- (2). 這一波政治清明時間不長，3月份兩會召開後，習近平全面接班。發生一些零星事件，歌手吳虹飛因微博上發言被拘禁、財新記者陳寶成因土地維權案件被刑拘。直到8月19日習近平主持全國宣傳會議，在講話中提到：「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宣傳思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等內容，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委員劉雲山提到：「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網際網路，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
- (3). 習近平發表819講話之後，各地黨委書記、宣傳部長、黨刊黨報都紛紛表態，並且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展開打擊網路謠言活動，南方周末甚至在頭版刊出《傅政華其人其事—超前幹實事不做救火隊》，此一報導讓不少媒體人感嘆南周精神已死。
- (4). 八月下旬，8.19秦火火、立二拆四被拘、8.22公盟及新公民運動創始人許志永，以擾亂公共秩序被批捕；8.23網路大V薛蠻子則因涉嫌「嫖娼」被逮捕，幾天後他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交代嫖娼過程；8.25新快報劉虎因涉嫌「造謠傳謠」被公安局拘留；9.13支持新公民運動的民營企業家王功權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被刑拘。最高法院甚至出台荒謬的「500條」規定。
- (5). 袁凌批評政府以90年代的口袋罪恣意抓捕異議份子，賈葭認為政權倍感威脅才會用盡全力打擊；趙何娟看出打擊大V是為了殺機做猴，石扉客評論現在收緊只是在延續統治；李永剛則分析中國互聯網監管邏輯，大V作為新的傳播節點，是重點打擊對象，曹海麗則看到了，重提意識形態讓社會變得更加分裂，一些文革式的語言重新浮現。
- (6). 許知遠寫下〈我們這一代人〉，他重新看到中國蘊含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須不斷檢討和糾正的。他也承認中國的新聞環境更差，他形容是提前進入後現代，威權的問題還沒解決，商業的力量又來侵襲，新聞空間更逼仄。
- (7). 政治力與商業力的雙重夾擊，新聞業內瀰漫著強烈的悲觀情緒。許知遠也感

嘆，中國的記者放棄自身的使命感。曾經，這層使命感是傳承的，從劉賓雁到胡舒立，胡舒立又鼓舞了許知遠。採訪中，寫下〈孫志剛之死〉的陳峰，提到當年他看著年輕氣盛許知遠年紀輕輕就當上《經濟觀察報》主筆，也鼓舞了他投身新聞業

- (8). 央視王青雷在《告別央視—留給這個時代一些真話》中寫下心情，「過去兩週，是我們央視人恥辱的兩週...開動宣傳機器打擊網路謠言，暗示大V即大謠」，王晨帶著不捨離開財新，加盟網易，但她說還是很喜歡財新；陸媛也離開了，她說「逃不過，幹嘛跟政府死嗑呢？」；當我問宮靖新聞管制，他停了一下才說「你只是好奇，但我們不想談」。《南方周末》則因年初新年獻詞事件，就已經有很深挫敗感，陳中小路失望的說，面對管制，記者只能服從；甚至柴會群認為，網路的確謠言氾濫，需要自律也需要政府管理。
- (9). 李永剛描述中國新聞業的集體壓抑。2013年10月17日《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公安局刑拘，10月23日與次日《新快報》在頭版標題「請放人」、「請再放人」，使陳永洲事件受到關注。26日，央視播出陳永洲「懺悔認罪」，承認收錢與不實報導。
- (10). 直至《新快報》陳永洲事件，胡舒立在《新世紀》發表文章〈新聞尋租不可恕〉，堅決抵制陳永洲事件中的權錢交易、新聞尋租現象。此文發表後引來南方媒體人牴觸，《南方都市報》評論員〈為何不忿胡舒立〉一文稱，譴責陳永洲是『於事無補、於理不足、於情有虧』。此事件在網上展開論辯，胡泳感慨，外在環境極其險惡之時，新聞界不能形成一個共同體；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達內也發表評論為〈決裂的時機〉。
- (11). 新聞空間收攏，經濟上又得不到相應報酬，部分記者需要精神力量支撐，寄託於成名的想像，同時，也折射出中國新聞業的價值觀衝突。90年代的記者，認為記者應該要站在弱勢一方，甚至進一步干預問題解決；2000年進入新聞業的年輕記者，卻認為新聞記者就秉持報導事實，能不能推動問題解決則不在關心之列。



3.探討那些問題

- 習近平819講話後，新聞空間收緊有哪些特徵？
- 公安部打擊網路謠言活動，他們如何開展？成效如何？
- 中國互聯網的監管邏輯為何？權責如何分工？為何要打擊網路大V？
- 中國新聞業提前進入後現代化，特徵是什麼？
- 雙重力量夾擊，中國新聞業出現普遍悲觀情緒，這股情緒的表現出的特徵是什麼？如何影響記者？
- 新聞業的集體壓抑情形是什麼？記者怎樣表現恐懼？又會如何影響他們？
- 新聞業內部分裂，價值觀出現分歧，有哪些明顯例證？

4.採訪那些對象

1)當事人: 羅昌平、周筱赟、許知遠、王晨、陸媛、宮靖、陳中小路、柴會群

2)第三者: 李永剛、袁凌、賈葭、石扉客、王星、陳峰

第九篇

1.題目：新聞自淨器



2.主題：

- (1). 中國傳統媒體2013年廣告收入急遽滑坡，上半年盤點，中國報刊廣告市場投放季度同比跌幅達12%，廣告收入下滑可能與中國經濟放緩相關，但報刊的收入滑坡遠遠超出整體經濟不景氣的關聯效應，主因為門戶網站瓜分多數的廣告資源。
- (2). 中國記者薪資是底薪加稿費制，多位記者抱怨，十年前底薪就是四五千元，十年過去媒體對新進記者底薪都未調整。據中山大學張志安副教授所做調查，中國調查記者超過六成薪資落在5000-10000元間，還算不上中產階級。
- (3). 管制下的尋租，將權力變現，部分報刊做起「有償沉默」的生意，有幾種不同作法，一開始是雜誌做了一篇扎實的揭黑報導，對方透過關係付錢拿下報導，後來演變為，記者只是拼貼網上不利於該公司的消息，也不做查證，就拿著報導向公司勒索。
- (4). 財新記者陸媛聽到很多企業界朋友向她抱怨，她珍惜這份工作，不想讓劣幣驅逐良幣，開始調查這一選題，但調查過程比想像更困難，被勒索企業不願意說，也無法取得核心的帳目資料。最終，她說服了對方，順利拿到證據。
- (5). 這條灰色產業鏈中，還有一個關鍵角色就是財經公關公司，而公關公司裡許多都是前媒體人轉職，要能說服內部人士提供合約書特別困難。
- (6). 報導出來後，陸媛受到很大質疑與批評，一方面因為內容大多採匿名消息，說服力道自然減弱不少；另一方面，批評同行讓她接到很多電話批評，新聞業在調查環境尚未健全之下，如今再出批評報導只會打擊到認真的記者，
- (7). 財新要做新聞業的自淨器，製作過《達芬奇案中案》、《刪帖生意》等報導，當中《達芬奇案中案》拿到南方周末2012年度調查報導獎，該篇報導揭露央視《新聞調查》記者敲詐兩千多萬公關費，引起社會極大關注。
- (8). 胡舒立認為，媒體要在政治與商業雙重壓力下守住底線，情況越差越要自律。財新此一舉動，打破新聞業長久以來，同業互不批評的潛規則。招致同行不滿。



3.探討那些問題

- 為何中國新聞業廣告收入銳減？為什麼是今年發生？
- 對傳統媒體造成多大影響？哪些媒體受到衝擊？全國性或區域性？
- 經濟收入持續降低，對記者有何影響？
- 新聞業尋租現象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
- 〈達芬奇案中案〉揭開有償新聞秘密，報導如何調查？如何規避風險？
- 財新持續發表〈有償沉默〉，記者陸媛分享調查過程，以及承受壓力。
- 胡舒立打破同業互不批評的潛規則，在業內提倡新聞專業主義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陸媛、高昱、胡舒立
- 2)競爭者：宋志標、賈葭、陳峰
- 3)第三者：李永剛

第十篇

- 1.題目：在路上，指向前方



2.主題：

- (1). 11月8日，中國記者節就像北京的天空，霧霾罩頂，似乎沒有任何樂觀的理由。但種種的壓力轉化為推力，萌生危機感的新聞人加快轉型。
- (2). 自媒體在2013年野蠻成長，尤其是微信公共帳號，憑著使用者粘性、私密性以及相對寬鬆的審查機制，成為最重要的新興載體。許知遠的《東方歷史評論》與前《21世紀經濟報導》深度部主任左志堅的《拇指閱讀》，是根基於行動裝置的新興媒體。
- (3). 劉建鋒原本想模仿台灣的公眾集資平台，贊助調查報導，但未能成功，他變換想法，在淘寶上「先賣後發」，贊助自己進行調查報導。
- (4). 趙何娟原本是《新世紀》高級記者，財新公費送她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看到新媒體轉型的機會，回中國後創業《鈦媒體》，提供TMT領域深度資訊，她也在思考如何發展商業模式，未來可持續地供養調查報導。
- (5). 羅昌平在思考也在實驗，他在想，如果每個人說話的成底都降低了，那還需要記者嗎？於是，他在網易真話頻道連載〈打鐵記〉，並且與《南都周刊》合作，將〈打鐵記〉做成app上架販售，他說「抽成多少我不在意，我想在新媒體有更多嘗試」。

3.探討那些問題

- 種種壓力，如何催促新聞人轉型
- 移動互聯網在2013年快速發展，記者微信有哪些實驗性產品？
- 劉建鋒為了保有獨立性，嘗試了哪些新聞眾籌模式？
- 趙何娟創立《鈦媒體》，她如何才一年內讓用戶數量穩定成長？
- 羅昌平的〈打鐵記〉包裝app販賣，他對未來新聞業的思考是什麼？
- 騰訊與網易都在嘗試UGC，前者有《大家》、後者有《真話》。

4.採訪那些對象

- 1)當事人: 左志堅、劉建鋒、趙何娟、羅昌平、賈葭、龍志
- 2)競爭者: 季天琴、袁凌、陳中小路、王星、宮靖
- 3)第三者: 李永剛、陸曄、許知遠

附件二：採訪名單



中國傳媒主管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性別
1	羅昌平	《財經》雜誌、《Lens》雜誌副主編	男
2	石扉客	前《南都周刊》主編，現任《博客天下》主編	男
3	陳峰	網易新聞中心與財經中心副總編輯	男
4	王雷	前騰訊微博總監，現任騰訊大蘇網總經理	男
5	傅劍鋒	前騰訊新聞中心副總監，現任騰訊大浙網總經理	男
6	龍志	前《南方都市報》記者，現任網易「真話」總監	男
7	趙何娟	前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現任《鈦媒體》總編輯	女
8	王克勤	前《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助理兼新聞調查部主任	男
9	賈葭	騰訊「大家」主編	男
10	左志堅	前《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部總監，現任《拇指閱讀》創辦人	男
11	曹海麗	《紐約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女
中國調查記者			
12	袁凌	《財經》雜誌、《Lens》雜誌記者	男
13	季天琴	《南都周刊》記者	女
14	王晨	前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現任搜狐新聞部主編	女
15	賀信	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	男
16	宮靖	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	男
17	楊海鵬	前《南方周末》、《財經》雜誌資深記者	男
18	王星	前《南方都市報》網眼版編輯，現任深度版記者	男
19	周筱贇	知名網路爆料人	男
20	陳中小路	《南方周末》記者	女
21	柴會群	《南方周末》記者	男
22	陸媛	前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	女
23	劉建鋒	前《經濟觀察報》記者，現為獨立調查記者	男
24	譚翊飛	《財經》雜誌記者	男
25	王佳	《南方都市報》網眼版編輯	男
26	張東鋒	《南方都市報》網眼版記者	男

27	張潔平	前《陽光時務》主編	女
專家學者			
28	許知遠	作家、《東方歷史評論》主編	男
29	陸曄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女
30	李永剛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男
31	張志安	廣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男
32	白紅義	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	男
33	笑蜀	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男



參考文獻

1. 王毓莉 (2007)。〈網路論壇與國家機器的碰撞：從三個新聞事件看大陸網路論壇對公共性的實踐〉，《新聞學研究》，92：37-95
2. 王毓莉 (2009)。〈中國大陸《南方週末》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之研究〉，《新聞學研究》，100：137-187。
3. 胡泳(2009)。〈中國網民權利分析:困境與共謀——以「綠壩」事件為例〉，
4. 《新聞記者》，11: 66-71。
5. 尤芷芸(2009)。《線上社交網站之媒介溝通經驗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 邱天助 (1998)。《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7. 張志安、沈菲 (2011)。〈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現代傳播》，第 10 期。
8. 張志安 (2013)。〈微博的興起和調查性報導的變革〉，《新聞實踐》，
9. 馬駿、侯一麟：〈中國省級預算中的非正式制度：一個交易費用理論框架〉，《經濟研究》，2004 年第 10 期，頁 14-23。
10. 陸曄、潘忠黨 (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71: 17-59。
11. 陸曄 (2005)。〈權力與新聞生產過程〉，《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
12. 楊國斌 (出版中)。《中國互聯網的力量：公民行動再現》。
13. 馮建三(2008)。〈考察中國輿論監督的論說與實踐,1987-2007〉，《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 157-195。
14. 童靜蓉(2006)。〈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 91-119。
15. 鄭宇君 (2009)。《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性：一種倫理主體的探究模式》。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16. 艾未未(2012年10月19日)。〈訪問五毛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中文版特刊。
17. 程益中 (2012年10月19日)。〈中共箝制媒體揭秘：從公開到隱蔽，由宏觀

及微觀》，《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文版特刊。



18. 胡泳（2012年1月13日）。〈2011，中國輿論的三大變化〉，《中國新聞週刊》。
19. 麥康勉(Barrett McCormick)(2005年12月30日)。〈中國媒體商業化與公共領域變遷〉，《二十一世紀》網絡版,45。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4013.htm>
20. 趙鼎新（2012年4月27日）。〈微博、政治公共空間和中國的發展〉，《東方早報》。
21. 谷禹（2012年4月20日）。〈牆裡的人想出去 翻牆的成本〉，《陽光時務》第17期。
22. 〈中國微博政治〉，（2012年3月）。《鳳凰週刊》2012年第7期。
23. 李永峰（2010年5月16日）。〈中國三分之二網民每天翻牆 防火牆過濾器太敏感引起反彈〉，《亞洲週刊》24卷19期。
24. 李良榮(1995)。〈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新聞學》，(北京)，2: 56-61。
25. 張潔平（2012年3月8日）。〈烏坎的廣場效應〉，《陽光時務》第12期。
26. 張潔平(2011年1月30日)〈微博改變權力生態 信息革命延伸全球華人〉，《亞洲週刊》，第二十五卷第五期。
27. 安替（2013年2月21日）。〈革命的推特、維穩的微博〉，《陽光時務》第43期。
28. 梅堂主（2013年2月21日）。〈從鴻忠搶筆到南周事件—大陸公共傳播環境的急遽變化〉，《陽光時務》第43期。
29. 王晨、王姍姍、任重遠、朱以師、于寧（2013年02月18日）。〈刪帖生意〉，財新《新世紀》2013年第6期。
30.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報《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雪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Hongqi/68/196802-08.htm>
31. 劉雲山（2008）。〈2008不平凡的經歷的啟示與思考〉，《求是》。上網日期：2013年5月7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8127454.html>
32. 吳恒（2013年2月26日）。〈空中樓閣的推特、毫米推進的微博〉，《中國數


- 字時代》。取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3/02/吴恒-空中楼阁的推特、毫米推进的微博/>
33. 何亮亮(2004年4月25日)。[〈中國的悲劇：程益中求仁得仁〉](#)，《亞洲週刊》。取自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3550612992/17af2.cfm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2004年11月18日)。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政法司網頁 http://www.stats.gov.cn/tjgl/swdcglgg/xgfg/t20041118_402209113.htm
35. 晨風(2011年9月18日)。[〈微博揭露湖南省委宣傳部禁令〉](#)，《多維新聞》。取自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8-08/57989646.html>
36. 劉雲山(2008年10月3日)。[〈2008年不平凡的經歷的啟示與思考〉](#)，《求是》。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8127454.html>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7年8月)，《人民網》。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195721.html>
38. 聞劍(2005年7月21日)。[〈焦國標演講 談中國的思想控制〉](#)，《自由亞洲電台》。取自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guobiao-20050721.html>
39. [〈中宣部主要職能〉](#)(無日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75332/5230610.html>
40. [〈中宣部新聞發言人介紹部門定位 詳解八大職能〉](#)(無日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GB/164113/12020201.html>
41. [〈丁關根：宣傳思想工作要幫忙，不要添亂；要唱響『主旋律』，不要搞噪音〉](#)，(1994年1月)，《人民日報》。取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724/c346979-18587673.html>
42. 列寧(1901年5月)。[〈從何著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GB/10896816.html>
43. [〈丁關根：對外廣播要堅持黨性原則，以正面報導為主〉](#)(2012年7月2日)，《人民網》。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722/c346836-18570904.html>
44. [〈違紀違規報刊警告實施細則〉](#)(2000年5月29日)。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國務院網頁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303.htm
45. 江澤民(1989年11月28日)。
〈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新華網》。
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1/content_2600239.htm
46. 詹新惠(2011年1月27日)。
〈中國報業集團十年發展歷程與現狀分析〉,《人民網》。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213308/213310/13831745.html>
47. 〈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第二階段〉(2010年9月27日),《新華網》。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0-09/27/c_12612069.htm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2002年11月20日)。
〈關於開展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工作的通知〉【公告】。取自:《北京新聞出版人才網》
<http://www.bjpress.cn/old/zcx/cbwgl/rsj/rsj2.htm>
49. 曹國星(2011年1月12日)。
〈全面收緊:中宣部禁令定調2011年中國新聞管制〉,《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華語網》。取自 <http://www.chinese.rfi.fr/中国/20110112-全面收緊:中宣部禁令定調2011年中国新聞管制>
50. 曹國星(2012年7月27日)。
〈北京暴雨 媒體人憤怒 中宣部密令曝光〉,《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華語網》。取自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12/0727/254499.html>
51. 駱亞(2012年9月30日)。
〈十八大前中宣布新密令嚴控輿論 媒體人淚奔〉,《大紀元》。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9/30/n3694745.htm>
52. 郭光華(2008年6月20日)。
〈建設中的中國式媒介批評制度—以湖南省新聞閱評工作為例〉,《人民網》。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2789/125048/7407692.html>
53. 毛羽(2007年11月7日)。
〈三地調查顯示58.4%的人認為記者屬高危職業〉,《北京青年報》。取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11/07/content_6237886.htm
54. 張千帆(2011年9月16日)。
〈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中國經驗、問題與出路〉,《財經網》。取自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1-24591.shtml
55. 林如鵬(2006年2月24日)。
〈跨媒體、跨地區、跨行業:中國媒介集團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人民網》。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4139911.html>
56. 笑蜀(2010年1月14日)。
〈關注就是力量 圍觀改變中國〉,《南方週末》。



- 取自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97>
57.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3年1月15日）。《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北京：作者。
 58. 趙鼎新，「微博已經改變了中國」，新華網，2012年1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24/c_122617681.htm。
 59. 「維穩費又飆升 多軍費 300 億」，主場新聞，2013年3月5日。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維穩費又飆升-多軍費 300 億/>
 60. 許建榮（2012年9月27日）。〈中國的那道防火牆〉，《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146>
 61. Brady, A. –M. (2006) 'Guiding Hand: The Role of the CCP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Era',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3(1): 57-76
 62. Sophie Beach (2013) . *Challenged in China- Beyond censors' reach, free expression thrives, to a point*.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
 63. Madeline Earp (2013) . *Challenged in China- although not explicit, legal threats to journalists persist*.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
 64. De Burgh, H. (2003). *The Chinese journalist: Mediating information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London; New York: Rutledge Curzon.
 65. Elsaka, N. (2004). *Beyond consensus? New Zealand journalists and the appeal of 'professionalism' as a model for occupational refor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66. Freidson, E.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7.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2 (May): 1-18.
 68. He Zhou (2000): 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 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4, 599-616
 69. Heald, E. (2009.1.28). DOING MORE WITH LESS: *VoiceOfSanDiego.org* leads the way in non-profi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Retrieved July 23, 2011
 70. Tong Jingrong (2007)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Journalism*, 2007 8:530

- 
71. Tong Jingrong & Colin Sparks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today, *Journalism Studies*, 10:3, 337 -352
72. Tong Jingrong (2010) "The crisis if the centralized media control theory: how local power controls media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0 32:925
73. Marshall, J. (2011). *Watergate's legacy and the press : the investigative impulse*. Evanston, Illinoi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74. Meyer, D. S. & D. C. Minkoff. 2004.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Forces* 82 (4): 1457-1492.
75.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6. Pan, P. P. *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77.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an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78. Zhou Yuezhi (2000)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Number 2: 577–597.
79. Epstein, Gady, Yang, Lin (Mar 2011) . Sina Weibo. *Forbes Asia*,7 (3) .
80. Tania Branigan (2011, January 27) . China tightens grip on press freedom. *The guardian*.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27/china-press-freedom>
81. The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 (2013, April 6th) . 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28-internet-was-expected-help-democratise-china-instead-it-has-enabled>
82.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12March, 2012) . World day against cyber censorship: China's enemy of the Internet. From <http://en.rsf.org/china-china-12-03-2012,42077.html>